

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三卷

南宋金军事史

目 录

第十三卷 南宋金军事史

绪 论	(1)
第一章 女真建国与南宋建立	(25)
第一节 女真诸部的逐步统一和金朝的建立	(25)
一、完颜氏统一女真各部	(25)
二、女真起兵反辽	(27)
三、金朝的建立与国势的扩展	(33)
第二节 金灭辽和北宋	(37)
一、金灭辽	(37)
二、金灭北宋	(41)
第三节 南宋的建立及抗金战略	(45)
一、以楚代宋	(45)
二、高宗继位、南宋建立	(47)
三、南宋的战略方针	(51)
四、宗泽的抗金部署	(54)
五、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	(55)
第二章 金朝军制	(58)
第一节 军事领导体制	(58)
一、中央军事领导体制	(58)
二、地方军事领导体制	(61)
第二节 武装力量的构成	(64)
一、禁军	(65)
二、戍军	(66)

三、民族军	(67)
四、义军	(69)
第三节 军兵种	(71)
一、骑兵	(72)
二、步兵	(74)
三、水军	(77)
第四节 军队编制	(78)
一、猛安谋克	(78)
二、沿袭原辽宋军队的编制	(79)
第五节 兵役制度	(80)
一、征兵制	(80)
二、募兵制	(82)
第六节 军事职官制度	(83)
一、军官仕途	(83)
二、武官品级	(85)
第七节 军事通信联络制度	(88)
一、铺驿	(88)
二、旗帜	(90)
三、牌符	(91)
第三章 金军装备与后勤	(94)
第一节 武器装备	(94)
一、兵器的种类	(94)
二、兵器制造与管理	(98)
第二节 金对军队的经济投入	(100)
一、军费	(100)
二、军俸	(102)
三、赏赐	(104)
第三节 后勤保障	(106)
一、军需运输	(106)
二、军屯	(108)

第四章 南宋军制	(111)
第一节 军事领导体制	(111)
一、中央领导体制.....	(111)
二、地方领导体制.....	(115)
三、领导方式——通信传令制度.....	(117)
第二节 军队的构成	(119)
一、正规军.....	(119)
二、非正规军.....	(122)
第三节 军兵种	(124)
一、步兵.....	(124)
二、水军.....	(125)
三、骑兵.....	(127)
第四节 军队编制	(129)
一、编制单位.....	(129)
二、统兵官的设置.....	(130)
三、士兵的等级.....	(131)
第五节 兵役制度	(133)
一、招募.....	(133)
二、强刺.....	(135)
三、其他规定.....	(136)
第六节 军事训练和军事法规	(137)
一、军事训练.....	(137)
二、军事法规——“新法”.....	(139)
三、“新法”的废弛及统兵官的腐败.....	(142)
第五章 南宋的军事技术与后勤保障	(144)
第一节 武器装备	(144)
一、长短兵器和抛射兵器.....	(144)
二、火药兵器.....	(147)
三、防护装具和军服.....	(149)
四、水战器具.....	(151)

第二节 筑城与守城技术的改革·····	(153)
一、筑城方式的变革·····	(153)
二、守城技术的改革·····	(155)
第三节 后勤保障·····	(156)
一、军费·····	(156)
二、军俸·····	(157)
三、赏赐·····	(161)
四、军需运输·····	(163)
第六章 金的全面军事进攻与宋的战略退却·····	(166)
第一节 金之战略与宋之防御部署·····	(166)
一、金的巩固两河与全面进攻战略·····	(166)
二、宋的防御部署·····	(168)
第二节 金军第一次南下攻宋·····	(170)
一、山东战场·····	(170)
二、河南战场·····	(171)
三、陕西战场·····	(173)
第三节 宋南迁临安·····	(175)
一、弃淮守江的战略·····	(175)
二、南迁临安·····	(176)
三、临安卫军政变·····	(177)
第四节 金军第二次攻宋·····	(180)
一、金的東西并进战略·····	(180)
二、宋的防御部署·····	(181)
三、西线战况·····	(183)
四、东部战场·····	(185)
五、扬州之战·····	(187)
第五节 金军第三次攻宋·····	(190)
一、金军渡江与宋的江防·····	(190)
二、攻占临安·····	(193)
三、搜山检海·····	(194)

四、黄天荡之战·····	(196)
第七章 金重点进攻南宋及其失败·····	(200)
第一节 宋金形势的变化·····	(200)
一、宋国力增强·····	(200)
二、金调整战略·····	(203)
第二节 刘豫齐国的建立·····	(205)
一、刘豫降金·····	(205)
二、齐国的内政及其军事制度·····	(206)
三、金与齐的关系·····	(209)
四、宋对齐的策略·····	(210)
第三节 金对川陕的重点进攻及其失败·····	(212)
一、富平之战·····	(212)
二、和尚原之战·····	(214)
三、饶风关和仙人关之战·····	(216)
第四节 岳飞经略荆襄及宋齐之战·····	(219)
一、岳飞经略荆襄和岳家军·····	(219)
二、岳飞第一次北伐·····	(220)
三、金、齐联军南攻与宋军的防御·····	(222)
四、岳飞第二次北伐·····	(224)
第五节 齐国的灭亡·····	(226)
一、内外交困·····	(226)
二、出兵攻宋·····	(228)
三、刘豫兵败被黜·····	(231)
第八章 南宋反攻与宋金相持局面的形成·····	(234)
第一节 金熙宗时期对宋政策·····	(234)
一、金对宋战略的变化·····	(234)
二、第一次宋金和议·····	(236)
三、金朝毁约和四路攻宋·····	(237)
第二节 宋朝战略反攻·····	(239)
一、顺昌保卫战·····	(239)

二、川陕争夺战·····	(241)
三、岳飞反攻中原·····	(244)
四、柘、濠之战·····	(246)
第三节 宋金和议的形成·····	(248)
一、议和的政治原因·····	(248)
二、罢宣抚、收兵权、杀岳飞·····	(250)
三、第二次和议·····	(252)
第九章 宋金相持阶段的战争（上） ·····	(255)
第一节 金朝宫廷政变与海陵王即位·····	(255)
一、金宫廷政变·····	(255)
二、军事与政治制度改革·····	(257)
第二节 金两次迁都与谋划攻宋·····	(259)
一、两次迁都·····	(259)
二、战前的军事准备·····	(261)
第三节 海陵王攻宋·····	(262)
一、金军四路进兵与南宋的抗战部署·····	(262)
二、金军西路受挫和中路兵败·····	(264)
三、金水军覆灭与东路军渡淮·····	(266)
四、金东京政变与海陵王兵败·····	(269)
第十章 宋金相持阶段的战争（下） ·····	(272)
第一节 宋孝宗即位及对金政策的转变·····	(272)
一、和战之争与高宗退位·····	(272)
二、孝宗的决意抗金及其半途而废·····	(274)
第二节 金世宗稳固内部、缓和外部的方针·····	(276)
一、稳固内部的措施·····	(276)
二、以战促和的战略·····	(278)
第三节 淮东争夺战与重订和约·····	(280)
一、淮东争夺战·····	(280)
二、金逼宋重订和约·····	(281)
三、“隆兴和议”后的宋、金形势·····	(283)

第四节 宋金战争的再起·····	(287)
一、南宋的备战与金朝的避战·····	(287)
二、宋军全线出击与金军数路反击·····	(290)
三、宋朝内乱与金军凯旋·····	(293)
第十一章 南宋、金农民战争·····	(296)
第一节 南宋农民战争的历史背景·····	(296)
一、土地兼并·····	(296)
二、苛捐杂税·····	(297)
三、官兵游寇的屠掠·····	(299)
第二节 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战争·····	(301)
一、钟相起义·····	(301)
二、杨么农民军的陆耕水战·····	(304)
三、抗宋反齐斗争的胜利·····	(308)
四、宋军剿抚并行与起义军的失败·····	(310)
第三节 南宋其他地区的农民战争·····	(313)
一、江西的农民战争·····	(313)
二、福建的农民战争·····	(315)
三、湖南、湖北的农民战争·····	(316)
四、广西的农民战争·····	(318)
第四节 金朝中期各族人民起义·····	(319)
一、山东、河北等地农民起义·····	(319)
二、西北路契丹的民族起义·····	(321)
第十二章 金对西夏和北方部族的战争·····	(326)
第一节 金夏结盟与军事冲突·····	(326)
一、金夏结盟·····	(326)
二、金夏军事冲突·····	(327)
第二节 金朝在北方的军事行动·····	(330)
一、金与阻鞑等族的战争·····	(330)
二、修筑界壕加强边防·····	(332)
第十三章 金与南宋的灭亡·····	(334)

第一节 金朝的灭亡·····	(334)
一、金朝的衰落·····	(334)
二、金蒙战争的爆发·····	(337)
三、中都陷落·····	(339)
四、红袄军起义·····	(343)
五、金南下拓地的失败·····	(348)
六、宋蒙联军灭金·····	(350)
第二节 南宋的灭亡·····	(353)
一、南宋的军事准备·····	(353)
二、端平入洛·····	(355)
三、蒙古出兵攻宋·····	(359)
四、襄樊之战·····	(364)
五、丁家洲之战·····	(367)
六、临安陷落·····	(368)
七、重建新朝与厓山之战·····	(370)
第十四章 军事学术与军事思想·····	(375)
第一节 军事学术的繁荣·····	(375)
一、南宋兵学的发展·····	(375)
二、南宋著名军事著作·····	(382)
三、金朝兵学的逐步建立·····	(393)
第二节 军事思想的发展·····	(395)
一、南宋著名将帅的军事思想概况·····	(395)
二、金朝的军事思想概况·····	(399)
 后 记·····	 (404)

书末附图:

- 1、南宋、金时期形势图 (公元 1208 年)
- 2、金军第一、二次南下作战经过示意图
- 3、金军第三次南下中路军作战经过示意图

- 4、岳飞第一、第二次北伐路线示意图
- 5、顺昌保卫战示意图
- 6、岳飞反攻中原作战经过示意图
- 7、海陵王攻宋东路军进兵路线示意图
- 8、钟相、杨幺起义地区图

绪 论

12~13 世纪在中国境内形成南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还有西夏、蒙古及元朝先后与之并存。在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阶段中，社会诸方面表现得异常活跃，各政权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相互间的冲突、矛盾日益加剧，而且相互间渗透、融合亦日趋明显。这种现象表明，以军事手段结束分裂走向全国重新大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这一时期的军事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伴随军事斗争的需要，各军事集团互相取长补短发展自己，客观上加快了军事发展的进程：诸如战争类型复杂多样，作战方式丰富多彩，军制体系日臻完备，军事家层出不穷，军事学术繁荣发展，军事技术长足进步，武器装备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等等。下面，仅对该时期军事的几个重要问题加以申论。

一、战争的分期及战略指导的成败

阐述南宋、金时期战争，我们以女真反辽战争（1114 年）为开端，以元军灭亡南宋的厓山之战（1279 年）为终结。在这连绵不断、长达一百多年的战史中，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八个阶段。

前期（1114~1129 年）始于女真涑流河誓师，至宋高宗将行在迁临安，为金朝攻辽、灭宋及南宋建国时期。此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114~1125 年）女真反辽建国，并发动以辽五京为目标的灭辽战争，称雄北方；第二阶段（1125~1127 年）金宋战争，金军两渡黄河，兵围宋都开封，仅一载有余，攻灭建国 160 多年的北宋王朝；第三阶段（1127~1129 年）金出兵攻击建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南宋王朝，经过山东、河南、陕

西战场的争夺，南宋决定弃淮守江，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尔后宋金南北对峙的格局形成。

这一时期，金朝在战略指导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生息在北方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以 2500 名军兵向军事大国辽朝宣战，并接连获胜，迅速发展壮大，亡辽灭北宋，很快席卷而南，把南宋赶到江南一隅。金朝的勃兴，与其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是分不开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洮流河起兵反辽后，首先把主攻方向选择在辽东北部地区与女真接触部，凭借负山抱水的有利地形，诱使辽军远离军事重镇上京和东京，在宁江、出河店、护步答冈等地进行会战，以歼灭辽军有生力量，挫败辽军锐气。接着，抓住战机，开展以辽五京为战略目标的灭辽之战。攻取五京的前后步骤是东京、上京、中京、西京、南京，战略计划周密得当。占领辽东京，获五十四州兵粮，辽东半岛与女真故地连成一片，金军事实力大增。西进上京，拔辽“太祖创业之地”^①，使辽军丧胆。挥师南下，轻取中京，占有“幅员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险足以自固”^②的形胜之地。辽中京一失，西京和南京失去屏障。金军先取西京，而后集中兵力夺取南京。五京一下，辽朝随即灭亡。史称：“太祖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③这正是对金朝战略指导方面成就的客观评价。

金灭辽后，与北宋遂成敌国。金挟灭辽之威，兵分两路出平州和大同南下，一东一西，形成钳形攻势，指向宋都开封。金战略部署得当，于是节节胜利。最终实现两路夹击会师汴京（开封）的战略目标。面对金军攻势，宋军事统御机构指挥不当，战守无方，没有针锋相对地形成一个攻防体系。特别是在金西路军屯兵太原城下之时，未能集中兵力对付深入腹地的金东路军。金撤军后，北宋亦未亡羊补牢，作防御部署。结果在金军二次卷土重来之时，束手无策，于是失败则不可避免。

①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② 《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

③ 《金史》卷二《太祖纪》。

北宋灭亡，南宋建立。金采取巩固两河，而后全面进攻的战略，以期消灭建于应天府的南宋。河北、河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西接川陕，东连山东，南抚河南。金以两河为基地，屯兵积粮，频繁三面出击。战略指挥正确，接连获得胜利。于是尽占淮河以北地区，迫使宋廷南迁临安。

南宋新立，当务之急是选贤任能，革新军政，制定积极进取的战略计划，发展军事力量。然而，宋高宗赵构昏聩无能，任用佞人，排斥贤相李纲，改积极抗战方针为消极防御。结果导致李纲建国十策难以完全落实，宗泽经营的开封基地前功尽弃，中原抗金义军的活动遭受打击，大好形势转眼即逝。随后，宋廷采用弃淮守江的战略，放弃两淮，南逃临安。结果造成临安卫军政变，金军亦乘机南下，高宗航海走避，南宋险些亡国。

中期（1130～1208年）从金、南宋黄天荡之战到南宋开禧北伐失败后金宋重订和约，为南宋、金和战时期。此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130～1140年）金军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宋军由战略防御转为主动进攻，战略形势开始有利于宋方；第二阶段（1141～1208年）从淮西会战到宋杀韩侂胄议和，宋金形成战略均势。这一阶段的战争最为激烈，交战双方互有胜负。但是，结局均以宋割地纳币而实现议和。

这一时期的军事是本卷研究的重点。南宋军事制度的健全，金朝政治和军事制度的改革，金、南宋之间的重要战役，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

黄天荡之战是中期开始的标志。由于南宋韩世忠部在黄天荡拦截金军归路，北撤金军险遭灭顶之灾。此后，金军不敢轻易渡江，南宋朝廷得以立足江南。伴随着南宋发展军事技术，改革军事制度，加强军队建设，从而使国防力量有所增强，从屡战屡败到胜多败少，战略形势逐渐向有利于南宋方面转化。金朝也从黄天荡之战后调整战略，从全线进攻改为以重兵争夺川陕。金获胜陕西，得陇望蜀，图谋入川。金宋两军在和尚原、仙人关展开激战，宋胜金败，金窥蜀成梦。以后，宋金多次交兵，北伐与南攻，

均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

从战略角度来总结这一时期的军事,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金由强转弱的历史教训,二是南宋战略举措的得失。

第一,金由强转弱的历史教训

军事强盛的金朝,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新建的南宋,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攻宋战争。结果事与愿违,非但灭南宋不成,相反自己却逐渐由强转弱。究其原因,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

一是缺乏总体战略构想。金占领两河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已有战果,进而消灭南宋,统一全国。此时金朝的正确战略方针应当是进一步占领和巩固两淮地区,而后自北向南逐步推进。实现这一方针的必要条件是军事、政治、经济协调一致。但是,金朝统治者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政治上没有吸取汉制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争取更多的北方汉族地主的支持。经济上没有及时制定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有效措施,以致黄河南北“荆榛千里”;山东之地“老稚离散,田野荒芜”。而淮南地区“不耕之田,千里相望”。^①经济缺乏潜力,造成国力不足和兵源不畅。金统治者不顾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一味采取“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②的作法,结果宋帝未获,兵力受损,灭宋无望。

二是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金对南宋作战,开始实施全线进攻,战线过长,带来兵力不敷分配的弊端。尽管金军“风行电举,兵无留难”^③,进展迅速,但无法巩固所占地区。常常愈是长驱深入,愈是处处被动。即使由全线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三是不能及时调整战略战术。金亡辽灭北宋,主要依靠的是骑兵作战。在长期的征战中,金骑兵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进

① 《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一百四十八,绍兴元年十月一日。

② 《金史》卷七十四《完颜宗翰传》。

③ 《金史》卷七十四《完颜宗望传》。

入江、淮地区后，未能根据水系纵横不利于骑兵作战的特点，改变骑兵远程出击的作法，及时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水师。结果始终长于骑技，短于水战，水上优势一直被南宋所占有。这也是金不能像占领两河地区那样，在两淮安稳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南宋战略举措的得失

南宋在金军北撤之后，实施几项战略性的举措是较为成功的。一是加强川陕防御，阻挡金军入川之举；二是建立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连结淮东的江淮防御体系，以阻止金军的进攻；三是实施以荆襄为基地，联络河朔，乘隙而进，直捣中原的战略方针。因之，形势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方面转化，南宋曾一度出现北进的较好形势。如若南宋的战略指导者能继续采用正确的战略，反攻中原，收复失地，甚至灭亡金朝，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南宋以妥协求和、偏安自保为基本方针，贯彻以文制武的军事指挥原则，极大地抑制了领兵将帅才能的发挥，妨碍了军事的发展。尤其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采取的解除三大将兵权，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缩编军队等错误措施，无疑是自毁长城。结果南宋在偏安中逐步走向衰弱。

后期（1209～1279年）以蒙古军兵围西夏中兴府为开端，进入蒙古灭夏、金、宋时期。此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209～1227年）蒙古在北方草原建国后，矛头指向西夏和金朝，采取先弱后强的战略，逼西夏就范，附蒙攻金，迫使金弃北图南，与宋起战端，蒙乘机灭夏；第二阶段（1228～1234年）蒙古巩固北方统治之后，大举灭金，采取联宋灭金策略，灭亡金朝，击败收复东、西、南三京的宋军；第三阶段（1235～1279年）蒙（元）与宋的战争，南宋厓山之战失败，元统一全国。

这一时期，以多元战争的战略指导为研究的重点。后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多元的，有蒙夏之战、金夏之战、宋金之战、蒙金之战、蒙宋之战等；战争类型是多样的，有兼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等性质的战争。复杂多样的战争，给战略指导者既带来困难，也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机会。金、夏、宋、蒙四国战略指导

的优劣泾渭分明。兹将宋金战略指导的得失分述如下：

金朝的战略指导最为拙劣。在四国中，论版图金最为强大，北达今外兴安岭，南抵淮河，东临于海，西至陕西，人口4470余万^①，有充足的兵源。但是金的战略地位也有明显的弱势，西北邻蒙古，西邻夏，南邻宋，处于西、西北、南三战之地。金要取得立足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与三国的关系。当时，金与三国的关系是：夏附于金，金宋订立和约，金蒙世仇，结怨甚深，蒙古人对金“怨入骨髓”。^②对待三国的战略，金的正确选择是结夏联宋，对抗蒙古。团结西夏，可从西面牵制蒙古南下。成吉思汗于建国后对金“乃定议致讨，然未敢轻动”^③，其重要原因是担心攻金时西夏可能构成的侧面威胁。联合南宋，可以免除后顾之忧，避免两面作战，全力对付蒙古。然而，金朝战略指导者却错误地选择了绝夏、攻宋、抗蒙的战略，结果三面树敌，自我孤立，致使形势急转直下。蒙古攻夏，夏求援于金，金坐视不救，夏转投附于蒙，与蒙联手攻金，金处于西、北两面受敌的窘境。金为减轻压力，从中都迁都开封，采取弃北图南的战略，进攻南宋，企图挹彼注兹，失之于蒙而获利于宋，于是“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④。结果，金北方尽失于蒙，南方受挫于宋，国土日蹙，国力日衰，在蒙宋夹击之下“遂至失国”。

南宋在四国中处于较佳的战略地位，占有“财利之渊”的东南和四川经济富庶之地，^⑤拥兵百万，更具有火器和水师优势。西北的夏不能与之匹敌，北方的金已日趋衰落，勃兴的蒙古攻击目

① 《金史》卷四十六《食货》载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人口统计：“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赵文林、谢淑君撰《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章第2节《金国人口》，都说明蒙古攻金时金人口在4400多万。

② 孟珙：《蒙鞑备录》。

③ 《元史》卷一《太祖纪》。

④ 《金史》卷十六《宣宗纪下》。

⑤ 叶适：《水心别集》卷十。

标首先指向夏、金。此时是宋向外发展的最佳时机，应乘隙而进，利用金蒙中都之战，金军主力被歼，中都被围之时，向北发展，既可由川陕东攻，又可出荆襄北进，还可从淮东北上，以收复黄河以南地区。然而，南宋统治者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对北方三国厮杀作壁上观，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待西夏灭亡，金北方尽失，战略转移，南攻宋地，宋才被迫应战。宋虽阻止金军南下，但兵力受损，蒙古势力也进入黄河以北，宋再无力北攻。金垂亡之际，宋尚不知唇亡齿寒，大祸将至，竟作出联蒙灭金的决策，结果寸土未得，实力暴露，最终走向灭亡。

在历时 100 多年的南宋、金时期，较大规模的战争有数百次。这一时期，战争的表现形式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本国内部的军事冲突，有反对阶级压迫的农民战争等等。战争的性质有兼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等。这一时期的战争是南北两大军事体系的矛盾与融合。南方以南宋为代表，军事体系是继承唐和北宋；北方以辽、金、蒙古为代表，军事体系渊于北方游牧民族。南北军事冲突，实际上是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军事交流，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时期军事的发展。同时，为实现全国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战争的发展与作战方法的变化

南宋、金时期，随着南宋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备，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使战争的规模、水平及作战方法都较前代有所发展和变化。现将战争的发展和作战方法的变化分别加以叙述。

第一，战争的发展

南宋、金时期较前代相比出现许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是战争的目标有了新变化。南宋以前，中国历史上形成以中原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为正统，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割据为藩属的传统观念。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发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

是以掳掠为主要目的，并未危及到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但是到了南宋金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战争的目的已不再是单纯地掳掠，而是以取代中原王朝、统一全国为目的。以金朝为例，早在天辅五年（1121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伐辽诏中就提出“今欲中外一统”^①；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指令金军将帅，“俟宋平，当立藩辅”^②，要取代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金海陵王完颜亮为实现“万里车书一混同”^③，而迁都攻宋；都表明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实现统一。蒙古的灭金之战和元朝灭宋之战的目的，也是要“天下一家”^④。战争目的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因此无论由谁最后完成统一都是历史的进步。

二是战场地域空前广阔。南宋以前，战场地域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南宋金时期，战场地域广阔程度为前所未有。金建国于混同江流域，蒙古立国于漠北草原，西夏控制今甘肃、宁夏及内蒙古大部地区，西辽建都于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大理国于大理（今云南大理）建都，南宋统辖东南之地。统一战争就是在广袤的大地上展开，战场地域涵括了山地、平原、沙漠、草原、江河、海洋、湖泽等几乎各种地形条件。金军动辄“经涉兵寇数千里”^⑤，或“越千里以袭辽主”^⑥，或渡江泛海以穷追宋帝。

三是战争速度和机动性增强。女真和蒙古属于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一年四季鞍马车辆迁徙流动，逐水草游牧和集体围猎的生活，养成群体性和流动性的习性。这种习性作用于战争，军事行动的速度和机动性都优于定居的其他民族。女真、蒙古在进行兼并和统一战争中，充分展示了速度快和机动灵活的特点。如金灭辽之战，仅在天辅六年（1122年）的一年间，金军遵照金太祖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卷七十六《完颜杲传》。

②⑥ 《金史》卷七十四《完颜宗翰传》。

③ 《会编》卷二百四十二《正隆事迹记》。

④ 《元史》卷四《世祖纪四》。

⑤ 《金史》卷七十四《完颜宗望传》。

“不可持一战之胜，辄有弛慢”的命令，^①连克辽中京、西京、燕京等地，辽天祚帝靠“日行三百五十里”^②的骏马才屡次化险为夷。《金史》曾赞誉金帅完颜宗望行军作战之神速说：“启行平州，战胜白河，席卷而南，风行电举，兵无留难，再阅月而汴京围矣”。^③再如蒙古于金贞祐二年（1214年）攻金，短短的几个月间“凡破金九十余郡”^④。说明战争速度之快。

四是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加大。南宋金时期，中国封建经济已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垦殖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为战争提供了雄厚的人力和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投入战争的兵力明显增多，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如海陵王攻宋，号称“提兵百万”，实际征调军兵51万多，加上征用的民夫，超过百万之众。当时，仅征用的马匹就多达56万匹。金蒙战争初期，金军仅据守野狐岭要冲的兵力就有三四十万。连刘豫齐国发兵攻宋，也一次签军30万，号称70万。战争不仅投入兵力多，而且数量众多的火器等先进武器用于作战，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作战中“火箭环射”、“炮飞如雨”，“声如雷霆”，“烟气涨天外”，“震城土皆崩”的激战场面，史不绝书。以往使用冷兵器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被应用大量火器进行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方式所取代。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也随之加大。

第二，作战方法的变化和革新

恩格斯曾说过：火药是“注定使整个作战方法改变的新因素”。^⑤南宋时期，作战方法较之前代出现很大变化，正是火药兵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 《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上》。

③ 《金史》卷七十四《完颜宗望传》。

④ 《两朝纲目备要》卷十四。

⑤ 恩格斯：《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金时期，宋、金、蒙三方先后都掌握了火药兵器制造技术，并大量生产已定型的火器和创制先进的新型火器。当时，火器生产的种类、数量、性能都颇为可观。尤其是管形火器的出现，在兵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火器大量应用于作战，战场上刀光剑影、捉对厮杀的场面逐渐被“火炮如雨”、“声如雷霆”的景象所取代。武器装备的变革，使以往冷兵器装备军队进行作战的情形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冷热兵器共用的多兵种联合作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步、骑、车等兵种联合作战的方式。但是，限于冷兵器装备的水平，直到南宋之前，使用冷兵器以步兵为主排兵布阵的作战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到了南宋金时期，军队的编成已着意于多兵种的配合。如金忠孝军中有飞火枪队，元军中置炮手军，南宋每支正规军中一般都配有步军、马军、水军、弓弩军等兵种。综合使用冷兵器和火器进行多兵种联合作战是这一时期常用的方式。如宋元丁家洲之战，宋军出动“军马十三万”，采用步、骑、水等兵种联合作战的方式，其中步军指挥使孙虎臣领步兵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①，宰相贾似道统后军。元军战舰顺江而下，“骑兵夹江而进，炮声震百里”^②，大败宋军。元军所采用的也是多兵种联合作战。

二是攻守城作战的地位更加突出，出现许多新的战法。南宋金时期，城市的发展很快，其政治、经济、军事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因此，一个重要城市的争夺往往成为整个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如蒙金战争中的中都之战和宋元战争中的襄樊之战，都是经过长达五六年之久的争夺一城，最终以一城之得失而决定了战争全局的胜负。基于此，当时不仅南宋重视攻守城战法，而且长于野战的金军、蒙军也开始着意攻守城战法。参战各方都力求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用于攻守城作战，于

^{①②}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伯颜传》。

是在攻守城战斗中出现许多新的作战方法。如陈规率领宋军守德安城，用长竹杆火枪焚烧敌军大型攻城掩体“天桥”，使敌军攻城失去依托。^① 据守开封的金军曾用震天雷火炮炸毁蒙军制作的大型可移动的掩护性攻城器械“牛皮洞子”，致使掘城作业的蒙军“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②在攻城方法中，金攻太原之役使用长围久困的“锁城法”，及以炮集中攻击敌城一隅之法，蒙军攻蔡州采用的先发火炮焚毁城上楼橹而后攻城之法，均为新出现的攻城法。

攻守城作战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城防建设的发展。以往为防御弓弩、云梯而设置的城防体系得到了根本的变革，新的防御敌军炮石和便于守军施放炮石的城防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三是水战日趋频繁，作用明显增大，战法也有革新。南宋金时期，江河湖泊作战以及海战等水战五光十色，蔚为壮观。较之以往的水战，范围和规模扩大，次数明显增多，战具有巨大进步，战法也大有变革。水战的作用随之越来越大，甚至一次水战能决定整个战争的命运。黄天荡之战使金军从此不敢贸然渡江，宋廷得以在江南立足。采石之战使两淮战场一败涂地的宋军转危为安。丁家洲之战使宋 2000 多艘战船毁于一旦，水师优势顿失，元军扬帆顺江东下，宋廷投降。厓山之战决定了南宋最后灭亡的命运。南宋金时期水战还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当时，内河、外海战船的制造技术都较先进，内河船体增大，类型增多；海船构造新奇，性能提高。南宋所制造的近百米长的内河战船，装载几百人，“捷如飞翔”。^③ 车船由已往的一车（两轮）发展到多达二十多车，并成为水军舰队的重要舰种。各种类型的战船不断出现，如拆装自如，运载和作战两便的“马船”；仅有两舷和站板的无底战船；“江海淮河无往不可”的多性能战船等等，^④ 不一而足。南宋建造的“铁壁铍觥平

① 陈规：《守城录》卷四。

② 《金史》卷一百十三《赤盏合喜传》。

③ 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十六《入蜀记》。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之二十二。

面海鹘战船”，为目前以金属作为造船材料的最早记录。近年在泉州发现的南宋的双桅、多层船壁、带有水密隔舱海船，其造船技术具有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战船进步的同时，各种新式火器也装备于船上，从而改变了以往水战常用的冷兵器近距离接舷战法，诞生了远距离攻击的新战法。于是，水战的激烈程度也大大提高。如厓山海战中所出现的“炮火雷飞箭星落”，“流尸漂血洋水浑”的激烈场面，^① 当为前所未有。

四是野战地位提高，新战法不断出现。南宋金时期，金骑兵长于野战，常以其快速机动和强大的突击力克敌制胜。南宋军队在野战中创造出许多新的作战方法。如宋将吴玠提出的“以分队制其骑兵”、“番休迭战”的“叠阵法”等以步制骑的战法，^② 就是一种创新。并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屡次获胜，对防卫川陕地区作用颇著。岳飞“好野战”，他针对金军惯拐子马（左右翼骑兵）和铁塔兵作战，曾采用了步骑协同对攻的战法，重创金军，大获全胜，开南宋在野战中以对攻方法克敌制胜的先河。南宋将领魏胜创造一种在野战中综合运用各种兵器歼敌的战法。军中装备大量的炮车、如意车、弩车等战具，炮车可施火石炮，如意车和弩车，每辆配备大枪数十枝，弩车上置床子弩。战时以车为阵，敌远可以发射火石炮和弩箭，敌近可使用大枪和刀斧，可攻可守，“进退俱利”^③，在野战中收到很好的效果。华岳在《翠微先生北征录》中总结了南宋各地破金军骑兵的二十四种战法，称之为“陷骑之法”^④。反映了南宋军民在制服敌骑方面的创造才能。

五是远距离作战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远距离作战较之肉搏近战是一大进步。南宋金时期，由于火炮、火枪等火器装备军队，为

①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卷十四《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世界书局本。

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魏胜传》。

④ 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五《破敌长技一》。

远距离发动攻击，杀伤敌人创造了条件。于是，远距离作战频繁出现在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史籍中，野战、水战、攻守城之战都不断地出现利用火器的燃烧性能和爆炸性能，远距离制敌的记录。如《辛巳泣薪录》记载，金兵在蕲州城外环列抛石机，向城内抛射铁火炮，引起多处爆炸，造成城中宋军民伤亡，甚至“头目面霹碎，不见一半”^①。陈家岛水战，宋水师改变以往常用的接舷战，采用远距离的“火箭环射”，“以火炮掷之”等方式^②，歼灭数倍于己的金军水师。金蒙战争中，金军使用的便于单兵携带的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③，曾大败蒙军。开庆元年（1259年），南宋寿春府创制的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④，远距离射杀敌军。蒙军也随后仿制成竹火筒，用于作战。

三、军制的基本特点

在中国军制发展史上，南宋金时期的军制是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主要表现是由多元逐步走向合流。多元是由于这一时期诸国并立，各国军制自身都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合流是根据兼并和统一战争的需要，各国又都力求吸收对方军制的长处，客观上促进了各国军制走向合流。下面就南宋和金朝军制的基本特点加以概述：

一是中央军事领导体制的逐渐强化。这个时期，金与南宋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都经历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金早期尚无健全的军事领导体制，征伐大事皆由皇帝和辅政勃极烈决策。占领中

① 赵与峕：《辛巳泣薪录》。

② 分别见《宋史》卷三百七十《李宝传》、《金史》卷六十五《完颜郑家传》。

③ 《金史》卷一百十三《赤盏合喜传》。

④ 《宋史》卷一百九十七《兵志十一》。

原后始置全国最高军事机构都元帅府，中央军事职官的名称和职责才逐渐明确。南宋初期中央军事机构简单而粗糙，朝廷设御营司执掌兵权。最终两国殊途同归，均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职责分明，分工细密，体制健全，与当时的武装力量体制相适应。

二是地方军事领导体制的行政化。当时，南宋的地方纯军事机构日趋减少，金除在个别地区仍保留少数几个统军司、招军司之外，大部分地区与南宋一样设路、府、州、县管辖。地方长官集军政权力于一身，既是地方军事首脑，又兼理民政。

三是军队编制的系统化。南宋沿袭北宋后期的旧制，采取军、将、队编制，以万人一军，每军十将，一将千人，每队五十人。金军编制渊于女真旧制、辽制和宋制三个系统，大体是女真军采用五、十、五十、百、千、万等六级编制，原契丹、奚、渤海等军采用辽都统司编制系统管理，汉军袭用原宋军的军、将、队编制。金国军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汉制成分。

四是骑、水、炮兵的构成有较大的变化。同以往相比，南宋金时期的兵种构成发生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骑兵数量和质量增加，水军规模扩大，炮兵开始逐渐成为独立的兵种，步兵的作用日益缩小，地位开始下降。兵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战略形势的需要。女真、蒙古为马上民族，组成的精锐骑兵集团南下作战，促使南宋骑兵作战能力也有所提高。水军的发展与南宋依江淮为守战略及造船业的进步相关连。南宋的水军规模大大超过北宋，沿江、淮要冲之地，常驻水军近三十支，每支兵额一般在四千人以上。金人赞叹宋人“使船如使马”的同时，也力图发展水军。蒙军由于有了足以同南宋较量的水军，才能突破宋军江防而获胜。火药兵器的应用与发展，促进军队新兵种炮兵的产生。火器威力日益提高，操作技术渐趋专业化，使炮兵脱离以往步炮混合编组而成为独立兵种。

五是征兵制与募兵制兼行。南宋金时期，兵役制度是征兵与募兵兼而有之，金以征兵制为主，辅以募兵制；南宋以募兵制为

主，也采用配隶、强刺等属于征兵制的方式。金征兵制产生于奴隶占有制，募兵制是占领中原后吸收了辽、宋制度。南宋的募兵制是从北宋沿袭下来的。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募兵的比重日趋增大，征兵的比重在逐渐缩小。

六是宋金军事职官的地位向两极分化。金、南宋军事职官地位有一定的区别。金以武立国，重武轻文，甚至皇帝和领三省事大臣也喜亲自统兵征战。因此，金军职官员地位较高，金人以能获得军职为荣。金人主要通过荫袭、军功、武举、亲军护卫等途径获得军职，制度较为严格。南宋军事职官地位远不如金，特别是南宋中期以后，由于恢复了以文制武旧制，大批文臣被任命为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督视军马、都督军马等职，于是武官事权又进一步受到了削弱。

七是军事后勤逐步制度化。金早期并没有专门从事军事运输的后勤人员，参战军兵自带兵器和少量口粮，国家不向军队提供经费，也无专项军费开支，军队通过在战领区掳掠，进行武器和粮草的补充。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晚年总结作战经验，提出“粮饷必继”^①，强调后勤供应对战争的重要性。金太宗之后，金军逐渐对后勤运输有所重视，并建立起军费征收、使用等管理制度。南宋军队后勤运输较之金更为先进。

八是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军事通信网络。南宋金时期，军事通信联络较前代有所进步。南宋、金都在辖区各地设立递铺和驿站，形成网络，朝廷发布指令，军队奏报军情等，通过递铺和驿站及时传递。当时常用的快速传送，即“急递”，能日行300里。南宋朝廷要求统兵主帅行军作战，不论有事无事，每天均要发送奏报，急递呈送朝廷。

九是军事训练注重切合实战。南宗金时期，军事训练较之前代有所发展。南宋颁行教阅法使军事训练具有严格的制度。训练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

更注重对实战的效果,“专习制御摧锋破敌之艺”^①。南宋将领岳飞对军队训练提出“视无事时如有事时”,即按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宋高宗在写给岳飞的一道《御札》中说:“可更戒飭所留军马,训练整齐,常若寇至”。^②这也就是练为战。由于水战的作用加大,南宋对水军训练重视的程度超过马步军,多次在江、淮、海上“措置教阅水战人兵”^③。水军训练的时间从每年春秋两次,到每月都要训练演习。水军实战能力大大提高。金朝也重视军事训练,“练士卒以振兵威”^④。军事训练侧重箭术和战斗意志的训练。同时,也重视新兵器的使用训练,如教阅时展示炮具等兵器。

四、军事学术的繁荣和军事思想的发展

军事学术的繁荣和军事思想的发展首先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战争,二是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南宋金时正处在全国大统一的前夜,频繁的战争,促使当权者重视军事;军事将领和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是以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依托。仅从刻版印书业的发展来看,地点由北宋的四处,到南宋增至一百七十多处。官府、书坊、私人印书蔚然成风。这无疑对南宋金时期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的交流起到了推进作用。

第一,军事学术的繁荣

南宋金时期,军事学术著作的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都超过了前代。整个南宋金时期,军事学术繁荣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南宋兵制研究的成就、城防理论的发展以及金朝兵学体系的

①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

② 《金佗粹编》卷二《高宗皇帝宸翰卷中》。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八,中华书局1988年4月本。

④ 《金史》卷一百九《陈规传》。

创建最为显著。

一是兵制研究的成就。南宋朝野都十分重视对兵制研究，当时编纂的大型类书中，如《山堂考索》、《玉海》等出现专列的“兵制门”。同期诸家文集中讨论兵制问题的文论及奏状札子数量骤增。如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多处研讨兵制，连“心学”鼻祖陆象山、理学大师朱熹也都发表过有关兵制的论述。这一时期，兵制研究成绩最显著的是出现系统的研究兵制史专著——《历代兵制》。兵制研究的兴盛是军事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是城防理论的发展。战国名著《墨子》已对守城设施、城防器械、兵力部署以及守城方式等做过较为详尽的记述。然而，作为城市攻防的第一部专著是南宋陈规撰的《守城录》。该书集前代城邑防御理论之大成，并开创火器与冷兵器共用时代城市防御理论之先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城防理论。

三是金代兵学体系的创建。金朝的兵学是在同辽、宋、蒙作战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金朝文字出现较晚，早期谈不上兵学。金灭北宋占领汴京后，北宋府藏悉归于金，其中不乏宋朝所收集的历代兵书。以后，金朝不断翻刻、注释历代兵书和用女真文译写汉籍兵书。如金贞祐年间刻印的宋施子美所著《武经七书讲义》，用女真字译写《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等。金中期以后，开始有自撰的兵书。目前所知有两部：金章宗承安年间国子斋长张守愚所撰的《平边议》三篇^①和金末马珣撰的《北新子》十万言^②，可惜两书均已失传，内容难以知晓。从兵书的搜集、翻刻、注释、译写到著述，反映出金朝兵学体系逐步建立和发展的轨迹。

① 《金史》卷十《章宗纪》载：“国子学斋长张守愚上《平边议》三篇，特授本学教授，仍以其议付史馆。”《辽金元艺文志》商务印书馆本第17页作“《平辽议》”。两说当以《平边议》为是。平边指平定北边部族的攻扰。张守愚撰此书的前一年，金右丞相完颜襄率军平定北方部族鞑靼等，“进军大盐泺，分兵攻取诸营”。此书正是为此而作。

② 元好问：《中州集》下册，中华书局本第449页。

第二，军事思想的发展

南宋金时期，是军事思想的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对历代军事理论的研究和总结，更重要的是产生许多新思想，主要反映在《翠微先生北征录》、《美芹十论》、《九议》、《酌古论》、《中兴论》等军事著述以及著名将领的言论中，现就军事思想体系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分述如下：

一是战争观。南宋金以前，军事思想家对战争的性质认识，已经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南宋时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更为深刻。陈亮在《酌古论》中用“正”与“智”来区别军事对立的双方。陈亮所说的“正”包含有忠、公、仁、信等成分，智包括奸、私、残、诈等意义。他认为，英雄代表正义一方，而智者代表非正义的一方。“去诡诈而示之以大义，置术略而临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为矣。”如果战场上仅仅是智与勇的较量，“而胜负之数未可判”。但是，“以正而攻智，以义而击勇”，胜方自然属于前者。在未交战之前，非正义一方“气已沮矣”。陈亮把战争的结局与战争的性质联系在一起，认为正义战争最后必定战胜非正义战争。这种正义战争必胜、政治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在当时已为许多军事家所共识。兴兵作战时宣扬自身的正义性，揭露敌方的非正义性，在政治上取得压倒敌人的优势。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发兵攻辽前曾对金军将帅说：“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①战争是为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史集》载：成吉思汗起兵攻金之前，向上天祈祷，说是金朝皇帝“刮起战乱的风，他挑起了战乱”，用酷刑害死俺巴孩汗等先祖，所以他起兵去复仇。于是，“靠着正义和意图的正确，他战胜了军队众多、国土辽阔、拥有无数坚城”^②的金朝皇帝。以祈祷的形式宣传正义在我，鼓动军队为正义而战。

二是战略观。南宋金时期，战略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宋、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5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金对峙，南北对垒的战略形势，对当时战略观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南宋始终有两种思想进行斗争。一为“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①的消极防御思想。一为坚持反攻，力主收复中原的积极进攻思想。前一种战略思想在南宋占主导地位；后一种思想大多为南宋有成就的兵学家和军事家的正确主张，但在宋廷中并未受到重视。如辛弃疾就主张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他在《美芹十论》中说，“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②。他的另一军事名篇《九议》也是所陈“皆恢复大计”^③。岳飞明确提出了以襄阳为基地，连结河朔，直捣中原的战略方针。陈亮还在《中兴论》中“论进取之道”时，提出了“东举齐（山东），西举秦（陕西），则大江之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④的收复中原的战略思想。此外，南宋许多有识之士也反对消极防御，主张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如胡铨在《戊午上高宗封事》中说：“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叶适反对消极等待战略形势的变化，认为“时自我为之，则不可以有所待也；机自我发之，则不可以有所乘也。不为，则无时矣，何待？不发，则无机矣，何乘？”^⑤并提出“捣陕虢，摇关辅，得其要郡而守”的战略思想。

金的战略指导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期对南宋的战争，其“以和议佐攻战”的积极进攻战略思想起主导作用；中期对南宋战争，本着“以攻为守”和以战促和的积极防御思想；后期对蒙战争，则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在战略和战术思想方面还有不少新见。如陈亮在《酌古论》中提出作战指导有两种术：一种是“运奇谋，出奇兵，

① 《金佗粹编》卷十二《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

② 邓广铭：《稼轩诗文抄存·美芹十论·详战第十》。

③ 邓广铭：《稼轩诗文抄存·九议·其九》。

④ 陈亮：《陈亮集》卷二《中兴论》。

⑤ 《水心别集》卷十《待时》。

决机于两阵之间，世之所谓术也”。一种是“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后，次第收之，而无一不酬其意”。用现代军事观点分析，陈亮所说的前一种是战术，不仅具有强烈的战术意识，而且还萌生了战役思想；而后一种术，指的就是战略思想。陈亮还认为，在两种术中，前一种术的作用“犹有所穷”，而掌握了后一种术，便可取得了自由权。将帅处理好两种术的关系，在“事变日异”的战争中，就能“沛然应之，而天下可指挥而定”^①。陈亮上述议论表明，他已经意识到战略指导与战役、战术应用之间的从属关系，具有近代战略和战役、战术思想的雏形。此外，吴玠提出的用兵“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全胜”^②的原则，强调长远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性。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见可而进，无淹师期”^③，金将提出的“天时人事，不可失也”，“一失机会，后难图矣”的把握战机的原则，^④也都是很有见地的思想。

三是国防观。国防建设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南宋有关国防建设的论述汗牛充栋。有些观点沿袭前代，但在新形势下又赋予新的内容；有些论点则为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以华岳、陈亮、辛弃疾等人的国防观最有代表性。华岳在《翠微先生北征录》中说：南宋国防状况是“边民失其故业，内地苦于征徭；版曹内虚，总司外耗；将帅无谋，士卒悖命；军储无蓄，国用不充”^⑤。对此，他提出许多改革的办法。如在经济方面，通过改公使钱库为国用钱库，专差钱粮官员，独行其事，严格制度等，使朝廷能掌握较多的经济支配权力，以满足军国之用。作为国防建设的原则，军民关系历来受到政治家、军

① 《陈亮集》卷五《酌古论一》。

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

③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④ 《金史》卷七十四《完颜宗翰传》。

⑤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三《军国大计一》。

事家的重视。华岳通过“劝募”、“省运”、“实边”等问题的论述，屡次强调军与民的结合，指出“养兵所以卫民，岂可为兵而殃民哉”，认为“屯田”、“水运”为军民结合之善法，足兵便民之良策。陈亮在《中兴论》中主张军备要充足，提出“调度总司之赢，以佐军旅之储”；边防建设要加强，提出“置大帅以总边陲”，“任文武以分边郡”^①。

与南宋相比，金朝的国防建设思想不如南宋系统深刻，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如完颜阿骨打“不可恃一战之胜，辄有弛慢”^②的胜不失备的思想。再如，刘炳提出，要调动民心士气，说“人情可以气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则万夫齐奋”^③。这些思想都是值得重视的。

四是治军观。南宋金时期的治军观，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岳飞提出的“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④的治军原则，在当时颇具代表性。

“仁”即仁爱。以仁爱治军，首先是要统兵将帅关心爱护部下士兵。岳飞本人正是爱兵的典范，“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无私”^⑤。南宋名将吴玠对部下将士也施以仁爱，“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⑥。

“智”即智谋。岳飞常说：“谋者胜负之机也。为将之道，不患无勇而患无谋。”^⑦金人许古也提出“将者贵谋而贱战”^⑧的治军原则。这里的“谋”，不仅要求将帅本身须有智谋，而且又要求将帅善于集中众人的智慧。金廷常在战前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将

① 《陈亮集》卷二《中兴论》。

②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③ 《金史》卷一百六《刘炳传》。

④⑤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

⑥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

⑦ 《金佗续编》卷二十三。

⑧ 《金史》卷一百九《许古传》。

帅们的意见，然后拟定作战计划，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以智治军观的体现。

“信”即信用。治军要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取信于人。岳飞带兵以“信义著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附之意”^①。金在出兵前，经常采取对天盟誓，要求金军共同遵守誓约，以此激励士气，这亦可视为一种以“信”治军。

“勇”即勇敢。岳飞的军队“众和而勇，此皆岳飞训养所致也”^②。辛弃疾提出以“致勇”治军，认为将士“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有所不敢避”^③。金朝一些著名的将帅也主张以勇治军。《金史·兵志》说：金军“将勇而志一”。^④完颜阿骨打起兵攻辽，以2500人大破辽兵，就是以勇取胜的。直到金章宗时，仍要求军队“奋敌忾之勇”^⑤。

“严”即严法。岳飞对“严”着重解释为“有功者重赏，无功者峻罚”^⑥。南宋与金在治军问题上都主张以严法治军，但是立足点不同。南宋军队是在北宋溃军基础上组建而成，军法废弛，军纪涣散，试图通过严法整饬军队。李纲主持颁行了“军制二十一条”，其目的就是整饬军纪，增强军力。华岳认为，“恩威之不明，三军之大患也”^⑦。只有赏罚严明，处事以公，即以法治军，按照制度办事，军队才有战斗力。岳飞就是靠严明的军纪，而带出一支“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⑧的所向无敌的岳家军的。金“以明军法”，主要出于兵力有限，不严法则不可能出现“兵精而力齐”的军队。金军法之严近于残酷。如金军法规定，作战“回顾

① 《金佗续编》卷二十一。

②⑥ 《金佗续编》卷二十三。

③ 《稼轩诗文抄存·美芹十论·致勇》。

④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⑤ 《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

⑦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一《恩威》。

⑧ 《金佗续编》卷二十三。

者斩”^①。伍长战死，说明属下四人不出力作战，“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②。如果“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队诛之者”^③。金初，军队执法严格，因而军队在亡辽灭北宋战争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但是，金朝在其后期，由于军法松弛，金军少有以往的“奋不顾死”和“出死力以御敌”的作风^④，因而战斗力明显下降了。

《南宋金军事史》所研究的领域几乎涉及到所有与军事相关的问题。例如，绪论中未论及的军事人物、军事筑城、武器装备等等，本书中也都有专门章节具体详细的阐述，这里就不再作过多的说明。总之，南宋金时期的军事起到了上承唐五代和北宋、下启元代军事的历史作用，并以其独特的风貌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① 《大金国志》卷二十七《粘罕》。

② 《会编》卷三。

③ 《琬琰集删存》卷一《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④ 《金史》卷一百九《许古传》。

第一章 女真建国与南宋建立

契丹族、女真族都是中国北方的民族。五代时，女真受契丹所统治。以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建立后，很快统一了女真各部。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女真将士誓师于洮流河（今黑龙江与吉林省间拉林河）畔，向辽朝的契丹统治者宣战，随后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军事上的胜利加速了女真建国的步伐，国家的建立又推动了国防建设与军事制度的发展。金朝建立后继续发动灭辽、北宋的战争，并取得胜利。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历史进入南宋与金南北对立时代。

第一节 女真诸部的逐步统一和金朝的建立

一、完颜氏统一女真各部

女真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五代时，女真之名始见于史籍，并受契丹所统治。辽朝统治者迁徙一部分女真人到今辽阳一带，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又称“曷苏馆女真”（义为篱笆内的女真）。黑龙江中下游及长白山地区的女真部落，被称为“生女真”。生女真散居在河流沿岸及山谷间，从事游牧狩猎和农业。当时，生女真尚处在氏族部落时期，大约有十多万人，分属于几十个不相统属的部落。每个部落数千户，小者千户，各有首领，互争雄长。^①

^① 《契丹国志》卷二十六《女真国》，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三，光绪四年越东集印本。

女真完颜部属于生女真，最初在诸部中势力并不强大。从函普任首领后，完颜部才渐有起色。11世纪初，绥可出任完颜部首领，一改“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的旧俗，修盖房宇，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阿什河）一带。^①完颜部的经济，从游牧狩猎发展为农业种植和畜牧业等多种经营，^②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绥可的继任者石鲁改完颜部“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的状况，“稍以条教为治，部落浸强”。^③辽朝封石鲁为惕隐官。石鲁改革旧俗，建立制度，遭到坚持旧俗的部落激烈反对。石鲁决定以武力征伐其他部落，“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④。石鲁领完颜部军一直进至苏滨水（恤品河）、耶懒水（乌黑河）地带，大获全胜。在回师途中，石鲁病死。其他部族乘机向完颜部发动攻击，乌林答部曾抢走石鲁尸体，后被完颜部奋战夺回。加古部也进袭完颜部，企图争夺石鲁遗体。完颜部与各部之间的斗争，反映出女真已进入奴隶制发展时期。

石鲁之子乌古迺，生于辽太平元年（1021年），在石鲁死后继任完颜部长。这时，完颜部已发展成为强大的部落，并征服和联合十几个部族组成部落联盟，“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⑤。乌古迺成为部落联盟长，并被辽授予节度使称号。辽朝也想进一步控制生女真，使其纳入辽籍。乌古迺不肯系辽籍，托辞拒绝。但是，乌古迺却利用辽朝的支持，加紧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活动。“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乌古迺于行军途中，病死在涑流

①③④ 《金史》卷一《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页。

② 对女真有无畜牧业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据《辽史·圣宗纪》载：统和四年正月，“讨女真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可知有畜牧业。《中华文明史》第六册《辽宋夏金》认为，在绥可以前已有畜牧业。

⑤ 以下引文见《金史》卷一《世纪》。

河附近。其子劬里钵继任联盟长，于辽咸雍十年（1074年），接受辽节度使封号。以完颜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在劬里钵和弟颇刺淑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劬里钵以武力成功地平息了联盟内部分裂势力，并在与纥石烈等部的战争中获胜。颇刺淑派兵追剿纥石烈等部，杀纥石烈首领腊醅，献首给辽朝，降服了纥石烈部众。

辽大安十年（1094年），盈歌继任联盟长，完颜部落联盟发展到鼎盛时期。最后，战胜徒单部、乌古论部、蒲察部三个联盟，“尽服四十七部之众”^①。盈歌统一女真诸部后，采纳完颜阿骨打的建议，禁止各部再自置牌号，“一切治以本部法令”^②，从此“法令归一”^③。女真在统一的部落联盟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辽乾统三年（1103年），乌雅束继任联盟长，在位十年，病死。辽天庆三年（1113年），完颜阿骨打继任联盟长，女真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女真起兵反辽

女真日益发展壮大，与辽统治者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国名前后几经变化。神册元年（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潢河（今吉林西拉木伦河）岸创建契丹国；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灭亡后晋，改国号为辽；统和二年（984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又改国号为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又恢复辽的国号。史家对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到天祚帝亡国期间的历史，统称为辽。辽先后建有五京：上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南）、东京（今辽宁辽阳）、中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市）。史称疆域“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④ 实际统治范

①③ 《大金集礼》卷三《皇统五年增上祖宗尊谥》。

② 《金史》卷一《世纪》。

④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围，东北达黑龙江口，西北辖蒙古草原各部落，西迄甘州（今甘肃张掖），南括燕云十六州。女真世受辽辖治，每年向辽纳贡。辽每年从女真部落勒索大量的马匹、北珠、貂皮、良犬、海东青（鹰）等贡品。辽在天祚帝以前，尚能对女真实施有效的控制。如辽圣宗时，曾为防范女真，派同知枢密院迷离己、兵马都部署黄翩、兵马副都部署达骨、都监赫石，“引军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间”^①，并同意黄龙府（今吉林农安）的请求，在靠近女真处修寨堡，筑烽台。辽天祚帝统治时期，辽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对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日益残酷。女真更成为辽统治者掠夺的对象，“责贡尤苛”^②。辽在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设立榷场同女真人进行物品交易，常常“低其直（值），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直”^③。派赴女真的辽使，勒索财物，恣意妄为，还强索女真美女陪宿，甚至女真贵族妇女也不能幸免。^④ 辽朝对女真的压迫和剥削，引起女真人的极大愤慨。随着女真力量的逐步壮大，他们便决心举旗反辽，并为此进行充分而周密的战前准备。

（一）战前准备

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早年随父兄参与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表现十分出色，胆识过人，屡立战功，多年的战争生涯把阿骨打锻炼成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在决策对辽作战中，阿骨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时，女真内部在对辽宣战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不少人担心辽军事力量强大，女真难与匹敌。完颜阿骨打认识到战前统一思想，树立起胜利信心十分重要。于是，在进行军事和物质准备的同时，做了许多思想方面的准备工作。

完颜阿骨打为了准确掌握辽朝政治和军事情况，曾先后多次派遣使者深入辽境，探听辽朝虚实。仅在起兵前的3个月期间，他

① 《辽史》卷十七《圣宗纪八》。

②③ 《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纪上》。

④ 洪皓：《松漠纪闻》，豫章丛书本。

3次派人使辽，了解辽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军事准备。“习古廼等还，具言辽主骄肆废弛之状”^①。于是，完颜阿骨打“召官僚耆旧，以伐辽告之，使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以听后命。”^②正当女真积极备战之时，不料被辽朝觉察，辽统军司派节度使捏哥来质问：“汝等有异志乎？修战具，飭守备，将以谁御？”完颜阿骨打以“设险自守”作答。但是，辽朝仍放心不下，再次遣使臣阿息保来诘问。阿骨打义正词严地指出：女真事大国不敢废礼，而辽朝却德泽不施，收留叛人。表示如果辽朝能归还叛逃的完颜部宿敌纥石烈部长阿疎，女真便事辽纳贡，否则女真不能束手受制。阿息保还朝复命，辽朝统治者感到不安，“始为备，命统军萧挞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

完颜阿骨打得知辽军有所防备之后，为了摸清辽兵力部署的情况，于是“使仆聒刺复索阿疎，实观其形势”。仆聒刺回来后说：“辽兵多，不知其数”。完颜阿骨打说：“彼初调兵，岂能遽集如此。”认为仆聒刺的情报有误，又派遣完颜部人胡沙补再次前往宁江州侦察。胡沙补深入宁江城，见到统军使和渤海军将领正在集结军队，计划冬天河冻进攻女真，^③并了解到辽在宁江州驻军，“惟四院统军司与宁江州军及渤海八百人耳”^④。阿骨打乃决定先发制人，立即起兵。他对诸将说：“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发制之，无为人制”。^⑤阿骨打先发制人的战略得到诸将的赞同。于是，入见颇刺淑（肃宗）之妻蒲察氏（靖宣皇后），把准备伐辽的计划向她报告。蒲察氏是蒲察部贵族，蒲察部世与完颜部通婚，两部关系最为密切。蒲察氏又是阿骨打的婶母，其夫生前曾任部落联盟长。因此，蒲察氏在女真部落联盟中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取得她的支持，对统一女真人的思想，组织女真军反辽至关重要。蒲察氏对完颜阿骨打说：“汝邦家之长，见可则行。

①④⑤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 以下引文均见《金史》卷二《太祖纪》。

③ 《金史》卷一百二十一《忠义传》。

吾老矣，无貽我忧，汝亦必不至是。”^①完颜阿骨打得到蒲察氏的认可之后，奉蒲察氏率诸将出门，“举觞东向，以辽人荒肆，不归阿踈，并已用兵之意，祷于皇天后土”^②。随后，蒲察氏“命太祖（完颜阿骨打）正坐，号令诸将”^③。在取得蒲察氏和僚属的支持之后，完颜阿骨打派人传令诸部，会师洮流河，准备起兵反辽。

（二）洮流河誓师

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初，女真各部按期到达洮流河，总共仅有军士2500人。阿骨打面对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战胜辽军，首先是提高士气。他采取的办法主要有两点：一是宣传反辽的正义性。完颜阿骨打在举行祭告天地的仪式上，历数了辽朝对女真所犯的罪行，申明“问罪于辽”的原委，表明了兴兵反辽的正义性，从而鼓舞了女真将士的斗志。二是传檄盟誓。阿骨打“命诸将传檄而誓”，誓约为“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苟违誓言，身死槌下，家属无赦。”^④明确表示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在当时很有诱惑力和威慑力。

（三）宁江大捷

洮流河誓师之后，女真军兵士气大振，向辽境进发。完颜阿骨打率军经唐括带斡甲、扎只水到达辽界，填平壕堑，进入辽境。随即与海州刺史高仙寿统领的3000辽朝渤海军遭遇。^⑤渤海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两军接触后，首先向女真左翼猛攻，见女真军左翼退却，又全力攻击女真中军。辽将耶律谢十追女真将领哲垵、完颜斜也时不慎坠马，辽军忙于营救，阵脚大乱。阿骨打乘机连连发箭，射死耶律谢十和救援人员。两军混战在一起，完

①③ 《金史》卷六十三《后妃上》。

②④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⑤ 关于渤海军人数诸书记载不同，今据《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纪上》：“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统渤海子弟军三千人。”及《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大败渤海之众，获甲马三千。”

颜宗幹与女真数骑被辽军团团围住，十分危急。阿骨打不顾危险赶去救援，甩掉头盔，杀入敌阵。女真将士勇气倍增，愈战愈勇，“敌大奔，相蹂践死者十七八”。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阿骨打也险些被敌箭射中，“矢拂于颡”^①。首战告捷，阿骨打并未因此而陶醉，拒绝别人劝他称帝建号的建议，继续挥师直指混同江东的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

九月末，女真军在宁江东击败辽将萧挞不也统领的增援部队，进至宁江州城下。阿骨打立即组织军队“填堑攻城”。宁江守军试图从东门突围，被女真军围歼。十月初一日，女真军攻克宁江城，俘虏宁江防御使大药师奴。占领宁江州后，女真军声威大震，原未加入完颜部部落联盟的部族，也送款归附。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阿骨打还发动了一系列政治攻势。释放归降的宁江州防御使大药师奴，“使招谕辽人”。授命投附的渤海人梁福、幹答刺，潜回乡里，“招谕其乡人”，宣传“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把所“获东京渤海人皆释之”。^②以争取渤海人的支持。派遣亲信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直”^③，一同抗辽。这些作法，有效地配合了军事行动。

完颜阿骨打占领宁江州后，并没有继续进兵，而是回师返还完颜部故地，休整军队，准备进行更大的战役。

完颜阿骨打利用战争的间歇期，为巩固后方做了许多工作。1、酬谢元老和犒赏将士。“谒宣靖皇后（蒲察氏），以所获颁宗室耆老，以实里馆赆产给将士”^④。2、改革猛安谋克制度。“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⑤使之成为统一的军事行政组织，有利于统一管理。3、继续向周邻地区拓展。派遣完颜酬幹

① 以下引文见《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 《金史》卷七十一《幹鲁传》。

③ 《金史》卷七十二《娄室传》。

④⑤ 《金史》卷二《太祖纪》。

“率涛温路兵招抚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肇古城邑，皆降之”^①。并出兵“败室韦，获其民众”^②。周邻的平定，为下一步攻辽解除了后顾之忧。

（四）出河店之战

正当女真积蓄力量准备进一步攻辽的时候，辽朝也开始调集军队迎击女真。天庆四年十月，辽朝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挞不也为副，征发契丹、奚军 3000 人，中京禁兵及土豪 2000 人，诸路武勇 2000 余人，总共 7000 余人，集结于混同江北的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准备与女真军作战。^③十一月，阿骨打统帅 3700 甲士迎敌，乘夜鸣鼓举燧而行，黎明前抢渡混同江，女真军先期抵达北岸仅 1200 余人，与辽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阿骨打乘大风骤起，尘埃蔽天，纵兵进击，大败辽兵，追辽军于斡论泺，斩首俘虏辽兵及缴获车马、武器等辎重甚多。随后，女真军相继攻占宾（今吉林农安东北红石垒）、祥（今吉林农安境）、咸（今辽宁开原老城镇）等州，招降兀惹、奚等部族，“辽东界内熟户女真，亦为阿骨打吞并，分拣强壮人马充军，遂有铁骑万余”^④。

出河店之战的胜利，使女真军队发展到上万人，控制区域也迅速扩展。这次胜利，为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奠定了基础。因此，出河店之战受到金朝历代统治者的高度评价。天会八年（1130 年），金太宗因出河店为“肇基王绩于此”，建肇州以为纪念。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 年），在肇州设防御使。承安三年（1198 年），金章宗又以“太祖神武隆兴之地”，升肇州防御使为节度使一级的重镇，并建立武兴军。^⑤

① 《金史》卷一百二十一《酬斡传》。

② 《金史》卷七十一《斡鲁传》。

③ 《辽史》卷二十七《天祚皇帝纪一》，中华书局标点书。

④ 《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纪上》。

⑤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

三、金朝的建立与国势的扩展

(见附图 1)

(一) 金的建立

女真民族的统一和几次对辽作战的胜利，使女真族建立国家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从 1113 年起，女真酝酿建国。先是撒改、完颜宗翰、完颜希尹等臣僚劝阿骨打建国称帝。1114 年女真军攻占宾、咸等州后，阿骨打弟吴乞买和辞不失等又提出建国之议。接着，归降女真的渤海人杨朴进言：“大王创兴师旅，当变家为国，图霸天下，谋为万乘之国，非千乘所能比也。诸部兵众皆归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愿大王册帝号，封诸蕃，传檄响应，千里而定。东接海隅，南连大宋，西通西夏，北安辽国之民，建万世之镡基，兴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则祸如发矢，大王何如？”^①这种种迹象表明，原有的氏族制已经不能适应女真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新的能够进行统治的机关来代替。经过两年的准备，1115 年女真完颜旻（本名阿骨打）在洮流河畔建国，国号金，年号收国，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

金朝建立之初，许多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金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仍偏重于军事，政治制度则经过几年的时间才初步建立起来。金的建立较以往部落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皇权统治的确立。金朝建立后，废除以往的部落联盟长制度，确定全国最高统治者为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利。金皇权统治的确立，加快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进程。二是建立勃极烈辅政制度。女真部落联盟时采用国相制，国相与部落联盟长都勃极烈分治诸部。金朝建立后，废除国相制，建立勃极烈辅政制，初设四勃极烈：谙班（大）勃极烈、国论忽鲁勃极烈、国

^① 《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

论阿买勃极烈、国论昊勃极烈，以后又增设国论乙室勃极烈，组成皇帝以下的最高统治机构。金初辅政勃极烈均以阿骨打亲属和原部落联盟中的贵族担任。三是颁行新法制。金初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刑、赎并行”^①，其出发点是在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同时，保护平民利益，巩固奴隶制统治。四是制造文字。女真建国前原无文字，借用契丹字与邻族交往。建国后，完颜希尹受命创制女真文字，依据契丹字、汉字制造新字，以拼写女真语言。女真字制成后，从此成为金朝官方通行文字。这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金朝的建立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金朝的军事势力也随之迅速强大起来。

（二）向外扩展

金太祖即位的第五天，便亲自统领金军进攻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黄龙府是辽朝的北方重镇，城防设施齐备。金太祖采取先扫清外围城寨，绝其外援，然后直捣黄龙府的战略，从宁江州西进逼达鲁古城。辽都统耶律斡里朵等率军列阵迎战，兵力优于金军。金太祖登高观察，见“辽兵若连云灌木状”，认为“辽兵心贰而情怯，虽多不足畏”。指挥金军“趋高阜为阵”。^②随后，向辽军发起攻击。完颜宗雄以右翼军攻击辽左军，辽左军退却。金左翼军从阵后攻击辽右军，遭到猛烈抵抗。金将娄室、银术可杀入辽军中坚被包围，力战脱身。金太祖派完颜宗幹率一军为疑兵，分散辽军兵力。宗雄的右翼军得手后，与左翼军夹击辽右军，辽军败退回营，金军乘胜包围辽营。辽利用黎明为掩护突围北逃，金军追至阿娄冈，全歼辽步兵。七月，金军在白马泺击败辽都统斡里朵等部辽军，向黄龙府步步进逼，辽军节节败退。

八月，辽天祚帝为扭转败局，从岭东畋猎之地直趋军中，罢免败军之将，调兵遣将，与金军一决雌雄。天祚帝起用围场使阿

^① 《金史》卷四十五《刑志》。

^② 《金史》卷二《太祖纪》。

不为中军都统，耶律章奴为都监，率蕃、汉兵10万，以精兵2万为先锋，其余分五部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以都点检萧胡觐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统领汉军3万，南出宁江州，对金军形成夹击之势。辽军正在行进当中，金军于九月攻克黄龙府。辽都监耶律章奴又率部反辽，出奔上京。于是，天祚帝“期必灭女直”^①的计划破产。

十一月，辽天祚帝亲率大军70万至驼门，驸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刺等领骑兵5万、步兵40万至斡邻冻。^②这是辽、金战争中，辽朝方面所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

金朝方面对这一仗十分重视，金太祖决定亲自率军迎敌。在爻刺召开军事会议，诸将一致认为，“辽兵号七十万，其锋未易当。吾军远来，人马疲乏，宜驻于此，深沟高垒以待”。^③金太祖采纳诸将的意见，决定严阵以待，以守为攻。

十二月，辽天祚帝闻听耶律章奴在上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要谋立燕王耶律淳为帝，率军西撤。金太祖抓住战机，率金军追至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以西），与辽军对垒。当时，金军“兵止二万”。金太祖向诸将部署破敌要略：“彼众我寡，兵不可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败其中军，可以得志”。^④于是，先派出右翼军作战，经过数次交兵之后，再派出左翼军合击辽军。见辽军败退，金军全力冲击辽中军。辽军抵挡

① 《辽史》卷二十八《天祚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辽史》记“女真”作“女直”，以避兴宗（宗真）讳。

② 关于辽兵力，《辽史·天祚皇帝纪》载：“遣驸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刺等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亲军七十万至驼门”。《金史·太祖纪》云：“辽主闻取黄龙府，大惧，自将七十万至驼门。驸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刺等将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冻。”两书说法基本一致。但说辽此次攻金，总兵力有115万，显然有夸大之辞；据《松漠纪闻》载：“天祚乃发蕃汉五十万亲征”。

③④ 《金史》卷二《太祖纪》。

不住，数十万大军土崩瓦解，“死者相属百余里”^①，“尽亡其辎重”^②。天祚帝一日一夜走300里，退保长春州（今吉林扶余他虎城）。“女真乘胜，遂并渤海、辽阳等五十四州。”^③

从金军攻黄龙府到护步答冈之战结束，前后不足一年，金能获得如此辉煌战绩，与其战略决策的正确和战术运用得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建国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利用了自己气势正盛，而辽准备不足的有利时机攻辽。他以“辽国残虐”，“欲尽剪除”女真，“非人死战，莫能当”相号召，^④以图在政治上师出有名，使金军上下“唯命是从”，同仇敌忾，造成锐不可当之势。在尚不具备攻取坚城能力的情况下，他采取诱使辽军远离军事重镇，进行野战，发挥金骑兵优势，以歼灭辽军的有生力量。同时，由于金辽兵力悬殊，面对多于数倍的辽军，在战术上他采取集中兵力，中间突破，击溃辽帝所在的中军，使辽军随之全面自行崩溃。

辽朝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政治腐朽，内部矛盾重重，在未战之时已后方自乱，使金军乘虚而进。除此之外，辽在战略指导上也有重大失误。一是作战指导上的盲目性。辽统治者对新兴的金朝势力认识不足，视为无足轻重的部族作乱。直至金军攻陷黄龙府后，辽天祚帝还下诏说：“女直作过，大军剪除”^⑤，极为轻视。二是弃长取短，远离可依托的军事重镇，与金进行野战。辽军每次作战，均放弃对其有利的城坚兵足的军事重镇及有后援充足的地区，而长途跋涉，进行不利于己的野战。结果造成以步兵为主的辽军疲惫不堪，难以与以逸待劳的金精锐骑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 《辽史》卷二十八《天祚皇帝纪》。

③ 《会编》卷二十一《亡辽录》。《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纪上》。

④ 《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纪上》，《辽史》卷二十八《天祚皇帝纪》。

⑤ 《辽史》卷二十八《天祚皇帝纪》。《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载：“天祚大怒，下诏有女真作过，大军尽底剪除。”

兵的冲击抗衡。三是缺乏有实战经验的统兵将帅。辽后期，军政的腐败，加上长期无战事，又不重视培养军事人才，使辽军缺乏胜任的统兵将帅。辽天祚帝更是毫无军事才能的庸才，亲征的结果，只能是亲手断送辽军。

第二节 金灭辽和北宋

一、金灭辽

金军在护步答冈歼灭了辽军主力之后，随即抓住战机，开展了以攻占辽五京为目标的灭辽之战。

（一）夺取辽东京及辽东半岛以东地区

收国二年（1116年）正月，辽裨将渤海人高永昌乘辽势衰落，据东京（今辽宁辽阳）反辽称帝自立，周围州郡的渤海人也起兵响应。辽天祚帝派张琳率军前往镇压，高永昌向金求援。四月，金太祖将计就计，派斡鲁统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古乃会咸州路都统斡鲁古以增援为名，“讨高永昌”，占领东京地区。^①张琳与渤海军经过三十余战，处于有利的形势。金军乘机从背后杀来，辽师“自惊恐，望风而溃，身亡不可胜计”^②。五月，金军攻战沈州，而后，击败高永昌军，攻占东京，擒斩高永昌。东京城被金军占领之后，“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③。自此辽东京等54州都归入金朝版图。辽东京地区“五十余城，内并边二十余州，各有和采仓，依祖宗法，每岁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有无虑三五十万硕，虽累岁举兵，未尝支用，至是女真悉取之”。^④金占领东京，实力大增。金太祖不失时机地进行制度方面的建设。

①③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 《契丹国志》卷十九《张琳传》。

④ 《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纪上》。

“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①并任命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镇守这一地区。

金朝占领东京之后，上下一心，士气高昂。金太祖接受群臣所上“大圣皇帝”尊号，改元“天辅”，始铸金牌奖授有功将领，准备继续西进以夺取辽上京。天辅元年（1117年）正月，金太祖命完颜杲及完颜宗雄、完颜宗幹、娄室等领兵1万西进，辽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金军夺取了长春州和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

金军步步进逼，辽军节节败退，引起辽朝君臣的震恐。于是，天祚帝任命南京留守耶律淳为都元帅，萧德恭为副帅，永兴宫使耶律佛顶、延昌宫使萧昂为监军，“听辟官属”，召募辽东饥民2.8万人，组成“怨军”，编为八营。同时，“科敷运脚车三千乘，准备随军支遣”。^②新组建的怨军八营，分驻于乾、显、卫等州待命。

金天辅元年（1117年）九月初，辽都元帅耶律淳率领燕云部分禁军和民兵几千人，从南京（今北京）起程北上，十一月到达卫州蒺藜山（今辽宁阜新北）。这时，“怨军”已有两营军兵因无御寒衣发生兵变。耶律淳正在“处置作过怨军”，整顿军队，部署迎敌的时候，金军已逼近，只得仓促迎战。两军会战于蒺藜山，辽军大败。金军乘胜占领成、懿、濠、卫、显、乾等州。蒺藜山辽“怨军”失利后，辽各地守军归降金军的日益增多，辽势更加衰弱。

（二）占领辽上京

辽天祚帝在中京（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得到辽“怨军”失利的消息后，十分震恐。一方面颁布罪己诏以自责；一方面在军政方面也作了应急的准备。派遣夷离毕查刺与大公鼎到诸路募兵，以西京留守萧乙薛为北府宰相，东北路行军都统霞末知奚六部大王事。此外，天祚帝还命内库三局官把宫中财宝装成500余囊，并挑选骏马2000匹，入飞龙院喂养，以作逃跑的准备。^③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③ 《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纪上》。

金军取得蒺藜山之战胜利后，遂还师进行休整，并利用这一战争的间歇积极备战，采取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在外交上，经过天辅二年至天辅四年（1118～1120年）与宋朝的频繁接触与宋订立了“海上之盟”，并与近邻高丽交好。天辅二年（1118年），金太祖派遣李堇术李“以定辽地谕高丽”^①。二是广招辽军民，封赏归降的辽军将士，以瓦解辽军斗志。天辅二年七月，金太祖派遣阿里骨、李家奴、特里底到各处“招谕未降者”。并下诏给达鲁古部李堇辞列说：“凡降附新民，善为存抚。来者各令以便安居，给以官粮，毋辄动扰”。金朝的招抚策略收到很大成效，辽朝臣民纷纷归降金朝。金朝对这些人给予妥善安置，原辽文武官员和部落首领都授予官爵。三是调整部署，修备战具。天辅二年三月，金廷调整了主要将帅，以阉哥取代斡鲁古为都统；以娄室为万户，命合诸路谋克，镇守黄龙府。天辅三年（1119年）九月，“诏诸路军过江屯驻”。天辅四年（1120年）三月，“令咸州路统军司治军旅、修器械，具数以闻”。金太祖在完成了大举攻辽的准备之后，决定亲统大军，于“四月二十五日进师”。五月初，金军抵浑河西。金太祖一面命完颜宗雄率先头部队直趋上京城，一面派辽降臣马乙持诏书入城招降。随后金太祖率主力军也到达上京城下。辽上京守军自恃城防坚固，粮草充裕，拒绝投降。金太祖下令攻城，从早晨开始攻击，不到中午，金军攻进上京外城，辽上京留守挾不野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金太祖占领上京临潢府后，进至沃黑河，然后班师回到会宁府。

（三）攻占中京、西京、南京

辽上京失陷后，君臣惊恐了一阵，金军班师，辽廷松了一口气。不料，内乱又起：天辅五年初，驻军中京大定府平州的东南路的“怨军”发生兵变，8000余人围攻锦州。这次兵变虽被耶律余睹率军镇压下去，但辽在中京地区的兵力减弱了。“怨军”之乱刚刚平息，辽廷最有实力的两大军事首脑，即以枢密使萧奉先为

^① 以下引文见《金史》卷二《太祖纪》。

一方，以都统耶律余睹为另一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萧奉先有妹元妃萧贵哥（天祚帝妃）和甥秦王耶律定的支持，耶律余睹的后台是文妃和晋王耶律卢斡（天祚帝长子）等。两派斗争的结果，耶律余睹一方失败，文妃、耶律挾曷里（娶文妃姐）、驸马萧昱等被处死。正在军中的耶律余睹闻变，于天辅五年五月，引帐下得力将领和千余名士兵投奔金朝。^①耶律余睹所部是担负中京地区防御的主要力量，他的出走，辽中京地区防御体系宣告解体。

辽朝的内乱，给金朝灭辽创造了条件。金太祖不失时机地下诏：“自余睹来，灼见辽国事宜，已决议亲征，其治军以俟师期”^②。天辅五年十二月，金太祖任命忽鲁勃极烈完颜杲（斜也）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完颜昱、完颜宗翰、完颜宗幹、完颜宗望、完颜宗磐等为副都统，大举攻辽，“今欲中外一统”。

天辅六年（1122年）正月，金军以耶律余睹为前锋，连克高州、恩州等地，迅速逼进中京。金军并未遇到大的抵抗就轻易占领中京大定府。接着，继续南下，攻克泽州（今河北平泉南）。二月，金军西进，在北安州（今河北承德市西）大败奚王霞末，奚部归降金朝。金军从俘获天祚帝护卫口中，得到天祚帝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县西北）畋猎的情报。完颜杲等人分析军事形势，认为西进虽然会遇到辽西北、西南两路兵马，但是这两路辽军都很弱。于是，决定向西追击天祚帝。三月，金军兵分两路，都统完颜杲率一军出青岭，副都统完颜宗翰出瓢岭，追天祚帝于鸳鸯泊。天祚帝逃奔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军进至西京。天祚帝从西京取马3000匹，往西北逃窜。金军招降天德、云内、东胜等州。金军进展很快，但是新收复的地区并不稳固，不时发生叛金的事件。都统完颜杲派完颜宗望还朝，向金太祖汇报，并请金太祖到军中亲自坐阵指挥。

① 《辽史》卷二十九《天祚皇帝纪三》、卷七十二《宗室·晋王传》、卷一百二《萧奉先传》、《耶律余睹传》。

② 《金史》卷二《太祖纪》。

八月，金太祖由上京到达鸳鸯泊，召见完颜杲等将领。随后，金太祖亲自率军追天祚帝于大鱼泊，天祚帝逃走。完颜杲、完颜宗望继续追击，在石辇铎大败辽军，天祚帝经渔阳岭，逃入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辽归化、奉圣、蔚州等地相继投降，金太祖率军至奉圣州。这时，宋军两次攻辽南京（今北京）失败。金太祖决定南攻南京析津府。

十二月，金太祖率金军攻辽南京，分金军为前军、左翼、右翼和中军，浩浩荡荡进入居庸关，南京守臣开城投降。

金攻占了辽中京、西京、南京之后，辽五京皆落入金手，辽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金太祖病死，皇位由弟完颜吴乞买继承。金太宗即位，继续开展灭辽战争。正当金太宗调兵扫荡辽朝残余势力之时，远在大西北的天祚帝纠集部众，图谋出兵收复燕云。耶律大石反对出兵，但天祚帝不听耶律大石的正确意见，执意出兵。耶律大石杀北院枢使萧乙薛和坡里括，率所部西走，称帝自立（史称“西辽”）。

天会二年（1124年）冬，金太宗指示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斡鲁，置耶律大石不顾，全力追击天祚帝。金军完颜娄室部在武州（今山西五寨），遇到天祚帝所领辽军，两军在奄曷下水（今山西大同西北）交战。完颜娄室用山西地方汉人乡兵为先锋，派女真千余名骑兵暗中从山间突然出现在室韦漠葛失兵后，漠葛失兵惊恐溃散，辽军大败，天祚帝向西逃窜。天会三年（1125年）二月，完颜娄室领金军在应州新城东60里处俘虏天祚帝，辽朝灭亡。

二、金灭北宋

（一）两路攻宋与城下之盟

宋军在攻燕京过程中，充分暴露出虚弱的实情。金太宗在灭辽之后，决定乘势灭宋。天会三年（1125年）十月，金太宗正式下诏伐宋。任命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为都元帅，计划分兵两路南下。以移赉勃极烈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

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统领西路军从大同攻太原。以六部路军帅挾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任副都统，完颜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阁母任副都统，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率东路军从平州（今河北卢龙，金曾改为南京）攻燕京。然后两路军会攻宋都汴京（东京，今开封）。两路军将帅都是灭辽战争中的名将，两路军各约有十六七万人。

完颜宗翰率领西路军，“严戒部伍，整肃器甲”^①，从大同南下。天会三年十二月，西路军经朔州（今属山西）、武州（今山西神池）、代州（今山西代县）、忻州（今属山西），逾石岭关，包围太原。在汾河北大败宋河东、陕西军4万援军，歼宋军1万余人。西路军进展之顺利，是完颜宗翰始料所不及的。完颜宗翰在战前原认为，与宋军“必有数战”。结果“金人如入无人之境，直趋太原”^②。但是，金军在太原却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滞留不进，南下计划受挫。

完颜宗望率东路军从平州经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于十二月初进至白河。宋将郭药师率常胜军（以原辽“怨军”之投宋者为骨干）10万迎战^③，两军接战，金军以骑兵猛攻宋军左翼，常胜军部将张令徽等人溃逃，宋军大败，宋将郭药师投降。金东路军乘胜进入燕京。金军以郭药师为前锋继续南下，接连攻克中山（今河北定州）、真定（今河北正定）、信德府等地。

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初，金军入河南，攻占相州（今河南安阳）、濬州（今河南浚县），获宋天驷监所养马2万匹和堆积如山的饲料，军力大增。随后，进攻黎阳，宋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领兵弃城溃逃。金军从白马津用10余艘小船，先骑兵后步兵，分批渡过黄河，随渡随行，直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旧县）。宋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弃滑州，领兵南逃开封。这时，宋徽宗

①② 《大金国志》卷三《太宗纪》。

③ 关于郭药师军兵力，据《大金吊伐录》卷四《郭药师拜降表》载：“并马步甲兵十万，及系官斛粟钱帛诸物等，谨陈表上进以闻。”

已禅位于儿子钦宗。钦宗任命抗战派大臣李纲为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组织开封军民守卫京城。开封城防原来就比较坚固，经李纲筹措，“治战之具，八日粗毕”^①，严阵以待，抵抗金军。

金东路兵临开封城下，虽然气势很盛，但是由于西路军未能及时会师，兵力不过6万，难以攻克防守坚固的开封城。于是，完颜宗望采用打谈结合的方针。完颜宗望首先指挥部分金军乘数十条船沿河而下，进攻宣泽门，被宋军击败，死百余人。首战失利，完颜宗望派使臣吴孝民等人入开封城，提出要宋朝派人到金营议和。宋钦宗派同知枢密院事李昉为使，去金营谈判议和条件。双方正在谈判期间，完颜宗望再次指挥金军猛攻开封的通津、景阳等门，又被宋守军击败。完颜宗望再派萧三宝奴、耶律忠等人，随李昉到开封，提出退兵的四项条件：一、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缎百万匹。二、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三、以宰相、亲王为质。四、宋对金称侄。怯懦的宋廷急于求和，除金银数额略有减少之外，所有金军的要求基本予以满足。在宋各路20万援军纷抵开封城外后，金军解开封围，稍稍北移，但并没有撤军的意向。

二月，宋将姚平仲领兵1万，夜间偷袭金营，被金军击败，宋军死伤惨重。金军再次兵围开封。在宋廷罢免李纲，送肃王为质，表示谢罪后，金东路军撤军回到黄河以北。金东路军撤军后，西路军统帅完颜宗翰留银术可一军继续围困太原，于当年三月，也领主力军回大同。

（二）打通西路合击宋都

金军撤退后，完颜宗幹、完颜希尹、耶律余睹、完颜宗望、完颜昌、阉母等主要将帅，分别从太原和燕京赶赴会宁，商定第二次攻宋的战略计划。

这一年的八月，距宋、金议和仅几个月，金军又分兵两路大

^① 《靖康前录》。《靖康要录》卷一记：“五日至七日，治战守之具粗毕。”光绪刻本。

举攻宋，两路统帅仍由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分任，预定进军路线与上次没有多大变化，战略重心是打通西路，以实现两路夹击，会师开封的战略目标。此次兴兵仍有 30 多万人。

完颜宗翰率西路军主力从大同赶赴太原，与围攻太原的银术可合兵一处，猛攻太原。此次，金军攻太原誓在必得。太原之战，金军采用“锁城法”，即“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筑城环绕，分人防守”，^①隔绝太原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在潞州和汾州两路设重兵，以阻击宋朝援军。九月，金军攻克太原。金军势如破竹，宋河东路三府最后一府平阳和十四州大部席卷而下。河东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②。占领河东，金西路军南下开封的计划得以实现。十一月间，金西路军从怀州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宋河阳守臣燕瑾弃城逃走，金军推进到黄河北岸，与南岸宋宣抚副使折彦质部 12 万宋兵和签书李回的 1 万余名骑兵，夹河对峙。金军采用“取战鼓，击之达旦”^③。宋南岸守军不战自溃，金军顺利渡过黄河，攻克西京洛阳。完颜宗翰分兵 5 万扼守潼关，以遏止宋西北军增援东京开封。^④ 随后，挥师直指开封。

完颜宗望率东路军进展顺利。八月，从保州（今河北保定）出发，分兵攻取宋河北西路，耶律铎军破宋兵 3 万于雄州（今河北雄县），那野败宋军 7000 于中山（今河北定州），高六、董才破宋兵 3000 于广信，突撚取新乐。九月，完颜宗望率东路军在井陉击败宋种师闵军 4 万，由天德军寨攻占真定。从真定南攻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企图沿第一次攻宋路线南下。但是，宋军已有准备，韩世忠部驻守庆源，范讷军 5 万人守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旧

① 《大金国志》卷四《太宗纪》，《会编》卷五十三靖康中帙二十八。

② 《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2138 页。

③ 《大金国志》卷四《太宗纪》。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中华书局 1988 年版卷一第 26 页载：“敌以兵五万守潼关，扼西兵来路。”

县)和浚州(今河南浚县东南)。于是,完颜宗望率军转向东南,往恩州方向挺进。十一月,进至黄河边,并未过河取恩州,而是沿河南进,攻取魏县,从李固镇渡河,陷临河、大名两县,南下攻占德清军、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完颜宗望派金将阿里剌领骑兵 3000 为先锋,沿途攻占胙城,击败宋军,直至开封。完颜宗望随后率东路军主力到达开封城下。

闰十一月,金西路军也抵达开封,与东路军会师。当月底,金军攻入开封城。十二月初,宋钦宗投降,徽、钦两帝被俘,北宋灭亡。

从 1125 年十月到 1126 年闰十一月,金军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灭亡了北宋王朝。北宋的灭亡,无疑是自身腐败所造成的。但从军事角度来看,金获胜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战机把握得当。金灭辽后,军力大增,士气旺盛,乘宋朝不备,发兵攻宋。二是主攻方向明确。金军攻宋把主攻方向选择在汴京,采取分两路进兵的战略,避实就虚,造成宋军左右难顾,而金军得以快速逼近并夺取汴京。三是采取多方瓦解宋军之策。金军在以军事进攻作为主要手段的同时,采取招降等多种手段以分化瓦解宋军。

第三节 南宋的建立及抗金战略

一、以楚代宋

金灭辽后,采取彻底摧毁辽朝统治机构的做法,把辽土全部纳入了大金的版图。金灭北宋后,没有沿用此法,而是采用了扶植傀儡,以汉人治理汉地的做法。金军进占汴京后,立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以统治中原地区。

金对宋占领区采取扶植傀儡的政策,主要是由于军事进展太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尚无法直接而有效地在汉地进行统治。金

人孙大鼎曾经说过：宋朝“百姓难于政化，故先立张楚”^①。面对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女真贵族所熟悉的奴隶制统治方式显得无能为力。女真统治者十分明了，宋朝并没有像辽朝那样到了“辽政不纲，人神共弃”^②的境地。辽阔的宋土还远非金朝军力所能控制，即使已占领的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仍然十分激烈。金朝统治者企图扶植张楚代替赵宋，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以根除赵宋的影响，又可以缓解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最终完成征服整个宋朝的战略目标。因此，金军占领东京开封，把赵宋宗亲全部押解北上，以防止赵宋东山再起。并“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③，即立一傀儡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

金朝以异姓取代赵宋的做法，一开始就遇到阻力。留守孙傅、张叔夜上表乞立赵氏帝。金帅大怒，胁迫孙傅等召集百官商议人选。在金军的武力威胁之下，亡宋臣僚“莫敢出声，相视久之，计无所出”。正在为难的时候，尚书员外郎宋齐愈从外而入，百官问宋：金人欲以异姓为人主，意推何人？宋齐愈书写“张邦昌”三字以示，于是众人推定张邦昌为帝。持异议的孙傅、张叔夜、秦桧等人被金军捕至军中。内亲事官等数百人不愿屈节异姓，推统制宣赞舍人吴革为首准备起事。举事前，众人先杀妻子，焚烧居室，抱定必死的决心。当众人行至金水河时，被张邦昌亲信范琼领兵镇压。

张邦昌是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进士出身。宋钦宗时升任太宰。他一贯主张与金朝妥协，坚持割地求和，曾随康王赵构入金营为质。出任河北路割地使期间，宋朝有人上书弹劾说：“邦昌私敌，社稷之贼也。”张邦昌由于与金朝的特殊关系，才有可能当上大楚皇帝。

① 《大金国志》卷二十四《宣宗纪》。

② 《金史》卷二《太祖纪》，第36页。

③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张邦昌传》，第13790页。

金天会四年（1126年）三月七日，张邦昌粉墨登场，国号大楚。以王时雍知枢密院兼权领尚书省，吴开权知枢密院事，莫俦权签书枢密院事，吕好问权门下侍郎，徐秉哲权中书侍郎，李回权尚书省左丞，冯澲尚书右丞。在金朝的武力支持下，楚国统治机构勉强拼凑起来。

金军退走之后，张邦昌遭到东京军民的唾弃，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退位，拥立赵构，城外勤王军兵也声称要讨伐张邦昌。张邦昌迫不得已，迎宋哲宗废后孟氏进宫，请孟太后垂帘听政，自己以丞相身份退居资善堂。四月底，张邦昌到南京应天府见赵构请罪。五月，宋高宗即位，以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①，授为太保，封同安郡王。这个金朝扶植的傀儡政权，仅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宣告破产。不久，宋高宗又以僭逆罪，贬张邦昌至潭州处死。金太宗对张邦昌之死非常震怒，决定再次发兵攻宋。在诏书中他仍表示要再立一个像张邦昌那样的“藩辅”^②，以资利用。

二、高宗继位、南宋建立

（见附图1）

北宋东京陷落之时，金兵曾大肆搜捕皇室宗亲，依据皇宫内侍邓述开具的诸王、皇孙、后妃名册，命开封府尹徐秉哲“按图索骥”，把留居府邸和藏匿民间的赵氏宗亲一一捕获，前后俘虏3000余人。金军的目的是将赵氏皇族彻底根除。劫后余生的宗王，只有当时不在东京的康王赵构。于是，复兴赵宋王朝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赵构（宋高宗）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靖康元年十一月，在金兵尚未到达东京之前，他奉宋钦宗诏与资政殿学士王云前往金营求和。行至河北磁州时，正逢磁州知州宗泽

①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4页。

② 《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第1760页。

率领军民“缮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义勇”^①，积极备战。宗泽劝阻赵构留在磁州；群情激愤的百姓拦遮道路，杀死多次使金的王云，抢走呈金的国书。在这种形势下，赵构无法继续前往金营，只得留居磁州。不久，又移至相州。东京被围后，宋钦宗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亨伯为元帅，相州知州汪伯彦与宗泽为副元帅，起河北兵马勤王。于是，赵构在相州开帅府设置官署，以耿延禧、高世则为参议官，张懋为京东转运使，黄潜善为随军应副直徽猷阁，梁扬祖为随军转运使，杨渊等充干办公事，蓝珪等主管机密文字。大元帅府设前军、中军、左军、右军、后军等五军，以刘浩为前军统制、赵俊为中军统制、张琼为左军统制、尚功绪为右军统制、王孝忠为后军统制，陈淬任兵马大元帅府都统制。初期，大元帅府“有兵万人”^②。以后，陆续招致多支勤王军，兵力达10万多人。

河北兵马大元帅府的建立，对联络各地分散的军事力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大元帅府本身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首先，几位主要军事首脑缺乏军事指挥才能。赵构以亲王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对于军事却一窍不通，加上曾被作为人质拘羁金营，十分惧怕金军。陈亨伯、汪伯彦均出身文官，对金军一味妥协求和。四位正副元帅中只有宗泽堪当军事领导重任。宗泽是元祐六年进士，虽然也属文官出身，但是为官刚正不阿，胆识过人。金兵攻陷太原后，当时宋朝“官两河者率托故不行”^③。宗泽临危受命知磁州，仅率羸卒10余人赶赴磁州，组织当地人民抗击金兵。由于他抗敌有方，被任命为河北义兵都总管。金兵攻磁州，他亲自披甲御敌，打退金兵，杀敌数百人。论才干宗泽当在四位军事首脑之上，而实际地位却居于末位。

① 《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第11276页。

② 《要录》卷一，第20页；《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一》，第440页。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

大元帅府建立之后，赵构“传檄诸郡兵勤王”^①，大造南下入援京师的声势。但是，却带着军队悄悄出相州北门，经临漳，过河逃往大名。宗泽从磁州赶到大名，力劝赵构火速发兵援救京师，并提出“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的方略^②。赵构既没有抗击金兵的勇气，又不便反对救援京师。于是采纳汪伯彦等人的建策，派宗泽率所部先行救援京师，实际上是把宗泽排挤出大元帅府。“自是泽不复预府中谋议。”^③宗泽走后，赵构继续东逃，先至东平，而后又到济州，离东京越来越远。宗泽带兵1万向东京挺进，途中与金兵接战，多次取得胜利，进至卫南。这时，金军已攻破开封，并押解徽、钦二帝北还。宗泽即率军从滑州，经黎阳，赶回大名，准备渡过黄河，截断金军归路，夺回徽、钦二帝。但是，其他各路“勤王之兵卒无一至者”^④，宗泽力薄势单，被迫放弃前谋。

金军退走之后，为赵宋王朝的重建造成绝好的时机。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仍沿用大宋国号，史称南宋，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⑤宋高宗称帝后，在军政方面采取了几项措施：

第一，任命大臣组建新朝。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讷为京城留守，杨维忠为殿南都指挥使、建武军节度使，吕好问为尚书右丞，朱胜非为中书舍人，宗泽为龙图阁学士、襄阳知府，姚古为河南知府等等。

第二，处罚靖康时期的主和派。宋高宗即位后，下诏斥责靖康大臣主和误国。诏书中说：“李邦彦等皆靖康主和之臣，或料敌失宜自成懦弱之势，或过听误事复忘备御之方，用起兵端，以误

① 《会编》卷七十一靖康中帙四十六。

②④ 《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

③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1页。

⑤ 见《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一》。

国。”^①对他们分别给予降职、贬官、流放等处罚。

第三，整顿勤王军队和义兵。高宗行在设在应天府后，各路救援东京的勤王兵马纷纷汇集应天府。宋廷对这部分军队加以整顿，分勤王兵为三等：一等为军人，二等是强壮无业之人，三等为老小怯弱不堪出战者。前两等拨归原兵马大元帅府统辖的五军收编，后一等遣散还乡。同时，下令各地，“应募兵勤王人以兵付州县主兵官，听赴行在”。对勤王军整顿的同时，收编抗金义兵，“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简其士马隶五军”。

第四，进行西迁或南迁的准备。宋高宗即位于应天府后，并不打算常驻此地。故都开封迭经战火，金军控扼北部要地，屏障已弱，宋高宗不敢再涉身险地。五月一日登基，五月二十八日即“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扬二州储资粮，修城垒，以备巡幸”^②。企图迁都西南或东南。

从以上四项措施来看，南宋新朝并没有多少新的气象。

在用人问题上，宋高宗最信任的是黄潜善、汪伯彦。黄、汪二人既缺少才干，又忌贤妒能，一心想对金朝屈服退让。当时人对黄、汪早有评论：“中兴之初，黄潜善、汪伯彦首为执政，智者必知二人无进取之意矣。”^③在靖康主和问题上，宋钦宗应负首要责任。当时，金军兵临城下，宋朝内部主和与主战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宋钦宗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④的罪名，罢免主战派李纲、种师道等人，而支持“坚主割地之议”^⑤的太宰李邦彦等主和派，频繁派出使臣去金营求和。宋高宗同样是一个逃跑主义者，所以处罚主和派，也只能草草了事。勤王军队和民兵多是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金武装，宋高宗对此采取统领调京，队伍划归地方

① 《会编》卷一百二炎兴下帙二。

② 以上引文见《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3～445页。

③ 《会编》卷一百二引《中兴遗史》。

④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0页。

⑤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第11120页。

统辖以及遣散等措施，实际上是害怕民众心理的反映。其结果是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力量，甚至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使一部分勤王军队成为敌对势力。“放散诸路兵，多有散而为盗贼者”^①。都城是立国之本，宋高宗不思还居东京，修复城防，组织抗金，而想西迁和南逃，使新王朝一开始就呈现出软弱的气象。

三、南宋的战略方针

南宋是在金兵撤走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虚弱的王朝，如何抵御金军卷土重来是立国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宋高宗一度起用声望很高的主战派李纲为相，希望能出现“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②的局面。

李纲出任宰相，引起主和派的非议，中丞颜岐五次上奏章反对，理由是：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③。右谏议大夫范宗尹也奏言：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④，不宜为相。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也反对任用李纲为相。宋高宗屈于当时的抗金形势，坚持起用李纲为相，主和派阻挠李纲任相之举未能得逞。

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任相后向宋高宗提出抗金建国的十项建议，在军事方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守为策”战略。李纲认为，“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⑤。但是，靖康后期守与战条件全部丧失。目前，南宋在军事上处在“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的局面。当前对金战略方针，“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① 《会编》卷一百二炎兴下帙二。

②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1页。

③ 《要录》卷六，第141页。

④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范宗尹传》，第11325页。

⑤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1页。

第二，加强战备。李纲认为，“敌情狡狴，势必复来”^①。当务之急，要加强战备。“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第三，整顿军队。李纲针对宋朝“军政久废，士气怯惰”，提出要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军队的整顿，首先要“一新纪律，信赏必罚”，这样才能鼓舞士气。

李纲执政后，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来实现上述战略构想：1、择帅臣以任方面。李纲推荐宗泽为东京开封府留守，守卫京城。在此之前，宗泽由知襄阳府改任青州知州。在李纲以“绥复旧都，非泽不可”^②，力荐之下，宗泽调任东京开封府留守。以杜充为北京大名府留守。河北、河东两路是受金军残破的重灾区。李纲主张在两地分设招抚司与经制司，并举荐“声震河北”的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③，力主抗金、屡立战功的傅亮为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2、置帅府以守要冲。为阻止金军的再次进犯，积极加强战备。“置沿河、沿淮、沿江帅府十有九，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帅守兼都总管，守臣兼钤辖、都监，总置军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人。别置水军七十七将，造舟江、淮诸路”^④。同时，“诏河北、京、陕、淮、湖、江、浙州军县镇募人修筑城壁”^⑤。并命各县增加弓手。3、招兵买马加强禁军。李纲认为，目前禁军力量薄弱，不能胜任捍强敌而镇四方的重任。应当“取材于东南，募兵于西北”，若“得十数万人，付之将帅，以时教阅训练，不年岁间皆成精兵，于要害州郡别置营房屯戍，使之更番入卫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务”^⑥。于是，宋廷下令在陕西、河北、京东西路募兵 10 万人，在河北西路括买官民马，命京东西路制造

①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

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第 11279 页。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张所传》，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

④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一》，第 446 页。

⑤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二》，第 445 页。

⑥ 《会编》卷一百九，《李纲募兵劄子》所记：要募兵“十数万”。《中兴小纪》卷一作“若得数十万”。

战车,以加强禁军力量。4、组织兵农结合的“忠义巡社”。巡社原为民间自发的抗金组织,特点是兵农合一,有战事则出战,无战事则从事农耕。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同知枢密院事张懋建议,由政府出面组织巡社,“募民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①。李纲采纳了张懋的建议,下令诸路、府、州、军组织巡社,并定名为“忠义巡社”,专隶安抚司。5、立军法以整顿军队。以2500人为一军,官长为统制;军以下编制为部、队、甲、伍;每500人为一部,100人为一队,25人为一甲,5人为一伍。上级官长以牌书写下级官长姓名,伍长书以同伍4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②。并订立受贿乞取、遇敌逃溃、沦为盗贼等惩罚条例。

如果李纲的救国方略能够贯彻实施,无疑会加速南宋国防体系的建设。遗憾的是,李纲仅做了75天宰相就被罢免。

宋高宗尽管起用抗战派李纲为相,开始也支持和采纳了他的一些军政建议,然而宋高宗是一个昏聩无能的皇帝,他最信用的是一味迎合其意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黄、汪二人主张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对李纲的军事部署极力诋毁。李纲派往经营两河的将领张所和傅亮,在工作刚有初步进展就遭到攻击。黄潜善指使河北转运使张益谦上疏说:“自置招抚,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③。傅亮才引兵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就指责“逗留不进,致失机会”^④。宋高宗听信谗言,不顾李纲的抗辩,下令招回傅亮。黄潜善、汪伯彦又授意同党弹劾李纲,说:“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士夫侧立不敢仰视,事之大小随意专行。买马之扰,招兵之暴,劝纳之虐。优立赏格,公吏为奸,擅易诏令,巧庇姻亲。”^⑤在主和派的围攻之下,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上书力言

①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张懋》，第11347页。

②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6页。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张所传》，第11348页。

④ 《会编》卷一百十二引《李纲时政记》。

⑤ 《会编》卷一百十三炎兴下帙十三。

“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① 并请宋高宗亲征金国，迎归徽、钦二帝。宋高宗竟下令将二人斩首示众。李纲苦心经营的军政设施，随后也遭到破坏。抗战派将领张所被贬到岭南，不久病死。河东经制司被撤销后，傅亮也以母病告退。南宋的战略方针从积极抗战转入消极防御。

四、宗泽的抗金部署

南宋建立后，宋廷对北宋旧都东京开封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李纲力荐宗泽堪当重任，说：“绥复旧都，非泽不可”^②。于是宗泽被任命东京留守，去收拾残局，进行抗金部署。宗泽初到东京，面临的是一派混乱的景象。“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汹汹。”宗泽发布命令：“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并收编了王善、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在开封城周围活动的武装集团。经过整治，局势渐趋稳定，秩序开始恢复。“开封物价市肆，渐同平时”。为防止金兵再次进犯，宗泽对开封城重新规划，城区分为东西南北四区，每区设使管领军兵，并修复城中楼橹，增强防御力量。在郊区建立坚固营垒 24 所，分设统领守御，统率新募义兵数万人，每日操练，做迎敌准备。在黄河沿岸的 16 个县境，设置的寨堡，栉比鳞次，称为“联珠寨”。这些寨堡与河北、河东忠义民兵的山寨、水寨遥相呼应。宗泽的积极抗金之举不但得到开封军民的支持，连陕西、京东西诸路宋军与义兵都自愿接受宗泽指挥。宗泽又针对金具有骑兵优势的特点，并造“决胜战车”1200 乘，以车制骑（每车 55 人，1 人使车，8 人推车，2 人扶轮，6 人执牌，20 人执长枪，18 人执神臂弓弩，随枪射远）。开封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

① 《会编》卷一百十三炎兴下帙十三。

② 以下引文见《宗忠简公文集》卷七《遗事》，《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

五、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

金朝的铁骑蹂躏中原，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斗争随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金朝灭亡北宋之时，尚处在奴隶制发展阶段，掳掠财富和奴隶成为女真贵族的职业和光荣。女真贵族试图在占领区推行奴隶制，使当地封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两河地区“田野三时之务，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①。女真贵族的残暴掳掠政策，激起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人民自发组织起抗金义军与金军作战。当时活跃在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的抗金队伍，“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②。他们结扎营寨，阻击金兵，袭击金营，互通消息，相为声援，成为反抗金朝统治的重要力量。起义军中以红巾军、八字军、五马山义军的声势最盛。

（一）红巾军

红巾军最初起自河东地区，参加者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为红巾军。以后红巾军发展到河北、山东，其特点是数千人为一支，“蚁聚蜂屯，啸聚林谷”^③，占据险要之地，行军打仗“弥冈络阜，旌旗缤纷，鼙鼓震叠”^④。尽管金军与宋军作战常常获胜，但红巾军对其“略无所惧”^⑤。红巾军不但经常歼灭小股金军，而且敢于与金军主力作战。河东红巾军曾将完颜宗翰率领的金军阻截在太原城下。有一次，完颜宗翰在泽、潞间的大营，也险些被红巾军攻破。金军十分惧怕红巾军，四处围捕，捉不到真正的红巾军就杀平民泄愤，“有举村被害者”^⑥。这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抗，红巾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牵制了金军的南下。建炎元年七月，宋河东

① 《会编》卷一百三建炎元年五月六日。

②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4页。

③④ 《金文最》卷二十五引杨丹：《襄垣县修城记》。

⑤⑥ 熊克：《中兴小纪》卷二，建炎元年十二月。

路奉国使傅雱与金军首领会晤时，金方质问：宋派兵过河的缘故？傅雱说：“只恐是红巾啸聚，必非朝廷之意。”^①这也可以反映出红巾军的声威。

（二）八字军

八字军是活跃在太行山区的一支抗金队伍，首领名叫王彦，曾被河北招抚使张所任命为都统制，率部众 7000 渡河抗击金军，一度收复新乡县。^②河北招抚司撤销后，王彦与宋廷失去联系，孤军作战。在数万金兵的围攻下，败入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西的太行山区，继续坚持抗金斗争。战士们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③八字，以示抗金到底的决心。八字军的威名，从此响彻两河。八字军的壮举得到两河人民的响应，义军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也率领 19 寨，10 余万人归附。八字军声势大振，“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④。并、汾、相、卫、怀、泽等地的义军，也接受王彦的领导。八字军与金军接战上百次，斩首和俘获敌人无数，并夺回许多被金军掳走的河南人民。《遗史》一书有一段描述金军如何惧怕八字军的文字：“金人时锐意中原，特以彦在河朔，兵势张甚，未暇南侵。一日，虏帅召其众酋领，俾以大兵再攻彦垒。酋领跪而泣曰：‘王都统寨坚如铁石，未易图也。必欲使某将者，愿请死不敢行’。其为虏所畏如此。”^⑤八字军的英勇斗争给南侵的金军造成很大的威胁。

（三）五马山义军

五马山义军是南宋初年活跃在两河的一支抗金武装。这支武装以五马山（今河北赞皇境）为根据地，首领马扩、赵邦杰曾仕北宋。马扩原为保州路廉访使，赵邦杰爵为武翼大夫。北宋灭亡后，他们组织义军抗击金军。以后，攻破金人控制的寨堡，得到

① 《会编》卷一百十引《建炎通问录》。

②④ 见《会编》卷一百十三炎兴下帙十三。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王彦传》，第 11451 页。

⑤ 《会编》卷一百十四《遗史》。

一个自称信王赵榛（宋高宗之弟）的人，拥立为帅，以号召两河人民抗金，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①

中原人民反抗金朝统治的斗争，为南宋军事力量在中原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有利的时机。但是，除宗泽等少数将帅主张联合义军抗金外，南宋统治者畏之如虎，并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团结、组织、支援义军与金军作战。反而对义军肆意攻击猜疑，诬为盗贼，致使抗金义军或被镇压，或瓦解，或向江南转移，中原人民大规模的抗金斗争迭受挫折。^②

① 见《会编》卷一百十五炎兴下帙十五、卷一百十六炎兴下帙十六，《要录》卷十三，第292页。

② 《要录》卷十四载：建炎二年三月，宗泽上疏，“今河东、河西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万人，诸处节义大夫不顾其身，而自黥其面，争相救驾者不知几万数也。今陛下以勤王者为盗贼，则保山寨与自黥面者，岂不失其心耶。”

第二章 金朝军制

金朝的军事制度是一种多成分的结合体，在原女真军制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契丹、渤海、奚、汉等民族的军事制度，而有其自身的特点。金朝军事机构较为简化，重视骑兵的作用，也逐步建立和发展其他兵种，军队中民族成分复杂，实行签军（征兵）和募兵兵役制度，军事职官的地位较高。金朝的军制对后世的军制有一定的影响。

第一节 军事领导体制

一、中央军事领导体制

（一）勃极烈制度

金朝建国初期，军事制度是从部落军事联盟基础上发展而来，因之带有浓厚的军事联盟色彩。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治时期，军事制度尚不完备，朝中并未设置专门的军事机构。完颜阿骨打仍采用任都勃极烈时的作法，凡决策征伐大事，都要召开会议。“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①女真人举行的议事会，渊于部落议事会，为原始军事民主，有其特殊的方式。与会者自下而上，依次抒发己见，“自卑者始议”。大会一经决议之后，“人不闻声，其密如此”。出征前，也要举行大会商讨作战方案。“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以献策被采纳者，“为将任其事”。这种战前会议，通常伴以酒宴，“大会而

^① 以下引文见《会编》卷三宣政上帙三。

饮”。阿骨打反辽起兵前，“与僚属会酒，号令诸部”^①。可见“会酒”是军事行动前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会议形式用于军队规模不大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但是，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显然就很难适应了。

金朝建立后，完颜阿骨打实行勃极烈辅政制度。勃极烈为女真语，原意为“官长”、“部长”。阿骨打任联盟长时，曾称都勃极烈。“都”字可能是借用汉语。部落联盟中也设过“国论勃极烈”，汉语译为“国相”。建国后，金太祖在朝中设立勃极烈辅佐国政。谙版（大）勃极烈由弟完颜晟（吴乞买）充任，国论忽鲁勃极烈由原部落联盟的国论勃极烈完颜撒改继任，阿买勃极烈由完颜习不失担任，国论昺勃极烈由弟完颜杲（斜也）担任。最初，辅政勃极烈仅4人，以后又设国论乙室勃极烈、移赉勃极烈等职。忽鲁勃极烈，在《金史·金国语解》释为“统领官之称”^②。似乎是主管军事的官员。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金朝的军事并非一人所执掌，凡是参加辅政的勃极烈均为最高统帅部成员。金朝征伐大事，由皇帝和辅政勃极烈决策和发布命令。虽然辅政勃极烈制度仍不免带有部落贵族会议的痕迹，但与部落联盟议事会在性质上已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不仅仅表现在会议人员的减少和决策范围的集中，而是形成了军事领导核心，具有了专门军事机构的属性。从而为金朝中央军事机构的设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都元帅府与枢密院

天会三年（1125年）十月，金太宗大举攻宋，开始设立都元帅府。^③此后，都元帅府成为全国的最高军事机构。

金都元帅府最高长官为都元帅，下设左副元帅、右副元帅、元帅左监军、元帅右监军、左都监、右都监等军事长官。都元帅府的级别很高，太宗时以谙班勃极烈兼领都元帅，金熙宗朝常以三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 《金史》附录《金国语解》，第2891页。

③ 参见《金史》卷三《太宗纪》。

公兼领都元帅。以后，确定品级，都元帅府高于六部，仅次于尚书令。都元帅秩从一品，与尚书省左、右丞相的品级相同。左副元帅、右副元帅秩正二品，相当于尚书省左丞、右丞的级别。左都监、右都监秩正三品，略低于参知政事的品级。都元帅府机构中还设一些协助长官处理日常军务的下级官员和吏员。其中经历、都事、知事为正七品，检法为从八品官员，令史、译史等为府吏。由于金军的多民族成分，所以令史、译史又有女真令史、汉人令史、女真译史、汉人译史等区分。^①

金都元帅府一般随朝廷设府，金制都元帅“恒居守而不出”^②，一般不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但是，都元帅亲临前线，甚至直接领兵作战，在金朝也是常见的现象。金熙宗时的都元帅完颜宗弼就喜欢亲自统兵作战。完颜亮在政变前曾任过都元帅，当了皇帝还要亲自统兵灭宋。金世宗时的右丞相兼都元帅仆散忠义也曾到前线指挥对宋作战。

都元帅居朝不出，指挥作战的左、右副元帅在前线开府，称左副元帅府和右副元帅府。金太宗时，都元帅府设于京城会宁府，左、右副元帅府分设于西京大同府和燕京析津府。完颜宗翰从西京大同攻太原，在太原城外设左副元帅府。副元帅以下的监军、都监领兵镇戍一方，也可以单独开府，府名以开府者的官衔而定。如元帅右监军完颜杲（撒离喝）曾在河中府开“元帅监军行府”。

金朝也有都元帅府远离朝廷的特殊现象。熙宗时完颜宗弼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把都元帅府长期设在开封。这主要是由于军权集中在他和弟完颜宗敏手中，其弟任左副元帅，随朝开府，完颜宗弼才有可能长期在外设都元帅府。

金海陵王时，都元帅府被枢密院所取代，枢密院成为金朝最高军事机构。金设枢密院的时间，可以追溯到金太祖时期，“燕山

① 参见《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

②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既下，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①。但是，金太祖时期的枢密院是带有临时性和地方性的机构。金太宗时，攻宋的金东、西路军主帅都曾在元帅府下设过枢密院。^②这时的枢密院是专理行政事务的机构。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③此时枢密院才成为中央主管军事的机构。金世宗和金章宗末年，金对宋作战，又曾设立过都元帅府，但时间很短，战后仍由枢密院主持军务。《金史》说：“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④反映了这一时期枢密院与元帅府之间的一体关系。

金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是枢密使，下设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枢密院事等军事长官。枢密使的品级与都元帅等同，均为从一品。枢密副使秩从二品，略低于左、右副元帅。签书枢密院事秩正三品，与元帅左、右监军品级相当。同签枢密院事秩正四品，略低于左、右都监。金枢密院也设有经历、都事、架阁库管勾、知法和令史、译史、通事（口语翻译）、曳刺（司侦候及传送军情）等下级官员和吏员。^⑤金枢密院官员数额，各代并不一致，时有增减。

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枢密院受尚书省节制。金朝后期，枢密院与都元帅府两套机构并置，在诸道又设行枢密院。金宣宗时，皇子完颜守纯以权都元帅府事任枢密使。于是形成“枢密掌天下兵，皇太子抚军，而诸道又设行院”^⑥的格局。

二、地方军事领导体制

金朝地方军事机构设置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都统司、招

①④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② 见《要录》卷二十八，第560页。

③ 《金史》卷五《海陵纪》。

⑤ 参见《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

⑥ 《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

讨司、兵马都总管府等。

（一）都统司、统军司、都统府

辽代地方统军机构有统军司，也称都统司。如，“南京都统司，又名燕京统军司”。^①金太祖灭辽过程中，承辽制在占领区设置都统司，长官为都统、副都统，其职能是统领军马镇戍一方。金太祖先后设黄龙路都统司、保州路都统司、咸州路都统司、南路都统司、南京路都统司、泰州都统司、中京都统司、奚路都统司、西北和西南路都统司等机构。以后，随着占领区的拓展，金朝又在各地设置过一些都统司。于是，都统司成为金朝设在地方的重要军事机构。金前期都统司的名称也很不统一，又称军帅司、统军司等。^②中期以统军司的称谓较为固定，机构编制也比较稳定。统军司设统军使一员，秩正三品，副统军一员，秩正四品。有时也袭用辽制设统军都监。司衙中处理日常司事的官员和吏员有判官、知事、知法、书史、守当官、译书、通事、抄事、公使等。^③最初，都统司的兵力，“每司五、六万人”^④。以后，由于占领区的扩大和军事重心的南移，北方都统司的兵力有所减少，机构或撤或并，逐渐被招讨司和总管府所替代。到海陵王统治时期，仅靠近南宋的地区设置河南、陕西、山东三个统军司，衙属设置的地点在京兆府、开封府、益都府。金世宗和金章宗统治时期，由于对宋作战，统军司体制一度有所变化，但在战后仍恢复南方三个统军司的体制。

都统府也称兵马都统府，其职能与统军司并无差别，但地位高于统军司。天会元年（1123年），金太宗为追袭辽天祚帝，设立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天会三年（1125年），改两路都统府为元帅府。^⑤海陵王正隆末，升陕西统军司为都统府。金世宗大定五年

① 《辽史》卷四十六《百官志二》。

② 都统、军帅、统军等名称，均为女真语都勃极烈异译。

③ 参见《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三》。

④⑤ 参见《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1165年)，又降陕西统军府为统军司。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四月，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主要目的是对宋作战。泰和八年（1208年），金宋签订和约后，又改都统府为统军司。都统府最高长官为都统使、副使。^①

（二）招讨司

辽曾在北边地区设置西北路招讨司和西南路招讨司，以镇抚蒙古等北边部族。金灭辽后，依辽制设西北路招讨司和西南路招讨司。天德二年（1150年），海陵王又改乌古迪烈统军司为招讨司。此后，金北边地区形成西北路、西南路、东北路三个招讨司。初期，招讨司从属于某一个都统司。以后，大部分都统司被合并和撤销，招讨司的地位上升，与统军司的级别相当，两司官长均为正三品。招讨司设招讨使一员，秩正三品，副招讨使二员，秩从四品。从事司衙日常公务的有：判官、勘事官、知事、知法等官员和司吏、译人、通事、曳刺、抄事、公使人等吏员。每司辖有一定数量的军兵，职责是“招怀降附，征讨携离”^②。金章宗泰和末年，西北路、西南路、东北路三个招讨司，分设于桓州、丰州、泰州。

（三）都总管府

北宋路一级已有都总管的建置，金朝占领中原之后，依宋制在各路设都总管府，其职责是统领本路“兵马甲仗”，维护本地治安。^③金最早设立总管府的时间在天会六、七年间，地点是河北东、西路与河东南、北路。^④以后路、府、州、县四级建置确立，从南到北各路设都总管的制度普遍推行，在全国范围共设立21个都总管府。

都总管府也称兵马都总管府或总管府，设兵马都总管、同知都总管、副都总管等长官，下设总管判官、府判、推官、知法等

① 参见《金史》卷十一《章宗纪三》。

②③ 《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三》。

④ 参见《金史》卷二十五、二十六《地理志》。

下级官员。总管府的吏员，分为女真司吏和汉人司吏，数额各地不尽相同，基本上是按辖地人口的比例而设置。都总管秩正三品，与统军使、招讨使的品级相当。都总管府不同于统军司和招讨司之处在于，都总管、同知都总管、副都总管三名主要长官都是兼职，通常由路治所在地的府尹、同知府尹、少尹分别兼领；五京所在地，以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因此，都总管府长官一身二任，既是地方军事首脑，又兼理民政。这与统军司、招讨司等纯军事机构又有所不同。

各路都总管府管辖本路的散府（非都总管府）和各州的军事。金县一级不专设军事机构，县令只管民政。金州一级又分为节镇州、防御州和刺史州。如山东东路，设有二府、二节镇州、二防御州、七刺史州，路治所在益都府为都总管府，济南府为散府。^①

节镇州设节度使、同知节度使、副使等长官，节度使从三品，同知节度使、副使分别为正五品和从五品。防御州的长官为防御使、同知防御使事，品级分别为从四品和正六品。刺史州的长官为刺史、同知，品级为正五品和正七品。节度使掌管“本镇兵马之事”，以及防御和刺史州的军事，^② 实际上是本路都总管府下的“军分区”长官。防御使掌管本州军事，刺史负责本州的治安。平时，节度使、防御使、刺史都兼管本州行政事务；战时，都是统兵官。这是受女真军政一体传统的影响，与宋朝基本上是以文官出任知府、知州的体制有所区别。

第二节 武装力量的构成

金朝的军队名目繁多，有侍卫亲军、护驾军、从驾军、神勇军、汉军、奚军、渤海军、驱军、忠孝军、镇防军、永固军、永

① 参见《金史》卷二十五《地理志中》。

② 《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三》。

屯军、射粮军、京城防城军、分番屯戍军、忠义军等几十种，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直属中央的禁军，一是屯驻地方的戍军，一是按民族成分组成的民族军，一是义军。

一、禁 军

禁军在金朝军队中地位最高，主要是由女真人组成。金朝建国初期，皇帝有合扎谋克。“合扎”是女真语，义为“亲近”。合扎谋克，即亲军护卫。《金史》说：“禁军之制，本于合扎谋克”。^①从合扎谋克发展到制度严整的禁军，是在海陵王时期。贞元时，海陵王以金太祖及宗王的亲军编为合扎猛安，依宋制称侍卫亲军，指挥官为都指挥使和副使，并设立侍卫亲军司作为指挥机构。正隆五年（1160年），取消侍卫亲军司，职掌归附大兴府，马军分为左、右骁骑军，作为从驾军，隶属殿前都点检司管辖，步兵归由宣徽院管理。金世宗大定初，设有侍卫亲军4000人。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侍卫亲军增至6000人。

殿前都点检司总领皇室侍卫亲军的制度，一直沿续到金末。殿前都点检司的长官为殿前都点检、殿前左副都点检、殿前右副都点检，秩正三品和从三品，主持本司事务。并分别兼任侍卫将军都指挥使与侍卫将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是一种统称，具体分为护卫和亲军两类。由殿前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左副将军、右副将军总领护卫，“掌宫禁及行从宿卫警严”。由左、右宿直将军掌总领亲军，负责“宫城诸门卫禁、并行从宿卫之事”。^②

海陵王时，侍卫亲军中的步军归并宣徽院管辖后，组建成威捷军，隶属于拱卫直使司，其主要职责是朝会、国宴的仪卫警戒。

金朝直属中央的军队还有京师防城军，其职责是维护京城的治安和城防。金世宗时，京师防城军改称武卫军。管领武卫军的

①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② 《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二》。

机构为武卫都指挥使司，隶属于兵部。武卫军的指挥官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钤辖、都将等。各级编制一般是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各一员，钤辖十员，都将二十员。此外，还设有下级军官中尉和队正。承安元年（1196年），武卫军人数1万，其中设有中尉200人，队正400人，军士8949人。^①

从初期的帝王护卫合扎谋克逐渐发展成为严格的禁军制度，反映了金朝在军事制度方面的进步。

二、戍 军

金朝有相当多各种名号的军队属于屯驻地方的戍军。这些戍军均属于金朝的正规军，对于金朝的边防和地方治安起了重要作用。

金朝戍军主要有镇防军、分番屯戍军、永屯军、永固军、边铺军等。由于戍守的地区、时间、分工以及身份的区别，因而出现军名各异，性质相近的现象。分番屯戍军即按照年限、分几批轮流在各地屯戍，当时称为“分番更代”。分番屯戍军是金北边地区的戍军，“北边之地，不堪耕种，不能长戍，故须番戍耳”。^②永屯军、永固军则专门驻守一地。如中都永固军、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上京路永驻军、诸北边永驻军等。驱军原是驱口（奴隶）放免后组建的军队，屯守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边铺军是在河南、陕西边界地区戍守的军队。镇防军是金朝南部地区的戍军，其军有屯驻范围广、人数多、建军历史长的特点。

金正规军屯戍主要是边境地区和重要州郡。《金史·兵志》说：“凡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置于要州者十一”。^③38个边境地区是：凤翔、延安、邓、巩、熙、泗、颍、蔡、陇、秦、河、海、寿、唐、商、洮、兰、会、积石、镇戎、保安、绥德、环、葭、隰、宁

①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二》。

②③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边、东胜、净、庆、来远、桓、昌、曷懒、婆速、蒲与、恤品、胡里改等州，内地 11 个要地驻军有：南京、东京、益都、京兆、太原、临洮、临潢、丰、泰、抚、盖等。反映出金朝中期正规军平时屯驻的大致情况。

三、民族军

金朝女真人数很少，作战不得不依靠大量的其他民族人员，于是金朝出现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军队，如渤海军、奚军、乂军、忠孝军、合里合军、汉军等。这些民族军队在金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军的情况不尽相同。

渤海军于金初建立，主要是由渤海人所组建。《金史》说：“所谓渤海军，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①渤海国原是东北地区的强国，立国 200 余年被辽朝灭亡。辽一直把渤海旧地作为一个特殊的政区进行管理。收国二年（1116 年）五月，金太祖占领这一地区后，组建渤海军，按照女真猛安谋克制设 8 猛安统领，随后参加了灭辽的战争。金熙宗时，取消渤海猛安谋克承袭制度，渤海军的兵柄收归女真贵族掌握。

奚军是由奚族人组建的军队。奚族原为东胡后裔，鲜卑族的一部。最早见于《魏书》，称为库莫奚。住地在弱落水（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以南、吐护真水（今辽宁辽河上流老哈河）流域，东北与契丹族毗邻。隋朝时去掉“库莫”，单称为“奚”。唐末奚的一部西迁妫州（今河北怀来），于是形成“东奚”和“西奚”。唐天祐三年（906 年），奚族被契丹最后征服。辽建国后，保留奚六部，号称“六部奚”，并设奚王和节度使统治奚部。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 年），金兵进攻奚部，奚王萧霞末、奚部节度使讹里剌投降。天辅七年（1123 年），萧幹（回离保）在箭筈山反金自立，号奚国皇帝，改元天复，分司建官。萧幹立国仅 8 个月被金军所灭。

^①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金太祖为控制奚部，设奚路都统司，因奚分六部，也称六部路都统司。奚人被编为猛安谋克，都统由女真贵族担任，于是奚军成为金军中一支重要力量。金军攻宋，完颜昌（挾懒）为六部路都统，领奚军参加灭宋。以后，奚军被分徙于咸平、东京、临潢、泰州、山西、河东、滨、棣及西北、西南路等地。^①

金纥军也属于民族军的一种，但是与渤海军、奚军所不同的是并非单一的民族军队。纥是对北边多种小部游牧民族的泛称。由于部名和族名不同，而有唐古纥、霞马纥、木典纥、咩纥、胡都纥等称谓。金朝初期，将诸纥人组成军队，称为纥军，驻守北边，分属东北路、西北路、西南路3个招讨司统辖。金世宗时，西北路契丹人起义，部分屯驻西北的纥军起兵响应。金章宗时，纥军成为金军主力之一，先后参加了北征塔塔儿和蒙古诸部的战争。泰和末，金对宋作战，调西南路纥军3万人，为前锋攻宋。宋、金议和后，这部分纥军因对金朝的奖赏不均不满，叛金北走投附蒙古。金宣宗从中都南迁后，驻守中都附近的纥军叛金降蒙，使蒙古军得以顺利占领中都。《金史》说：“宣宗南迁，纥军溃去，兵势益弱”。^②说明纥军是金朝后期的重要支柱。金末，金哀宗从开封逃往蔡州，尚有纥军众家奴等百人随行。

忠孝军是西北多种民族组成的军队，金宣宗时建军。其民族成分有回纥、乃蛮、羌人、吐谷浑以及被蒙古军所掠逃回的中原汉人。招募的条件是擅长骑射，经选拔后充任骑兵，人有两至三马，粮饷高于其他军队三倍。“凡进征，忠孝居前，马军次之”。^③统兵官有元帅、都统、总领、提控、万户、千户等名目。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率忠孝军骑兵400人，破蒙古军于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正大七年（1230年）十月，蒙古真定万户史天泽率领河北蒙、汉军围攻卫州（今河南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1293页陈述、韩志远撰《奚》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②③}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汲县)。金兵救援，完颜陈和尚率忠孝军为先锋，击败蒙古军，解卫州围。正大八年(1231年)，蒙古军速不台部攻陕西，兵至潼关。忠孝军前去增援，击败蒙古军，并追击蒙古军至倒回谷口(今陕西蓝田东南)。金末，忠孝军有1.8万人，成为金军中的精锐部队。^①

合里合军是金朝后期组建的军队，其性质与忠孝军大致相同，也是从北方流亡过来的各族人组成。参加合里合军的人经过骑射考试合格，可以补入忠孝军。合里合军的粮饷仅及忠孝军的二分之一。天兴二年(1233年)，金哀宗出走归德，有合里合军担任随行护卫。

汉军是由汉人组成，人数在金军中所占比重最大。金朝所谓的汉军并非确指独立的一支军队，凡汉人军兵均被称为汉军。当时，汉军有时单独组军，有时与其他军兵混合编组。金朝戍军中有相当部分是汉人军兵。金初，对归附的北部汉人采用猛安谋克制，授予汉人首领为猛安、谋克。金军攻克燕京等地后，降附的汉军增多，沿袭辽制，在广宁府设立枢密院，总领各路汉军。金熙宗时，取消汉人猛安谋克承袭制，兵权收归女真贵族。以后对汉人也实行签军制度，“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②海陵王正隆间，废除诸路设汉军的制度，仅留威勇、威捷、顺德等番号的汉军。金世宗时，迁东北等地戍边汉军于内地。汉军戍军主要分布在南边和内地。金朝地位较低的射粮军、弓手、土兵等，大多是汉人充当。汉军的地位低于渤海军、奚军及一些其他部族军。

四、义军

金朝对招募和收编的民间武装称为义军或忠义军。金朝后期，

^① 参见元好问：《元遗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七《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读书山房刻本；《金史》卷十八《哀宗纪下》。

^②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由于蒙古势力的南下，金宣宗被迫从中都南迁汴京。于是金对北方失去控制能力，民间出现一些聚众结寨自保的大大小的武装。初期，金廷对于这些民间武装首领授予总领义军使、副使、训练官等职，进行收编、训练以及派官统领。以后，义军成为金朝合法的武装力量。

兴定三年（1219年）正月，蒙金战争的形势对金朝极为不利，金宣宗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人建策：“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①于是，金朝开始大力招集义军，授予义军首领名义较高的军职。“招集义军各置都统、副统等官。”^②但是，义军的军职的实际品级都很低。“都统授正七品职，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③随着某些义军的势力增大，义军首领别有所图，金廷无力控制，于是采用分封勋爵的方式以换取义军对金朝的支持。

兴定四年（1220年）二月，金宣宗分封河北、山东、河东的义军首领王福等九人为“公”，九公均兼宣抚使，赐号“宣力忠臣”^④，总率本部兵马。设置公府，任命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皆由九公自便。史称这一事件为“九公封建”。九公的封号及其管辖的地区为：沧海公王福，管辖清、沧、观州、盐山、无棣、乐陵、东光、宁津、吴桥、将陵、阜城、蓑县等地；河间公移剌众家奴，统领献、蠡、安、深州、肃宁、安平、武强、饶阳、六家庄、郎山寨等地；恒山公武仙，辖有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镇宁、平定州、抱犊寨、栾城、南宫县；高阳公张甫，统领雄、莫、霸州、高阳、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静海、宝坻、武清、安次县等地；易水公靖安民，管辖涿、易、安肃、保州、君氏川、季

① 《金史》卷一百十八《苗道润传》，第2574页。

② 《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

③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古里甲石伦传》，第2439页。

④ 《金史》卷一百十八《王福传》。

鹿、三保河、北江、矾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东安寨；晋阳公郭文振，统辖河北东路；平阳公胡天作，统领平阳府、晋安府、隰州、吉林等地；上党公张开，统辖泽、潞、沁州；东莒公燕宁，辖有益都府路。金末，九公及所统领的义军，或归降蒙古军，或被蒙古军歼灭。

元光间（1222～1223年），金朝又大量招义军，并以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猛安），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都统之上设一总领提控。^①金廷依靠授以名义很高的军职，以拢络义军。越到后期，军职滥授的现象就越普遍。义军还常被冠以“××军”的名号，如金宣宗兴定三年七月，“籍邳、海等州义军及协从归国而充军者”，组成一军，号“决胜军”。^②这些义军，缺乏严格训练，战斗力不强。

金朝除以上所说的禁军、戍军、民族军、义军之外，还设立了一些专门维护地方治安的军兵，这部分军队人数不多，属于非正规军，主要名目有弓手、土兵等。金朝弓手属雇佣之兵，每县弓手人数多达百人，少则六七十人。金朝曾设立“弓手钱”之税，用来赡养弓手。^③土兵的职责是“以司警捕之事”^④。

第三节 军兵种

金军的兵种主要有骑兵、步兵。以后才逐渐发展了水军，并有一些炮兵。

① 参见《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1004页。

② 《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第346页。

③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1006页；《金史》卷一百二十五《胡砺传》，第2721～2722页。

④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998页。

一、骑 兵

女真族具有北方民族共有的善骑射特点，这与他们畋猎和游牧生活习俗有着自然的联系。自幼的鞍马射猎生活，造就了大批出色的骑兵。在建国、灭辽、攻宋的战争中，金朝骑兵发挥了巨大作用。

金朝骑兵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技艺、装备和战术等方面。重视技艺是女真人的传统，“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①。金军不仅骑术和箭术精良，尤以“能寒暑”，惯“苦战”的坚忍性著称于世。^②收国元年（1115年），金、辽达鲁古城之战，娄室、银术可率金骑兵“冲其中坚，凡九陷阵，皆力战而出”^③。最后，金骑兵击败数倍于己的辽军取得胜利。宋将吴玠多次提到，金军“坚忍”、“忍耐坚久”的优点。^④

金军骑兵强盛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武器装备的精良。骑兵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有弓箭、刀、长枪、棍棒、甲冑、马匹等，以弓箭、甲冑、战马独具特色。金骑兵极少使用强弓劲弩，一般弓力不超过五斗，大者也不过七斗。弓力不大，但箭镞极长，长至六、七寸，形状如凿，射中目标，伤者不易起取。每战骑兵带箭多达几百支，非50步不射，颇具威力。

金骑兵多以重甲全装取胜，常见于史籍中的“铁浮图”，即重甲骑兵。这种重甲，一般是两层铁甲，质地坚硬，头盔把整个脸包裹起来，只露出双眼，使枪、箭难以穿透。

骑兵最重要的装备是马匹。“金人利于骑战，舍马则无所施其能”^⑤。因此，金朝对战马倍加重视。金朝战马的来源主要有饲养、

①②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991页。

③ 《金史》卷二《太祖纪》，第27页。

④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吴玠传》，第11413、11420页。

⑤ 《要录》卷一百八十一，第3017页。

贸易、掳掠、征括等途径。

饲养战马依靠官营群牧所和强派民间饲养。群牧所女真语称“乌鲁古”，主管“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①一般设在“无蚊蚋、美水草之地”^②。金朝初年，继承辽朝几处群牧司。天德间（1149～1152年），设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等5个群牧所。以后，群牧所增至9个。正隆末，由于海陵王攻宋的征调和西北契丹人民起义的冲击，群牧所降至4个，存马仅千余匹。金世宗大定间，群牧所又恢复到7个，有马47万匹，超过兴盛时期的北宋马匹数量。金章宗明昌时，开始依靠民间大量养马，曾下令在中都、西京、河北东、西路验民物力状况，分配战马，进行畜养。并规定一旦国家需要，“悉以送官”^③。

金朝还通过与周边地区贸易获得一定数量的马匹。金朝在北边白水等处置榷场，与北边游牧民族进行贸易，“金人之马，皆塔坦（鞑靼）所入”^④。西夏也是金朝马匹的重要贸易国。

掳掠是金朝获得马匹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战争，金从辽、宋、蒙古掳掠了大量马匹。例如，天辅六年（1122年），金兵攻陷辽朔、应等州，“掳去群牧良马三万匹”。^⑤天会九年（1131年），金兵“出沿边以掠，熙素多马，金人驻兵搜取无遗”。^⑥

征括也是金军获得战马的一个途径。“每有大役，必括于民，及取群官之余骑，以供战士焉。”^⑦海陵王大举攻宋时，曾“大括天下骡马”。^⑧

金朝前期，骑兵的强盛与马源充足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每名骑兵一般都配备二匹马。一人两骑，使战马轮番休息，利于速

① 《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三》，第1330页。

②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1004页。

③⑦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1005页。

④ 《要录》卷一百八十一，第3016页、3017页。

⑤ 《契丹国志》卷十一《天祚皇帝纪中》，第120页。

⑥ 《要录》卷四十二，第774页。

⑧ 《金史》卷五《海陵纪》。

进。以后兴起的蒙古骑兵带从马的方法，很有可能吸取了金骑兵的经验。

金骑兵在战争中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当时，常见的战术是分左、右两翼迂回侧击。金辽护步答冈决战，金太祖“使右翼先战，兵数交，左翼合攻之，辽兵大溃”。^①采用的就是这种战术。这种战术被宋人称为“拐子马”，“东西拐子马阵”，在宋金战争中金军也多次采用。“虏人（金兵）遇中国（宋朝）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②另外，金兵还常用一种“更进迭却”的锐阵。^③“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④这种连续发动攻击的战术，具有很大的威力。

二、步兵

金在建国以前，“率皆骑兵”^⑤，并没有步兵。在灭辽建国的过程中，也未见有使用步兵作战的记载。以后，在灭北宋的战争中开始使用步兵，但依然是骑兵为主，步兵仅处于从属的地位，多由降附的汉人充当。《金虏图经》对此记叙得十分明晰：“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汉儿，悉非真虏人。取胜全不责于步，惟运薪水、掘濠堑、张虚势、搬粮草而已”。^⑥这比较符合金前期的实际情况。

从金熙宗始，金帝仿宋制建立仪卫制度，担负仪卫的军队也有步兵。天德五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担任“行仗法驾”的军队就有“步甲军”。^⑦但这不过是仪仗队，并非用于作战。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

④ 《云麓漫钞》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一《女真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8页。

⑥ 《会编》卷二百四十四炎兴下帙一百四十四。

⑦ 《金史》卷四十一《仪卫志上》。

海陵王大举攻宋时，曾征发数十万军兵，其中有大量的步兵。但是，在战争中主要还是依靠由精锐骑兵组成的“硬军”，步兵仅起到“但可张其势”的作用。^①

金朝中期，步兵仍属于附从地位，相当数量的步兵不过是“充杂役”的射粮军和“充防筑之役”的牢城军等。^②但这一时期，步兵参战的人数和次数明显增多。宋金战争期间，金军常采用“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的战术。^③这种步骑结合的战术，用以对付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卓有成效。

金朝后期，由于蒙古的兴起，灭亡西夏和占领金朝的北部地区，断绝了金朝的主要马源，金原有的群牧监数十万马匹也被蒙古军所获，金骑兵从此一蹶不振。金朝骑兵衰败之后，于是被迫大量发展步兵，军队以骑兵为主，改变成为以步兵为主。金宣宗南迁汴京后，骑兵赖以发展的地理条件受到限制。故“山东残破，群盗满野，官军既少，且无骑兵”。^④兴定三年（1219年），金在裕、宿等州设元帅府，调“陕西步骑精锐六千人实京兆”，“选精锐六万分屯平凉、泾、邠、乾、耀等州”。^⑤6000人明确说是步骑，精锐6万未涉骑兵，主要为屯守，似为步兵。元光元年（1222年）二月，陕西行省上书金廷说：“虽京兆、凤翔、庆阳、平凉已各益军，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阔远，卒难应援，倘关中诸镇不支，则河南亦不安矣。”^⑥说明当时金朝陕西行省已经大多是步兵。

金末，金军主力与蒙古军决战钧州三峰山，金派出“骑二万，步十三万”^⑦。反映了金军步兵的比重大大超过了骑兵。金哀宗即位初，整顿军队，曾先后设置十几个都尉，名称为建威、虎威、破

① 《会编》卷二百四十二《正隆事迹记》。

②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③ 《会编》卷二百四十四炎兴下帙一百四十四。

④ 《金史》卷一百四《移刺福僧传》，第2297页。

⑤ 《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第344页。

⑥ 《金史》卷一百十三《白撒传》，第2486页。

⑦ 《金史》卷一百十二《移刺蒲阿传》，第2473页。

虜、振威、鷹揚、虎賁、振武、折冲、蕩寇、殄寇、果毅、安平、寧遠、宣節等，都尉直屬樞密院，每個都尉有步兵萬人。^① 因此，金末樞密院掌握的步兵總數約十六七萬。

此外，金軍與北宋作戰中已經使用了石炮和火炮。此時火炮乃系拋擲爆炸物。由於操作簡便，早期金軍中並無專職的炮兵。直到金朝末年，炮兵才從步、炮混合編組中逐漸獨立出來。

金滅遼後，獲得遼朝製造的石炮和制炮技術，並用於進攻北宋的城池。有關金軍使用石炮的記載頗多，金天會三年（1125年），完顏宗翰領西路軍從西京攻太原，“每攻城，先列炮三十座，凡舉一炮，听鼓聲，齊發炮。炮石入城者，大過於斗，樓櫓中炮，無不壞者”^②。天會四年（1126年），金軍攻開封，“一夜安炮五千余座”^③。金軍主要使用石炮，也有少量的火炮。如攻懷州，“用火炮延燒青布及索綱”^④。

金朝末年，炮兵有“炮軍總帥”、“炮軍萬戶”等統兵官。火炮的質量有所提高，興定五年（1221年），金軍攻蘄州（今湖北蘄春南），所使用的鐵火炮，“其形如匏狀而口小，用生鐵鑄成，厚有二寸”，爆炸後“其聲大如霹靂”。^⑤ 天興元年（1232年），蒙古軍圍攻開封城，守城金軍使用一種火炮，“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蒸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⑥。說明金朝已經有鐵制的爆炸物，可算是早期的“炸彈”。

①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999頁。

② 《會編》卷五十三靖康中軼二十八：原文“舉一炮”，應為“一舉炮”之誤。

③ 《避戎夜話》卷上，第174頁，上海書店1982年5月印行。

④ 《會編》卷六十一《北記》。

⑤ 《辛巳泣蘄錄》。

⑥ 《金史》卷一百十三《赤盞合喜傳》，第2496頁。

三、水 军

金水军出现较晚，金太祖率军过混同江灭辽，当时连船只都没有，诸军乘马“径涉”，“水及马腹”^①。金太宗时，元帅完颜宗弼几次率军渡淮，过江攻宋，人员和武器装备都依靠船队的运载。但是，船队只是运载工具，还不是水军的船队。金熙宗时，金朝曾打算加强水军建设，修造战舰，从海路攻宋。“伪齐刘豫献海道图及战船木样于金主亶。金主亶入其说，调燕云、两河夫四十万，入蔚州交牙山采木为栈，开河道，运至虎州，将造战船，且浮海入犯。既而盗贼蜂起，事遂中辍，聚船材于虎州。”^② 金水军成为专门的军种是在海陵王统治时期。

正隆四年（1159年）初，金臣梁汉臣向海陵王提出创建水军的建议：“创置巨船，训习水卒，支备海道”^③。这一建策，得到正准备攻宋的海陵王赞赏。于是，金朝立刻开始进行建立水军的准备工作。二月，工部尚书苏保衡主管建造战船，用福建倪蛮子等3人为技术指导，在通州“打造七百只”^④战船。在战船建造过程中，海陵王还曾“至通州视工作”。^⑤说明金对水军建设十分重视。经过一年多时间，金朝水军初具规模。水军战士主要是步兵和各地征调的水手充任，官长由都水监和步军指挥使司官员担任。正隆五年（1160年）三月，金“舟师九百”，浮海征东海县民张旺、徐元等领导的起义。海陵王说：“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⑥六月，金水军到达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俘虏徐元、张旺，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第27、28页。

② 《要录》卷九十六，第1594页。

③ 《大金国志》卷十四《海陵王中》。

④ 《会编》卷二百三十炎兴下帙一百三十。《会编》卷二百四十三引《炆王江上录》记：“打造战船三等数千只”。

⑤ 《金史》卷八十九《苏保衡传》，第1973页。

⑥ 《金史》卷五《海陵纪》，第111页。

歼起义军 5000 多人。

正隆六年(1160 年)九月,海陵王大举攻宋,任命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完颜郑家为副统制,率领新组建不久的水军从海道攻临安。在胶西海战中被宋军击败,苏保衡领一部分水军退入胶州湾。从此,金朝水军就再也没有能发展起来。

第四节 军队编制

一、猛安谋克

金朝的早期军事组织采用的是猛安谋克编制。猛安,又译萌眼;谋克,又译毛毛可。《金史·兵志》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指挥诸孛堇(勃极烈)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①这一制度并非始自金初,在部落时期就开始出现了。但是,初期的猛安谋克还不是固定的军事组织,而是出于围猎和征伐需要设置的临时军事首领。直到辽天庆四年(1114 年)以前,猛安谋克作为军事编制单位,人员数额尚没有统一的规定。天庆四年十月,完颜阿骨打攻占宁江州之后,“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猛安谋克才形成定制。

金初,在女真部众中继续实行猛安谋克制度。同时,把归顺的契丹、渤海和汉人也纳入猛安谋克组织。“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但是,外族人组成的猛安谋克,其编制与女真人有所不同。“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汉人王六儿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王伯

^① 以下引文见《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龙及高从祐等并领所部为一猛安。”直到天会二年（1124年），攻占平州（今河北卢龙）后，才改变制度，“诸部降人但置长吏，以下从汉官之号”^①。

由女真狩猎组织演变的金军事编制，一般分为五、十、五十、百、千、万等六级单位。但是，金朝军队中并没有严格按照六级编制进行组织，常常是因时而异，编制数额或多或少。史籍对金军编制记述多有抵牾之处，反映了金军编制并非整齐划一。《金史·兵志》仅介绍了“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蒲里衍”。千、百的编制较为明确。根据宋人的记述，金军“队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②千、百之下，尚有十、五的编制。《金虏图经》又说：金朝“每一万户所辖十千户，一千户辖十谋克（谋克，谓百户也），一谋克辖两蒲辇（蒲辇，五十户也）”。^③此处又出现万和五十的编制。由于金采用兵民合一的体制，统兵官长也称为“户”。例如，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经常被称作百户、千户、万户。在以上六级单位之外，某些史籍中，金军领兵官还出现过“三百户”、“五百户”、“八百户”、“二千户”、“五千户”等，说明金军并非完全采用六级编制和“按什伍进位编制”。^④金军的实际兵力也常常与各级编制数额不符。因此，很难依据金军的编制来准确推算出实际兵力。

二、沿袭原辽宋军队的编制

在灭辽的过程中，金依辽制设都统司管领契丹、奚、渤海等

①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993页。

② 《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

③ 《会编》卷二百四十四引《金虏图经》。

④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章第52页认为：“这种军事编制的猛安谋克”，“其组织按什伍进位编制”。

部族降军，每司统军五、六万人，设都统和副都统等。在攻掠燕云地区和灭北宋收降的汉军，仍依原来宋军的编制。例如，射粮军、牢城军，“每五百人为一指挥使司，设使，分为四都，都设左、右什将及承局、押官”^①。德顺军和黄、沁埽兵等，也都设有指挥使、军使、什将、承局、押官、长行等。这些是袭用辽朝汉军都指挥使司、马步军都指挥使司以及宋朝禁兵、厢兵的编制。^②

金军的编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士兵分为正军和阿里喜。女真语阿里喜，是副、从之意。金正军一人，可携带阿里喜一至二人。正军也称甲军，顶盔贯甲参加作战；阿里喜主要从事杂役，为正军服务。充任阿里喜的多是正军的子弟和驱丁，其月俸也仅及正军的一半。如果阿里喜替代正军参战，被称为“撮甲阿里喜”。金世宗大定初规定，立功的撮甲阿里喜，可以与正军同样受升赏。在正军缺乏的情况下，阿里喜也会被选补为正军。^③

综上所述，金军编制主要有二个系统：一是始于早期女真狩猎组织猛安谋克，一是沿袭辽宋军队编制。

第五节 兵役制度

一、征兵制

金朝实行签军（征兵）和募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金朝建国初期，仍采取女真族早期的兵民合一，寓军于民的做法，“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

①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1002页、1003页。

② 参见《辽史》卷四十六《百官志二》；《宋史》卷一百八十八《兵志二》。

③ 参见《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卷八百一《苏保衡传》；卷九十《孛术鲁罕传》。

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①。和平时期，在家从事劳作；战争时期，可以随时签发为军。从军是丁壮必尽的义务，器甲鞍马和食物都要自备。随着金朝疆域的扩展，原在女真部内实行的签军制，也在渤海、契丹、奚、汉等民族中推行。

金朝实行签军制的效果，前后并不一致。金末人刘祁所说：“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②刘祁所记是他亲眼目睹的金末情况，但并不符合金朝签军制的全部情况。

金朝初期，签军制成为金军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金代社会正处在奴隶制发展时期，掠夺财富和奴隶是战争的首要目的，签军入伍是获得财富和职位的主要途径，从军参战被视为高贵的职业和光荣。金初签军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每签军，则元帅府符下诸路帅司，帅司次第下节镇、支郡、诸县，县籍户口、家业定讫，乃谕民间以所当军数多寡，然后市鞍马，置器械，备糗粮。”^③选择军兵的标准主要是两点：家产和丁壮。这种“以家产高下定之”的做法，称作“家户军”。“以丁数多寡定之”，称为“人丁军”。由于金军鞍马、兵器、军粮依靠个人自备。于是，家产的多寡决定装备的优劣，而装备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军力。因此，当时家产多者常被签军。“贫者称贷于人，以应军役”。金太宗时签军，“征乡邑良家子”^④。金世宗镇压契丹族起义时签军，“量于富家签调”^⑤。这都反映了当时采用富者为兵的办法。从签发的军士中，“选千户、百长人等，部之以行”^⑥。奴隶和贫穷人户难有此

①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② 《归潜志》卷七，第77、78页，中华书局1983年6月点校本。

③ 以下引文均见《要录》卷九，第212页。

④ 《山左金石志》卷十九《故奉国上将军郭建神道碑》。

⑤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窝斡传》，第2853页。

⑥ 《要录》卷九，第212页。

待遇。

金朝中期，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封建制的确立，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战争不再是单纯的掳掠，而转向对占领区的经营。这时，签军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由于军士不能再依靠掳掠“所获数倍”，而是“得不偿费”，因此，“人始患之”。^①海陵王为侵宋签军，曾引起西北路契丹人、中原汉人以及泰州女真人的起兵反抗，说明签军制对民间造成的危害。金世宗时，对签军制略有调整，规定了签军财产数额：“凡物力五十贯者招一军，不及五十贯者率数户共之”^②。对南路女真贫穷户，“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钱米”^③。大定三年（1163年），金迎击宋军北伐，规定“军士每岁可支一千万贯”^④。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签军制带来的问题。到了金朝后期，签军制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海陵王大规模签军，年龄也仅限于20~50岁之间。此时，军士签发的年龄越来越宽，以至“老弱尽行”^⑤。人员范围也不断扩大，甚至僧人、驱奴、文官都被签发为军。这样军士的自觉性甚差，质量难有保证。

二、募兵制

金朝受辽、宋的影响，也实行募兵制。金朝实行募兵制的时间，当在金中期。金朝的募兵制仅是签军制的补充，在较小的范围内实行。例如，隶属各路都兵马总管府的射粮军，就是“非验物力以事攻讨，特招募民年十七以上、三十以下魁伟壮健者收刺，

① 《要录》卷四十三，第786页。

② 《北行日录》上。

③ 《金史》卷八十八《唐括安礼传》，第1963页。

④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1005页。

⑤ 《会编》卷一百八十六《王庶第二札子》。

以资粮给之，故曰射粮”^①。此外，边铺军、黄河埽兵等，也属于“月给例物”的“诸招军”。^②金章宗时，曾在上京、东京、北京、咸平、临潢、西京等路大量招募汉军。^③此后，募兵制的范围逐渐扩大。贞祐三年（1215年），金宣宗因中都被蒙军围困，曾打算“遣亲军六千余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④。这不仅说明都城也有数量不少的募兵，而且把募兵与亲军并列，也反映出募兵制的作用增强。贞祐年间，金曾在各地大量募兵。如田琢以尚书省令史出为宣差兵马提控、同知忠顺军节度使，一次在蔚州（今河北蔚县）“募兵旬日，得二万人”^⑤。尽管金募兵制成分逐渐扩大，但仍不能替代起主导作用的签军制。

第六节 军事职官制度

一、军官仕途

金朝是以武立国，加上战事频繁，因此军职官员的地位较高。金人主要通过荫袭、军功、武举、从亲军护卫中选升等途径获得军职。

金初，军事要职多为世袭，且没有严格的制度。金熙宗天眷中期，建立官员门荫制度，规定文武官员一品至八品都可以庇荫子孙，并没有人数的限制。海陵王贞元二年（1153年），定荫叙法，一品至七品限制所荫人数，取消八品用荫。此后，门荫制度并没有实质的变化，仅是所荫人数上有所区别。当时，品级越高所荫庇的人数就越多，庇荫的范围就越广。文武官一品，“荫子孙至曾

① 《金史》卷四十二《仪卫志下》，第962页。

②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1007页。

③ 参见《金史》卷十《章宗纪》。

④ 《金史》卷十四《宣宗纪上》，第309页。

⑤ 《金史》卷一百二《田琢传》，第2249页。

孙及弟兄侄孙六人”，而七品官仅荫“子孙兄弟一人”。^①金朝通过门荫，借助先人之力晋升为军官的不乏其人。

军人荣立军功而加官晋级。金朝对于军功，规定了六种：（1）川野见阵，当先杀退敌军。（2）攻打抗拒州县山寨，夺得敌楼。（3）抢占船桥，越险先登。（4）深入敌方侦察，捕获喉舌。（5）军情危急，远处报事成功。（6）出谋画策使作战获胜。^②金朝文以进士、武以军功，所授官位较高。而且，军功常常不受资历、年限和数额的限制。如完颜宗弼再取河南后，“凡有功军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③。

金朝也采取武举的方式以选取军事人才。金朝在熙宗时开始设武举，合格者可以晋升军官。金朝武举考试包括武艺和军事理论及法规等方面。武艺考试有射箭和枪术。通过射箭的准确、弓力、射程、步射和骑射等，来检验箭术水平。马上枪术，以刺杀的力度、速度和准确性来判断优劣。军事理论考试，一般从孙子和吴子兵书中出题，十条能回答出五条为上等。军事法规考核，出律令一条作答。通过武举者分上、中、下三等，每一个等级中又以水平的高低分出名次。泰和三年（1203年）规定：上等第一名迁正八品上忠勇校尉，第二、三名迁正八品下忠翊校尉，中等迁从八品上修武校尉，下等从八品下敦武校尉。^④

皇室的亲军护卫是选升军官的重要来源，金朝的许多将领出身于亲军护卫。亲军护卫升迁无一定的标准，初期随意性很大，以帝王好恶而决定。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制定护卫升迁格规定：护卫每30个月升一次，初次女真护卫迁授从八品下敦武校尉，非女真者迁正九品上保义校尉，150个月出职，品级在从五品以下

① 《金史》卷五十二《选举志二》，第1160页。

② 参见《金史》卷五十二《选举志二》，第1166页。

③ 《金史》卷七十七《宗弼传》，第1755页。

④ 参见《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第1151页；《金史》卷五十二《选举志二》，第1165页。

到从六品以上。金世宗即位初，护卫的迁授和出职的品级都有所提高。大定二年（1162年），护卫晋升格规定：护卫初迁正八品上忠勇校尉，120个月出职为五品官。大定十四年（1174年），又规定：女真护卫初迁从八品修武校尉，其他人为从八品下敦武校尉。护卫迁授的品级又基本上回到正隆格。以后几朝的护卫迁授和出职标准都没有超过大定二年格规定的品级。侍卫亲军的晋级有其特殊之处。长行（军士）每50个月晋升一个等级，升至五十人长后，30个月升一次，60个月出职，系正班九品（金铨选分正班与杂班，正班高于杂班），有荫者授八品职官。五十人长未出职而升百人长，则30个月升一级，60个月出职，系正班八品，有荫者授七品职官。七品军职有都军、正将，八品有都巡检、副将等。侍卫亲军未出职前，也可以授予武散官阶。^①

二、武官品级

金初，军事职官系统基本上是以女真传统旧制为主，吸收了部分辽、宋制度。随着金代社会的发展，对旧的军事职官体制进行了改革。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颁行新官制的同时，参照汉制建立了武官品级体制，从而使金朝军事职官系统出现了新的面貌。以后，又经海陵王和金世宗修订增补，武官品级制度趋于完善。

金朝武官分为两种：一是实际统兵的军职官，一是具有军衔的武散官。军职官与武散官都是依照品级区分地位的高低，由从一品至从九品。武散官每个品位又分为几阶，总共42阶。《金史·百官志》载：“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②即武散官正三品以上未设专门名号，而与文官名目同。武散官品级及阶名见下表：

^① 参见《金史》卷五十三《选举志三》。

^②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第1221页。

武散官品级表

品 级		阶 名		
一	正			
	从	开府仪同三司（上）	仪同三司（中） 特进（中次）	崇进（下）
二	正	金紫光禄大夫（上）		银青光禄大夫（下）
	从	光禄大夫（上）		荣禄大夫（下）
三	正	龙虎卫上将军（上）	金吾卫上将军（中）	骠骑卫上将军（下）
	从	奉国上将军（上）	辅国上将军（中）	镇国上将军（下）
四	正	昭武大将军（上）	昭毅大将军（中）	昭通大将军（下）
	从	安远大将军（上）	定远大将军（中）	怀远大将军（下）
五	正	广威将军（上）	宣威将军（中）	明威将军（下）
	从	信武将军（上）	显武将军（中）	宣武将军（下）
六	正	武节将军（上）		武德将军（下）
	从	武义将军（上）		武略将军（下）
七	正	承信校尉（上）		昭信校尉（下）
	从	忠武校尉（上）		忠显校尉（下）
八	正	忠勇校尉（上）		忠翊校尉（下）
	从	修武校尉（上）		敦武校尉（下）
九	正	保义校尉（上）		进义校尉（下）
	从	保义副尉（上）		进义副尉（下）

金朝所谓“军职官”，专指“兵马司及它司军者”。^① 范围仅限于直接带兵的武将，而不包括元帅府、枢密院、兵部官员以及兼顾军事的京府留守、都总管、节度使、防御使等官员。为便于了解军事官员的品级问题，现将金朝中期主要军职官及有关军事的官员品级情况附表如下：

^①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第1230页。

军职官品级表

品	级	军 职 名
一	正	
	从	都元帅、枢密使、宣慰使、安抚使
二	正	左副元帅、右副元帅
	从	枢密副使
三	正	元帅左监军、元帅右监军、殿前都点检、总管府兵马都总管、统军司统军使、招讨司招讨使、兵部尚书、宣抚副使
	从	左都监、右都监、签书枢密院事、殿前左副都点检、殿前右副都点检、武卫军都指挥使、节度使
四	正	同签枢密院事、统军司副统军、兵部侍郎、都尉(后升为从三品)
	从	拱卫直使司都指挥使、武卫军副都指挥使、总管府同知都总管、招讨司副招讨、猛安
五	正	总管府兵马副都总管、同知节度使、兵马司都指挥使
	从	拱卫直使司副都指挥使、节度副使、兵部郎中、义军总领使、军器监监、谋克
六	正	钤辖司钤辖、同知防御使事、兵马司副都指挥使、威捷军钤辖
	从	兵马司指挥使、诸府州兵马钤辖、兵部员外郎、军器监少监、利器署令、义军总领副使
七	正	兵马司军使、都军司都指挥使、正将
	从	钤辖司都钤辖、军器监丞、利器署丞、诸镇军都指挥使
八	正	副将、军器监直长、军器库使、利器署直长
	从	训练官、军须库使
九	正	部将、队将、军器库副使
	从	钤辖司都将、司军、军辖兼巡捕使、威捷军都辖、军须库副使

金朝武官品级十分复杂。猛安、谋克的品级还有些规定。《金史·百官志》诸猛安条：“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①至于统军司中的猛安、谋克及战争中临时授予的“行军猛安”、“管军猛安”、“押军谋克”等有

^① 《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三》，第1329页。

所不同，这一类职品级不固定，或无品级。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规定，河南、陕西统军司猛安四十年以上授从七品，三十年猛安和四十年以上谋克为从八品，二十年以上猛安、三十年以上谋克从九品。另外，金初，在猛安、谋克之上还设有万户一职。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颁《罢万户官诏》，取消此职。^①金末，在招募义军中又曾设此职，但职权与金初万户无法相比。万户一职并未设过品级。宋人所谓：“金人以万户比都总管之职”，并不确切。

第七节 军事通信联络制度

一、铺 驿

铺驿是金代对急递铺和驿站的统称。驿站是负责官员往来的交通站；急递铺平时传送公文，战时传递军情和命令。金代铺驿隶属于兵部管辖，在军事联络和交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金朝驿站的设置早于急递铺。金灭辽后，疆域迅速扩展，东北至黑龙江下游，北至外兴安岭，南已占领燕京，继续向中原拓展。出于军事和行政管理的需要，遂建立联系各地的交通驿站。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正月，金朝开始设置由上京到燕京的驿站，每五十里设一驿。同年闰三月，又设置从上京到春州、泰州的驿站。^②以后，在各路都设置驿站，形成了以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后改为中都大兴府）、汴京开封府（后改汴京为南京）为中心的交通线。

金朝驿站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备有驿舍、马匹、食品和饲料，为各级来往官员及其随行人员提供便利。金廷按照官员品级制定乘驿标准，并颁发驿用牌符。当时规定的官员随行人数、使

^① 《金文最》卷四。

^② 参见《金史》卷三《太宗纪》。

用驿马数和伙食标准是：从一品以上，随从八人，驿马十匹，食钱三贯十四文。从二品以上，随从五人，驿马七匹，食钱二贯九十八文。从三品以上，随从三人，驿马五匹，食钱一贯五千十一文。从五品以上，随从二人，驿马四匹，钱九百六十八文。从七品以上，随从一人，驿马三匹，食钱六百十七文。从九品以上，随从一人，驿马二匹，食钱四百十四文。没带有随从的官员，减少食钱七十八文。御前差无官人员，视同从五品。省差如有官者，食钱四百五十文。走马人钱一百五十七文。^①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章宗即位初，制定了“转递文字法”^②，并设有马铺传递公文。传递公文的递牌分为两种，尚书省用绿油红字牌，敕递用朱漆金字牌，由左右司掌管，“有合递文字，则牌送各部，付马铺转递，日行二百五十里。如台部别奉圣旨文字，亦如上制”^③。以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急递铺制。

泰和五年（1205年），宋军毁约分路攻金，金宋战争再次爆发。泰和六年（1206年）六月，金章宗下令设置传送紧急文牒的急递铺，“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④。急递铺也称递铺，设在军马要道上，每十里设一铺，备有快马，每铺设四人，其中铺头一人，铺兵三人，从所辖军射粮军内差充，由提控急递铺官管理。元帅府、六部需要传送的公文，任敕递、省递牌子入铺传送。传递采用接力方式，铺兵腰系响铃，骑马驰至下一铺交送，由第二铺再传至第三铺，日行三百里。急递铺对于传递紧急军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朝急递铺设置和传递的主要地区是：一路从中都（今北京市）经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阳（今山西临汾）、京兆（今陕西西安）、凤翔至临洮。一是自真定经彰德（今河南安阳）至南京

① 参见《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

② 《金史》卷九《章宗纪一》，第212页。

③ 《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四》，第1336页。

④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第276页。

(今河南开封)。南京一路从归德(今河南商丘南)、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寿州(今安徽凤台);一路经许州(今河南许昌)、邓州(今河南邓县)。另一路从中都经沧州,到达益都。

二、旗帜

古代军队行军作战离不开军旗,金军旗帜,“凡用师行征伐,旗皆上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①所谓“五方”,是指东、南、西、北、中。例如,有东方门旗、南方门旗、西方门旗、北方门旗和中央门旗,统称五方门旗。五方神旗,指东方神旗、南方神旗、西方神旗、北方神旗、中央神旗。

金朝军旗的种类相当多,有标志帅、将等统兵官职务的大旗,有以各种动物、天干、地支、五行、五色、五岳、五星为标志的军旗。此外,还有吉利旗、行止旗、牙门旗等多种。军中最常用的大旗是皂纛旗。海陵王攻宋时,曾使用过红、黄指挥旗。

旗、鼓是行阵时实现指挥和显耀军容的工具。金军中专门设有旗鼓兵和押旗、押纛官,旗鼓兵待遇低于正军,与阿里喜同。行军作战十分重视军旗的作用,“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②。天会四年(1126年)春,金军攻宋,完颜宗望率军进逼黄河北岸,旌旗飘扬,南岸宋守军“望见金人旗帜,烧断桥缆”^③而逃。天会七年(1129年),完颜宗弼领兵渡江攻建康,宋江东安抚使陈邦先等见金军“旌旗器仗蔽野,铁骑往来如云”^④,于是开城投降。旗帜起到了震慑敌军的作用。大定三年(1163年),

① 《大金国志》卷三十四《旗帜》,“五方”,《大金国志校证》下册第495页认为,疑五色之误。此说有误,见后文“五方”解释。

② 《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

③ 《大金国志》卷四《太宗纪》。

④ 《会编》卷一百三十五炎兴下帙三十五。

金将纥石烈志宁领兵攻宿州，“令从军尽执旗帜”^①。以迷惑敌军，取得了胜利。金宋战争期间，宋将韩世忠曾利用旗帜搞乱金军阵脚，击败金兵。“旗色与金人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② 顺昌之战，宋将刘锜守顺昌，击败金完颜宗弼军，获得大量金军旗帜。^③ 反映了金军在作战中配备许多旗帜。

金军著名将领死后，除了祀奠物品之外，“建大将旗鼓，送至坟域”^④。

三、牌 符

金军中通行牌符制度，行军作战凭借牌符调度指挥，发布号令，奖赏功臣。

金建国前，女真各部首领已经自制信牌，颁发号令。盈歌任部落联盟长时期，“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讯事，号令自此始一”^⑤。

金建国后，金太祖于收国二年（1116年）九月，开始制作金牌，以后又有银牌、木牌，“金牌以授万户，银牌以授猛安，木牌则谋克、蒲辇所佩者也”^⑥。

金廷掌握牌符的制作和颁赠，对牌符的数量控制很严格。即使在战争期间，金、银牌数额也绝不滥授。金世宗时对宋作战，都元帅仆散忠义请求增添金、银牌。金世宗说：“太师梁王（完颜宗弼）兼数职，未尝增也。”^⑦ 尽管金世宗不太同意增加金、银牌，但还是稍作让步，“增都元帅金牌一、银牌二十，左、右副元帅金牌

①④ 《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

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第11364页。

③ 参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刘锜传》。

⑤ 《金史》卷二《太祖纪》第21、22页。

⑥ 《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四》，第1335页。

⑦ 《金史》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第1939页。

各一、银牌各十，左、右监军金牌各一、银牌各六，左、右都监金牌各一、银牌各四，三路都统府银牌各二”^①。金朝的牌符除质地有别之外，金牌还有虎头金牌和素金牌的区别。近年发现金朝的银牌一面，提供了研究金朝牌符的实物资料。银牌长22.2厘米，宽6.5厘米，上端有穿孔，可以结绶佩带，中间一类似“主”字的大花押，这大概就是《金史》所说：金银牌“其上有太祖御画”^②。银牌下镌有3个女真字，读作“国伦你哈答温”，译为“国之信”。^③反映了金朝的金银牌形制很独特。

金朝还有一种递牌，质地分金、银、木三种，作为遣使送递文书的信牌。金、银、木牌以示不同的身份。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金宋爆发战争，金军败于顺昌，“遣银牌天使驰往东京告急”^④。皇统五年（1145年），金朝又重新制造金、银牌，史称“其制皆不传”。^⑤这种新制的金、银牌也应属递牌。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又仿照宋制，制作绿油红字牌和朱漆金字牌。红字牌递送尚书省公文，金字牌递送皇帝敕书，两牌均为木质。

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仿汉制建立虎符制度。金朝虎符是五左一右，左符按一至五次序编排，留在御前，由亲信侍臣掌管；右符交付各路统军司、招讨司长官掌握。征兵、任命和撤换本司正、副长官，都要从尚书省奏请左第一符才能实行。发左符要经过尚书省、近侍局和皇帝，近侍局把左符囊封交尚书省，由尚书省备录圣旨，同符封于函内，加尚书省印记，派专使带牌驰送。统军司、招讨司主符长官得左符和命令后，以右符勘合，立即奉行。左符用毕，复用囊封，上加盖使用者官印，连同回复文

① 《金史》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第1939页。

②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全周传》，第2444页。

③ 参见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49，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④ 《会编》卷二百一《顺昌战胜破贼录》。

⑤ 《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四》，第1335页。

书交付使者带回。尚书省对虎符查验之后，重新加封，交还近侍局。如果再有事，“左符以次出，周而复始，仍各置历注付受日月”^①。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符制改为枢密院用鹿符，宣抚司用鱼符，统军司用虎符。^② 金末，行元帅府和行省也用虎符。

① 《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四》，第1336页。

② 参见《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四》；《金史》卷十四《宣宗纪上》。

第三章 金军装备与后勤

金初军事装备较为简陋，以后在灭辽和北宋时，吸收了辽军和宋军的武器装备和制造技术，并建立专门的兵器制造和管理机构。金军后勤供给从无到有，一直落后于北宋和南宋，专门的管理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第一节 武器装备

一、兵器的种类

由于狩猎和作战的需要，女真族在原始部落时期已有制造兵器的手工业了。金朝建立之后，武器装备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金代表性的实战兵器主要包括格斗兵器、抛射兵器、火器、防护装具、攻城器械等几大类别。

（一）格斗兵器

金的格斗兵器有沿袭传统的刀、枪、剑、槊、斧、戟等。每一种兵器又有不同的形制，如刀又分为横刀、长刀、板刀、敲刀、朱膝刀、佩刀、手刀等名目。枪也有长短之分，长枪一般不超过“一丈二尺”^①，金将抹然史挖搭“所用枪长二丈”，在军中号称“长枪副统”。^② 金战刀的发展趋势是由直身单刃向利于劈砍的弯型战刀过渡。枪（矛）的常见形制是头部呈尖状，棱形横阔，中间起脊较明显，箍部无刻纹，用以对付金属鳞状、片状铠甲较为

① 《会编》卷九十九《北记》。

② 《金史》卷九十三《抹然史挖搭传》，第2072页。

有效。当时，格斗兵器以坚硬的镔铁制品为佳。如金世宗即位后，赐给平章政事、右副元帅仆散忠义“宾铁吐鹞弓矢、大刀”^①等兵器。大定时，纥石烈志宁攻占宿州，金世宗赐予“宾铁佩刀”^②。格斗兵器中，金军常用的是刀、枪。如海陵王正隆时，仅郢州、相州、青州三地就上缴“铜板刀五千口，改造敲刀”^③。

（二）抛射兵器

金的抛射兵器主要是弓箭和炮（抛石机）。金的弓箭，与宋有较大差别。宋弓箭特点是弓硬箭远，如常用的神臂弓。而金“弓力止七斗，箭极长”。^④金军的弓力一般仅及南宋三等士兵所用之弓。金箭的镞（箭头）多为铁制，并有了呈窄三棱形的穿甲箭镞，还有“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辄不可出”^⑤。宋将赵立曾于楚州（今江苏淮安）被金兵射中面部，“箭镞入舌下，坚不可取，命医以铁箝破齿，凿骨钮去，移时乃出，流血盈襟”^⑥。很可能即中此长镞箭。金在对宋战争中，常使用弓箭等兵器远距离制敌。如攻开封城，金军“箭发如雨，中城壁如猬毛”^⑦。

金威力最大的抛射兵器是炮。“金人攻城，大炮、对楼，势不可当”。^⑧当时的炮还是利用杠杆原理的抛射机。金的造炮技术，初渊于辽，后与宋作战中又吸收宋的造炮技术，并不断改进。从目前所见的史料看，金在天会三年（1125年）已开始使用炮进行攻城作战。金炮发展很快，从初期的几十座，到几百座、几千座。梢（弹射石块的长杆）是炮的主要装置，梢数越多，抛射的力量越大，

① 《金史》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第1936页。

② 《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第1933页。

③ 《会编》卷二百四十三《杨王江上录》。

④ 《会编》卷二百四十四《金虏图经》。

⑤ 《会编》卷三宣政上帙三。

⑥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九。

⑦ 《会编》卷六十六靖康中帙四十一。

⑧ 《会编》卷一百三十九《朝野僉言后序》作“势不可当”，《守城录》卷一《陈规靖康朝野僉言后序》作“势岂可当”。

射程越远，炮石越重。据史籍记载：金 7 梢炮可施放 50 斤重的炮石。金炮的种类很多，常用的有发射三四斤重泥丸的小炮，有能发射巨石的 9 梢虎蹲炮，有可以左右旋转变换射向的旋风炮，有一次可以抛射数枚炮石的撒星炮，还有能发射大石百步之外且命中率很高的遏炮等等。^① 金的造炮技术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

（三）火器

金军灭辽时，已初步掌握火药制造技术，并开始用于作战。在灭北宋战争中，缴获大量的宋军火器，尤其占领宋的火器制造中心汴京及硝的主要产地泽州（今山西晋城）和大名（今属河北），从而为金的火器制造和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金朝的火器制造迅速地走上由仿制到创新的蓬勃发展之路。

金朝火药兵器以火炮、火枪居多，主要用来攻守城池。金军最初所用的火炮，是一种用抛射机发射的燃烧性火器。金、南宋战争期间，南宋首先发明了纸壳爆炸性火球，尔后火器开始由燃烧性向爆炸性发展。金在世宗大定末，始研制成铁火炮。这种以铁罐装填火药，利用爆炸杀敌的火器，其威力远远大于纸壳爆炸性火球。《辛巳泣薪录》说，铁火炮“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爆炸时“其声大如霹雳”，“震动城壁”。以后，金又在这种铁火炮的基础上研制成称为“震天雷”的铁火炮，更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此外，金还有磁制火炮。

自宋绍兴二年（1132 年），南宋德安守臣陈规制成喷射火焰的长竹竿枪后，金人也在不断进行新式火枪的研制。尔后，金人制造火枪的技术超过南宋，并生产出能单兵携带的火枪。据《金史》所载：“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② 当时，火枪又称飞火枪，“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

^① 《会编》卷六十一《北记》，《守城录》卷一至卷三。

^② 《金史》卷一百十六《蒲察官奴传》，第 2548 页。

近”^①。金蒙战争中，金军的火炮、火枪给蒙古军造成很大威胁，“大兵（蒙古军）惟畏此二物”^②。此外，金兵也常用火药箭。例如，金世宗时，宋金战争期间，金将徒单克宁“使以火箭射其（宋）营舍，尽焚”^③。

（四）防护装具

金建国前，女真完颜部的铠甲制造很落后，直到乌古迺任部落联盟长时，尚不能炼铁和制造铠甲。史载：“邻国有以甲冑来鬻者，倾货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④此后，女真完颜部“得铁既多”，才开始制造甲冑。金建国后，对辽、宋作战中极重视军队的防护装具的配备，“人马皆全副甲”。^⑤金军常用的甲冑，主要有两种：一是“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⑥的较为轻便的一种铠甲。一是“重铠全装”，防护能力很强的鳞状重甲。后一种铠甲，其特点是“厚铠”、“铁面”，“兜鍪极坚，止露两目，枪箭所不能入”。^⑦金军在中原作战时，常用称为“铁浮屠”的重装骑兵作战，其人“被两重铁兜鍪，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对宋军威胁很大。^⑧金朝铠甲以安山所造最为著名。金世宗时，以“安山铁甲”赏赐勋臣。^⑨

（五）攻城器械

金军在装备方面，尤以攻城器械发展最快。辽金战争初期，由于攻城器械简陋（仅有少量木梯），金军很少强攻城池。金主要采取诱敌出城野战的方式，以消灭辽军有生力量，而后迫守军献城。天辅六年（1122年）金军攻辽西京（今山西大同）时，已经使用

①② 《金史》卷一百十三《赤盏合喜传》，第2497页。

③ 《金史》卷九十二《徒单克宁传》，第2046页。

④ 《金史》卷一《世纪》，第5页。

⑤ 《会编》卷九十九《北记》。

⑥ 《会编》卷二百四十四《金虏图经》。

⑦ 《会编》卷三十，《宋史》卷四百三《孟宗政传》。

⑧ 《会编》卷二百一炎兴下帙一百一。

⑨ 《金史》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第1936页。

所制造的洞子（木质填壕活动掩体）、楼车（装有车轮的楼式器械）攻城。经过灭辽战争后，金军的攻城器械在当时已处于领先地位。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围攻宋太原时，已经有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等，“凡有数千”。^①此时，金攻城器械的制造技术又有较大进步。如洞子，“下置车轮，上安巨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幔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而且，动辄“节次相续，凡五十余辆，人运土木、柴薪于中”。再如，鹅车，“一如鹅形，下亦用车轮，冒之以皮铁”。这种器械相当高大，须用成百上千人推动，沿鹅车可直上敌方城楼。连过去单靠手搬肩扛的云梯、火梯，也“悉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②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攻开封时，除上述器械外，又增加“度高百尺，下觐城中”的望台，能“载兵八十人”的对楼以及“用长木数丈，上施横木数尺，下以铁作轴”的撞竿等多种。宋人对金军的攻城器械之精妙称赞不已，说：“虏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③。

二、兵器制造与管理

金朝对兵器的制造和管理十分重视，兵器上一般都刻有监造官员的姓名和制造的时间，以明确责任。金朝先后设置军器监、军器库、甲坊署、利器署、作院、武库署等机构，负责从事兵器制造和管理。

军器监是金朝主管修造军器的重要机构。金章宗时设置，下辖甲坊署和利器署。以后一度取消军器监，把甲坊和利器两署合并为军器署。军器署设令、丞、直长等职，直属兵部。卫绍王至宁时，又恢复军器监这一机构。军器监官长为监、少监、直长等。监从五品，少监从六品，直长正八品。

武库署是掌管各地按时上缴军器的机构，隶属于殿前都点检

①② 《会编》卷五十三靖康中帙二十八。

③ 《守城录》卷一，《会编》卷一百三十九《朝野僉言后序》。

司。武库署设令、丞、直长等职，令从六品，丞从七品，直长正八品。武库署令必须是“以晓军器女直人充”^①。

军器库主要负责制造和管理甲冑、兵器，同时也收藏一些战利品。宋韩侂胄、苏师旦被杀后，金人“漆其首藏之军器库”^②。军器库原分设于中都大兴府、南京开封府、西京大同府、北京大定府，受地方机构管辖。长官为使、副使，使正八品，副使从九品。大兴府、开封府设使，大同府、大定府设副使。金宣宗南迁后，在朝中设军器库，隶属军器监，并下令“河南路节镇以上立军器库，设使、副各一员，防刺郡设都监、同监各一员”^③。由于北方为蒙军所占，这时朝中军器库管辖的范围也仅仅是京城与河南一路。

利器署主要是掌管修造弓弩刀槊等兵器，隶属于军器监，曾一度并入军器署。利器署的前身是都作院，兴定二年(1218年)改称利器署。主要长官为令、丞、直长，令从六品，丞从七品，直长正八品。

甲坊署负责甲冑的制造，设令、丞、直长等职，品级与利器署同。原隶属于军器监，泰和四年(1204年)，并入军器署。

作院掌管监造军器及兼管囚徒，设于东京、西京、南京、中都、上京及诸府节镇，中都、南京称都作院。各地作院所设官员数额不尽相同，主要有使、副使、都监等，秩正八品至从九品。

以上是金朝主要的修造和管理军器机构。此外，金朝还设置过军需库和八作左右院，“掌收军须、军器”^④。战争期间，金朝还从各地临时征调工匠从事军器制造。海陵王攻宋时，“仍于诸路刷铁匠五千人，打造人马衣甲、军器”^⑤。右丞李通曾“提控造军器于燕山之西北隅”^⑥。

① 《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二》，第1256页。

② 《金史》卷九十八《完颜匡传》，第2173页。

③ 《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第343页。

④ 《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二》，第1289页。

⑤ 《会编》卷二百四十三《炀王江上录》。

⑥ 《会编》卷二百四十二《正隆事迹记》。

第二节 金对军队的经济投入

一、军 费

金太祖统治时期，仍沿袭旧的兵民合一的管理方式，作战临时签军，出征将士自备军械、口粮等，国家不向军队提供经费，也无专项军费开支。因此，在这一时期，金朝军费的征收、使用等管理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金太宗即位后，在继续推行奴隶制经济的同时，开始对原北方农业区实行赋税制。天会元年（1123年），“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穡”^①。金灭北宋后，占领中原地区，又采取遣使赴诸路劝农和均赋役等办法，恢复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赋税的收入和南宋的岁币，为金朝军费开支提供了保障。这时，已经设置了“收积财货，誓约惟发兵用”^②的军需库。军队中也出现了随军转运使，负责征运粮饷。^③但是，此时金朝用于军费的开支还很少。天会十一年（1133年）二月，元帅府曾请示金太宗说：“承诏赈军士，臣恐有司钱币不将继，请自元帅以下有禄者出钱助给之”。金太宗说：“官有府库而取于臣下，此何理耶？其悉从官给”。^④反映出不但军费少，而且军士没有固定的军俸，只有依靠赈济。金熙宗颁行新官制后，军俸成为军费的一项主要开支。

海陵王即位后，准备大举攻宋，使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这时的军费投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筹军粮，“缮治甲兵，调发军旅”^⑤等物质准备；二是增加军俸，“官兵并增廩给”，“以绢万

① 《金史》卷四十七《食货二》，第1056页。

② 《会编》卷一百六十五《燕云录》。

③ 《会编》卷七十二《朝野僉言》。

④ 《金史》卷三《太宗纪》，第65页。

⑤ 《金史》卷八十三《祁宰传》，第1874页。

匹于京城易衣袄穿膝一万，以给军”。^①大量的军费开支依靠民间征敛和国家财政来维持，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财政的困难。海陵王不顾客观条件，大规模增加军费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金世宗统治初期，为镇压北方契丹人和反击宋军的进攻，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仅对宋用兵一项，“军士每岁可支一千万贯”。由于“官府止有二百万贯”，空缺以“军须钱”的名目“取于官民户”。以后，尽管与宋签约休战，仍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以维持人数众多的驻军。

金章宗时，由于征讨北方游牧部族和迎击宋军北伐，“军须所费甚大”，采取按物力征河夫钱的办法“征军须钱，验各路新籍物力，每贯征钱四贯，西京、北京、辽东路每贯征钱二贯”。即以河夫钱为比，每征河夫钱一贯者征军须钱四贯，西京等地每一贯河夫钱征军须钱二贯。结果，使“农民困于军须”^②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金朝后期，战事频繁，国库空虚，财政窘困。河北被蒙古军占领后，大批金军和家属退到河南，原来军队靠屯田还能解决部分军费，因土地丧失，屯田废止，军队和家属完全依靠国家支給钱粮。“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盖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③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仅京南、东、西三路，有“屯军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④，造成军费更加困难。对此，在大量“添征军须钱”^⑤的同时，不择手段地筹集军费，甚至靠出卖度牒和官爵以增加军费。金宣宗时，“定权宜鬻恩例格”，公然标明价格，以“入粟草各有数”来卖官筹集军费。^⑥无休止地征敛军费，给人民带来沉重

① 以下引文见《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② 《金史》卷十一《章宗纪三》。

③④ 《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二》。

⑤ 《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

⑥ 《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的负担。金哀宗也感叹说：“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①《金史》称：金哀宗之世，“区区生聚，图存于亡，力尽乃毙，可哀也矣”。^②的确，军费使金朝耗尽了国力。

二、军 俸

金朝初期，军队并没有俸禄制度，军器和粮草由军士自备：通过在占领区掳掠，进行武器和粮草的补充。从金熙宗时开始，“岁给辽东戍军绢绢有差”^③。以后，经海陵王、金世宗到金章宗时逐步形成了一套军俸制度。

金朝军俸是按照地区、品级、民族、兵种等分成不同的等级。

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镇防军，其中马军官兵月俸：猛安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及六匹马的饲料；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及五匹马的饲料；蒲里衍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及四匹马的饲料；正军钱二贯，米一石五斗，绢四匹，绵十五两及二匹马的饲料；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绵十两。步军官兵俸禄大致与马军相同，仅马匹的饲料与马军有所区别，“猛安马二匹，谋克马一匹刍粟”。此外，对战马的草料还有“四时皆给”，“岁给五月”、“六月”的区别。

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的军俸：千户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六匹马饲料，地五顷；蒲里衍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四匹马饲料，地三顷；正军钱二贯，米一石四斗五升，绢四匹，绵十五两，二匹马饲料，地二顷；阿里喜和旗鼓等人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绵十两，地一顷。

交替军，即北边各族人组成的边防军，其正军月俸为钱二贯，米四斗；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

① 《金史》卷十七《哀宗纪上》。

② 《金史》卷十八《哀宗纪下》。

③ 以下引文均见《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上番汉军的月俸：千户钱三贯，粮四石，绢八匹，四匹马饲料；谋克钱二贯五百文，粮一石，绢六匹，二匹马饲料；正军钱二贯，米九斗五升，绢四匹。

上京路永驻军的月俸：千户钱十五贯，粮十五石，绢十匹，绵二十两，三匹马饲料；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二匹马饲料；正军月支钱二贯五百文，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一匹马饲料，阿里喜等人钱二贯，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

诸屯田被差及缘边驻扎捉杀军的月俸：猛安钱六贯，米一石八斗，五匹马饲料；谋克钱四贯，米一石二斗，三匹马饲料；蒲里衍钱二贯，米六斗，二匹马饲料；正军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一匹马饲料；阿里喜等人钱一贯，米四斗，一匹马饲料。顺德军指挥使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三匹马饲料；军使、什将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二匹马饲料；长行钱二贯，米一石五斗，绢四匹，绵十五两，一匹马饲料。奚军谋克钱一贯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绸绢春秋各一匹，三匹马饲料；蒲里衍钱一贯，米二石七斗，绸绢与谋克相同，二匹马饲料；长行钱一贯，米一石八斗，绸绢也与谋克相同。

都元帅、副元帅等军职官的俸禄，同其他官员一样，依照品级支給。从一品都元帅钱二百贯，粮近三百石，春秋衣绶、绶各三十匹，绢各一百匹，绵五百两。正二品副元帅钱一百五十贯，粮二百余石，春绶、秋绶各二十二匹，绢八十匹，绵三百五十两。正三品统军使和招讨使钱八十贯，粮一百余石，绢各三十五匹，绵一百六十两，公田二十五顷。正四品副统军，钱五十贯，粮五十石，绢各二十二匹，绵八十两，职田十七顷。其他军职官均与同级文官俸禄相同。

金朝对未纳入品级系列的护卫长、长行、侍卫亲军五十户、百户等，也规定了应享受的俸禄。例如，“护卫长，支正六品俸。长行，从六品俸”。^①地方治安军从指挥使至军士也规定了军俸数额。

^① 《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四》。

最高的指挥使每月钱七贯、粟七石，最少的牢城兵和土兵钱仅八百文，粟二石，春秋两季军衣费十贯。

金朝后期，由于蒙古军南下，国土日蹙，财政危机，使原有的军俸制度难以维持下去。贞祐四年（1220年），甚至要求“掌军官能自备刍粮”^①。此后，军俸不正常，多短期的、临时性的措施。

三、赏 赐

金朝军队除正式的军俸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钱、物赏赐。通过赏赐，以达到安抚军队，稳定军心的目的。赏赐包括长期、短期及一次性赏赐等多种，主要有功赏、劳赐、恩赐、奖赏艺优、放老给赏、赠赠等形式。

金朝十分注重奖赏参战官兵，不但对荣立战功者按照勋爵和军功援例加官晋级，而且对广大参战官兵普遍进行钱、物赏赐。例如，大定二年（1161年），“诏出内府金银给征契丹军用”。同年，派左副点检蒲察阿孛罕等人，“赏赉河南将士”。大定五年（1165年），金宋战争获胜后，“以宋国岁币悉赏诸军”^②。参战金军将士都得赏赐，“曾过界者人给绢二匹、银二两，不曾过界者银二两、绢一匹，阿里喜绢一匹，谋克倍军人，猛安倍谋克”^③。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五月，金廷对率先阻击宋军北伐的河南守军予以赏赐，“赐唐州刺史吾古孙兀屯、总押邓州军马事完颜江山爵各二级，蔡州防御使完颜佛住爵一级，余赏赉有差”^④。同时，对首先报告宋军北伐消息的军士严整，授嵩州巡检使，“赐爵八级，钱二百万”^⑤。

金朝对军队还有一种劳赐，对象主要是边防军和亲军护卫。例

① 《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② 以上引文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③ 《金史》卷八十七《徒单合喜传》。

④⑤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

如，“承安元年（1196年）十二月，金章宗派提点太医、近侍局使李仁惠，“劳赐北边将士，授官者万一千人，授赏者几二万人，凡用银二十万两、绢五万匹、钱三十二万贯”。^①金帝每次捺钵（四时居处，出巡之意），随行的亲军护卫都有劳赐。金世宗银山捺钵，“诸从军士赐钱五万贯”^②。金章宗秋山捺钵，“选亲军、武卫军各百人以从，仍给钱五千万”^③。

金朝还经常以恩赐的形式对军兵进行经济补贴。例如，金世宗大定十七年（1179年），“岁以羊皮三万赐西北路戍兵”^④。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以陕西大寒，赐军士柴炭银有差”^⑤。

金朝对军队还施行奖赏艺优的办法。例如，“凡镇防军，每年试射，射若有出众，上等赏银四两，特异众者赏十两银马盂”。^⑥

金朝设立有放老给赏制度，即给年老退伍军人一次性发放财物。根据“给赏之例”的规定，以地区、职务、年限等为给赏的标准。河南、陕西、山东等地，旧军担任千户十年以上，赏银五十两、绢三十匹。担任谋克十年以上，赏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不足十年的千户与十年以上谋克赏赐相同。蒲里衍十年以上，银三十两、绢二十匹；不足十年的谋克与十年以上蒲里衍给赏相同。担任蒲里衍不足十年，给银二十两、绢十五匹。马、步正军、阿里喜等不分年限，放老正军银十五两、绢十一匹，阿里喜、旗鼓、吹笛、火头人等银八两、绢五匹。北部边境地区，万户、千户、谋克等依据任职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期限，分别有迁两官与从五品、迁一官与正六品、迁一官与正七品以及赏银六十两、绢六十匹，赏银五十两、绢五十匹，赏银四十两、绢四十匹等待遇。属于三虞候千户、谋克、蒲里衍等放老给赏，也以任职十年、二十年为限，赏额分为银五十两、绢三十匹，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

①③ 《金史》卷十《章宗纪二》。

②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④⑥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⑤ 《金史》卷十七《哀宗纪》。

银三十两、绢二十匹，银二十两、绢十五匹，银十五两、绢十匹等。正军、阿里喜不分年限，正军放老给赏银十两、绢七匹，阿里喜、旗鼓、吹笛、火头等人银五两、绢四匹。^①

金朝对死亡官兵有赙赠，“战没军官、军士长行赠官、赐钱有差”^②。赙赠包括追赠官爵、发放丧葬费、抚恤家属等，通常待遇优厚，“向官军战歿者皆廩给其家，恩至厚也”^③。例如，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赠故寿州死节军士魏全宣武将军、蒙城令，封其妻乡君，子俟年至十五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仍赐钱百万”。^④阵亡将领之子，年长者直接录用为官，年幼者抚恤到15岁，而后荫补为官。至宁元年（1213年）八月，纥石列执中（胡沙虎）杀卫绍王政变，宣武将军、护卫十人长完颜石乃率500名大汉军抵抗，全部战死。“战没者，赠赏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贯石俸给之，俟年十五以闻。”^⑤金朝对病逝的将领也实行赙赠，一般赙赠最高额是：“赙银千五百两、重綵五十端、绢五百匹”^⑥。金中期著名将领徒单合喜、仆散忠义、仆散揆都受此殊荣。

总之，赏赐是军队俸禄以外的一种补贴，对提高军队的待遇，鼓舞士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节 后勤保障

一、军需运输

金朝初期，军队并没有专门从事运输的后勤人员，参战军兵

① 参见《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②⑥ 《金史》卷八十七《徒单合喜传》。

③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纥石烈牙吾塔》。

④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

⑤ 《金史》卷一百二十一《鄱阳传》。

自带兵器和少量口粮。因此，金军“行军无馈运之苦”^①。由于长期作战的需要，尤其是封建制建立后，金军逐渐对后勤运输有所重视。

金朝军需运输主要是兵器和粮草，担负运输工作的多为汉军和民夫，运输工具以马骡等牲畜和车辆为主。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攻宋，金军中已设有粮料使，负责向军队供应粮草。以后，金军不断南下攻宋，运输量随之增大。金熙宗时攻宋，征调山东、河北等地人民运送军粮，“粮斛人车，路上千万无数”^②。海陵王攻宋时，在全国范围征调民夫、水手和工匠从事后勤服务。

在和南宋作战中，金军也经常使用船只为运输工具。海陵王攻宋时，户部员外郎曹望之曾“运米八十万斛由蔡水入淮，馈伐宋诸军”^③。宋军也发现在淮河中运送军需的金军船队，“舟约数百艘，有载粮运往濠州者，有载激犒之楚、扬者，溯流牵挽，其势甚速”^④。金章宗时迎击宋军北伐，仅单州一县征调“漕运船五百余只，挽夫千有余人”^⑤。金军还喜欢“以毡裹船载粮”^⑥。

金朝的军需运输能力，从海陵王起明显加强。正隆末、大定初，金朝政府为镇压西北契丹起义军，“转致甲仗八万自洺州输燕子城”^⑦，“起运在中都弓万五千、箭一百五十万赴懿州”^⑧。这两批武器，对击败契丹起义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定三年（1163年）金宋战争期间，纥石烈志宁率金军争夺灵壁、虹县、宿州等地，雨天弓受潮，“胶解，弓不可用”，金汴京府库及时“发所贮劲弓给志宁军，与宋人战，遂大捷，竟复宿州”。^⑨然而，在当时

① 《要录》卷九，第212页。

② 《金佗续编》卷十一《令措置四太子人马分路作过省札》。

③⑦ 《金史》卷九十二《曹望之传》。

④ 《要录》卷一百九十三，第3239页。

⑤ 《金文最》卷八十《单州乌延太守去思碑》。

⑥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刘锜传》。

⑧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移刺窝斡传》。

⑨ 《金史》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纥石烈志宁传》。

的情况下，金军运输能力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金末，赤盏合喜驻军中牟故城，将士 1.5 万人，而“发丁壮五千人运粮，餉合喜军”^①。军士和从事运输的丁壮比例是 3：1。尽管金军征调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后勤运输，粮草供应不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金宋战争中，金军多次因为气候恶劣，“粮道不通”、“粮馈不继”，而处于困境。例如，天会十二年（1134 年）底，金完颜宗弼军在淮南受阻于宋韩世忠部，“会大雨雪，粮道不通，野无所掠，至杀马而食”^②。从事运输的人员也由于路途艰辛、环境险恶，而付出沉重的代价。金太宗时，曾派耶律余睹率骑兵西征耶律大石占据的可敦城（曷董城），从河北、山西征发民夫运粮，“经沙漠三千余里，民无得还”^③。海陵王时，苏保衡领水军攻宋，把战船和军需从通州运到定林口，起用山东民夫“开河、担水、挽舟”，行程 280 里，“人人称冤，道路嗟叹”。^④与平时有军俸、死亡有赙赠的军士相比，从事运输民夫的地位甚低。为防止民夫逃走，军队派兵看守，视民夫如囚徒。由于民夫被迫从事运输，毫无积极性，遇到战败撤退，便丢弃军需而逃。海陵王攻宋失败，“龟山沿路有金人遗弃粟米山积”。^⑤自然条件与人为的原因，造成了金军后勤运输能力低下。

二、军屯

金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 年），已有迁女真户到内地，“比屋连村，屯结而起”^⑥的记述。这具有军屯的性质。金熙宗时，“废

① 《金史》卷十七《哀宗纪上》。

② 《要录》卷八十三，第 1370 页。

③ 《要录》卷四十三，第 786 页。

④ 《会编》卷二百四十三《杨王江上录》。

⑤ 《会编》卷二百四十六《遗史》。

⑥ 《大金国志》卷八《太宗文烈皇帝纪》。

刘豫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田军屯田”^①。从事屯田的军户由迁居中原地区的女真及契丹、奚人组成，其组织形式与猛安谋克没有多大的区别。因此，屯田军户也被称为“屯田猛安谋克”^②。金朝屯田军户属于元帅府管辖，实际上是储备兵员之所。

金朝统治者对军屯十分重视，海陵王曾派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 11 人，赴大兴、山东、真定等路府，对这一地区的官田、荒地、寺庙田产等进行拘括，分给迁到此地的猛安谋克户屯种。金世宗多次派人视察军屯情况，并指示“刷良田给之”^③。

金朝中期，军屯户约有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有三、四百人，不超过五百人，屯田的地点主要分布在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诸路。屯田军设有千户、百户统领，不居住在州县，在村落之间筑寨居住。政府按户口分给军人和家属一定数目的官田，令军户自行耕种，收获归己，不缴纳税粮，政府每年发给服装和一定数量的津贴。平时军人和家属以耕种为生，战时屯田军人出征作战发给军俸，老幼家属依旧在家屯种。屯田军出征时的军俸数额，据《大金国志·屯田》载：月俸“米不过十斗，钱不过数千”^④。说法笼统而欠准确。《金史·兵志》所说的“屯田被差”人的俸禄：“猛安月给钱六贯、米一石八斗、五马刍粟，谋克钱四贯、米一石二斗、三马刍粟，蒲辇钱二贯、米六斗、二马刍粟，正军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一马刍粟”。^⑤即系出征屯田军的月俸。由于屯田军“与百姓杂处”^⑥，不免同当地民户发生纠纷。民户有把属于“本朝元帅府已曾拘籍”的屯田，“指射为无主地”，占为己有。^⑦屯田军强占民田的事也时有

① 《会编》卷二百二十四《金虏图经》。

② 《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二》。

③④ 《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六《屯田》。

⑤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⑥ 《会编》卷二百四十四《金虏图经》。

⑦ 以下引文见《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二》。

发生。金世宗曾对宰臣说：“能使军户稍给，民不失业，乃朕之心也”。但是，军户与民户之间的矛盾难以缓和。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南京、陕西路军民为争地，“以致军民起讼”，朝廷“差官往各路定之”。然而，军民矛盾并未解决，纠纷不断。泰和间，“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民田被军队强占为屯田，而民户仍要纳税，自然引起民户的不满，上告朝廷。尚书省上书说：“若复遣官分往，追照案凭，讼言纷纷何时已乎。”于是金章宗下令，所多征民户的税粮，以后“于税内每岁续克”。实际上是承认军队强占民田。

军户分到田产后，也有转租给民户耕种，自己坐享其成。对此，金朝原有禁令：“军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赁与人，违者苗付地主”。但是，军户转租土地的现象仍很普遍。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又制定新的条例：“所拨地土十里内自种之数，每丁四十亩，续进丁同此，余者许令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对限制转租屯田的政策有所放宽。

金宣宗南迁后，河北地区为蒙古军所占，河北军户徙于河南。金宣宗和宰相主张“括官田及牧地”给河北军户。^①由于太常丞石抹世勳、侍御史刘元规等大臣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实行。后采取“倍益官租，以给军食”的办法。但是，“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费三百六十万石，半以给直，犹支粟三百万石”。当时，河南可租地24万顷，每年获租税156万石，仅勉强够河北军户口粮的半数。于是金宣宗又准备建立军屯，命右司谏冯开等到各地寻找荒芜的官田和可耕的牧地，准备授以军户，每人30亩；又任命尚书右丞高汝砺负责“以括荒田及牧马地给军”。由于高汝砺等人的反对，金宣宗“诏罢给田”，对军户采取“半给粮、半给实直”。直到兴定末年，金朝君臣还在争论屯田利弊的问题，但是“更不能行”。以后，军屯一直没有能够恢复。

① 以下引文见《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二》。

第四章 南宋军制

南宋建立后，始终受到来自北方的军事势力威胁。因此，其军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南宋的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构成、军兵种、军队的编制、兵役制度、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较之前代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第一节 军事领导体制

一、中央领导体制

南宋中央统御体制前后有所变化。建炎初，以御营司专掌兵权，由宰相和执政兼任御营使和御营副使，御营司实际成为统领全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建炎末，恢复北宋枢密院管军旧制，枢密院又成为最高军事机构。南宋还曾在临安设置诸路军事都督和三衙等重要机构。

（一）御营司

御营司也称御营使司，是南宋初期的最高军事机构。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宋高宗始置御营司。南宋设御营司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南宋政权建立后，北宋溃散的军队陆续聚集到南宋行朝。当时，南宋主要的军队有杨维忠、王渊、韩世忠的河北兵，刘光世的陕西兵，张俊、苗傅等的帅府及降盗兵。^①各支军队互不相统，“于是始制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②。御营司的最高长官为御营使和御营副使，由宰相和执政兼任，下设都统制。御营司辖

^{①②} 《要录》卷五，第123页。

有五军，军一级最高指挥官为统制。六月，宋高宗“命诸郡各举才谋勇略可仗者三人，赴御营司量才录用”。^①御营司机构属员也随之配备齐全。

御营司设立后，改变了北宋时期枢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柄的格局，“置御营使，其后专掌兵权，枢府不得而豫”^②。宰执以御营使身份辖治诸军，军事机构和指挥程序均较简化。这一格局对南宋军事体系的重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御营司管军的体制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尤其是都统制一职常用难孚众望之人，而引起矛盾颇多，以致诸军渐有脱离御营司而独立的趋势。由于御营司权限逐渐削弱，南宋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必要的调整。

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撤销御营司，“罢御营使及官属，而以其事归枢院”^③。军队也相应地进行了改编，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御营军为神武副军、御营副使军为御前巡卫军。诸军并归枢密院管辖，恢复北宋枢密院管军的旧制。御营司撤销后，下设的一应机构也随之撤销。如“御营司有激赏库，专充军书、警奏、间探之用，凡银五百两、钱千缗为一料，画旨取之。暨司废，库存隶于三省，出纳浸广矣。”^④以后在宋孝宗初年，又曾设过御营卫使司和御营使司，但职权已缩小，不能辖治诸军。

（二）枢密院

枢密院是南宋最高军事机构。南宋初，仍沿袭北宋旧制设枢密院主持军事。但是，宋高宗把实权交归御营司，枢密院形同虚设。建炎四年，撤销御营司，“以其事归密院”^⑤，枢密院才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军事机构。

南宋枢密院设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事、枢密副使、

① 《要录》卷六，第158页。

② 《要录》卷五，第124页。

③④ 《要录》卷三十四，第658页。

⑤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

签书枢密事、同签书枢密事等职。上列职务并非一定同时设立，而时有增损。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以宰相兼任枢密使。此时，宰相兼枢密使尚未形成制度，“或兼或否”^①。自宋宁宗开禧年间，始“以宰相兼使，遂为永制”^②。南宋后期，宰相仍例兼枢密使，但又另设专职的枢密使。南宋枢密院副长官常与参知政事职务互兼。

（三）都督府

都督府也是南宋重要的军事机构，全称诸路军事都督府，设于都城临安，“掌总诸路军马，督护诸将”^③。官长为都督、同都督、督视军马等。都督由宰相充任，同都督、督视军马多为执政担任。都督出行设置都督行府。宋高宗绍兴初，吕颐浩以左仆射出都督江、淮、两浙、荆湖诸军事，设都督行府于镇江。张浚任相，兼都督诸路军马，曾奉旨江上视师，置都督行府。当时，宰相兼都督，一般居朝不外出赴前线和战区任职，而由执政及其他大臣任权同都督或同都督代行职责。

南宋中期以后，宰相一般不兼任都督，而由执政大臣兼任督视军马。参知政事兼任督视军马时，其机构常被称为参知政事行府、参政行府。但一般通称为督视军马行府、督视行府、督视府，简称行府、督府。都督府属官有咨议军事、参谋、参议等，吏员有书写机宜文字、干办官、准备差遣等。

（四）三衙

三衙是两宋对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的合称。北宋时，“三衙管诸军”^④。南宋初，仍保留三衙的机构，但“自渡江以后，三衙名存实亡”^⑤。从

①② 《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志二》。

③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第3954、3955页。

④ 《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志二》，第3799页。

⑤ 《要录》卷九十六，第1582页。《要录》卷四十四亦记：“自巡幸以来，三衙实无兵，名存而已。”

而改变了三衙统辖全军的体制。绍兴五年（1135年），赵鼎、张浚为相时，主张恢复三衙统军的体制，并上奏宋高宗说：“应都督府军马，并拨隶三衙”。宋高宗回复说：“祖宗故事，应军马未有不入三衙者，今厘正之，甚善”。^①以后三衙所属军队开始恢复。绍兴五年末，杨沂中的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随后，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的兵力陆续增加，三衙的作用增大。但是，仍没有恢复到北宋时期的地位，仅辖治驻京城临安的主力军。

南宋三衙长官一般称作主管殿前司公事、主管侍卫马军公事和主管侍卫步军公事，职责分管三衙军。南宋三衙军与各御前军均为并列的屯驻大军，编制也大致相同。南宋三衙管理体制与北宋略有不同，侍卫马军司并非全统马军而兼统部分步兵，步军司也辖有部分马军。

三衙中以殿前司所辖军队兵力最强。绍兴五年十二月，殿前司已有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护圣军、选锋军、策选锋军等8军。绍兴九年（1139年），殿前司共有13名统制、21名统领，178名正、副、准备将。^②绍兴十八年（1148年），殿前司扩充踏白军、游奕军、神勇军和破敌军等4军，共计12军。^③此外，泉州左翼军、赣州右翼军、循州摧锋军和明州水军也名义上属于御前司。宋孝宗时，殿前司军定编为7.3万人。此后编制一直很稳定。

侍卫马军司的兵力较之殿前司要弱。绍兴七年（1137年）三月，组建6军、12将、6000人。^④绍兴十四年（1144年），从四川右护军调拨4个军，改编成为侍卫马军司第5~10将。^⑤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侍卫马军司兵力有3万。^⑥此后编制变化不大。

① 《要录》卷九十六，第1583页。

② 《要录》卷一百二十七，第2064页。

③ 《要录》卷一百五十八，第2567页。

④ 《要录》卷一百十，第1282页。

⑤ 《要录》卷一百五十一，第2428页。

⑥ 《要录》卷一百九十，第3176页。

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临安保留殿前司和步军司的军队，调侍卫马军司到建康，以后侍卫马军司的部队常驻建康。原属马军司的龙卫、云骑、武骑等三军，仍留驻临安。

侍卫步军司部队的组建的时间较另外两司稍晚，兵力也少于殿、马两司。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时，侍卫步军司有5军，兵力约2万人左右。宋孝宗乾道时，规定步军司编制2.1万人。南宋末年，步军司仍保留5军2.3万人。此外，步军司所属神卫、左虎翼、右虎翼、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厢军、御营喝探等7军，尚有兵力4600人。^①

二、地方领导体制

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先后设置招讨使司、宣抚使司、镇抚使司、制置使司等军事统御机构，对维护地方治安和抗金军南下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招讨使司

招讨使司，也称招讨司，南宋管辖一路或数路的军事机构。北宋时，对西夏和安南作战曾一度设置过招讨使司。北宋招讨使司主要用于战时，带有短期和临时性质。南宋招讨使司除战时指挥战事外，平时“掌收招讨杀盗贼之事”^②为主要职责。

宋高宗建炎年间，开始设立招讨使司，官长为招讨使，位于宣抚使下、制置使上。属下有随军转运使一员、参议官一员、干办官三员、随军干办四员、书写机宜文字一员。宋廷授权招讨使“军事急速事宜，待报不及，许以便宜行事”^③。南宋几位著名将领都曾担任招讨使。建炎四年（1130年），张俊任江南路招讨使。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镇压杨么起义军有功，升任湖北、襄阳招

^① 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8～161页。

^{②③}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第3965页。

讨使。绍兴十年（1140年），金完颜宗弼等军大举南攻，宋廷授任韩世忠、岳飞、张俊并兼任河南、北招讨使率部迎击金军。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廷在陕西、河东北、京东西等路都设置招讨使。这些地区为金朝占领区，宋设招讨使以示收复该地之意。

（二）宣抚使司

宣抚使司，也称宣抚司，北宋时已设置，“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及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①。南宋时成为管辖一方的军政机构。长官为宣抚使或宣抚副使、宣抚判官。宣抚使的地位在招讨使之上。宋高宗建炎时，执政大臣张浚、孟庾、李纲等都出任过宣抚使。以“处置”二字入衔，称宣抚处置使，职权又高于宣抚使。张浚曾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绍兴元年（1131年），宋廷派吕颐浩、朱胜非、刘光世以安抚大使兼宣抚使。当时，刘光世是没有担任执政的武将。史称“武臣非执政而为宣抚使，实自光世始”。^②以后，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分别以武臣充任宣抚使。绍兴七年（1137年），罢刘光世宣抚使。绍兴九年（1139年），吴玠病死。这时，南宋形成淮东、淮西、京湖三宣抚司，宣抚使分由韩世忠、张俊、岳飞担任。三宣抚司实际上为三个大的战区。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和秦桧收三帅兵权，撤销三宣抚司，以原宣抚司中的统制官自为一军，并把各军调发权收归三省和枢密院。

（三）镇抚使司

镇抚使司是南宋设于地方的军政机构。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始置，长官为镇抚使，官属有参议官、书写机宜文字各一员，干办公事二员。镇抚使司主要设置在淮南、京西、湖北等路，每司管辖的范围达几个府州和军。如翟兴曾任河南府、孟、汝、唐州镇抚使，赵立任楚州、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南宋设镇抚使用意是争取活动在宋、金接壤地区的民间武装首领。当时，在舒、蕲的李成，在襄、邓的桑仲，在扬州的郭仲威，在高邮的薛庆，都

^{①②}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第3957页。

被任命为镇抚使，“许以能扞御外寇，显立大功，特与世袭”^①。由于镇抚使多兼知府、州，因此不但掌管辖区的军事，并兼领民政。

南宋设镇抚使司并未起到抵御金、齐的作用。各镇抚使拥兵自重，各行其事，甚至有的为害一方。如李成任舒、蕲镇抚使，连兵数万，烧杀抢掠，专门在宋境肆虐，后攻打江州等地，被宋军击败降齐。绍兴四年（1134年）时，南宋仅剩荆南镇抚使解潜。赵鼎任相，召解潜入朝主管马军，撤销镇抚使司机构。

（四）制置使司

制置使司是南宋地方军事机构。北宋末年，在边界地区曾设过这一机构，管辖一路或数路的军事，职责是“经画边鄙军旅之事”^②。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设制置使司，“掌本路诸州军马屯防扞御”^③。并“诏令安抚使、发运、监司、州军官，并听制置司节制”。^④制置使司长官为制置使，地位低于招讨使，多以安抚大使兼任，也用统兵官充任，以秩级高者充任制置使，称制置大使，位宣抚副使上。绍兴间，南宋大臣赵鼎、席益、李纲、吕颐浩都曾担任过某一地区的制置大使，岳飞曾担任过制置使。宋孝宗开禧时，丘岳、何澹也担任过制置大使。制置大使下设司属官吏参谋、参议、主管机宜、书写文字各一员，干办公事三员，准备将领、差遣、差使各五员，其他人员“随时势轻重而增损”^⑤。最初，制置使权力很大，有人提出：“守臣既带安抚，又兼制置，及许便宜，权之要重，拟于朝廷”。于是诏“止许便宜制置军事”。^⑥有关刑狱、财赋交付提刑司、转运司管理。南宋先后在江西、湖南、江浙、江淮、四川、沿江、沿海等地设置过制置使司。

三、领导方式——通信传令制度

同北宋一样，为了确保中央政府对军事实施及时有效的领导，

①②③④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第3955～3967页。

⑤⑥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

南宋沿袭北宋的做法，也建有一套通信传令制度。即依靠军士骑马奔跑于递铺间，来传递朝廷指令和军情的奏报。

南宋递铺设于各地，公文通过“诸递铺转送”。遇有紧急公文，采用急递传送的方式。急递又称急脚递，规定传递速度是“日行四百里”^①。急递实际上是一种快速接力传递，在军事通信中最为常用。沈括曾说过：急脚递“惟军兴则用之”^②。急递这一通信形式，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比较先进的。因此，两宋、金、元都采用这一制度。

南宋为传送公文设立许多信牌，先后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等，并规定了日行速度和奖惩制度。

金字牌沿袭于北宋，上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字样，牌底色用朱漆，字为金字。金字牌规定日行500里，传递速度最快，常用于军情紧急时发送御前急件。宋高宗时，金字牌使用率很高，仅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至翌年二月，共计发过金字牌文字1023封。

青字牌始设于宋孝宗时期，牌底色为雌黄色，上书青字，枢密院作为“军期急速文字牌”。青字牌传递速度为“日行三百五十里”。^③

红字牌，宋光宗时由枢密院行用，牌底色为黑漆，字为红色，“日行三百里”^④。

宋时，对军事联络十分重视，朝廷要求统兵主帅行军作战，不论有事无事，每天都要发送奏报，急递呈送朝廷。如果不能写成文字，须派亲信直接驰奏。

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之五十二。

② 《梦溪笔谈》卷十一。

③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十九之四十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金字牌》。

第二节 军队的构成

一、正规军

南宋的军队主要由屯驻大军、禁军、厢军、土军、弓手等五类所组成。各类军队的名目大都从北宋沿袭而来，但是建制和作用却多有变化。南宋的屯驻大军、禁军为正规军，厢、土等军属于非正规军。据当时人统计，南宋盛时正规军大约有七八十万，非正规军有二十余万。^①

（一）屯驻大军

南宋初期，经过对北宋溃散军队的收容和整编，逐渐形成由宋廷直接控制的五支正规军，即“屯驻大军”。五支大军的番号，最初并不统一，而且同一支军队的名号前后也并不一致。绍兴五年（1135年）十二月，宋廷对五支大军颁布了统一的行营护军番号，以前、后、左、中、右划分五军。由当时著名的将领分领五军：韩世忠军称前护军、岳飞军称后护军、刘光世军为左护军、张俊军为中护军、吴玠军为右护军。前护军、左护军和中护军屯驻在长江下游，后护军驻军长江中游，右护军守卫川陕地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宋廷对军队进行改组，先后解除了韩世忠、岳飞和张俊三帅的兵权，各支大军都进行了缩编。改编后的军队取消行营护军的番号，称为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经过整编，兵员由三四十万，减至“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人”^②。以后南宋屯驻大军的体制大体稳定下来，一直延续到南宋

① 参见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十一《兵制》、《南宋文录录》卷九《对策》。关于南宋兵力，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一书中认为：“正规军四十多万人，加上禁兵、厢兵等非正规军二十多万人，总计约有六七十万人。”

②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兵志七》，第4821页。

中期。

御前诸军屯守的地域也与原行营护军有所区别，多数不屯驻在宋金交界处，而是“屯守于阡奥至安之地”^①。当时，十支御前军曾分别屯驻在兴州（今陕西略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江陵府（今湖北江陵）、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江州（今江西九江）、池州（今安徽贵池）、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利州（今四川广元）等地。御前十军连同殿前司、侍卫马军司、步军司的三支军队，共计有十三支屯驻大军。各军的兵力，少则万余，多则几万。每支屯驻大军中一般又分为游奕、前、右、中、左、后六军，有时还设有选锋军、踏白军、水军等番号。

屯驻大军通常采用军、将领导体制，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在特殊情况下有时也设都统制。将一级指挥官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等。此外，下设训练官、部将、队将、押队、拥队、旗头、教头等军官和军吏。屯驻大军中的士兵，一般分为效用和军兵两级。

南宋后期，屯驻大军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各种名目的新军逐渐增多，并取代屯驻大军成为南宋正规军的主体。屯驻大军的兵力锐减，降至仅占正规军的一小部分。

（二）禁军

北宋灭亡后，在北方的禁军大部分溃散。南宋建立以后，大体保留了北宋南方禁军的名号建置。但是，性质、作用却发生了变化。

南宋禁军仍分为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各路系将禁军，包括东南十三将禁军、驻守临安府的京畿第二将禁军等，州郡的禁军为不系将禁军。无论是系将禁军，还是不系将禁军，不以作战为主要任务，近于卫戍的部队。宋孝宗时，枢密使周必大针对当时的禁军状况说过：“昔神宗皇帝初置将、副，其选甚重，比年小

^① 《历代制度详说》卷十《屯田》。

使臣不经边任者往往得之，军情兵法，懵然不晓，但知谄辞媚色，以奉守帅，勇夫壮士，专充工匠杂役之用”^①。南宋人李心传对禁军也有专门的论述，他说：“今禁兵但供厮役，大抵如昔之厢军。将官虽存，亦无职事，但以为武臣差遣而已”^②。说明禁军的地位，已经下降到与承担各种杂役的厢军相差无几，以至被划入“无用之兵”之列。^③

禁军的作战能力，虽然不能与屯驻大军相比，但是并非毫无作用。平时镇压小规模起义，维持地方封建统治秩序。战时禁军中的青壮常常被征调到主力军中参加作战。绍兴末，金兵大举南侵，宋高宗曾诏令两浙、江东、福建各州，“将见管禁军弓弩手以十分为率，拣选人材强壮，堪披带人五分，遣官部送枢密院，教习拍试，听候使唤”^④。随后，又把除广南以外的各路州禁军弓弩手，分别抽调到自荆南府至明州的各支作战部队中。

通过拣挑强壮，使禁军又分为拣中禁军和不拣中禁军的区别。如宋孝宗时，太平州“止有拣中禁军四百二十七人”^⑤。宋光宗时，要求诸路提刑司每遇巡历，都要会同守臣，“将拣中、不拣中禁兵并厢兵，通选一次，其少壮及等，并充拣中禁军，反是充厢军”^⑥。宋宁宗时，台州禁军雄节第六指挥所管辖的 489 名禁军中，其中有拣中禁军 327 人，不拣中禁军 162 人，两种禁军的待遇也有所差别。

各路禁军由各路安抚司统辖。据宋宁宗嘉定时真德秀估计，浙东、浙西、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和广西八路“禁军之可用者之虑十万余人”^⑦。

① 《周益国公集·奏议》卷二《论诸帅臣将副》。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御前诸军》。

③⑤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四。

④ 《要录》卷一百九十，第 3174 页。

⑥ 《宝庆四明志》卷七。

⑦ 《真文忠公集》卷九《江西奏便民五事状》。

二、非正规军

(一) 厢军

南宋的厢军，其制度与北宋并无多大变化。厢军原为诸州之兵，镇守城厢。实际上已成杂役军，基本上不进行军事训练和作战。南宋人叶适说：“厢军供杂役”。^①

厢军所从事的杂役范围很广泛，修城、筑路、浚河、运输等等。宋高宗时，一次“浚运河”，征用两浙厢军4000余人充役，历时一个多月。^②平时厢军应付更多的还是本地的杂役。宋孝宗时，桂阳军有厢兵102人，仅接送官员，诸司占用等，每年需要178人。因人力不足，只好动用禁军。宋高宗时曾任参知政事的李邴，对厢军服劳役的做法十分不满，上疏说：“所谓厢军者，臣不知其所谓也。夫习击刺，工骑射，履行阵，固兵矣；擎肩舆，供伎巧，服厮役，又兵乎？今自一州守贰，下至宫观、里居之士，皆破兵为白直，允占私役，诡名重叠，其弊百出，皆原于厢军。”^③但是，直到南宋末年厢军的性质也没有多大变化。

南宋厢军隶属各路提刑司管辖。由于厢军人员多为老弱，有少壮者也拣选为禁军。因此，南宋官员李椿有“无用之兵”^④的说法。一般不征调厢军参战，特殊情况下除外。如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的情况下，宋廷曾下令“征两浙、福建诸郡厢、禁兵之半入卫”^⑤。

厢军人数，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四川厢军二万九百七十二人”。以此推测厢军总数不超过10万人。

① 《水心别集》卷十二《厢禁军弓手土兵》。

② 《要录》卷七十二，第1205页。

③ 《会编》卷一百七十四炎兴下帙七十四。

④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四。

⑤ 《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纪》，第926页。

（二）土军

宋神宗时，已有土军的名号、建制，“就其乡井，募以御盗，为土军”。南宋时，仍保留，职责依然是“土兵为乡之控扼”^①，维持地方治安。

南宋时，土军的管理机构是各路府的刑狱司，^②直接负责统领的官员为各州县的巡检。巡检为低级武官，“以材武大小使臣充。各随所在，听州县守令节制，本砦事并申取州县指挥”^③。

由于宋朝在“险扼控御去处”，设立巡检司砦，“招收土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④因此，土军又被称为砦兵。南宋巡检司砦所管辖的土军人数，一般是在100人左右。各地的巡检司砦数额不尽相同。如江南西路赣州共设12砦，浙东庆元府共有九砦，浙西路临安府有13砦，安吉州7砦等。

土军人数少于厢、禁二军。如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四川厢军二万九百七十二人，禁军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三十六人”。说明土兵较厢、禁军数额要少得多。

（三）弓手

南宋的弓手制度是从北宋沿袭而来，但是在编制和数额等方面，又有一定的变化。弓手又称弓兵、射士。南宋的弓手是隶属于县尉司的地方治安军。

南宋的弓手仍采用北宋后期雇役制度。最初是在两河、京东西设置，每县500人，都是当地有户籍的人充任，由武尉（武臣县尉）管领，主要是用来捕捉“盗贼”。当时规定，每州4县以上置准备将一员、部将一员，作为总领，每500人置都头2人总辖。十将5人，分管100人；左将虞候5人，右将虞候5人，左承局5人，右承局5

① 《水心别集》卷十二《厢禁军弓手土兵》。

② 《要录》卷十七，第352页：“诸路禁兵隶帅府，土兵、射士隶提刑司。”

③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第3982页。

④ 同上，第3979页。

人，左右将虞候、承局每人分管 25 人；押官 5 人，分管 100 人。^①以后废除了准备将一级编制，各县弓手的编额也有所裁减。

南宋弓手受所在路的提点刑狱司管辖，县尉司设置营舍和教场，弓手的训练有一定的规定，巡检、县尉要定期亲临教阅弓手，如托故不亲临者，要受到杖 100 的处罚。^②

第三节 军兵种

一、步兵

南宋的军兵种构成，仍以步兵为主，骑兵发展较慢，水军规模大幅度提高，炮兵开始逐渐从步兵中脱离而向独立兵种转化。

南宋军队中步兵占绝对优势，非正规军几乎都是步兵，正规军中步兵的数量约占总兵力的 70% 以上。南宋的正规军一般采取各军兵种混合编组的形式，以刘光世的左护军为例，绍兴七年（1137 年），全军共有 5.2 万多人，其中水军有 5000 人；骑兵人数缺载，但从仅有战马 3000 余匹来看，骑兵人数超不过一万。^③可见，步兵所占比重相当大。

南宋军队始终没有改变步兵为主的格局，面对善于骑射的金军，总的对策是以步制骑。但是，无论从当时的实战需要还是从军队的发展趋势看，这种政策无疑是消极的。岳飞在与金军作战中屡次取胜，其中重要原因也是注意在军队中编配了较强的骑兵，他的背嵬军中就集中了 8000 精锐骑兵。^④如郾城之战，岳飞首先命岳云率背嵬和游奕骑兵突入金阵，迎战金军的拐子马（左右翼骑兵），继以步兵从侧翼用专门对付骑兵的麻札刀和大斧攻击，最

① 参见《要录》卷六，第 159 页，《宋会要辑稿》兵三之十三。

② 《庆元条法事类》卷七《按阅弓兵》。

③ 《金佗续编》卷八《督府令收掌刘少保下官兵札》。

④ 《金佗粹编》卷二十二《淮西辨》。

后获胜。

南宋的步兵中作为专业炮手的数量逐步增大，并开始从步炮混合编组中独立出来。北宋时已有“飞山雄武”、“宣毅床子弓弩炮手”等炮军。但是，数量很少，设置的时间都不长。如“宣毅床子弓弩炮手”，在熙宁三年（1070年）撤销。^①炮兵仍隶属于步军，基本上还不是独立的兵种。到南宋时，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火药火器生产的规模扩大，南宋能月造铁火炮几千只、常年储存10万多只铁火炮的城邑已不鲜见。由于新型火器的不断出现，尤其是炮已成为战争中不可缺少的重火力而广泛应用于各种作战。于是对炮的操作技术要求也不断提高，使炮兵脱离以步炮混合编组转为独立的兵种。当时，与南宋交兵的金、蒙古，与蒙、金交战的西夏，都有独立的炮军。

二、水 军

南宋诸军中以水军发展的速度为最快。南宋初期，水军的规模很小，战斗力较弱，以致使金军得以顺利渡淮、渡江。以后，在与金军和蒙军作战中，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水上武装力量。

南宋初期，长江、淮河成为抵抗金军南下的主要防线。因此，发展水军为当务之要。宰相李纲提议在“沿江、淮、河帅府置水兵二军，要郡别置水兵一军，次要郡别置中军，招善舟楫者充，立军号曰凌波、楼船军”。^②以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岳飞所部都专置水军，各部水军人数一般有几千人，战船几百艘。绍兴二年（1132年），创设的御前忠锐军中也有水军。御前忠锐第七将徐文曾于绍兴三年四月，“以所部海舟六十，官军四千三百，泛海至盐城县，遣使臣阍中纳款于伪齐”^③。绍兴三年至六年间，南宋

① 《宋史》卷一百八十八《兵志二》，第4623页。

② 《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志一》，第4583页。

③ 《要录》卷六十七，第1135页。

又先后建立横江水军、神武中军水军、沿海制置使司水军等几支水军。宋高宗统治时期，宋金的几次战争中，宋水军都发挥很大作用。如黄天荡之战和陈家岛之战都是依靠水军取得了胜利。

南宋中期以后，南宋政府在江、淮、海沿岸重镇，设置了 20 多支水军，以长江下游至两浙路沿海的水军兵力最强。如平江府许浦水军，“元额一万四千人，分为四军、八将、六十三队”^①。虽然实际人数前后有所变化，但是大多数时间里，许浦水军都能经常保持在 1 万人以上。

南宋水军的领导体制和编制情况，与陆军大体相同，也是采用军、将、队编制。统兵官有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等，并设有训练官、押队、拥队、引战教头、牌头等。水军兵士中的等级，也分为使臣、效用、水军。宋孝宗时，一度设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②。集中统一管理水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南宋水军的武器装备以战舰为主，配有大量的弓弩及火箭、火炮等兵器。宋元战争时，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麾下都统张顺和张贵率 3000 人，乘战船 100 余艘，增援襄阳府“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③等，都是适合于水战的兵器。水战的发展，水军中使用“火炮之法”，“火箭环射”等战术，^④也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平时水军也举行训练演习，以提高作战能力。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 年）曾目睹过鄂州水军演习，当时战舰有 700 艘，大者有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鞀鞀，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⑤。南宋水军在战船和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技术及管理等方面，陆续建立起来一套较严格的制度。

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十四。

② 《宋史》卷三十四《孝宗纪》，第 641 页。

③ 《宋史》卷四百五十《张顺传》，第 13248 页。

④ 《敝帚稿略》卷一《防海寇申省状》，宋人集丙编本。

⑤ 《渭南文集》卷四十六《入蜀记》。

三、骑 兵

南宋政府骑兵的建设，远不如步兵和水军。因此，南宋的骑兵与女真骑兵和蒙古骑兵相比要落后得多。

战马的数质量是反映骑兵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蒙古骑兵配备的战马，数量往往多于骑兵人数。每个骑兵战士一般都备有两匹战马，一匹作为从马，以便随时换乘，保持马的体力和行进速度。南宋骑兵恰恰相反，兵多马少，出现部分骑兵无马骑的现象。从高宗始，宋军骑兵缺马之弊就没有解决。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宋高宗就下诏：“文臣许养马一匹，余官吏士民之有马者并赴官，委守、令籍为三等，以常平封桩钱偿其直：马高四尺六尺为上等，率直百千，余以是为差。有田之家则折其税，僧道则以度牒取偿，限半月籍定，有隐寄者以违制论。每买（马）及百匹，则守倅令佐迁一官，不及者等第推赏”^①。这种依靠强买民间马匹的做法，并没有解决军队缺少马匹的问题。孝宗时，华岳《再上皇帝书》说：南宋军事上有十弊，其中有“御骑者未得其具”和“马政未备”。^②宋光宗时，殿前都指挥使郭杲奏称：“本司应管战马一万七百余匹为额，比之元额，见阙二千二百余匹”^③。殿前司骑兵人数本来不及总兵力的七分之一，但仍有约五分之一的骑兵无马骑。宋宁宗嘉泰时，江州都统司兵力编额1万人中，“马军合用披带马一千六百八十匹，目今不及千匹”^④。马匹的缺少，影响南宋骑兵建设。

南宋骑兵缺马有主客观原因。当时马匹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养马和买马。南宋先后在各地设置过一些马监，以牧养繁殖

① 《要录》卷六，第168页。

②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一。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十六之六。

④ 同上，兵二十六之十五。

马匹。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置马监于饶州，守倅领之，择官田为牧地，复置提举，俄废”^①。绍兴四年（1134年），又在临安府的余杭和南荡设马监。以后又置监于郢、鄂间，收养公母马千匹，“十余年仅生二十驹，且不可用，乃已”^②。南宋马监牧马，多因管理不善，而效果甚差。仅鄂州大军设于汉阳军的“孳生监”^③，曾一度有所获。马监牧马的失败，也与当时流行的“南地不宜牧马”^④的传统观念有关。养马不成，于是全靠买马。能用于作战马的，主要是来自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北方因战事，影响互市）。宋孝宗乾道年间，南宋每年在四川购买川秦马1.19万多匹。宋宁宗时，每年所购川秦马也在1.1万至1.2万左右。初期规定，所购川秦马要送至枢密院，因多死于途中，又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改为“分隶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各七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马司、步司各千，川马良者二百进御”^⑤。南宋每年在广南地区购买的广马，为1500匹至3000匹。凡属于军马，都要打上烙印，各军字号有别，便于区分。南宋每年用于买马的费用很高，川秦马“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出易马绸绢十万四千疋”^⑥。广马“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绁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得马千五百”。运费更超过买马的费用。川秦马“每纲运，公私经费十倍，而人马俱疲。上则耗国用，下则困州县”。买马费用的昂贵，限制了购买的数量，质量也难以保障。陆游针对当时的马政衰败，作诗云：“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瘴乡所产非权奇，边头岁入几番皮。崔嵬瘦骨带火印，离立欲不禁风吹”^⑦。真实地反映出南宋在购置军马方面的困境。

南宋骑兵不但缺少马匹，训练方面也很差。从南宋有关骑兵

①②④⑤ 《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兵志十二》，第4954～4956页。

③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二。

⑥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兵志十二》，第4955～4957页。

⑦ 《剑南诗稿》卷五《龙眼画马》。

训练资料的匮乏，也可以反映出这方面的问题。南宋骑兵没有形成独立兵种和行之有效的战术，仅仅作为步兵的附属兵种，配合步兵作战。

第四节 军队编制

一、编制单位

南宋正规军一般采用军、将、部、队四级编制，军辖将，将辖部，部辖队。建炎时，设御营司，曾规定“诸军并以万人为一军”^①。绍兴时，每军兵员数额并不严格划一，从千人到万余人不等。如绍兴七年（1137年），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刘锜奏请，“以前护副军及马司，见在通为前、后、左、右、中及游奕，凡六军，每军千人，共为十二将”。宋高宗“从之”。^②五大帅之一的刘光世，所辖有10军，各军的兵力不同，最多的是乔仲福军7038人，最少的是王照军3128人。岳飞辖有背嵬、前、后、左、中、右等12军，各军的兵力也有差别，其中精锐亲兵背嵬军的兵力超过万人。宋孝宗时，军的兵员数额多在4000至8000之间。如淳熙九年（1182年），兴元府都统司管辖5军，前军4700余人，左、右、后3军各有4300余人，中军7800余人。^③

军以下设将，每将的编额也不尽相同，大体一将有千人左右。一军设几将，根据其军的兵力而决定。御营司管军时，曾规定“每军十将”^④。宋孝宗乾道时，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分为前、右、中、左、后、水、游奕7军，水军兵力为5000人，其余6军各7000人。“水军以三将，余军以五将，共三十二将”。^⑤由于将隶属某军，

①④ 《要录》卷二十四，第500页。

② 《要录》卷一百十，第1782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六之四。

⑤ 《嘉定镇江志》卷十。

因此将的番号前面常冠以所在军的名称，如兴元府驻扎前中军马军第一将、建康府驻御前左军步军第二将等。

南宋时，军队的军、将、队三级编制较为固定，而部的设置或设或废常有变化。每将一般设4至5部，分别为左、右、前、后及中部，每部数百人。当时，也有特殊的现象，如建炎时的神武军部的编制甚至超过将。

队是南宋正规军的基层编制单位。南宋队的编制，基本上是从宋神宗“新定结队法”延续而来。一般50人为一队。

二、统兵官的设置

南宋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以统制职务最高。遇有特殊情况以及水军等特殊兵种，在统制之上有时也设都统制和副都统制。^①军级职务的设置，按一般惯例，“每军差置统制官一员，统领二员”^②。将一级的统兵官名称为正将、副将、准备将等，通常一将有正、副、准备将各一员。部将是部的统兵官，分正、副将；南宋初神武等军的部级统兵官是统领。队设队将、拥队、押队、旗头等名目。旗头执战旗，押队于队前导引，拥队殿后，全队随号令统一行动。旗头属于军吏，押队和拥队可以作为队将，也可为队官。区别在于，如果是使臣等有品武阶官，即可作队将；如为无品武阶官，即算作队官。

在各级统兵官之外，军中还设有训练官和教头等名目。训练官职责是负责军事训练，地位较低，与旗头地位相当，一般属于军吏。

南宋初，军队官员的任命，“准备将而上，皆主帅升差，仍先申枢密院审察”^③。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改为“训练官、部

① 参见《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二之四十六。

③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第3982页。

队将而下，许军中径差，申朝廷照会”。宋光宗绍熙间，“诏诸军升差统制至准备将者，主帅解发三人，赴总领所选一名”。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诏主帅选择，总领所或屯军处守臣审核保明，申枢密院”。

三、士兵的等级

南宋正规军中的士兵也分为三个等级：使臣、效用和军兵。使臣原是宋朝八品和九品的十等武阶官总称。有此武阶的人进入军队后，可以担任统兵官。但是相当一部分使臣，仅仅充当普通战士。这部分人的待遇却高于一般战士，“一使臣之俸，实兼十人战士之费”^①。于是，在军中就形成一个高于普通军士的使臣等级。军队可以直接招募使臣，效用和军兵也可以晋升为使臣。南宋初期，使臣在军中占有不小的比重，“一军不过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②。绍兴十年（1140年），刘光世的三京路招抚处置使司奉命“招效用、军兵万人，内招使臣二千员”。^③使臣在军中的比例的增大，并不是军队素质和作战能力提高的表现，而是某种程度上军队腐败的反映。“行伍中使臣大半，是养兵十万，而止获万兵之用”。^④有相当一部分使臣是靠“亲旧之和”入伍，甚至有人“身未尝到，虚寄名籍，以资请给”。^⑤当时，还有一部分占用军队编制，并不参加战斗的“不入队使臣”。这部分人在各军中究竟有多少，难有确数。驻川陕的吴玠军“有不入队使臣三百三十人”^⑥，也未必是全数。金宋隆兴和议后，宋孝宗整顿军队，裁减使臣，军中主要采行效用、军兵两级制。

① 《浮溪集》卷一《行在越州条具时政》。

② 《要录》卷六十三，第1067页。

③④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兵志》。

⑤ 《毗陵集》卷三《论诸军效用使臣札子》。

⑥ 《要录》卷一百十一，第1798页。

效用是列在使臣之下的一个等级。效用的待遇和地位优于普通军兵。效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由军兵升迁，二是直接招募。充当效用的基本条件是体格健壮，作战勇敢。但是，由于战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实际招募中，往往发生降低标准和滥竽充数的现象，甚至有一军中战士全部都是效用。宋孝宗隆兴时，对招募效用数额作了规定：“招七分军兵，三分效用”^①。于是，三七开成为南宋招募效用和军兵的比例。时人愿投充效用，在于俸禄高于军兵，又免于刺字。“效用日得之饷，三倍于兵，敌近应募为兵者甚少。”^②宋时，刺字作为特殊的标记，对罪犯、奴婢、士兵等常采用刺字的方式，以区别于常人。既有防止逃亡，又有表示其低贱身份的作用。效用“不刺面，不捏手”，^③很受兵士欢迎。效用又分为上等效用、次等效用，此外因在编与不在编以及替补等，又分为守阙效用、不入队效用、队外效用、正额效用、额外效用等名目。上等效用在身材和臂力方面规定的标准较高，次等稍逊。南宋在军队中设置和推广效用等级，部分废除了黥兵制，兵士的地位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军兵在军中数额最大，来源复杂，待遇和地位也最低。因此，人员流动性很大，造成编额伸缩性很大。时局紧张和灾年，人员迅速膨胀，平时则减少。军兵积战功可以升为效用。军兵也有等级，一般分成胜捷、吐浑、雄威三等，通称为“三色军兵”。从身长的规定，俸禄多寡，到招收数额都有区别。胜捷军士身長规格为5.65宋尺、吐浑5.55宋尺、雄威5.45宋尺。南宋末，建康沿江制置司的防江军，其中步军三千，“并刺充三色军兵”，“胜捷五百人，吐浑一千人，雄威一千五百人”。^④多少反映出三色军兵编制的情况。

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诸军效用》。

② 洪适：《盘洲文集》卷四十二《论招军之弊札子》。

③ 王之道：《相山集》卷二十《又与汪中丞画一利害札子》。

④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

第五节 兵役制度

一、招募

南宋的兵役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北宋制度，实行招募为主，同时采用强刺及配隶等方式。

南宋募兵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根据需要随时招募。如宋高宗末年，殿前司缺额数千人，于是“诏三衙分月招补”^①。灾年募兵多，兵源以逃荒饥民为主。如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江西、湖南地区遭受旱灾，粮食歉入，朝廷诏令两地募兵千人。^②宋理宗时曾“招收沿淮失业壮丁”^③ 5000人组成武胜军。灾年募兵，主要是出于防止饥民聚众滋事。南宋人吴儆在《论募兵》中说：“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两得”。^④平时也有破产的农民和流民为解决衣食问题自愿投募的。

南宋也十分重视招募军户子弟入伍。宋高宗时，“令诸路州、军、砦或三衙招募，或选刺三衙军中子弟，或从诸郡选刺中军子弟解发”。^⑤但是，南宋军人子弟入伍，与世隶军籍的唐之府兵不同，还是多采用自愿投充的方式。宋光宗时，洪秘曾对宋光宗说：原岳家军的子弟具有极好的素质，但是“为壮士者非效用则弗屑”^⑥。军人子弟入伍的条件较之逃荒农民要高，多愿意充当地位

① 《要录》卷一百七十九，第2953页。

② 参见《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

③ 《宋史》卷四十三《理宗纪》，第830页。

④ 《吴文肃公文集》卷二《论募兵》。

⑤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兵志七》，第4819页。

⑥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一《知南剑州洪公墓志铭》。

较高的效用兵。

南宋对待应募人员，视其原来的身份给予不同待遇。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宋廷曾规定：“凡招军，量增例物，其白身充募者全给，溃兵、降盗及他军改刺者半之，……如有良家子愿备弓马从军者，依敢勇法月给钱米”。^①

在正常情况下，南宋正规军招募新兵，也讲究一定的质量。新兵入伍前要进行体格检查，身高、视力、力量、年龄都有一定的规定。测量身高仍采用北宋流传下来的等长杖方式，即以木挺所刻身高尺寸为依据。各军种虽有不同尺度，但较之北宋嘉祐军兵二十几个等级，要简化很多。^②南宋投充效用兵，身高要求较高。宋光宗时，从南宋控制地区以外归来的原宋朝官员子弟，投充效用兵，需要“身長五尺五寸”^③。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允许金州都统募兵，“自五尺四寸至五尺六寸三等招收”^④。宋孝宗时，殿前司、步军司军官子弟投充效用兵，也必须进行身高测量，要求符合等长杖。以后，经枢密院奏请，在缺额的情况下，“若低一、二寸，令射八斗力弓，低三寸，令射九斗力弓，委承旨司审验强壮，即行指试”^⑤。视力测试采用划定距离，掩一目等方式，与现代视力检查有相似之处。测量力量主要采用开弓弩方式，从几斗力弓到几石力弩不等。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殿前司“正额效用万一千五百九十二人，阙二百五十九人，于雄效内及效用带甲拍试一石力弓、三石力弩合格人填阙额”。^⑥南宋招募军兵年龄以二十岁至三十五岁为最佳年龄层，四十五岁以下次之。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曾下诏征调江南、江东、两浙，“部辖人

① 《要录》卷六，第169页。

② 参见《宋史》卷一百九十三《兵志七》。

③ 《宋会要辑稿》兵十七之三十二。

④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兵志七》，第4821页。

⑤ 《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⑥ 《宋史》卷一百九十四《兵志八》，第4839页。

年四十五以下，长行年三十五以下”，取六分之一赴行在。^① 军士退役年龄，正常情况下，一般要在五十岁以上。一经招募为军士，通常只有年老病弱才被裁汰。

南宋募兵制的一个特点，士兵家属可以随军居住军营。这虽然解决了“远妻孥怀土之恋”，但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南宋初年，军队调动频繁，家属随军给作战带来很大的困难。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出任通、泰州镇抚使，所带军马仅有1万余人，加上家属却有7万多人。因为行动迟缓，贻误了救援楚州的战机。^② 绍兴十年（1140年），大将刘锜带兵约2万人，随行家属好几万人，在顺昌府与金军遭遇，靠死战侥幸获胜。^③ 军队在作战时，携带家眷，影响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家属随军，也增加了居住的困难。南宋政府为安顿军人及其家属，建造了不少营房，解决了一些问题。这对安定军心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强 刺

南宋还采用“强刺”方式逼迫平民入伍。宋高宗绍兴末，这种“强刺平民为军”的现象相当普遍。“诸将掠人为兵，补军籍，率用大舟往来漕河无人处，道遇强壮少年，束缚绀梏之。恶少利其资，通为囊橐，因闭栅中，无脱者”。^④ 某些部队将领还肆无忌惮地派军士到集市掳掠市民、樵夫和渔民入伍。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正月，殿中侍御史王珪曾上疏要求制止“殿前马步军三衙强刺平民为军”的做法。^⑤ 因为军队缺额现象很普遍，所以朝廷对强刺只好默许。强刺的结果，使从临安行在到衢、婺数州，“道路之间，商旅不行，远近大扰”。^⑥ 甚至“将别军人拘执”，而引起

① 《宋史》卷一百九十四《兵志八》，第4838页。

② 参见《金佗粹编》卷十七《赴镇画一申省札子》。

③ 参见《会编》卷二百一《顺昌战胜破贼录》。

④⑤⑥ 《要录》卷一百七十九，第2953～2954页。

争端。以至宋廷下令制止“互相招收”的现象。^①但南宋对于强刺平民为兵的做法始终没有废止。

三、其他规定

南宋的兵役制度，在募兵和强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以罪犯充当供役的军兵也是常采用的方式。当时规定：“应犯强盗，合配远方之人，并配隶屯驻大军交管”。^②诸路每年所发配的罪人多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壮勇，“配隶诸军，正得其所”。^③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池州御前诸军都统制李显忠也曾对“本军有诸州配到罪人不少”，采取“拣选堪披带之人充军，将怯弱人发遣附近州军牢城收管”。^④当时，罪犯成为南宋正规军的兵源之一。

军士还要在脸部和手部等处刺字。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曾下诏河南、河北、淮南等地，招募有民籍的土人为振华军，“皆于左鬓刺‘某州振华’四字”。^⑤当时，还规定各地弓手“已拣中者，即于左手背上刺‘拣中弓手’四小字为号”。^⑥宋宁宗时，湖南安抚司设置亲兵，对原已刺字军兵，再于“左手母指下添刺‘湖南安抚司亲兵’七字”。以后，又从本司招募填补缺额时，“却于左额角上刺七字军号”。^⑦南宋时已经出现效用兵不刺字的做法，但是缺乏法律上严格的规定。因此，效用兵刺字的现象并不能杜绝。宋宁宗时，隶属各路安抚司的效用兵，“小字于手背刺‘某路安抚司效用’八字”。^⑧反映出当时存在效用兵刺字的现象。

①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兵志七》，第4819页。

②③ 《吴文肃公文集》卷二《论配隶当屯驻大军》。

④ 《要录》卷一百八十四，第3086页。

⑤ 《要录》卷十三，第292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十八。

⑦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一之一百十六。

⑧ 《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十八《招补归朝归明归正人》。

由于军士不能随意脱离军籍，军中经常有逃亡的现象发生。开禧元年（1205年），参知政事蒋芾说：“在内诸军，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①。宋理宗绍定时，各州郡招募军兵，“所招无二三，逃亡已六七”^②。为禁止士兵逃亡，宋朝制定有“逃亡之法”。南宋初，宰相李纲颁军制二十一条，其中第二条即逃亡法。但是，逃亡法并没有阻止住士兵的逃亡。

第六节 军事训练和军事法规

一、军事训练

南宋对军队的训练很重视，并制定严格的法规予以保障。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为加强对新组建军队的训练，颁行枢密院教阅法，“专习制御摧锋破敌之艺”^③。教阅法规定，军队训练时要全副武装，贯甲束带，兵器用短桩神臂弓、长柄刀、木槌等。训练分两步进行：第一，熟悉兵器的使用。射箭包括步射和骑射两种，射士与箭垛间隔一百二十步，用力量很大的神臂弓发箭，每日给箭二十。训练时战士所用长柄刀，长一丈二尺以上，外面裹上毡皮，引斗五十二次，不使刀头触地。第二，排练阵法。经过两次演练兵器的军士，分成五十人为一队，教习分合后，编成前、右、左、中、后五军。每军各设置旗号，“前军绯旗，飞鸟为号；后军皂旗，龟为号；左军青旗，蛟为号；右军白旗，虎为号；中军黄旗，神人为号”。除此以外，还制做指挥用的各式招旗、分旗。演练开始，教官招旗一举，五军一起举旗相应，组成阵式。分旗一举，五军分阵为队。“左右前却，或分藏为伏，或分出为奇，皆举旗为号”。同时，配以金、鼓，协调行动。“缓鸣小金即止，急鸣应鼓即奇兵出阵趋战，急鸣小金即伏兵出”。每年春秋季节要依

①②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兵志七》，第4821页。

③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第4868页。

照教阅法进行训练。

宋高宗以后，宋廷对教阅法不断加以补充，增加训练科目，提高训练项目难度。宋孝宗淳熙间，制定“枪手及射铁帘格”^①。射铁帘，即射手的目标是铁帘，中的后发出声响。规定“中垛帘弓箭手一石二斗力十箭，弩手四石力八箭，依格进两秩，各赐钱百缗；弓箭手一石力十箭以上，弩手三石力八箭，各进两秩”。枪手以擗刺枪数为标准。宋光宗时，又对“枪手及射铁帘格”进行了改订，新格规定：殿前、步军司诸军弓箭手，“带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六箭中垛为本等。弩手，带甲百步射，四石力，箭十二，五箭中垛为本等。枪手，驻足举手擗刺，以四十擗为本等”。达到本等要求后，并不能晋秩获赏，而是在高于本等规定的人中进行筛选。每军从5500人以上选出弓弩、枪手各15人。这些人经过统制、统领检查，主帅审核，然后到枢密院复试，从中再择优等2人，升转两秩，其余人只给钱五缗。宋宁宗时，对诸路禁军训练的要求：“以十分为率，二分习弓，六分习弩，余二分习枪牌。习弓者听兼习弩，斗力可以观其进退，射亲可以察其能否”。南宋正规军中普遍设有训练官和教头，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教习武艺。

南宋在加强马步军训练的同时，水军训练也备受重视。建炎初，李纲看到“水战之利，南方所宜”。建议“沿河、淮、海、江帅府、要郡，宜效古制造战船，以运转轻捷安稳为良。又习火攻，以焚敌舟。”^②宋高宗派杨观复前往江、浙负责组建和训练水军；沿江、淮、海口州郡，也委派官员“措置教阅水战人兵”^③。南宋初期，水军训练也是每年春秋两次。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水军训练增加了时间，“水军岁春秋两教外，每月轮阅习”^④。

南宋军事训练并不是常抓不懈，而是随战和之势时紧时松。宋

①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

②④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

③ 《要录》卷八，第195页。

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以前还较为重视。宋高宗有时还“诏内殿按阅神武中军官兵”。^①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之后，军队训练松弛。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有大臣曾上奏说：“州郡禁卒，远方纵弛，多不训练，春秋教阅，临时备数，乞申严旧制。”^②但是，并未引起宋高宗的重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四月，“朝廷闻金人决欲败盟”，六月金海陵王迁都汴京，战争迫在眉睫。宋高宗这才临阵磨枪，在同年七月，“命江浙、江东滨海诸州预备敌兵。诏诸路帅臣教阅土兵、弓手”。^③同时，要求各地帅府“严责守兵勤兵归营，训练精熟，以备点视”。^④从宋孝宗起到宋亡，皇帝多在即位初期和新改元不久，进行较大规模的阅兵活动。阅兵对于提高军队士气和备战意识有一定的作用。

南宋末年，军事训练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有大臣上疏说：“比者招募军兵，一时徒取充数，以觐赏格。涅刺之后，更不教阅”。^⑤这种情况下，军队素质降低，影响战斗力。

二、军事法规——“新法”

南宋军队是在北宋溃军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军法废弛，军纪涣散的现象十分严重，极大地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对此，南宋许多军事将帅和有识之士都提出加强军事法规的建设。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宰相李纲曾主持颁军制二十一条。宋高宗下诏说：“自今行军用师并依新法从事”。^⑥这是南宋颁行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综合性军事法规。新军法二十一条，就其内容来说，并不完全都是新的，其中有的是在新形势下对旧法的重申。现将二十一

①②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

③ 《宋史》卷三十二《高宗纪九》，第601页。

④⑤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第4872页。

⑥ 以下引文均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七之二十八~三十。

条军法以其所包括的内容归纳叙述如下：

一是重申“阶级之法”。北宋初年设立此法的目的，即明确各级军职的上下隶属关系。新法又对“阶级之法”加以重申，规定：“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议，敢有违犯，上军当行处斩，下军徒三年配五百里”。南宋新立，“循浸失法”的现象较为严重。重申阶级之法，对维护军队的领导体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是逃亡之法。此法是针对禁军逃亡所制定的惩治条例。律条规定：“禁军逃亡，上军处斩，在七日内者，流三千里，配千里，首身杖一百；下军第一度（徒）三年，首身杖九十；第二度流三千里，配邻州本城，首身徒二年；自今可常切遵守。过七日者，不许自首，许人告捕，每获一名，赏钱十贯文”。士兵逃亡对军队造成的危害最大。南宋士兵多为被迫入伍的饥民和罪犯等，因此逃亡的现象极为普遍。无论立法多严，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士兵逃亡的问题。

三是出战之法。主要是对临阵士兵的奖惩律条。其中规定：“禁军出战，遇贼敌进前用命者，赏；辄退不用命者，斩；贼众我寡，力不能胜，因致溃散，不归本部本寨聚集者，斩；因逃归住营处不作过者，家族并诛”。南宋军队初建时，战斗力很弱，惧怕金兵，常常临阵一触即溃。李纲等试图通过设立此法以扭转这一局面。

四是行军之法。军队在行军中的纪律约束。其律条规定：“禁军于行师之际，盗、博、斗殴、饮酒至醉、拍掷器甲、藏匿妇人、胁持财物、扇摇惑众、买物不还价钱，并依军法”。南宋初，军纪败坏，赌博、斗殴、敲诈、抢劫习以为常。军中因赌博的输赢，使酒负气，经常引起争执和斗殴，以至发生恶性事件。设立此法之后，军纪也未见有所好转。南宋大臣杨万里曾对军队中“蒲博而使酒”的风气提出过批评。^①

五是统兵官之法。这是对带兵将领所设立的律条。其内容规

^① 《诚斋集》卷八十九《千虑策》。

定：“统制官、部队将，遇敌怯懦，不能率众用命者，斩；贼攻，一军危急，而余军不策应者，统兵官当行军法；统制官明保公状，故不实，徇私不公者，当行军法；统制官不能抚御将士，致士卒摇动者，当行军法；统制官不能用兵，不能乘机取胜，致败北，事理重者，当行处斩；事理轻者，编窜远恶州军”。作战的胜负，往往与担负军事指挥的将领有直接的关系。二十一条中针对统兵将领所制定的律条比重不小，但实际执行也最差。

六是赏罚之法。针对将士作战中的功过而制定的奖惩条例。其具体内容有：“将士卒伍先登陷阵及以弓弩射贼者，虽不纳级，亦行推赏。全军胜，则全军推赏，全队胜，则全队推赏；同退走者，尽斩。军队虽不胜，其间有能自斩贼级者，及中伤在前者，自行推赏”。“凡有罪处斩，并枭首令众，率先退走者，家属尽杀，余并依将法”。“守纪律，保护其上者赏，违犯者斩”。“守控扼要害，敌处至，因守不去者赏，弃所守者斩”。“使劫寨，或邀截，或追逐，或设伏，或出奇，或入敌营垒探事，能如令者赏，违戾者斩”。赏罚严明是军事法规的一条重要原则，起着激励士气，增强战斗力的重要作用。正如华岳所说：“恩威之不明，三军之大患也”。南宋军队无功而赏，有罪不罚的事例很多，“实败而言胜，无功而希赏”，^①已经成为一种军风。

七是抚恤之法。对伤亡将士的家属进行抚恤的规定。其内容规定：“将士战没，五甲将佐亲身而非逃亡者，委五甲将佐开具保明，当优恤其家，不得辄以收身不到开落，违者重行编配，许其家陈诉”。南宋军队家属可以随军，对伤亡将士的家眷能否有所安置，会直接影响作战军队的情绪。尽管此律缺乏详细具体的规定，但对收揽军心还多少有些作用。

八是执法官之法。要求执法官员秉公执法。律条规定：“凡赏应转官资，或支例物，并军中尽时给付”。“将佐卒伍出战获功多缘，再下保明，遂致行赏，稽滞夫赏不逾时，欲士卒之知劝也。自

^① 《洛水集》卷二《轮对札子》。

今大帅、统军尽时保明，即行推赏，故不以实，许人告，根究得实，以赏与之；枢密院人吏，辄拖延者，编配远恶州军”。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执行。反之，法律将失去应有的权威性。南宋执法不严，严重失律方面的问题很多，此法的设立并未能解决问题。

三、“新法”的废弛及统兵官的腐败

南宋初年，虽然设立新军法二十一条，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随着李纲罢相后，新军法也就逐渐自行废止。以后，南宋始终没有制定过较为全面系统的军法，而各军自行其事，军事法规很不一致。特别是，在朝廷的纵容之下，南宋高级军官享有不少特权，以致生活奢靡，聚敛财货，兼并土地，欺压士兵，成为军中风气。

南宋的大将中畏敌避战，丧师误国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但极少受到惩处，而且常常得以升迁。正如华岳所说：“怯懦疏拙者，皆幸迁于将佐”。^①南宋将领骄奢淫逸之风甚盛。大将多蓄养姬妾，平时宴饮由歌姬侑酒，作战也携带姬妾同行。如鼎、澧州镇抚使程昌寓率军镇压杨么起义军时，还带着“姿色妖丽”的妓女小心奴。^②大将刘光世生活奢靡，姬妾成群，曾请求宋高宗“并封三妾为孺人”^③。张浚对刘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国事”^④，提出过批评。岳飞在南宋将帅中是少有的生活较为简朴的典型。一次，川陕宣抚使吴玠以2000贯钱买了一个“士族女子”，送给岳飞。岳飞问这个女子，能否穿细布衣服，吃粗菜面食？岳飞见她笑而不答，知道她过惯了奢侈生活，把她退了回去。^⑤

①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一《恩威》。

② 《金佗续编》卷二十五《杨么事迹》。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刘光世传》，第11483页。

④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刘光世传》，第11484页。

⑤ 《金佗续编》卷二十七《岳武穆公遗事》。

军官平时多有从事营货逐利的现象。如建置土地房产，经营质库（当铺）、邸店（货店）以及从事贩运等经贸活动。宋孝宗时，右正言蒋继周曾上奏说：“乞诏诸军将佐屯驻去处，自今不许私置田宅、房廊、质库、邸店及私自兴贩营运。”^① 蒋继周也仅仅是要求禁止将领们在屯驻地区的经贸行为，而并不限制在其家乡从事这方面的行当。即使将领们在驻地的营利性行为，也一直未能禁止得了。

南宋军官广置田产，然后租佃收税的现象极为普遍。岳飞是南宋将领中，占田最少的一个。杨存中不但田产很多，还“买扑湖、秀州、临安府界酒坊九处，并发酒子坊一十三处”，资产达 72 万余贯。^② 南宋将领聚财积货，骄奢淫逸，生活腐朽的程度超过了北宋。

南宋将领对士兵的欺压也相当严重，视士兵等同奴仆，将领“虚众营私”^③，驱使手下士兵为其从事各私杂役。朝廷大臣对此也屡上书要求整饬。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 年）九月，林大鼐曾上书反对役使士兵“为厮隶之贱”^④。张浚也曾上疏反对军中“遣出差役，使之荷担肩舆，市买工作”等非军务的劳役。^⑤ 宋孝宗即位发布制书说：“不许私役战士盖造私第，营葺房廊，修筑园圃及兴贩工作等”。^⑥ 但是，结果如同一纸空文，奴役士兵的现象并无好转。至于南宋将领克扣士兵军俸之事，则屡有发生。

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十一。

② 参见《要录》卷一百八十八，第 3150 页；《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一之二。

③ 《要录》卷一百八十八，第 3142 页。

④ 《要录》卷一百六十三，第 2667 页。

⑤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二。

⑥ 《要录》卷二百，第 3387 页。

第五章 南宋的军事技术与后勤保障

南宋是中国军事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火药火器继北宋开始应用于军事领域后，南宋又出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火器不但数量大幅度增长，而且新式火器接连问世，尤其管形火器的出现是兵器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南宋的水战器具和防护装具都有较大的发展，传统的长短格斗、抛射等冷兵器的制造技术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城邑防御技术也在进一步发展。相比之下，南宋的军事后勤较为落后，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制度。

第一节 武器装备

一、长短兵器和抛射兵器

南宋长短格斗和抛射兵器有数十种之多，常用的传统兵器有枪、刀、斧、棍和弓、弩、炮（抛石机）等，其中以抛射兵器弓、弩、炮最受重视。宋宁宗嘉定时武科状元华岳曾说：“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① 炮在北宋和南宋都已大量应用于作战，其威力远大于弓、弩，但炮需多人操作。华岳谈军器疏漏炮具，可能是仅从单人掌握的兵器而言。

（一）长短兵器

南宋的长兵器，以大刀、长枪、大斧为主。当时教阅军队，考核军士，选拔军事人材，除检验弓力和射箭水平之外，演练大刀、

^①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七《弓制》。

长枪是主要考察项目。大刀刀柄很长，因此又称“长柄刀”，刀头与刀柄合起来有“长丈二尺以上”。^①乾道二年（1166年），宋孝宗白石阅兵，“有数将独手运大刀”，“刀皆重数十斤”。^②乾道四年（1168年），宋孝宗阅兵，“随队呈试骁锐大刀武艺”。^③宋光宗绍熙年间，要求诸路禁军“以十分为率，二分习弓，六分习弩，余二分习枪、牌”^④。枢密院考核殿、步司诸军，枪手及格标准为：原地站立不动，手握枪连刺40下。《辛巳泣薪录》载，宋宁宗时，蕲州贮备兵器中，有“长枪五百条，麻扎一百五十柄”。麻扎，即麻扎刀，是对付骑兵的利器。郾城之战中，岳家军的步兵大破金军骑兵，使用的主要武器之一即麻扎刀。宋宁宗开禧间，侍卫马军司军官毕再遇招募敢死军，用麻扎刀砍金骑兵马腿。^⑤大斧也是常用兵器，在宋金的几次大战中都发挥过威力。金元帅完颜宗弼曾说：“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重斧，外无所畏。”^⑥

短兵器，以短枪、刀、剑、铁鞭等较为常用。如，宋孝宗时，荆南府和鄂州两军，“每人各教用短枪”。刀、剑、铁鞭均为传统的兵器，南宋并无多大改进。

南宋对格斗兵器的改进，重点是长兵器。绍兴六年（1136年）十二月十五日，宋高宗曾颁新“枪样”给岳飞军中。高宗说：“卿军中见用长枪，似未尽善，此物须是铍利劲决，即用之，借助人力。今降样去，可依此制造，尽改旧样不用。”^⑦刀、斧也较之北宋出现不少新式样。

（二）抛射兵器

南宋的抛射兵器有弓箭、弩和炮。弓、弩在设计 and 制造以及

①②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第4868～4869页。

③ 《宋史》卷一百二十一《礼志·阅武》，第2834页。

④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第4870页。

⑤ 参见吴泳《鹤林集》卷二十《边备札子》。

⑥ 《会编》卷二百一十五《征蒙记》。

⑦ 《金佗粹编》卷一《降枪样至军中赐御札》。

功能等方面都超过北宋，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划车弩、马蝗弩、木羽弩、木鹤觜弩、匭筒木弩、床子弩、神臂弓、克敌弓、神劲弓等。南宋制造弓弩技术较北宋有所进展。如著名的神臂弓，原是从北宋流传下来的一种强弩，弓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能射二百四十多步，约合 372 米以上。南宋时，经韩世忠改进，增大尺度，名为“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① 约合 558 米，可以射穿重甲，“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② 威力较北宋神臂弓增大不少。神劲弓的威力也不小，适合平原旷野作战，配上弹子头箭，“神臂不及也”。^③ 开庆元年（1259 年）寿春府工匠研制的匭筒木弩，“与常弩明牙发不同，箭置筒内甚稳，尤便夜中施发”。^④ 湖北、京西所造的无羽箭，“箭不用羽，可谓精巧”。^⑤

抛射兵器以炮最有威力。炮之所以优于弓、弩，在于能抛掷重型石弹和火器，有很强的攻击力。南宋时，制炮技术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武经总要》中所记载的各种炮具，南宋不但都有，而且出现一些新种类，并从主要抛射石弹转而能大量抛射火器。如南宋将领魏胜创制的炮车，是一种用于野战的车载抛石机，既能抛射石弹，又能抛射火球。火球装入抛石机后，增加了威力。这种炮车能够“进退具利，伺便出击”^⑥，机动性很强。建炎时，洞庭湖农民军杨么水军车船上发巨石的“拍竿”，即船载抛石机。这种既能“踏车进退”自如，又有“上置巨石，下作辘轳”进行攻击。^⑦ 南宋的炮在用于攻守城战的同时，已大量应用于野战和水战。

①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曾三聘传》，第 12612 页。

② 《会编》卷二百一十八炎兴下帙二十八；《中兴小纪》卷十五，绍兴三年秋七月。

③④⑤ 《宋史》卷一百九十七《兵志十一》，第 4923 页。

⑥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魏胜传》；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一版第 28 页。

⑦ 《要录》卷五十九，第 1026 页；参见王育成《中国古炮考索》（载《中国史研究》1993 年 4 期），该文认为：“拍竿”即“抛投巨石的舰船用抛石机”，是。

二、火药兵器

南宋火药兵器的制造技术、数量和种类都比前代有长足进展，居世界领先地位。尤其以管形火器的出现，在兵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宋的火药兵器中，具有燃烧和爆炸性能的有火炮、火枪、火箭、突火筒、火疾藜、铁火桶、铁火椎等。火炮有纸制、陶制、铁制等区别，但还不是用火药发射的管形火炮，而是用抛石机投射并引爆的火药包等一类爆炸物。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大举攻宋，宋军在采石之战中曾用霹雳炮重创金军。这种霹雳炮就是一种纸制火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之以石灰、硫黄”，爆炸后，“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①南宋后期大量制造和使用铁火炮，如宋理宗时，江陵府“一月制造一、二千只”铁火炮，“荆、淮之铁火炮动十数万只”。^②这种铁火炮是在铁壳内装填火药，依靠爆炸力使铁块迸裂，四射杀敌。制作铁火炮要先铸造铁炮壳，然后根据其体积和重量填充火药。重量越大，威力也就越大。宋端宗景炎二年（1227年），元大将阿里海牙攻广西，兵破静江府，守卫月城的宋军娄玘辖和250名将士，拒不投降，“拥一火炮燃之，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攻城的元军“多惊死者”，娄玘辖和部下将士，“灰烬无遗”。^③足见当时火炮具有很大的威力。据《景定建康志》载：建康府在两年三个月时间内所制造的火器中有大量的铁炮壳，重量分别为3斤、5斤、6斤、7斤、10斤，数量最多的是3斤重铁炮壳，多达22044只，其次是5斤重铁炮壳13104只。反映了当时已经具备了很高的制造技术和生产规模。其他火箭、突火筒、火疾藜、铁

① 《诚斋集》卷四十四《海鳅赋》。

② 《可斋续稿》后卷五《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

③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马塈传》，第13270页。

火桶、铁火椎等火器，虽然较铁火炮威力稍逊，但是由于制作简便，生产的数量大，在战争中实际应用范围较广。

南宋时，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管形火器。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任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以火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撞枪钩镰各数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①在守卫德安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南宋后期，建康府制造的兵器中有火药弄袴枪头和突火筒。静江府守臣李曾伯也提到静江贮存的火器中“火箭则有九十五只，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②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制造的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③。陈规制造的火枪，可能还是一种火药喷火器。《宋史·陈规传》载：“规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焚天桥。”可见这种火枪是用于发火燃烧敌方器械。寿春府所造突火枪已经能够发射子弹杀伤敌人，说明当时已经基本掌握了利用管内弹道控制子弹的技术，提高了射击的准确性。管形火器的出现，带来了兵器技术的革命，为近代枪炮技术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故英国普丁顿教授认为，突火枪的原理是后世欧洲步枪的先导。

南宋政府对兵器的制造与使用十分重视，初期即设置御前军器所负责掌管兵器制造，所直接管辖的工匠就有4500多名。以后，又在江陵、建康等许多军事重镇设置兵器制造场和火药库，制造兵器和火药。宋理宗时，建康府仅二年多时间，“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④。其他冷兵器的制造，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过火药兵器的制造。淳祐间，一火药库在焙药时不慎发生爆炸，“众炮倏发，声如雷霆，地动房倾”^⑤。火药库规模之大可

① 《守城录》卷四《李横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守山阁丛书本。

② 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五《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

③ 《宋史》卷一百九十七《兵志十一》，第4923页。

④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

⑤ 《癸辛杂识》前集《炮祸》。

以想见。皇帝在阅兵时经常检阅军队的武器装备状况。如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十月，阅兵，“随队呈试骁锐大刀武艺，继而进呈车炮、火炮、烟枪”^①。战争的需要和南宋政府的重视，促进了南宋兵器制造业的发展。

三、防护装具和军服

南宋的甲冑主要有步兵用的盔甲和骑兵用的马甲。从质地上划分，又可以分为铁甲、皮甲和纸甲。南宋的甲冑是在继承北宋甲冑制作技术基础上，吸收女真甲冑的特点，并经过创新，逐步发展成为适用于南宋军队需要的防护装备。

南宋的盔甲种类很多，不同兵种配有不同的盔甲。如“枪手甲”、“弓箭手甲”、“弩手甲”等。^②各具特点，符合作战需要。“造甲之法，步军欲其长，马军则欲其短，弩手欲其宽，枪手则欲其窄，其用不同，其制亦异。”^③根据军士的身材，每一种甲又分为几种不同的规格，使军士穿着合体，利于作战。“每遇给散（发送）铠甲，则随其肥瘠长短而选给之，则肥瘠长短，无一不称其用。”^④

军士穿的铁甲，一般由头盔、披膊、身甲、腿裙等部分组成。头盔即头盔，亦称兜盔，古称冑，用孟子、眉子、兜盔帘等部分组成。披膊护膊，身甲护身，腿裙护腿。当时常见的铁甲是用上千个铁叶片组成，全副甲冑重达几十斤。绍兴四年（1134年），宋高宗给军器所颁降的一种甲式，“甲叶千八百二十五”^⑤。铁甲既要具备坚硬的防护作用，又要利于动作。因此，造甲最忌讳笨重而欠灵活。制造铁甲用的铁叶片，大小和重量都有严格规定，一般

① 《宋史》卷一百二十一《礼志·阅武》，第2834页。

② 《宋会要辑稿》舆服六之二十八～二十九。

③④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七《甲制》。

⑤ 《宋史》卷一百九十七《兵志十一》，第4922页。

要宽度一指，长度一掌，叶片上铸孔，用皮线连缀。南宋的铁甲重量一般是“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①这种铁叶甲与流行于漠北地区的“柳叶甲”极为相似。^②铁甲的重量越重，士兵的负荷就越重。宋高宗曾下诏军器所，要求造甲“勿过五十斤”。^③但是各军所造铁甲也不免常有超重的现象。宋宁宗开禧年间，毕再遇任骁卫将军兼知扬州、淮东安抚使，“更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兜鍪也杀重为轻，马甲易以皮”。^④在金军重甲骑兵威胁之下，南宋军队中全装重甲仍居统治地位。

骑兵所用的盔甲称为马甲。由于骑兵是“曲膝蹲坐”，甲裙长则绾绊累坠。因此，“马军甲裙所以独用过膝三寸”。^⑤骑兵用的马甲易于分解，“马军则吊腿、挖泥遴作二段，名曰摘吊，而便于去取，故截为两段，上安结项四枚。遇敌则挂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退师则解入搭袋，而免被牵制”^⑥。南宋的马甲分为大全装和小全装两种，大全装北宋已有，小全装发明于宋宁宗时期，分为甲身、搭尾、了顶、鸡项、面子、秋钱等六个部分。小全装优于大全装。

皮甲的原料主要是牛皮和其他兽皮。皮甲取材方便，制作简便，且有穿着轻便的特点，缺点是不如铁甲坚固。于是，出现用多层皮革制成的皮甲，以解决坚固方面的问题。

南宋除铁甲、皮甲之外，还制造数量很多的纸甲。纸甲，亦称“楮甲”。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四川“调梁、洋义士万数，授以楮甲”^⑦，与金军作战。宋宁宗嘉定时，蕲州曾造“纸兜鍪一千副”。^⑧纸甲成本低，制作简宜。“纸甲无性极柔之纸，加工锤软，叠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统箭难透。”^⑨民

①③ 《宋史》卷一百九十七《兵志十一》，第4922页。

② 参见《黑鞑事略》，《出使蒙古记》第六章。

④ 《宋史》卷四百二《毕再遇传》，第12187页。

⑤⑥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七《马军甲制》。

⑦ 《要录》卷一百九十八，第3335页。

⑧ 《辛巳泣蕲录》。

⑨ 《涌幢小品》卷上《纸铠绵甲》。

间私造纸甲时有发生。南宋初，“东南州县乡兵多因私置纸甲，而啸聚作过”。^① 尽管纸甲成本很低，易于制造，但是由于缺乏坚固性，往往不受军士欢迎。南宋正规军中很少有人穿用纸甲。

南宋的军服在式样、颜色、质地等方面与北宋军服差别不大。

南宋军服主要是绯、紫两色，“军人之衣绯紫，亦是别其军号，今厢、禁军皆衣紫，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颇存往制”^②。军服种类主要有带袖衫子、袄子、衬衣、夹袜头裤、夹裤、背心、头巾、靴、鞋等。质地有绢、罗、麻布等。军服中的背心，并不是我们现在贴身穿的背心，而是穿在衣服外面。背心上标有番号，便于区别各军。南宋初，禁卫班直所穿用的背心，用丝罗制作，分绯、绿两色，上有红色盘雕图案。^③ 靴主要是用皮革制成，靴面和靴底用硬皮，靴底并用漆蜡，“凹口合用软皮带系”。^④ 靴主要是骑兵所用。

四、水战器具

南宋沿江设防，以阻止金、蒙势力南下，遂大力发展水军。南宋制造战舰技术较以往有更大的发展。这时，出现“大军船小样”的战船模型，使战船制造的效率和质量均大幅度提高。南宋降金的将领张中彦，曾把造战船模型技术传授给金朝工匠。“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无不骇服”。^⑤ 南宋临安、建康、平江、明州、泉州、广州等地都是制造战船的重要地区，每年都制造大量的各种型号的战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仅江

① 《要录》卷五十七，第995页。

②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

③ 参见《宋会要辑编》职官三十二之二十七。

④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七《靴制》。

⑤ 《金史》卷七十九《张中彦传》。

湖四路造船 2767 只，其中大部分当是战船。建康之地，在宋理宗淳祐九年至景定年中，造新战船 850 只，修旧战船 2693 只。^①陆游曾目睹鄂州水军演习，出动二三十丈长的大舰 700 多艘，^②都反映出当时战船制造和使用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南宋战船分为水用战船和海用战船两大系统，在制造技术和使用方面都有新的重要发展。

水用战船，主要是用于内河与湖泊。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当属车船。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南北朝时已能制造两轮即一车的车船。而南宋的车船的车数则增加数倍，多达 20 多车。车数增加，船体随之增大，造船技术要求也就越高。车船的驱动是靠轮、桨，在内河湖泊作战，不受风向左右，行进速度很快。建炎末，洞庭湖杨么农民军制造出 24 车楼船式的大型车船，其船体长达 36 丈（约 110 米），船上起楼，上置攻击敌船的抛石机，转轮外设保护装置护车板，其船虽高大，但运转自如，行驶速度很快。^③杨么农民军车船式样，为南宋政府所采用，下令各地仿造，并装备给南宋水军。此后，车船成为南宋水师的重要装备。如淳熙九年（1182 年），建康府一次造车船 90 只，以加强本府水军的战斗力。^④

车船制造技术发展的同时，各种类型的新式战船不断出现。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 年），南宋马定远制造出 100 艘能拆装自如，运载军马和作战迎敌两便的“马船”。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 年），张贵制造了仅有两舷和站板的无底战船，其特点是常诱使夺船敌军溺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江海淮河无往不可”的多性能战船。如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 年），南宋水军统制冯湛制造一种战船，此船头尾形似海船，底部为湖船形，顶部装置战船盖，船体长 8.3 丈，宽 2 丈，用 42 桨，载士兵 200 人。这种船具有吃水量浅、抗

①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武卫志》。

② 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十六《入蜀记》。

③ 《金佗续编》卷二十五《鼎澧逸民叙述杨么事迹一》。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之二十二。

风浪、坚固和快捷等优点。^①

海船在南宋也有较大的发展。当时，平江建造的四橹海鹞船，明州所造的鲙鱼平底海战船，池州船场所造“铁壁铎觥平面海鹞战船”，都很著名。铁壁战船的出现，为目前以金属作为造船材料的最早记录。近年在福建泉州发现的南宋时期的双桅、多层船壁、带水密隔舱海船，其造船技术具有世界领先地位。^②

战船进步的同时，船上使用的兵器也出现重大革新。南宋战船上不仅使用传统的冷兵器，而且大量装备有各式新型火器。在与金、元作战时，南宋水军舰队使用数量较多的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威胁。

第二节 筑城与守城技术的改革

北宋时期城邑防御技术已具有一定的水平。南宋时期，由于攻城器械的进步，尤其是火器大量应用于攻城战，对传统的防御手段带来巨大的冲击，从而加快了城邑防御技术的进步。

一、筑城方式的变革

南宋城邑防御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筑城方式的变化和守城器械的改革。筑城方式的变化体现在对平原城邑的改造和山城防御体系的建立。

南宋平原城改造的重点主要是加强城门和城墙的防护能力。陈规《守城录》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叙述。旧式城门设计为一重，并在城门外修瓮城、筑敌楼，以防护敌军攻击城门。这对于防御弓箭等冷兵器较为适用，但却不堪炮击。改革的方法是：城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之二十二。

② 参见王冠倬《从文物资料看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

门为三重，以内外两道护门墙取代瓮城，保护城门；增高旧式门楼，改一层为双层，以利于上下同时攻击敌军；城门通道下设暗板，城墙上置炮石，上下配合，阻击破门之敌；改吊桥为实桥，并多设暗门、突门，便于突然多路出击，攻敌不意。城墙的设计是：收缩防御薄弱、易受炮石攻击的四方城角，使敌军不能夹角施炮，而守城之军便于立炮向下射击；在城墙上建筑高大的鹞台，台上建护墙；拆除旧式马面墙上不能防炮的附楼，另筑高厚墙；改造旧式羊马墙，加筑鹞台和护墙；大墙和羊马墙上都设“品”字形射孔，形成大墙上和两侧羊马墙内三面拒敌；用大木和麻绳结成护墙网，使敌攻城炮石威力不能奏效；设置重城重壕，即于大城之内再修一道里城里壕，以替代一城一壕的传统格局，形成层层设防，增强防御能力，如外城被突破，里城墙、壕也难以逾越。经过改造的平原城邑，提高了防御能力。

南宋的山城防御手段较之平原城邑有更大的进步。南宋后期，余玠等人在四川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堪称杰作。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后，根据四川多山川的地理特点，以重庆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涪江、沱江、岷江和长江两岸，“凡地险势胜，尽起而筑之”，构筑山城20座。这些山城“皆因山为垒”，^①坐落在天然险固的山上，山顶宽平，面积达数十亩至数十里，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饮，能容纳众多的居民和军队长期居住和守御。同时，各城又大多依凭江河，或居两江、三江之汇，或位于峻峡险滩之旁，或以水陆船车可与大江相联，既可借助水势增加山险，又能依赖水运与外界往来。每座山城之间，或近在毗邻，或隔江相望，彼此呼应，互为犄角，“如臂使指，气势联络”。^②形成一个棋布星分，以点控面、以堡寨控扼水陆要道的纵深防御体系。这种“阻山为城，带江为池，恃以自固”的城防体系，^③往往令攻城之敌束手无策。

①② 《宋史》卷四百一十六《余玠传》，第12470页。

③ 《元史》卷一百六十五《张立传》，第3878页。

南宋四川的山城，与古已有之的驻兵山寨不同，它不仅是军事要塞，又“为诸郡治所”。^①州县府治迁于山上，使山城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以利于组建军政结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耕守结合的防御基地。平时山城军民耕种聚粮，战时凭借城防工事军民协同据守以御敌。

南宋众多的山城中以合州钓鱼城的构造最具代表性。钓鱼城由余玠主持首建，而后又经王坚等大规模扩建，成为具有很强防御能力的坚城。钓鱼城位于重庆北70余里，坐落在钓鱼山上，地势险要，嘉陵江、涪江、渠江在此会合，控制着三江上游的广大扇形地区，屏蔽着战略要地重庆。山城西、南、北三面环江，东面是起伏绵亘的华蓥山脉，易守难攻，为筑城防御的理想之地。

钓鱼城建有内外两道城墙，外城城墙周围长12里，墙高5公尺左右，设8个城门，皆双层拱门。南北面修筑一道一字城延伸至嘉陵江边，以隔断东面丘陵至江边和水师码头的通道，保障水师及码头的安全，便于水师阻止敌军渡江。钓鱼城内军事设施齐备，建有阅武场和营房。城中还建有官廨和供军民所用的生活设施，如居民住宅、寺庙、庭榭、园林、仓库及大小蓄水天池10多处和90多眼水井，以供城中生活之需。钓鱼城是合州治所在地，断绝外援可以自立，实行耕战结合，由戍军派兵护耕，耕耘所得，积聚山城，以供军民所需。从而使钓鱼城成为一个城坚、粮足、能够长期坚守的防御基地。^②

二、守城技术的改革

南宋守城技术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弓箭等冷兵器为主的守城战具，转变为以炮（抛石机）抛射石弹和火器为主要守城战具。

① 《宋史》卷四百一十六《余玠传》，第12471页。

② 参见胡昭曦、唐唯目《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世松：《余玠传》，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在敌人攻城时，“用炮摧毁攻具”^①。敌军发炮攻城，守军“用大炮与之相对施放”，以压住敌方炮石；发射程较远的小炮，以击杀敌军指挥官。当时，大量采用石炮守城的同时，还生产和研制火炮（爆炸物）、火枪，并用以守城。炮位的设置也有所创新，除了城上设炮外，在城里还配置一定数量的暗炮，城上守军指示目标进行射击，而使敌人无法捕捉目标。先进的器具和防御措施，增强了城市防御能力。如陈规在德安曾用长竹竿火枪烧毁围城敌军的攻城器具，敌军败退。钓鱼城宋军曾用炮击伤蒙古大汗蒙哥，使蒙军不得不退兵。除炮之外，南宋守城器械还有多种，大体可分为防护器材、障碍器材、守城战具、灭火器材、侦察器材等。

第三节 后勤保障

一、军 费

南宋的军费开支数额巨大，财政收入相当大的部分用于军费。兹略述其来源、管理和使用情况。

南宋军费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甚大。当时有几种说法。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殿中侍御史吴芾说：“大农每岁养兵之费十之九”。^②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臣僚上言：“方今国家所管财用，供军之费十居七、八”。^③ 朱熹也曾说过：“今日财赋岁出以千百巨万计，而养兵之费十居八、九”。^④ 宋孝宗传位给宋光宗时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⑤ 宋宁宗庆元时，姚愈上奏说：“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

① 陈规《守城录》卷二。

② 《要录》卷一百九十九，第3355页。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二十。

④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⑤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十四。

兵廩居十之七”。^①嘉定年间，余嵘说：“建炎南渡，权宜制置增赋，凡四千三百外万，而供亿于三衙，与科截于四总所者，无虑三千六十余万，其耗于养兵者几十之六七”。^②上面列举的几种关于军费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差别（可能有时不同等因素），但是其中共同点是所占比例不少于十分之六。这一比例反映出南宋军费开支是相当高的。

南宋政府为了维持巨额军费开支，想方设法以增加财政收入。绍兴和议以后，“金币山积”^③；宋孝宗淳熙年间，“内外桩积缗钱四千七百余万”^④。财政收入增加，与局势平稳、无大的战事有关。经过开禧北伐以后，南宋财政经济日益恶化，到宋理宗时，“土地日蹙，赋入日少，恃和余以足糗粮，倚造楮以为泉货”^⑤，财政已经难以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这与养兵过多有关，所谓“冗兵为患”。

南宋军费主要用于赡养军人及其家属。由于军人长期保持有数十万，军属不下百万，因此养兵费的开支很大。如果再加上武器制造费用、骑兵的战马和水军战舰等方面的费用，南宋财政开支故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

南宋军费开支浩大，与其指导思想有关。过于重视军队的数量，而忽视军队的素质。招募太滥，冗员太多，“冗兵浮食，日益猥众”^⑥。使“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⑦，也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军队需要。南宋的军费问题一直成为财政的沉重包袱。

二、军 俸

南宋军俸的特点是以军队种类、资级等为标准。南宋军种复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六之七十。

②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四十五《龙学余尚书》。

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左藏南库》。

④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十。

⑤ 《杜清献公集》卷十二《经筵已见奏札》。

⑥⑦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

杂，资级繁多，加上南宋在军俸管理上的缺陷，造成南宋军俸制度的复杂和混乱。

南宋初期，军俸制度极不完善，在“多遵旧制”^①的基础上，依据当时财力匮乏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措施。如绍兴五年（1135年），对原北宋的“效用八资旧法”进行了修改，“改公据为守阙进勇副尉，日餐钱二百五十（文）、米二升，甲头为进勇副尉，日餐钱三百（文）、米二升。非带甲入队人自依旧法”。^②由于这些措施常带有临时性，因此军俸数额前后常有变化，甚至还存在名不符实的现象。

南宋正规军的军官俸禄，按照各自武阶官的级别供给，名义上与同级的文职官员的俸禄基本相等，实际上统兵官优于一般的文官。在财政困难时期，官员减俸的情况下，“唯统兵官依旧全支”^③。绍兴十三年（1143年）开始，宋廷陆续规定，屯驻大军的都统制每月支供给钱200贯，副都统180贯，统制、副统制150贯，统领100贯，正将、同正将50贯，副将40贯，准备将30贯。^④军官与月俸不过三贯的士兵相比，还是高得多。

正规军中士卒一般分为效用和军兵两级，效用俸禄高于军兵。效用的俸禄，一般“每月食钱九贯，米九斗”^⑤，也就是每日钱三百，米三升。由于效用的名目和资级很多，造成效用之间俸禄也多有差别。如宋光宗时，上等效用“日食钱三百文，米三升”，次等效用“日支食钱二百文，米二升”。^⑥甚至有的效用与军兵的俸禄相差无几。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兵部专门制定了一个效用《请受格》，共分为十资，按资发给俸禄，十资名称和俸禄情况如下：

①② 《宋史》卷一百九十四《兵志八》，第4846页。

③ 《鸡肋编》卷中。

④ 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十七。

⑤ 《要录》卷二百，第3399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十七之三十二。

第一资为守阙毅士，“月各钱三千，折麦钱七百二十，米一石五升，春冬衣绢各二匹”。^①

第二资称毅士，俸禄与第一资相等。

第三资叫守阙效士，俸禄也与第一资相同。

第四资名效士，俸禄“钱三千，折麦钱九百七十二，米一石一斗三升有奇，衣绢各二匹”。

第五资为守阙听候使唤，俸禄“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八十，米一石二斗，绢三匹有半”。

第六资称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二百六十，米一石四斗七升，绢五匹”。

第七资作守阙听候差使，“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一石六斗八升，绢各五匹”。

第八资为听候差使，俸禄数额与七资同。

第九资为守阙准备使唤，“钱五千，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六石八升，绢各五匹”。

第十资为准备差使，俸禄数额与九资同。

这个《请受格》大概仅在淳熙年间实行过，淳熙以后就不见有这方面的记载。宋宁宗时，效用分为正额效用和额外效用，两类效用俸禄名为七等，实际上仅四等。正额效用资级分为白身、守阙进勇副尉、进勇副尉三等，但是俸禄数额相同，均为每日一百文、米二升半。守阙进勇副尉、摄进勇副尉各日二百五十文，米二升；进勇副尉日三百文，米二升。^②

军兵的俸禄，在宋高宗绍兴年间，一般是日俸“一百食钱，二升半米”^③。以后，军兵中又分为胜捷、吐浑和雄威三个等级，但俸禄差别不大，一般是“月请钱三千，米一石五升”^④。由于士兵

①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一百九十四《兵志八》，第4848页。

② 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二之二十一～二十四。

③ 《会编》卷一百八十炎兴下帙八十。

④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一《平戎十策》。

主要是靠微薄的军俸为生，并要赡养家属，生活相当艰辛。南宋初年，有人上书宋高宗说：“至如近下军兵，有请一百食钱，二升半米，而赡三、四口者。日逐上教，或至晚方罢，及回本营，欲得一杯热水，以沃肺腑，亦不能得。夫何自申牌前后，打灭火烛，不许复爨，其情可知。及其所请食钱，非独欲赡数口，一月之内，仍欲买皮条，买磁末，买弓弦，至于修理弓箭，种种费耗，不过此一百食钱而已。自晚上教其妻刷甲，其子积薪，纵缘阴雨，得少休息，又不免修葺营寨。此特步人之劳，至于马军，又有甚于此者矣。”^① 军兵在军队的地位较低，生活也处于下层。

军士为生活所迫，常兼营一些其他行业，作为生活费用的补充。有的经营得法，或有一技之长，收益相对好些。但是，多数人只有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甚少。“甚者采薪积履，掇拾粪垠，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②

南宋禁军、厢军的俸禄较为复杂，其中有地区、军队种类等差别。华岳说：“诸路之将兵，月请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八斗，盐一斤半或钱三百耳。”^③ 系将禁军俸禄略优于一般军士。

南宋弓手的俸禄，宋高宗时，“弓手三等，月给每人米一石，食钱上等二贯五百文，中等二贯文，下一贯五百文”^④。以后，仍采用北宋的雇役法，只有雇钱，不支粮米。

南宋的乡兵待遇，与北宋大体相差不多，为“不养之兵”，一般是在作战和训练时才发给钱粮。宋孝宗乾道时，京西、湖北路民兵“每人合日给米二升半，钱五十文省”^⑤。各地区乡兵待遇也不一致。如荆门军“每人每日官给米二升，钱三百文足”^⑥。

南宋的军俸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朝廷掌

① 《会编》卷一百八十炎兴下帙八十。

②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

③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一《平戎十策》。

④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十三、十九。

⑤⑥ 《宋会要辑稿》兵一之二十九～三十一。

握不了各军确切的兵员数字,几乎各处都有吃空额的现象存在。如绍兴二年(1132年),刘光世军“月费二千万缗”^①。宰相吕颐浩认为有虚数,“乞差官考核”。宋高宗“诏御史江跻、度支胡蒙至军点校,终不得实”。^②军队人员总数尚不清楚,军俸的发放自然存在着问题。将领克扣部下军俸的事也时有发生。南宋初,有士卒反映:“所支米麦,一月之间仅得五分之四,所请食钱,一百以上仅得三分之一,其余则自主将至押队,皆有分焉。”^③宋孝宗时,有的军队在发放军俸,采取“月给小会子,铜钱趲换,减克几半”^④。以致由于“干办部辖人减克乞取”,军士挨饿,“因致逃亡”。^⑤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七月,泸州宋军兵变,主要是由于主帅张孝芳克扣士兵俸禄,“廩赐或有不时给者”,而引起的。^⑥以后,特别是到了度宗咸淳时,“军将往往虚立员以冒稍食”^⑦。史称“当是时财赋之出有限,廩稍之给无涯,浚民膏血,尽充边费,金帛悉归于二、三大将之私帑,国用益竭,而宋亡矣。”^⑧把宋朝灭亡与军俸联系在一起,不无道理。

三、赏 赐

在军俸之外,南宋政府对军队还有各种不同的赏赐,既用以激励士气,又是军俸之外的一种补贴。当时以郊赏和军赏对军队的影响最大。

南宋郊祀大礼三年一行,其间对军队进行赏赐,称为郊赏。每次郊赏数额不一,对各军也有区别。如绍兴四年(1134年)郊赏,

①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刘光世传》,第11482页。

③ 《相山集》卷二十五《上都督府参谋兵部尚书吕安老书》。

④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

⑤ 《毗陵集》卷一《论禁军逃亡札子》。

⑥ 《两朝纲目备要》卷二《光宗》“秋七月泸州军乱”条。

⑦⑧ 《宋史》卷一百九十四《兵志八》,第4849页。

张俊和杨沂中部人均 30 贯，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等军人均 2 贯多。^① 郊赏一般是按资级支給，资级越低赏钱越少，效用赏钱仅为 2 贯，可见赏赐很少。郊赏一般赐钱，但常因钱币短缺，多用各种实物替代。

军赏是对有功劳官兵奖给一定数额的钱物。南宋时军赏又有激赏、犒设、犒军等名目。军赏一般是随事犒劳，因此无固定的数额。通常由朝廷拨出钱物，以皇帝名义进行赏赐，所赏的范围主要有作战、阅兵、屯戍等。如建炎四年（1130 年）九月，南宋对金军北撤时进驻建康的宋军犒赏，宋高宗“诏赐枢密院见甲千付（副），本路上供经制钱四十万缗，米二十万斛”^②。绍兴五年（1135 年）闰二月，神武中军春季教阅，宋高宗“诏户部赐钱万缗，充激犒”^③。

由于军赏常常是凭皇帝的一时之好来决定，因此随意因素很多。例如，绍兴四年（1134 年）十月一次较大的犒赏。这次犒赏的原因是金、齐联兵攻宋，宋高宗声称亲征，从杭州行至平江，在平江对随行军队大加赏赐。“诏犒设随驾诸军一次，时堂吏以下，亦援泛海旧例，各支犒设钱，有至数十千者”。^④ 侍御史魏矼对此次犒设很不满，上奏说：“自临安至平江四日耳，乘舟顺流有何劳苦？虽曰激赏库支，其实户部系省钱也。”^⑤ 这种滥赏的现象在整个南宋一代都相当普遍。乾道二年（1166 年），宋孝宗幸茅滩阅兵，“毕事，上大悦，赏赉加倍”^⑥。皇帝心情的好坏成为赏赐多寡的标准。除朝廷对军队进行赏赐外，也有的地方政府对本地军队专设有激赏钱。如四川就有“两川激赏钱”。

南宋经常对派往各地戍军进行赏赐。如宋孝宗时，派往扬州

① 《要录》卷八十，第 1340 页。

② 《要录》卷三十七，第 701 页。

③ 《要录》卷八十六，第 1433 页。

④⑤ 《要录》卷八十一，第 1340 页。

⑥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第 4869 页。

戍守的几支军队，“支給犒设等钱”^①。新任都统制赴任也常例行犒设诸军。如鄂州都统制秦琪到任，“例行犒设诸军一次，共钱六万七千余贯”^②。军赏也有仅对个别人员进行赏赐。如金州驻扎御前军正将穆永昇因训练所部合格，对其“特转一资，支犒设银五十两”^③。淳祐八年（1248年）十月，赏四川戍军都统制张实所部战功，赐其本人“刺史象符、金银器二百两、银三百两、缗钱一万；余将士依第转官，给金银符、钱帛有差”^④。南宋的军赏以大胜仗之后开支数额较大。开禧年间，奖“复四川功，将士共转三十万官资，犒赐共用金七十两，金盘盏一副，金带五条，金束带一条，银六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三两，绢六十一万六千九百二十四匹，钱八万二百五十引”。^⑤ 淳祐十一年（1251年），宋军收复襄樊，宋理宗“诏立功将士三万二千七百有二人各官一转，以缗钱三百五十万犒师”。^⑥总之，赏赐已成为南宋财政一笔可观的开支。

四、军需运输

军需运输是配合前方军队作战的重要环节。南宋的军需供给主要是粮草，也有少量的兵器和犒赏物品等。由于运输条件和组织系统不完备，使南宋的军需供给成为沉重的负担，也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有效发挥。

军需运输与地域远近及工具优劣关系密切。南宋军队的分布有别于北宋，其主力大军沿江驻扎，屯兵之地交通便利，又采取就近供给的办法，因此较北宋节省人力和物力。据史籍所载，绍兴三十年（1160年），南宋户部有奏章说：“鄂州大军岁用米四十

① 《宋会要辑稿》礼六十二之七十四。

② 《宋会要辑稿》礼六十二之七十八。

③ 《宋会要辑稿》兵十九之三十一。

④⑥ 《宋史》卷四十三《理宗纪》。

⑤ 《两朝纲目备要》卷十。

五万余石，系于永、全、郴、邵、道、衡、潭、鄂、鼎州科拨；荆南府大军岁用约米九万六千石，系于德安、荆南府，澧、纯、复、潭州，荆门、汉阳军科拨；池州大军岁用米十四万四千石，系于吉、信州，南安军科拨；建康府大军岁用米五十五万余石，系于吉、抚、饶州，建昌军科拨；镇江府大军岁用米六十万石，系于洪、江、池、宣、太平州，临江、兴国、南康、广德军科拨；行在合用米一百一十二万石，就用两浙米外，系于建康府，太平、宣州科拨；其宣州见屯殿前司牧马，一岁约用米并折纳马料共三万石，系于本州科拨。”^①这说明在正常情况下，南宋军需运输也有一定的制度保障。然而，军需运输能力的高低，主要是通过战时来检验。南宋战时的军需运输能力并不比北宋提高多少。

南宋运送给养除少量用车、船之外，大部是靠人夫与牲口的背负和驮运。一般情况下，人负六斗，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当时，每名军士的口粮标准是二升，月耗粮六斗，以一万人为计，每月消费粮食 6000 石，所动用的民夫要在 6000 人以上，用牲畜驮载也需要几千匹。军中马匹也要配给粮草，一匹马每天消耗的粮食不少于一名军士。依据北宋以来的规定，“征马每匹给生谷二斗，作口袋，饲秣日以二升为限”。^②承担运输的民夫和牲畜也还要消费一定数量的粮食和草料。因此，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需要有一支庞大的运输队伍。战争持续的时间越久，后勤供给的作用就越重要，运输量也就越大。

当时，军队进行短期的、规模较小的军事行动，也可自带粮草。但是，一般携带不超过五天的粮食，否则将影响军队行军作战。绍兴六年（1136 年）冬，岳飞部队攻打蔡州，“有兵二万人，七分披带，持十日粮”^③。在当时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仅限于几天之内能解决战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非依靠后勤运输不可。

① 《要录》卷一百八十四，第 3074 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雍熙三年正月戊寅。

③ 《金佗续编》卷二十七《岳飞事迹》。

由于运输条件的落后，给运输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宋高宗绍兴初，一次蜀道送军粮，“役夫饥病相仍，毙于道者三之一”，“计其所运一石，民间费七十千”。^①花费在运输上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遇有军事失利，部队退遁，造成民夫伤亡，运输物资损失的现象时有发生。如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军队与金军在淮西会战，张俊、杨沂中等军溃退，“军民皆弃所负之米于道侧而去”^②。当时是征调了建康和上元、江宁二县的大量民夫，每人携带六斗米，数额很大，全部损失。

南宋的军事后勤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制度。平时，军队分驻各地，后勤供给问题尚不突出。战时，各种矛盾就显露出来，突出的问题是运输队伍的素质问题。南宋军队担负运输任务的多是临时强征的民夫，而且只求数量，不管质量。如淮西会战，“建康尽刷老弱”^③运粮。靠这样的运输队伍很难保障后勤供给的畅通。

① 《要录》卷一百一十，第1788页。

②③ 《要录》卷一百三十九，第2242页。

第六章 金的全面军事进攻 与宋的战略退却

金在南宋建立后，发动几次大规模攻宋战争，横扫黄河南北，并一度深入江淮，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攻陷临安（今浙江杭州），长驱明州（今浙江宁波），追宋高宗入海，但始终不能消灭南宋。金军北还途中被宋军拦截，两军大战于黄天荡，金军险遭不测。此后，金从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

第一节 金之战略与宋之防御部署

一、金的巩固两河与全面进攻战略

金朝统治者的最终目标是占领原北宋统治地区。金采取的“以僭逆诱叛党”^①，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等做法，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战略部署。赵构的称帝，南宋的建立，使金朝的这一战略意图遭到破坏。于是，金朝在战略与军事部署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期给予新兴的南宋王朝毁灭性的打击。调整后的战略是：先集中力量巩固河北、河东地区，再以两河为基地向西、南扩展。

金朝推行军政兼施，稳定两河社会秩序的方针。金军初期单纯的军事进攻，并不顺利，主要是遭到活动在两河的南宋军队和义军的坚决抵抗。宋军和义军经常联合对付金军。例如，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南宋统制官薛广、张琼领兵 6000 会合河北义

^① 《大金国志》卷七《太宗纪五》。

军，共同收复磁州、相州等地。七月，贵州团练使王瑁以磁、洺义兵光复洺州。当时，南宋朝野抗金呼声很高，东京留守宗泽还亲自到河北视师，从而有效地阻止了金朝战略计划的实施。但是，随着南宋朝中妥协派得势，金朝加紧了在两河的军事行动，同时采取政治措施，缓解矛盾。

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秋，金军在两河发动秋季攻势，并取得巨大战果。“是秋，金人分兵据两河州县，惟中山庆源府、保、莫、邢、洺、冀、磁、绛、相州久之乃陷。”^① 金军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事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战术上也很有特色。以往金军攻下城镇不留军驻守，掳掠后继续行进，许多地区得而复失。金军此次兴兵采取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对攻陷地区派兵据守。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击未占领地区。金军在两河的兵力部署大体是这样的：万户银术可领一军驻扎太原，娄室驻军在河中（今山西永济），鹞眼屯军安邑（今属山西），副都统韶合守真定（今河北正定），迪虎进据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蒙刮占赵州（今河北赵县）等。^② 金军分兵据守的战术，切断了南宋军队之间的联系，使守城宋军孤立无援，为金军实施第二步行动创造了条件。这一年九月，金著名将领元帅左都监阉母、元帅左监军挾懒各率一支劲旅，在两河展开强大攻势，目标是夺取尚未占领的地区。阉母一军攻占河间，接着在莫州击败宋军万余人，占领莫州，迫使雄州守城宋军投降。挾懒军连下祁州（今河北安国）、永宁军（今河北蠡县）、保州（今河北保定）、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以后，分据要地的金军又陆续攻占了邢、洺、冀、磁、绛、相等州。南宋在两河地区的军事力量受到沉重打击，抗金义军也遭到很大损失。从此，两河地区基本上被金军所控制。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金朝及时配合以政治攻势。金太宗诏告

①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9页。

② 参见《大金国志》卷五《太宗纪三》；《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七十二《娄室传》、《银术可传》。

诸军说：“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或见城邑有残破者，不无疑惧，遂命坚守。若即讨伐，生灵可愍。其申谕以理，招辑安全之。倘执不移，自当致讨。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①金军一改肆意杀掠的做法，采取以招辑安抚为上的策略。结果，确实收到一定成效。实施怀柔政策的同时，又加强两河的行政管理。“河北、河东府镇州县请择前资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②为选派行政官员治理两河，金太宗特意委派完颜宗翰、耶律暉等人，携诏书赴黄龙府路、南路、东京路等地选拔官员。在腹心之地选拔人才的同时，诏告全国举行科举考试，诏书说：“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缺，宜开贡举取士，以安新民”^③。

金朝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两河地区的统治，随即以两河为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宋战争。金军沿黄河一线，三路进兵，并拟由海道出击，采取全面进攻战略。其部署是：中路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率领，攻河南；东路由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及完颜宗弼率领，攻山东；西路由娄室（洛索）、完颜杲率领，攻陕西。金军所投入的兵力甚多（史无明载，仅中路银术可部声称有20万之众）。

二、宋的防御部署

金军占领两河后，南宋采取以黄河为防线，分区守御的战略。其部署是以陕西、河南、山东为三大防御区。^④

西部防区：从黄河中游的绥德州（今陕西绥德）、丹州（今陕西宜川）、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至陕州（今河南陕县），重点防御金军从河中府（治今山西运城蒲州镇）渡河

①③ 《金史》卷三《太宗纪》，第57页。

② 《金史》卷七十四《宗翰传》，第1697页。

④ 有军事著作认为：金第一次南下攻宋前，南宋已形成淮、汉、长江防线。但根据史实来看，此时仍是黄河防线。因此，金宋只在山东、陕西、河南打了几仗。

西进。宋在此区部署的兵力主要有：鄜延经略使兼知延安府王庶部，据守绥德、丹州段河防；席益领河中军，扼守“蒲津西岸”（河中府对岸）；同、华安抚使邓骘领兵驻守同州、华州，据守黄河与渭水交汇地区，以防止金军从合河镇（今山西风陵渡）渡河沿渭水西进；河东经制使王瓚领河东军驻扎陕州，防守黄河由北向东折转点至虢（今河南灵宝）、陕一线。此外，驻陕宋军尚有两支重兵，一支是京兆府路经略制置使唐重部，驻军京兆（今陕西西安）；一支河东经略使曲端部，守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原州（今宁夏固原）。

中部防区：以西京（今河南洛阳）和东京开封为中心，主要防守从黄河中游的河清（今河南大峪）至下游的东明（今山东东明集）一线。西京留守孙昭远派统制官翟进扼河清、白坡（今河南孟县西坡头），郑建雄部守河阳（今河南孟县），他亲自据守汜水（今河南汜水）。东京留守宗泽在开封连百万之众（多为忠义民兵），修建城防并于阳武（今河南原阳）、延津（今河南延津西北）、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东明等黄河沿岸地区构筑寨堡。

东部防区：以东平府（治山东东平县须城）、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益都府（治今山东青州）为重心，防守东明以西至黄河入海口。宋在这一地区部署的兵力，有据守东平的京东西路制置使权邦彦部和东平府兵马钤辖孔彦威（后改名孔彦舟）军，通判济南张东辖治的济南守军，守益都的马括军 20 万及据临朐的李成等部。

南宋以黄河为防线、分区御敌的战略切实可行，但在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西部防区集中陕西和原河东、河中的众多兵力，但朝廷迟迟未任命统一的指挥官，致使诸军各自为战，群龙无首。中部防区是东强西弱，宗泽负责的东段，兵力较强；西京留守孙昭远负责的西段，因“所谓西师，以非所隶悉引去”^①，兵力薄弱。“昭远数以洛城无城池，而强敌对境侵轶之状闻于朝。”^②但并未得以解决。东部防区问题更多。新任命的知济南府事张悦，

①② 《要录》卷十一，第 249 页。

迟迟不到任。东平的孔彦舟与权邦彦不和，甚至发展到彼此动武的地步。正如史籍所说：“左副元帅宗辅引兵犯山东，而京东无帅”。^① 因此，东部防区与西部防区同样存在缺少主帅的弱点。

第二节 金军第一次南下攻宋

(见附图 2)

一、山东战场

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 年）十二月，金东、西、中三路军经两河大举进攻南宋。完颜宗辅、完颜宗弼（兀术）统率东路军自沧州（今属河北）渡河，攻入山东境内，金、宋两军在山东战场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金军挟勇一举攻占淄州（今山东淄川）。然后，金军一分为三，完颜宗辅率一军镇守淄州，完颜宗弼与阉母各领一军围剿山谷诸屯。^② 淄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偏近山东的中心地带，西临济南，东近青州（今属山东）。

金军占领淄州引起南宋军队的很大震动，宋将李成率军包围淄州，试图夺回淄州。但是，被金将乌林答泰欲战败，金兵乘胜东进。天会六年（1128 年）正月，完颜宗弼领一军攻青州，击败郑宗孟率领的宋军，夺取青州。而后由青州南攻临朐（今属山东），先击败宋将赵成军，后大破黄琼，夺取临朐。阉母继续领兵东攻潍州（今山东潍坊），宋潍州知州韩浩（韩琦孙）、通判朱廷杰战死，金军占领潍州。^③ 宋将马括军进至乐安，完颜宗辅领兵北上，击败马括 20 万军队。^④ 此时，东路军得到宋高宗南逃扬州的消息，于是完颜宗辅下令撤军。东路三军，完颜宗辅一军先行撤

①③ 《要录》卷十二，第 273 页。

② 《要录》卷十一，《金史》卷三《太宗纪》。

④ 《金史》卷十九《世纪补》，第 408 页。

回河北。阁母还军，准备从千乘（今山东广饶西）渡黄河北撤，遭到宋军与义兵 3 万余人邀击，完颜宗弼军赶到击败宋军，两军渡河北还。

金东路原定的进兵路线是经山东入河南，最终攻击的目标是南京应天府。但是进兵山东仅 48 天而返，其撤兵原因《金史》称：“闻宋主在维扬，以农时还师。”^① 宋高宗弃南京南逃，使金军失去进攻的目标，金军没有继续南下作战的准备。另外，金军撤军与山东军民的顽强抵抗有很大关系。从金军攻入山东之日起，处处受到宋军的拼死抗击，每攻克一地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金军从淄州东进恰是宋军防御薄弱环节，倘若西攻济南受到的阻力将会更大。这大约是金军撤退的重要原因。

二、河南战场

金太宗天会五年十二月，完颜宗翰（粘罕）率金中路军自云中（今山西大同）沿太行山南下，准备渡黄河进攻河南。中路军是金三路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统帅完颜宗翰胆略过人。《金史》称：“宗翰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② 这次统兵南下，行军路线仍是去年灭北宋的旧路，轻车熟路，一路之上势如破竹，直抵河阳（今河南孟县）。

宋军方面已有迎敌的准备，沿河设防，以阻止金军渡河南下。宋将郑建雄据守河阳城，西京统制官翟进扼守河清（今河南济源市西南大峪）、白坡（今河南孟县西坡头），相互策应，阻击金军。完颜宗翰见渡河不成，于是扎营河阳北城外，造成攻城的态势，牵制宋军的注意力，暗中派遣银术可取道九鼎渡河，背攻河阳南城。河阳腹背受敌，宋军溃败，金军遂由河阳渡河迅速南下。宋将姚庆率军在偃师（今属河南）阻截金军，姚庆战死，宋军溃败。金

① 《金史》卷三《太宗纪》，第 58 页。

② 《金史》卷七十四《宗翰传》，第 1700 页。

军夺取偃师之后，向西挺进，兵锋直指西京洛阳。留守孙昭远引兵弃西京南逃，金军进入西京。完颜宗翰任命原宋代州降官李嗣本为河南知府，分遣大将银术可等领军继续南下攻城略地，自己则驻守西京，以防止在东京开封的宗泽，“恐邀其后，故亲自据西京，与泽相持，使汉上之师无后顾之忧也”^①。银术可等军号称20万人，挥戈南征。十二月底，金军攻克汝州。天会六年（1128年）正月，金军接连告捷，攻占邓州（今属河南）、襄阳（今湖北襄樊）、房州（今湖北房县）、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

金军时而分兵出击，时而合兵一处，配合十分默契。相反，宋军不能很好地协同作战。“各据人马，以图自固，逐路帅司不能调发，致无连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复攻一州。”^②邓州战役集中暴露了宋军的弱点。金兵压境，担负守备邓州重任的是知州范致虚、京西转运使刘汲、制置使赵宗印三人，本应同心协力共抗敌兵。但是，在关键时刻，范致虚率先逃走；刘汲调遣诸军从东、西、南三门出城迎敌；赵宗印率3000军兵出西门逃奔襄阳；从而造成刘汲两翼受敌，战败身亡，邓州失陷。^③

二月，金兵从均州向东北方向挺进，连克唐州（今河南唐河）、蔡州（今河南汝南）、陈州（今河南淮阳），再由陈州折向西北攻进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东）。然后，继续北上攻占郑州（今属河南）。东京留守宗泽遣统制阎中立、郭俊民领兵赶赴郑州迎敌，两军大战，阎中立战死，郭俊民投降，李景良临阵逃走。宗泽捕斩李景良，同时，处死与金将一起来劝降的郭俊民。金军见东京守备坚固，未敢贸然进犯。金东路军先行撤回，中路军处于孤军深入的境地，不久也宣告撤军。金军撤退时，把所占领的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等地的百姓裹胁到河北。^④

①② 《大金国志》卷五《太宗纪三》。

③ 参见《要录》卷十二，第264~265页。

④ 见《金史》卷三《太宗纪》。

三、陕西战场

由娄室、撒离喝（完颜杲）统帅的金西路军，在天会五年十二月，自隰州（今山西隰县）、慈州（今山西吉县）南下进攻陕西。金军从龙门（今山西河津）渡黄河进入陕西，开辟陕西战场，以策应中路军作战。

金军重兵压境，陕西宋军尚未作御敌的部署。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等只顾自身安危，正忙于把朝廷迁往扬州，而无心他顾。因此，当陕西告急文书送到行在，朝廷才临时任命唐重为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兼知永兴军，负责统帅关中宋军御敌。唐重原为天章阁待制，后出守同州，曾率残兵数百守卫同州城。但是，正如《遗史》所说：“唐重儒士，不知兵，帅关中一蹈范致虚覆辙。”^①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当此大任，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唐重临危受命后，为了加强黄河沿岸防御，决定“沿河置安抚使，以统制将兵守河，而安抚统制屡易，最后以曲方为治河安抚使”^②。曲方也并非是合格的人选，“方已衰老，皓首黧面如鬼物，统兵驻于韩城，日以饮酒蹴鞠为事，未尝治军政”^③。当金军集结于龙门、清水曲，有人向他禀报时，“方犹饮酒，而以告者为妄言”。河防重任交与一个老酒鬼，足以说明唐重缺乏知人善任的统帅才能。

金西路军于十二月十三日，由龙门顺利渡河，直扑韩城，距韩城仅4里时，宋军才发觉，曲方领兵奔逃，韩城陷落。金军从韩城南进同州（今陕西大荔），守城宋将闻风而逃，金军不战而胜。接着，金军攻华州（今陕西华县），东破潼关。宋河东经制使王瓚弃陕州（今河南陕县），逃奔四川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军并

① 《会编》卷一百十五《遗史》。

② 《会编》卷一百十四炎兴下帙十四。

③ 以下引文见《会编》卷一百十四炎兴下帙十四。

不继续东进，转而西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天会六年（1128年）正月，金军围攻京兆府，唐重率军死守几十天，援兵不至，经制副使傅亮以所部兵开门出降，金兵入城，唐重率兵巷战，身中数箭壮烈殉国。二月，金军越过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沿渭水而西，逼近秦州（今甘肃天水），宋守将李復开城降。金军再西攻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遭到熙河路经略使张深率军阻击。张深遣都监刘惟辅以精骑 2000 夜袭金营，大败金军，杀死金将黑锋，金军由原路向东败退。陇右都护张严奉张深命追击娄室进入凤翔境，遇伏兵而死。三月，金军占领凤翔后，北上攻泾原路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宋镇戎军经略司统制官曲端据守麻务镇（今甘肃泾川附近），命副将吴玠为前锋进据青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迎头痛击金军，大败金军，追赶金军 30 里，金军向同州、华州方向撤退。曲端乘胜收复秦州，李彦仙等义军收复陕州、凤翔、京兆。这时，形势对陕西宋军十分有利。宋陕西路制置使钱盖向鄜延帅王庶发布命令，派他兼制环、庆、泾、原等地兵追歼金军。但是，几路将帅军阀习气很重，不愿意听从后起之秀王庶的节制，“遂具文以报，而实不出兵”^①。泾原统制曲端更是从中作梗，张贴榜文说：“虏已过河归国，农务不可失时。”^②并尽数遣散渭河以南的义兵。结果，王庶的联合围歼金军的作战计划得不到实施。五月，金军从蒲津从容渡河北归。

金军三路南下攻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但是，这次军事行动使金朝对南宋的国防力量及兵力部署加深了了解，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再次南下攻宋的计划。

^① 《要录》卷十五，第 321 页。

^② 《会编》卷一百十七炎兴下帙十七。

第三节 宋南迁临安

一、弃淮守江的战略

自从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破东京后,身为兵马大元帅的赵构就企图南逃。他在应天府即位后,仍时刻准备南逃。正如宗泽在建炎元年六月奏劄所说:陛下即位四十日之所为,“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一统之绪为偏伯者尔”。^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高宗南迁的企图。李纲入朝为相,积极部署抗金,坚决反对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南迁主张,认为南迁“国之存亡,于是焉分”^②。宋高宗出于无奈,被迫“收还巡幸东南手诏”^③。转而采取分步骤南迁的策略。建炎元年七月诏说:“奉元祐太后(孟太后)如东南,六宫及卫士家属从行。”^④先送孟太后过江,自己再伺机南逃。为掩人耳目,信誓旦旦地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战。”^⑤宋高宗一面赌咒发誓抗金,一面暗中作南迁的准备。

宋高宗一意南迁,主要是对黄河防线失去了信心。金军铁骑踏进开封,说明黄河并不是可倚恃的天险。因此,尽管宗泽多次上书请“回銮”整治一新的开封,宋高宗仍固执己见,急于逃往淮河以南。

建炎元年八月,李纲罢相;九月,宋高宗即命扬州守臣吕颐浩缮修城池,并派遣徽猷阁待制孟忠厚护送太庙神主赴扬州,做好南迁扬州的准备。宋高宗知道南逃不得人心,将会招致臣民反

① 《会编》卷一百八炎兴下帙八。

②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上》,第11258页。

③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宛委别庄本。

④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7页。

⑤ 《会编》卷一百十一炎兴下帙十一。

对。于是诏告四方：“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① 用严酷镇压手段，以实施南逃的计划。

十月，宋高宗乘船南下。次年二月，到达扬州。扬州地处淮南，纵横交错的水系不利于金骑兵行动，又远离金军侵宋基地两河，他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真正的目的地是长江以南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宋高宗放弃黄河流域，逃到淮南，进而渡江南下，以实现弃淮守江的战略。弃淮守江的战略，实际上是放弃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宗泽对朝廷南迁以及将会造成的危害焦急万分，再三敦请宋高宗返还开封，“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②宋高宗置之不理，宗泽忧愤成疾，于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疽发背而死。死前一日，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并嘱咐部将们完成其未竟事业，继续抗金。在弥留之际，连呼三声“过河！”宗泽死后，杜充被宋高宗任命为东京留守。杜充“尽反泽所为，故河北诸屯豪杰皆散。而杜充又务诛杀，故城下兵又复为盗去”。^③ 开封这一抗金基地很快就被断送。

二、南迁临安

宋高宗逃到扬州，金三路军鞭长莫及，相继北撤。然而，宋高宗把“暂驻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④的宣言抛在脑后。所谓暂住淮甸准备南渡是真，还京御敌是假。他对促成扬州之行的黄潜善、汪伯彦感激不尽，一再表示：“事朕同险艰，备知其忠实”，“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⑤ 而后，又“忘外患，恃江淮为险，无经济远谋。”^⑥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参赞御营事张浚，曾提醒过黄潜善、汪伯彦，指出：“金人必来攻，而庙堂晏然，殊不为

①④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9页。

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第11284页。

③ 《会编》卷一百十八炎兴下帙十八。

⑤⑥ 《会编》卷一百十九炎兴下帙十九。

备”，^①是十分危险的。黄、汪二人视为笑谈，不予理睬。就在南宋君臣苟安一时的时候，金军又大举南下进兵了。

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太会六年，1128年）七月，金太宗又下诏大举攻宋。十月间，完颜宗翰率金军主力由黎阳渡河，与金军将领完颜宗辅率领的河北金军会师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城下。

金军围濮州的次日（十月十四日），宋高宗命孟忠厚先把孟太后及六宫皇子送到杭州。他所采取的仍是与早先南迁扬州相似的手法，先安置亲眷南逃，而后自己再脱身往就。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宋高宗听到数千金军骑兵进据离扬州仅100余里的天长军（今安徽天长）时，慌忙带王渊和康履等五六名内侍，从瓜洲（今江苏仪征东）乘小船渡江逃往镇江，再由镇江逃往杭州。宋高宗到达杭州后，升杭州为临安府，以府衙作行宫，以显宁寺充当尚书省衙。当时，随行到杭州的官员不足十分之一。据《维扬巡幸记》记载：“三省六房公吏本千余人，得至者其数不满五十。”^②由于缺员甚多，造成“行在职务久而不备”的荒唐局面。

宋高宗逃到临安，迫于朝野舆论压力，下责己诏。但明为责己，实则为自己开脱。仓皇南逃，在这里成为“退保江津以援淮甸”^③的战略部署。并发誓以后“屏斥细务，专事兵戎”。^④表示要全力抗金，但实际上却积极进行求和准备。他先后派大臣使金，并录用张邦昌亲属以讨好金朝，甚至“罪（李）纲以谢金人”。^⑤这一切并没有换得金朝罢兵，反而给南宋内部带来极度混乱。

三、临安卫军政变

自从南宋朝中排斥了抗战派之后，宋高宗把军政大权委付给

①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第11297～11298页。

② 《会编》卷一百二十一《维扬巡幸记》。

③④ 《会编》卷一百二十二炎兴下帙二十二。

⑤ 《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第461页。

黄潜善和汪伯彦，结果使渐有起色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接连遭到溃败。

军事上的溃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当皇帝和高级文武官员从扬州向南奔逃，沿途城乡居民，“扶老挈幼如蜂屯蚁聚”，随之奔窜。混乱之中，“相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老弱妇幼行动迟缓，金军追到后，“悉被驱虏，不从者杀之”。有的宋朝败兵也趁火打劫，“公行劫虏，什物钱帛填委街衢，无敢阻之”。人们对此境况，“莫不痛心疾首，怨愤之气达于上下”。^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军事上的失利，也大大增加了军队与决策者之间的对立情绪，进而发展到部分军兵捉杀当政官员以泄积愤的事件。司农卿黄镈被军兵误认为是黄潜善而处死，少卿史徽、丞范浩、左谏议大夫李处遁、给事中黄哲等朝官，在南逃途中也被宋朝军兵杀死。

宋高宗感到势态严重，到达临安后，下诏罪己，并罢免黄潜善、汪伯彦，试图平息军民怨愤，稳定政局。但是，由于宋高宗继续坚持妥协逃跑的指导思想，新任命的军政要员也是黄、汪之流，且更不孚众望。主政的宰相朱胜非，是一贯主张与金和议的投降派。黄、汪当政时，他曾受黄潜善指使草制攻击李纲。在金军大举进攻面前，他所能提出的退敌办法是：“请尊礼邦昌，录其后以谢敌”。^②主管军事的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原是黄潜善、汪伯彦的同伙，对于扬州溃逃负有重大责任。朱、王二人的倒行逆施，造成军队中对当权者不满情绪更加激昂，从少数官兵的不满，发展到“诸将不悦”的严重势态。^③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事变发生了。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初五日，临安卫军将官苗傅、刘正彦利用所部官兵对当权者的愤慨，打着“为天下除害”^④的旗号，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捕杀了王渊，处死康履等宦官，逼迫宋高

① 以下引文见《会编》卷一百二十一炎兴下帙二十一。

②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朱胜非传》，第11316、11319页。

④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传上》，第13804页。

宗退位，另立宋高宗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并宣布改年号为“明受”。

在政变当天，苗傅等组织者曾发布告天下民庶官吏军兵宣言，并“揭榜于市及传檄诸州”，^①以昭示他们举兵的原因。宣言原文如下：

统制官苗傅谨申大义播告天下民庶官吏等，迺者大金侵扰淮甸，皆缘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致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遗弃，社稷存亡在于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并内侍等，不务修省，尚循故态，为恶罔悛，致令民庶皇皇未知死所，进退大臣尽出奄宦，赏罚士卒多自私门。金人将至，朝廷安然坐视，又无分毫措置，即日两浙之民遂有淮扬之祸，嗟尔士庶，兴言及此，宁不感伤。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为民除害。凡有大臣，罪恶显著，并内侍等官，并行诛戮。期尔士庶一德一心，共图中兴之业，慎无生疑，以取后患。本为生灵，别无希取，尔等若获安居，傅等一死未晚。

应当说，政变宣言所言皆切中时弊，杀王渊和康履等人，“诚可以快天下之心，纾臣民忿怒之气”^②。但是，苗傅、刘正彦“二将忠有余，而学不足”。^③缺乏主持国家军政的能力，致使政变后不能有效地控制局势；不吸收有政治头脑的文官合作，也就提不出振奋人心的政治主张；既不与临安城外的其他军队取得联系，又不争取临安居民的支持；一味困守孤城，因而失败不可避免。

在忠于宋高宗的文官吕颐浩及张浚等人的串连和鼓动之下，宋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军，先后从淮南和江南等地发兵勤王，讨伐临安起事军队。勤王军攻入临安，四月初一日，宋高宗复位，任命吕颐浩为宰相，张浚任知枢密院事。起事军队遭到镇

① 《会编》卷一百二十七炎兴下帙二十七。

② 《要录》卷二十一，第432页。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朱胜非传》，第11317页。

压，一部分官兵被逮捕处死，苗傅、刘正彦率部众出走东南，被韩世忠追获斩首。^①

南宋新立后，所控制的地域相当可观，除江南之外，西北和中原大部地区仍归其掌握之中。但是，由于宋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排斥李纲的积极抗战方针，以退却逃跑为其指导思想，造成军事部署方面问题重重。既没有防守黄河一线的决心，又没有统一指挥和部署。因此，在金军第一次进攻面前，黄河防线形同虚设，短短的3个月时间，西自秦州（今甘肃天水），东至青州一线的许多要点被金军攻占。所赖宗泽在汴京坚决抗击和各地坚持抗金军民的英勇奋战，才使金军东西联为一气、三路并进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南宋统治者才得以暂时渡过危机。

第四节 金军第二次攻宋

（见附图2）

一、金的東西并进战略

金朝第一次进攻南宋，并没有完成灭宋的预期的战略目的。经过数月休整之后，闻宗泽已死，宋防线南移，军心不振，决定再次攻宋。

金朝这次兴兵，在军事准备方面较前次充分。战前，金廷召开军事会议，拟定作战计划。当时，金朝军事首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驻扎河北的金将提出，放弃用兵陕西，集中兵力从河北全力进攻。在河东的金将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陕西与西夏为邻，事关重大，绝不可放弃用兵陕西。左副元帅完颜宗翰进一步提出：宋人积弱，河北不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

^①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传上》，第13802~13809页。

宋”的战略构想。^①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奏请金太宗裁决。金太宗作出：“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宋平，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的决策。^②于是金王朝决定以完颜宗辅与完颜宗翰率金军主力，穷追宋高宗，消灭宋王朝；派娄室、蒲察部进攻陕西，以牵制四川、陕西方面的宋军；采取东西并进的作战计划。

金军东西并进战略决策较为合乎实情。金太宗是一个极有军事才能的人，早年协助金太祖拟制重大的军事行动计划，“凡太祖用兵，时密谋秘计皆其所与”^③。同时，也有统兵作战的经验，“攻辽时，三数大战皆亲犯矢石为部众先”^④。因此，金太宗才能在军事首脑“议久不决”的情况下，合众议为一，使金军同心合力攻宋。金军的战略部署是建立在精神和物质较充分准备的基础之上的。

二、宋的防御部署

金军第一次攻宋后，宋廷放弃黄河防线，开始筹建以寿、扬州（今安徽寿县、江苏扬州），建康、润州、池州、鄂州（今江苏南京、镇江，安徽贵池、江西九江，湖北武昌），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等为要点的淮、汉、长江防线。但是，由于南宋统治者在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给金以可乘之机。

大敌当前，南宋统治者仍然以求和作为指导思想。建炎二年五月，宋高宗任命大臣宇文虚中为祈请使前往金廷，名义上是祈请放归二帝，实际上是向金求和。金太宗对宋求和的反映是：“宋主遣使奉表请和，诏进兵伐之。以宋二庶人（徽、钦二帝）赴上京。”^⑤直到金军大举进兵之时，宋高宗还委派魏行可赶往前敌向金军求和。

①② 《金史》卷七十四《完颜宗翰传》，第1698页。

③④ 《大金国志》卷三《太宗纪》。

⑤ 《金史》卷三《太宗纪》，第59页。

指导思想的错误，导致了军事部署的偏差。南宋朝廷不是部署军队作抗击金军的准备，而是寄托于和议。因此，在兵力部署方面并未立足于全力对金作战。

建炎二年五月至十月间，南宋朝廷把很大的兵力用于镇压江、淮的敌对势力。当时，南宋三个最有实力的将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有二位被调往江、淮去对付叛军和起义军。五月，命御营中军统制张俊率军去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士兵徐明等人的兵变。六月，刚剿灭秀州兵变；七月，又命张俊与两浙提点刑狱赵哲率军去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军校叶浓领导的起义军。十月，又派遣大将刘光世往宿州（今属安徽）征讨叛军李成。^①南宋统治者视肃清内部甚于抵御外寇重要。

同时，宋廷也并没有把握全局的御敌谋略，兵力部署的重心是以宋高宗等人的安危为转移。宋高宗在建炎二年六七月间，对江、浙州军频频发布诏旨，进行军事部署。选调江、浙州军的兵卒六分之一赴行在，增加行在的防御力量；下令江、浙沿长江州军训练水军，制造战舰；^②派遣大将韩世忠驻军淮阳（今江苏邳州西旧县）等等，试图加强淮河以南和长江沿线防线。由于缺乏战略眼光，仓促部署，江淮防御体系并没有形成。其他地区的布防情况与江淮地区相比就更显得薄弱。

河南和山东是扼止金军南下淮河流域的战略要地，而南京开封府和济南府又是河南、山东的枢纽，金军第一次攻宋受阻，与两地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此外，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与开封互为犄角。宋廷把南京开封府委付刚愎自用的杜充全权负责，导致军心动摇，义兵四散，“两河忠义之士往往皆引去”^③，使宗泽苦心经营的复兴基地自行瓦解。知河南府杨进，原为宗泽招揽的义军，不堪杜充肆虐，称雄自立。济南重镇

① 《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二》，第456～458页。

② 《要录》卷十六，第332页。

③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上》，第13810页。

委派畏敌如虎的刘豫去镇守，与弃之无异。

陕西方面的部署较河南、山东略强，但是也有着不少问题。建炎二年六月，朝廷任命鄜延经略使兼延安知府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负责陕西方面的防卫。王庶在陕西的威望不高，陕西许多将领不肯听从调遣。庆州帅王似、渭州帅席贡“皆以庶后进，不欲听其节制”。^①泾原统制曲端也“素不欲听庶节制”，甚至不接受朝廷任命的节制司统制职务，不服从王庶指挥。陕西将帅之间的矛盾连金军都知晓，而宋廷却懵懵懂懂，从而留下隐患。

南宋在战略部署上的失误，必然铸成在战场上的惨败。

三、西线战况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以娄室、蒲察为统帅，婆卢火、绳果为监军的金西路军率先发动攻势，^②揭开了第二次攻宋的战幕。

八月，娄室率军西入华州（今陕西华县）击败宋军，部将讹特剌攻破守渭水的宋军，北上占领下邽（今陕西渭南縣北）。九月，绳果率军再克蒲城（今属陕西）、同州（今陕西大荔）、丹州（今陕西宜川）。十月，娄室、蒲察指挥金军继续北进，经临真（今陕西临真镇）向延安府（今陕西延安）挺进。

在气势汹汹的金军面前，陕西方面的宋军却显得一筹莫展。总帅王庶闻听金军已进入康定（今陕西富县境），才连夜从坊州（今陕西黄陵）赶赴鄜、延间，指挥阻截金军。王庶委派庞世才、郑恩部阻击延安来路金军，他亲自负责抵抗鄜州（今陕西富县）来路金军，征调兴元（今陕西汉中）王玠部和驻扎淳化（今属陕西）的曲端等部前来会战。^③曲端部实力在陕西诸将中最强，有精

① 《会编》卷一百十七炎兴下帙十七。

② 《金史》卷七十一《婆卢火传》、卷七十二《娄室传》，第1639、1652页。

③ 《会编》卷一百十八炎兴下帙十八。

兵5万。但是，不管是王庶连日发出调兵公文，还是派遣十几位使臣、进士前去劝说都无济于事，曲端始终按兵不动。相反，曲端率部擅自行动，派部将吴玠领一军收复金军占后又舍弃的华州，随后合兵一处向西北行进，进入位于深山中的襄乐（今甘肃宁县东北）。曲端躲入远离金军500余里的子午山中，坐视陕西宋军的败亡。^①王玠部行动迟缓，直到延安失陷方才赶到鄜州。

金军利用陕西将帅之间矛盾，不待宋军集结完毕发动攻势，宋军溃败，金军乘胜进逼延安西城。王庶收集散亡兵士增援延安，行至甘泉（今属陕西），听到延安城陷，率部众往襄乐投奔曲端。曲端斥责王庶丢失延安，乘机夺走制置使印，扣留制置司属官，然后把王庶赶走。^②王庶上书朝廷自劾，被免去制置使职，改守京兆（今陕西西安）。王庶去职，陕西六路军马更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

十一月，金军占领延安府后继续北上，招降绥德军（今陕西绥德）及静边（今甘肃静宁东）、怀远（今宁夏固原西）等16座城寨；攻破青涧城，兵逼晋宁军（今陕西佳县）。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今陕西神木东北）、府（今陕西府谷）、丰（今陕西府谷北）三州降金。金军扫清晋宁城周围寨堡，全力攻击晋宁城。但是，遭到晋宁守军的顽强抵抗。金军围攻三个月，晋宁城岿然不动。正当金军久攻不下准备撤军时，发现晋宁城中没有水井，仅靠流经城内的河水解决吃水问题。于是，在城外挖渠泄水，断绝水源，晋宁城危在旦夕。守卫郭门的宋将李位、石乙开门投降，金军入城。知军事徐徽言率众拼死抵抗，激战三日，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出走，途中被俘，誓死不屈，大骂敌人而死。^③同时被杀的还有誓死不降的统制孙昂和被俘的士兵。攻占晋宁军后，金军又掉头南还，目的是先巩固已占领的地区。随后，娄室、婆卢火镇守延安，折可求屯兵绥德，蒲察驻军蒲州。在用兵的同时，娄室委

① 《要录》卷十八，第366页。

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曲端传》，第11491页。

③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徐徽言传》，第13192、13193页。

派官员建立官府，对残存的居民进行安抚。不久鄜、坊、乾、邠等州也落入金军之手。^①金军在西部战场取得胜利，完成了牵制陕西宋军、配合主力东进的预订计划。

四、东部战场

金西路军的胜利，为东路军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建炎二年秋，金东路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由河北、河东金军组成的主力部队，担任统帅的是完颜宗辅和完颜宗翰。东路军从两地出发，一支由完颜宗辅统领从河北南下；一支由完颜宗翰率领由山西东进；两军预期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会师，然后合兵一处，经山东南下灭宋。

完颜宗翰自大同率军南下太行山，十月间，由黎阳渡黄河直扑濮州。完颜宗翰最初并未把濮州放在眼里，“意以为小郡，甚轻之”^②。宋将姚端乘金军戒备松懈，夜劫金营，攻入金中军大营。完颜宗翰赤脚而逃，险些被宋军活捉。

完颜宗辅镇压了河北五马山起义军后，统军向南推进，途中曾命完颜宗弼领兵攻打开德府（今河南濮阳），见宋军据守，并不恋战继续行进。十月中旬，到达濮州城下。

完颜宗翰与完颜宗辅两军会合实力大增，猛攻濮州城。驻守濮州宋军面对强敌毫无畏惧，打退金军多次进攻，把金军阻截在濮州城下达 33 天之久。^③十一月十五日，金军从濮州城西北角攻入城中，采用屠城的残酷手段进行报复。濮州军民用血肉之躯延缓了金军南侵的速度，为宋朝组织抗击金军赢得了时间。但是，南宋统治者并没有把握战机组织抗敌。相反，派遣使臣赶往前敌向金军求和，从而坐失良机。

① 《金史》卷七十二《娄室传》，第 1652 页。

② 《要录》卷十八，第 367 页。

③ 《会编》卷一百十九炎兴下帙十九；《要录》卷十八，第 367 页。

十二月，金军从濮州分兵四出，攻城略地，进展十分迅速。完颜宗弼领一军攻开德府，开德知府王棣率军民据城死守，金军强攻不成，采用离间之计，伪造王棣降书。王棣面对愤怒的军民有口难辩，奔走中被激愤的人群踩死。十二月六日，金军攻占开德。金军对开德军民进行了报复，“怒其拒战，杀戮无孑遗”^①。开德失陷十一年后，南宋再度收复开德，“城中无一户旧居土人”^②。足见当时金军的残暴。

完颜宗辅率一军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大名知府张益谦想弃城逃走，遭到提点刑狱郭永坚决抵制。郭永指出，敌人如果夺取大名，会席卷而南，朝廷就要告急。主张坚决死守，以待外援。郭永亲自率兵登城日夜据守，又派人缒城突围赴行在告急。金军把俘掠的东平、济南人押至城下喊话：“降者富贵，不降者无噍类”。^③但是，大名军民不怕利诱威逼，誓与大名共存亡。十二月十四日，金军凭借大雾，用石炮摧毁城上櫓楼，攻陷大名。知府张益谦屈膝投降，郭永被俘不屈骂敌而死。^④

完颜宗翰统一军从濮州向东北方向挺进。十二月十日，兵抵东平府（今山东东平），据守东平的宋京东西路制置使权邦彦弃城逃走，金军不战而得东平。完颜宗翰在距东平东南 50 里处安营扎寨，遣完颜昌（挾懒）领一军北攻济南府（今山东济南），自领大军经滕县（今属山东），南取徐州（今属江苏）。宋济南知府刘豫开城向完颜昌投降。济南为山东重镇，济南一失，山东震动。金军乘势扫荡青州（今属山东）、潍州（今山东潍坊）等地，山东大部落入金军手中。

建炎三年（1129 年）正月，完颜宗翰率军渡泗水，经滕县攻占徐州。^⑤徐州是宋朝储存江淮币藏和物资的重要基地，金军克徐

①② 《会编》卷一百十九炎兴下帙十九。

③ 《要录》卷十八，第 374 页。

④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忠义传三》，第 13207 页。

⑤ 《要录》卷十九，第 385 页。

州得到补给，如虎添翼，为进攻淮河流域和南攻扬州打下了基础。至此，金军在东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宋军在东部战场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投降主义指导思想作祟。二是各路宋军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如濮州坚守月余竟无人增援。更有甚者，握有重兵的东京留守杜充，为了自己的安危，在濮州城破之后，派兵掘开黄河放水，以阻止金兵西进。结果造成洪水泛滥，引起更大的混乱。软弱的政府、涣散的军队，面对组织严密、战略意图明确的金军，失败是注定了的。

五、扬州之战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金东路军攻占徐州后，决定继续向东南进兵，战略目标是南宋行在扬州。

淮河流域是宋朝兵力部署较为雄厚的地区，南宋著名将领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此时正驻军淮阳（今江苏邳州西旧县）；江淮制置使刘光世击败李成叛军后，也统兵沿淮河设防，以遏止金军南下。但是，金军乘胜直入淮河地区。

金军东路军敢于涉足险地是有充分准备的，战前计划也较为周密。攻击扬州分两步进行：由完颜宗翰统大军兵逼淮阳与韩世忠军决战；另派拔离速、乌林答泰欲、马五等率领精兵1万，日夜兼程长途奔袭扬州。^①

完颜宗翰率金军迫近淮阳，韩世忠仅有兵1万，无法阻挡蜂拥而来的金兵，连夜被迫退至宿迁（今属江苏）。未到天明，金军又随后追来，韩世忠败走沐阳（今属江苏）。韩世忠在沐阳如惊弓

^① 《要录》卷十九第385页载：拔离速、马五、乌林答泰欲“领兵万人趋扬州”。但目前流行之说，攻扬州为5000骑兵，如《中国军事史略》、《简明宋史》均持此说。《金史·宗翰传》载：“乃遣拔离速、乌林答泰欲、马五袭康王于扬州，未至百五十里，马五以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城下。”疑5000骑兵为500骑兵之误。

之鸟坐卧不宁，星夜弃军渡沐水逃往盐城（今属江苏）。翌日清晨，宋军得知主帅逃走，于是全军溃散，有人干脆啸聚山林占山为王去了。完颜宗翰乘势进入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大将刘光世“阻淮拒金人，敌未至自溃”。^① 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宋各地守将望风而逃。

二月初，拔离速、乌林答泰欲、马五统帅金兵，由泗州（今江苏盱眙）攻入天长（今属安徽），距扬州仅60余公里。宋高宗仓皇出逃，扬州仅御营军就有10万之众，^② 但不战自溃（参见本章第四节）。马五领500骑兵率先驰至扬州城下，^③ 听到宋高宗已离开扬州，一直追到瓜洲镇（今江苏仪征东瓜洲）渡口，不及而返回扬州。

宋高宗逃过江后，马五等部并没有过江追击，主要原因是：为数不多的金军骑兵要立即渡江绝非易事，而且脱离主力孤军深入也十分危险。因此，金军占领扬州后，随即焚扬州，经高邮（今属江苏）北还，与主力会师。宋军随后收复残破的扬州。

自扬州之战后，金军停止南进，以巩固在山东的战果。完颜宗翰将刘豫调至东平府，并任命他为京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度大名、开德二府及濮、滨、博、棣、德、沧等州；以刘豫子刘麟为济南知府，统辖大河以南新得之地；留左监军完颜昌镇守山东。完颜宗翰、完颜宗辅回京复命，金军第二次攻宋结束。

金军第二次攻宋，历经半年多，仍采用全线进攻的战略，尽管进攻持续猛烈，攻城略地也颇有战绩，但依然不能达到灭亡南宋的战略目标。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金自身条件的制约。女真属于长于骑射的马上民族，建

① 《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二》，第460页。

② 《会编》卷一百二十二：“粘罕之犯扬州也，时御营之师必有十万，粘罕只有五六千骑……。”

③ 《金史》卷七十四《宗翰传》，第1698页。

国后又经过亡辽、灭宋的战争，使其拥有一支惯于野战的精锐骑兵，在平原野战，几乎所向披靡。完颜宗弼曾颇为自诩地说：“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马胜”。^① 骑兵的优势，加上军事指挥得当，使其连连获胜，锐不可挡。然而，随着战区的扩展，金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局限，使其优势难以充分地施展。金第二次攻宋，在东、西两线同时展开，东攻两淮，西犯川陕，两线的地势条件，均不利于骑兵作战。两淮水网纵横，陕川山峦起伏，限制了金军骑兵发挥速度和机动灵活的特点，从而造成金军“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的结果。^②

二是战略指导的缺陷。第一次南下攻宋后，金统治者应调整一战即消灭南宋的指导思想，采取分步骤、循序渐进的战略方针，在巩固中原战略要地的基础上，将政治、军事重心南移，以便进一步占领和巩固两淮，而后自北向南逐步推进。但是，金的战略指导者仍是西攻川陕，东攻两淮，穷追宋帝，消灭宋王朝。一味地全线出击的结果，造成兵力分散，后援不足，所占地区无法巩固的弊端。在南宋军民抗击之下，力量不断削弱，使灭宋的目标难以实现。

南宋在抗击金军进攻方面，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一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者，由于寄托于和议，直到战争爆发，军事部署尚无头绪，防淮还是守江迟疑不决，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防御体系。致使守淮军队意志不坚，防御无策，未战先溃，金军得以长驱直入。二是没有建立一个像样的军事领导班子。李纲罢相后，继任的黄潜善、汪伯彦、朱胜非等人，是只知逃跑与求和的“皆无远略”之辈，让他们执掌军政大权，部署抗敌，岂不误事？宋廷所任命的前线指挥官也多为无能之辈，如开封的杜充、济南的刘豫，或逃或降。让他们在前线指挥和组织抗敌，造成两地的沦丧是必然的。三是协同作战不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宋纪一百二十三，绍兴十年秋七月。

② 《要录》卷四十三，第786页。

够。南宋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各军作战互不配合，难以形成强大的力量。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颁行的新军法中专门设有“贼攻，一军危急，而余军不策应者，统兵官当行军法”等律条，^①但积习难改。如濮州军民困守孤城月余而无外救援；陕西诸将相互忌刻，坐视友军败亡。

南宋之所以能危而不亡，主要由于南宋军民对金的民族压迫具有强烈反抗精神。金军所到之处，掳掠人口财富，肆行杀戮。广大南宋军民不甘屈辱，不畏强暴，采取各种方式坚持抗金斗争，有力地牵制了金军，使其战略意图难以实现。这对于南宋维持危局，稳定战事，逐步走出困境，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五节 金军第三次攻宋

（见附图3）

一、金军渡江与宋的江防

金军第二次攻宋，未达到消灭南宋的目的，经稳定占领地、调整军事部署后，又决定第三次攻宋。

天会七年（1129年）秋，金军分三路攻宋：中路以完颜宗弼为统帅由归德南下，渡江攻建康，追击宋高宗赵构。东路完颜昌部攻取山东未下之地及淮北地区，以保障中路军左翼安全。西路娄室部继续在陕西发动攻势，以保障中路军右翼安全，并牵制西夏。同时在梁山泊（今山东梁山东南）造船，拟由海道南下，以为配合。^②

天会七年八九月间，金军东西两路在山东、陕西两地同时发

① 《宋会要辑稿》刑法七之二十九。

② 见《要录》卷二十八，第553、564页；《金史》卷七十二《娄室传》、卷七十七《完颜宗弼传》。

动攻势，配合中路军顺利进军。

完颜昌从东平到潍州指挥东路军东进，连破莱、登二州，然后掉头攻陷密州、沂州，南趋楚州。西路娄室部渡渭水，攻占京兆府。^①

在东西两路军攻城略地之时，完颜宗弼率部于九月间，攻占单州（今河南单县）、兴仁府（今山东曹县西北）和宋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十月，完颜宗弼领十余万大军南下渡淮，攻陷寿春（今安徽寿县）。当听说孟太后在南昌，于是命拔离速、马五率本部军马西进，自蕲州（今湖北蕲春南）、黄州（今属湖北）攻江西；自率主力从庐州、和州攻江东。

拔离速、马五部于天会七年十月末，攻下黄州，用小船和木筏渡江，费时三天，所部才全部过江。接着，经大冶直指南昌，追击孟太后。以后一直深入到潭州。

十一月初，完颜宗弼军连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和州（今安徽和县）、无为，沿江作战，伺机渡江。在攻采石时受到宋军阻击，渡江不成，继续顺流而进，克真州，然后掉头攻占乌江县，直趋马家渡（今江苏南京西南），从此处渡江，克溧水、太平，兵逼建康。

金军两路渡江，使南宋弃淮守江的战略失败。金军所以能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是与南宋退让求和、仓促备战、江防部署不固、用人不当分不开的。

自从金兵撤离扬州之后，逃到临安的宋高宗迫于舆论，将行在迁至建康，表示要组织军队抗击金军，“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应接中原”^②。但是，实际上高宗色厉内荏，对抗金并无信心，仍把希望寄托于乞和上面。因此，在建炎三年五月、七月间，两度遣使向金乞和，声称“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③直到八

① 关于西路军兵力，据《中兴小纪》卷八载：“联众十万”。

② 《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二》，第466页。

③ 《要录》卷二十三，第484页。

月金军已经起兵南下，高宗还遣使向金太宗求和，给完颜宗翰写信哀求罢兵，说自己到了“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①的穷途末路的境地，请求“见哀而赦己”^②。但是，金军并不理会宋高宗的哀求乞怜，仍继续进兵。

宋高宗见乞和不成，又想要逃跑，“上召诸将，问以移蹕之地”^③。由于不少文臣、武将反对逃跑，主张抗击金军，宋高宗才同意备战，部署江防。于是任命同知枢密院事杜充守右仆射兼御营使，领行营军兵10余万驻守建康，御前前军统制王玠负责增援杜充，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府（今江苏镇江），任命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守太平（今安徽当涂）、池州（今安徽贵池）一线。不久，又命刘光世移驻江州（今江西九江），防止金军从蕲（今湖北蕲春南）、黄（今湖北黄州）渡江，“以为南昌屏蔽”^④，保护在南昌的孟太后安危。御营司都统制辛企宗守吴江县，御营后军统制陈思恭守福山口（今江苏福山），统制官王琮守常州（今属江苏）。分兵派将之后，宋高宗本人则离开建康（今江苏南京）返回临安（今浙江杭州）。

宋高宗把江防重任委给杜充，“授以兵柄”，并可以“越次用之”。^⑤甚至把中书省印交与杜充，在人员和物质等方面任其调拨指挥，并下令“沿江诸将并听节制”^⑥。但是，杜充未敢出战，仅派兵6万守长江南岸，自己龟缩建康。统制官岳飞泣谏出战，亦未听。杜充既残暴又无能，“日事诛杀，殊无制御之方”^⑦。经常鞭鞑将士，“诸将衔之，伺其败，众将甘心焉”^⑧。握有重兵的刘光世、韩世忠也不愿隶属杜充指挥。南宋江防体系一开始就孕育着危机。

①② 《要录》卷二十六，第524页。

③⑤ 《要录》卷二十七，第532页。

④ 《要录》卷二十八，第554页。

⑥ 《会编》卷一百三十四炎兴下帙三十四。

⑦ 《要录》卷二十七，第551页。

⑧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传上》，第13810页。

刘光世驻军江州，担负阻击蕲、黄方面来犯的敌军，所部“月费钱十三万缗”^①。他却不尽职尽责，每天与江州知州韩相饮酒作乐，直到金军兵临城下才发觉，不敢迎战弃城奔逃，一口气经信州（今江西上饶西北）跑到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使金军顺利攻占南昌（今属江西）。

杜充坐镇建康指挥各军防止完颜宗弼部渡江，在几次小胜之后，放松警惕，金军趁黑夜偷渡成功。金军从马家渡过江后，杜充又未能及时组织兵力反击，只派统制官陈淬领兵3万阻击金军，王玠所部1.3万为后援，造成陈淬战死，王玠败逃的败局。他自己也丢下建康逃走，后投降金军。造成南宋江防全线崩溃，除宋高宗仓促部署，应负用人失当的责任之外，杜充与刘光世均负有直接的责任。

正是由于南宋政治和军事腐败，使金军乘虚而入，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

二、攻占临安

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完颜宗弼军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建康和江州一失，宋江防全线溃败。据守镇江（今属江苏）的韩世忠把储存在镇江的军资全部装入海船，焚毁城郭，退走江阴（今属江苏）。各路将帅纷纷遁逃。完颜宗弼军在建康休整10天，并制定了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占领临安，追获宋高宗。

十二月，完颜宗弼亲自率军经溧水（今属江苏）、建平（今安徽郎溪），击败抵抗的民众武装，大肆杀戮两城居民，放火烧城。接着，进攻广德（今属安徽），广德军知军周烈误以为是宋溃兵，忙派人迎接，结果引狼入室，周烈在奔逃中被金兵追获。金兵焚烧广德后，继续南下攻安吉（今属浙江）。宋安吉知县曾绰聚集乡

^① 《要录》卷二十八，第554页。

兵把守石郭隘口，本为对付抢掠的本朝溃兵，一遇金兵则丢弃竹枪、纸甲而逃。金军进入安吉，一把火使安吉县城化为灰烬。于是，由安吉直取余杭县西北的独松关。独松关是通往临安的咽喉要地，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然而，宋军只顾望风逃窜，并没有在此设下一兵一卒，使金兵顺利逾关而过。金军过独松关时感叹道：“南朝可谓无人，倘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渡哉！”^①独松关一失，临安门户顿开。

宋高宗早在金军攻临安一个多月以前，扬言“往浙西迎敌”，^②实际上出临安往东南方向逃窜，先至越州（今浙江绍兴），再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御营军和临安驻军相继撤走，临安已经将寡兵微，防御力量甚弱。

金军过独松关后，一路无宋军阻挡，只有钱塘县（今浙江杭州西）县令朱晔率民兵拒战，身受重伤仍让手下人背负作战，城破战死。金军进围临安城，当晚就轻取临安。

三、搜山检海

完颜宗弼占领临安后，派阿里、蒲卢浑率军 4000 往明州追袭宋高宗。明州地处东南沿海，宋高宗到明州并非要背水一战，而是向海上逃跑。

宋高宗一到明州就急忙派人募集海船，得到 20 只海船后，挑选一只作为御舟，于十二月中旬，在定海县（今浙江镇海）登船下海，其余各船装载高级文武官员、护驾禁卫等，拱卫在御舟周围，漂泊海上。

在下海之前，随驾禁卫几乎酿成一场兵变。当时，规定每船载 60 名卫士，卫士所带家属不得超过两口。禁卫多有父母妻子，“不知两者如何去留”。因此，对这项规定十分不满，“人情纷纷，

① 《会编》卷一百三十五炎兴下帙三十五。

② 《要录》卷二十九，第 576 页。

不欲入海”。^①以张宝为首的 100 余名卫士，挡住宰相吕颐浩，质问入海到何处去？吕颐浩却指责军士不为国家死战，愤怒的士兵要杀死吕颐浩。宋高宗眼看下海避敌的计划要付之东流，于是密谕中军统制辛企宗及亲军将领姚端带 500 甲士埋伏在宫门，设计诱捕敢于反叛卫兵。在宋高宗假意安抚之下，卫士们放松了警惕。第二天清晨，宋高宗身披甲胄，引伏兵四出，张宝等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宋高宗开弓射死两人，其余兵士束手就擒。为首的张宝等 17 人被处死，其他人都被送去坐牢。

金军从临安出发沿宋高宗逃跑的路线追击，先追至越州，越州守将李鄴战败投降。金军渡曹娥江向明州进军。宋据守明州的是浙东制置使张俊，在宋高宗应允的“一战成功，当封王爵”^②的重赏之下，南宋军于距明州城 25 里处的高桥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阻击战。

高桥战役是南宋正规军与地方军队，陆军与水军配合默契的一战。此战，张俊派出刘宝、杨沂中、田师中、赵密等率军在高桥迎头阻击金军；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质率领水师协同作战；明州知州刘洪道率州兵参战。在刘宝、杨沂中等殊死抗战之下，金军前进不得，李质和刘洪道从两旁夹击，打败金军。这一战中宋军也受到不少损失，党用、邱横等将领阵亡。

高桥之战后，张俊惧怕金军再次反扑难以招架，与李质、刘洪道一起率部撤出明州。宋军撤退时，拆断护城河浮桥以阻挡金兵，结果造成城内居民无法逃难。金军进城后泄愤屠城，居民幸存者寥寥无几。

建炎四年（1130 年）正月中旬，金军破明州后，又疾趋克定海（今浙江镇海）。接着，金军用搜集到的船只攻昌国县（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去追袭宋高宗御船，金军船只行至碇头遇大风雨，又遭到宋将张公裕大海船拦击，被迫退回定海。宋高宗侥幸脱险，

^① 《要录》卷三十，第 584、585 页。

^② 《会编》卷一百三十五炎兴下帙三十五。

当时距离金军船队仅有一天的路程。此后宋高宗的船队就在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今属浙江）的近海中漂泊，直到金军撤退才登岸。

阿里、蒲卢浑无法追到宋高宗，派人向完颜宗弼报告：“搜山检海已毕”。^① 得到完颜宗弼的指示后，于是从明州退回临安。

四、黄天荡之战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完颜宗弼决定金军全部撤回江北。宗弼率主力自临安北返，已深入到荆湖地区的拔离速部从潭州（今湖南长沙）北归。

二月十一日，完颜宗弼下令焚烧和抢掠临安三天，十三日率兵10万，带着輜重循钱塘江北岸撤退，破秀州，过吴江，焚掠平江，攻陷常州，抵达镇江，准备渡江到扬州。一路之上势如破竹的金军，正在渡江之际，却遭到韩世忠部宋军的阻截，于是金宋两军在长江中展开一场激战，即著名的黄天荡之战。

韩世忠预计金军不能久踞江南，于是，他“自镇江退保江阴”，并将军队部署在吴淞口等地，准备“俟敌归邀击之”。^② 当金军北撤消息传来，韩世忠率领8000军兵，征集战船100余艘，先期返回镇江，屯兵于焦山寺，截断金军归路。

三月十五日，金、宋两军在镇江附近金山、焦山间长江相遇。韩世忠身先士卒，其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宋水师“乘风使篷，往来如飞”^③。两军激战数合，“金兵终不得渡”。^④ 完颜宗弼见强攻不成，转而采用软化的策略，请求韩世忠借道过江，情愿归还在江南掳掠的财富，遭到韩世忠的拒绝。

金东路军完颜昌得到完颜宗弼受阻的消息，遣将急攻楚州、扬

① 《要录》卷三十一，第608页。

②④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第11360～11361页。

③ 《要录》卷三十二，第635页。

州，以接应中路军渡江。由于受到宋军的顽强抵抗，东路军虽经数日苦战攻克楚、扬二州，但是错过战机，未能达到策应中路军渡江的预期目的。

当完颜宗弼军逆水西上时，宋军也沿北岸溯流行进，拦截金军。宋军船大，前后排开，长于金军数里。两军且战且行，橹桨之声昼夜不停。宋军不时出动轻舟攻击金军，使金军船队脱身不得，最后金军被逼进建康东北70里处的一条死港——黄天荡。宋军船只封锁住出口，金军被困40余天，成了瓮中之鳖。正当金军一筹莫展之际，后得乡人献谋，挖通老鹳河故道，可直达秦淮河。^①完颜宗弼采纳了这一建议，金军连夜开渠30里，四月中旬逃出黄天荡，到达建康。

宋军发觉金军逃脱，又沿江追赶，在建康一带水面上再次截住金军。宋军赶制了一部分前端带钩的铁索发给各船，用以钩栏敌船。宋军水战经验丰富，船队机动灵活，时而“分两道出其背”，时而又合兵一处。^②宋、金两军水上几经接战，金军一直处于劣势。

完颜宗弼感到形势严重，采取张榜悬赏的办法，寻求破宋海船之策。在建康开米铺的福建人王某，贪财忘义，教金军在船中载土，上铺设木板，凿船板装棹桨，并准备大量的火箭用来射宋军帆篷。金军船只经过改装之后，作战能力大大增强了。

四月二十五日，金军乘风平浪静，宋大海船因帆篷不能利用，突然发动攻击，火箭齐射海船帆篷，宋船起火，秩序大乱，顺江败退。金军随后追至长芦，受到杨家洲民众武装的拦截，上千艘小船均插红旗，民兵头裹红巾，挡住金军，使韩世忠部得以顺利退到瓜步（今江苏南京北），然后弃船登岸，从陆路取道镇江。金军不敢继续深入，从长芦回师，渡江到六合。五月十一日，留在

① 金军开河路线有数说：在黄天荡南开河通真州（今江苏仪征），称芦门河（蕃人河）；在白鹭洲凿河等。此处据《金史·宗弼传》。

② 《要录》卷三十二，第630页。

建康的金军也全部撤回江北。

从潭州北撤的拔离速部比较顺利，于建炎四年二月底，经石首（今属湖北）渡江北还。后取道荆门，进入河南境内。四月二十五日，行至宝丰（今属河南）时，被宋牛皋统领的民兵击败，“杀伤甚众”，金将马五被俘。^①

完颜宗弼退回江北以后，对黄天荡之战犹心有余悸，“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②。从此金军不敢贸然南攻。留在江淮战场的东路军也在民兵的打击下，经山东北撤。西北战场的娄室部也退军河东。金军第三次攻宋宣告结束。

金第三次攻宋较前两次更为猛烈，战绩更为显著，横扫两淮，渡江而南，占建康，取临安，长驱明州，迫宋帝入海，但仍不免被迫撤兵。根本原因是金尚不具备灭宋的条件。

金朝崛起之后，依靠强盛的军力，领土迅速扩展到黄河流域，然而，金统治者不懂得对辖区的有效治理比军事占领更为重要。由于主要国力用于向外扩张，并采取奴隶制的掠夺式经济，使金初期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甚至对某些地区经济造成破坏。黄、淮地区，在北宋时期已是封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金朝势力进入这一地区后，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以致田园荒芜，居民离散，“不耕之田，千里相望”^③。经济得不到及时恢复和发展，影响金国力增长，兵源畅通。与奴隶制经济相适应的金朝政治制度，也不利于争取更多北方汉族地主的支持，从而影响金朝封建化的进程。军事上也没有及时根据战场地域的变化，改变以骑兵远程出击为主的作战方式。在这些带根本性的条件制约下，使其最终不能乘势灭宋。

在金军第三次大举进攻面前，南宋危机四伏，宋军全线败退，宋廷被迫流亡海上。南宋的败退，完全是南宋统治者一手造成的。

① 《会编》卷一百三十八炎兴下帙三十八。

② 《大金国志》卷六《太宗纪四》。

③ 《会编》卷一百四十八《汪藻轮对札子》。

南宋的整体实力不亚于金，具有优于金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江南素有鱼米之乡、财利之渊的称誉，四川“天府之国”自然条件优越。南宋初，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南宋人丁兴旺，兵源充足。南宋以汉族正统王朝之名有相当的号召力，军力逐渐回升，水师占有很大优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南宋完全有能力将长于骑技、短于水战的金军阻击在江、淮以北。但是，南宋统治者以消极防御为战略指导方针，大敌当前，求和不成，才仓促备战，因而不免江防不固，举措失误，使金军有隙可乘，逾淮渡江，长驱直入。在金军北撤之时，南宋没有抓住时机进行战略反攻，而仅有韩世忠部拦截金军，致使深入险地的金军得以撤回江北。

金军北撤之后，不再贸然南下，而改变战略以重点争夺川陕。南宋立足江南后，经济和军事得到较快发展。

第七章 金重点进攻南宋及其失败

1130 年黄天荡之战后，金强宋弱的格局有所变化。宋立稳江南，经济开始恢复，军事力量发展较快，形成较为巩固的淮河、汉水、长江防御线，战略形势逐渐向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金迫于形势，调整战略，从全线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全力争夺川陕。

第一节 宋金形势的变化

一、宋国力增强

南宋新立之时，不断遭到金军攻击，两淮残破，江汉被兵，军锋及于江西、两浙，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政治和军事基本上也处于无绪的状态。此时的南宋，民心离散，士气低落，国势不振，在金军的全面进攻下大有天亡之势。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 年），屡败的南宋出现了转机。原因是深入江南数月的金军，因不适应多水多雨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又不断遭到江南民众的打击，疲惫不堪，被迫北撤，在黄天荡遭宋军截击，金军统帅完颜宗弼等 10 万大军，险些不能生还。从此，金军不敢也无力渡江。尔后，宋廷结束漂泊流亡，都于临安（今杭州），政权逐渐趋于稳定。南宋立足江南，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国防力量有所增强，形成较为牢固的淮、汉、长江防线。此后，南宋对金战争，从屡战屡败到胜多败少，战略形势逐渐向有利于南宋方面转化。

南宋在这一时期国力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金兵北撤后，南宋政府开始重

视战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当时，两淮、湖北、京西等地，所受兵火之灾最重。建炎四年(1130年)十二月，宋翰林学士汪藻上书说：“淮南近经兵祸，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还”。^①湖北、京西一带，农业破坏也相当严重，“襄、汉沃壤，荆棘弥望”^②。遭受兵火地区，牲畜被杀掠，田园荒芜，农民逃亡，人口锐减。金军北撤后，汪藻即建议朝廷在淮南一带屯田。此后，朝廷积极鼓励流民复业。如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宋高宗诏“两浙路收买牛具，贷淮东人户”。^③绍兴四年(1134年)，“贷庐州民钱万缗，以买耕牛”。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南宋还制订《守令垦田殿最格》，对郡守县令垦田的多寡，实行奖惩制度。于是，这一地区的农业得到恢复，“两淮、荆湖等路民稍复业”^④。

江西路的农业，在建炎时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南宋政府对恢复生产的有功官员进行奖励，如绍兴二年(1132年)七月，宋廷因知兴国军王绚、知永兴县陈升，“率先奉诏诱民垦田，各增一秩”。汉水上游的汉中一带，以兵民结合进行农田垦植，颇有成就。如绍兴初，吴玠在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洋州（今陕西洋县）等地进行屯田，岁收谷10万斛，又调兵修褒城（今属陕西），农民有灌渠可恃，归业数万家。两浙地区，沿安吉（今属浙江）、临安、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一线，曾遭金兵攻掠。但金军退后，生产很快就得以恢复。福建是重要农业区，在南宋初年破坏较少，这一地区以开发山田为全国瞩目。四川盆地农业生产的重要地区，金军始终未能染指。绍兴间，经过兴修水利，生产得到很大发展。两广地区，尽管耕作粗放，较之长江流域落后，但南宋初年未经战火破坏，生产也逐年有所发展。湖南以洞庭湖区为主要产粮区。南宋初年，此地曾遭官兵和游寇残破，一度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后经钟相、杨么农民起义对封建统

① 《要录》卷四十，第749页。

②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汪藻传》。

③④ 以下引文均见《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上一》。

治的打击，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因此，农业经济发展较快。据史籍记载：绍兴初期，每年都有商贩从一些州县贩米外销。

总之，南宋初期的十余年间，经过广大农民的辛勤劳作，农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还不能说是速度很快。直到1141年宋金和议以后，南宋农业经济才有较快的发展。

二是政权趋于稳定。北宋灭亡后，其庞大的官僚体制随之瓦解。南宋重建，在金军的攻击下，行都几迁，政权不稳，机构设置极不健全。金军进攻的势头减弱之后，南宋政权定都于临安，制度逐步健全，中央集权制统治日趋稳定。南宋官僚制度较为精简，省并了原北宋的一些机构。南宋初期，对最高行政机构三省六部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建炎三年（1129年），“议者请并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为一”。^①于是三省合一，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改门下、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废尚书左、右丞。六部中的各部，只设长官或副长官，主持部务；所属司级机构，除户部以事务繁多未减少外，其他五部通过兼领、合并而大量省并。同时，对一些权限较大的监寺进行了省并，“并宗正寺归太常，省太府、司农寺归户部，鸿臚、光禄寺、国子监归礼部，卫尉寺归兵部，太仆寺归驾部，少府、将作、军器监归工部，皆用军兴并省也”^②。建炎四年（1130年），“罢御营使及其官属，以其事归（枢）密院”。^③从而使南宋建立之初设御营使管军的权宜体制，改为枢密院管军的稳定体制。南宋政权的稳定，对南宋社会的恢复和国防力量的增长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军事力量的增强。南宋建国初期，新组建的军队成分复杂，属正规军人数不过数万，其余多为临时拼凑、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军队。在金军大举进攻时，宋军逃亡、降金，甚至沦为寇匪之事时有发生。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南宋的军队在数量、质量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绍兴三年（1133年）九

①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官制一》。

② 《要录》卷二十二，第475页。

月，宋高宗曾说：“今有兵仅三十万，当更精择得胜兵二十万，器械悉备，训而行之，可以复中原，威外国”。^①说明南宋正规军的数量、质量都有所提高。绍兴四年（1134年），南宋曾统计过东南各军人数，“常御殿前，三卫、班直、宿卫、忠佐、忠锐将兵，神武右军、中军，七万二千八百余人，共支钱二百三十一万余缗；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王玠四军，十二万一千六百余人，共支钱二十八万余缗”。^②总计正规军有近20万人。此时，已形成吴玠、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五支实力雄厚的大军。此外，杨沂中和王彦两军也有一定的实力。

南宋军队数量增加的同时，军队武器装备的水平也不断在提高。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军器手工业工匠随宋廷南迁临安。于是，南宋以开封迁来的军器手工业为基础，建立了御前军器所，负责管理和制造军器，尤其大力研制发展火药武器。绍兴元年（1131年）以后，南宋军器制造，每年达340多万件，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

南宋国力的增强，为以后挫败金军的进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金调整战略

金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新建的南宋，为此发动三次大规模的攻宋战争，目的并没有达到。金全面进攻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金战略指导的失误。

金在占领两河之后，战略形势对其十分有利。此时，金的正确战略部署应当是：进一步控制和巩固两淮地区，使之成为进攻南宋的前进基地，而后采取自北向南逐步推进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已不是仅仅依赖军事即可一蹴而就，需要的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协调一致。但是，金朝统治者自恃军力强盛，而忽视了政治和经济的作用。

^① 《要录》卷六十八，第1155页。

^② 《要录》卷八十，第1309页。

金初占中原，获得许多城邑、土地和民众。总结历史经验，采取积极可行的办法，以招徕民众，恢复生产，为以后的战争发挥经济潜力和解决兵源问题十分重要。然而“所为经画纷纷然”^①，却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金太宗后期，也曾遣使分路劝农，以恢复农业生产，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金朝统治者不是由封建地主集团所组成，而是由推行奴隶制度的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所组成。因此，他们不懂得进一步吸取汉制，对女真奴隶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之与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中原汉族封建经济相适应。由于金对占领区的不断掳掠，甚至变农民为奴隶，破坏了中原地区经济的正常发展。金太宗对此也有所觉察，曾于天会七年（1129年）颁布诏书说：“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② 试图改变掳掠汉族百姓为奴的现象，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金军不仅遇到南宋军民的强烈抵抗，而且也引起其统治区内民众的反对，其军事行动受到牵制，有后顾之忧。

政治和经济不能实行必要的改革，从而限制和影响金朝军事力量的有效发挥。金在漫长战线实施全线进攻，兵力不敷分配，后援不足，无法从占领区得到必要的补充。攻入两淮后，并未以此为基地，利用河、海、港、湖等作为建设或训练水师的场所，组建起一支强有力的水师。仍保持传统的骑兵远程出击的战术，结果在江、淮水系纵横的环境下，骑兵长技难以发挥。尽管金主帅完颜宗弼领兵一度突入江南，但到处遭到南宋军民的打击，中原和北方的义军乘金军后方空虚，纷纷出击，使金军处处受到严重威胁。北撤途中，又险些被困死于黄天荡。教训是深刻的。

金第三次攻宋失败后，金统治者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消灭南宋是不可能的。从而不得不调整攻宋的战略部署。尔后，金改全线进攻为重点进攻，在宋金战争的东部战场，暂时采取守势。通过扶植宋朝降官刘豫建立齐国，形成一个以黄河以南到淮河以

① 《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序》，第1030页。

② 《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第1033页。

北的缓冲地带。同时，纵在金多年的秦桧还朝，进行劝降活动，以此瓦解南宋的抗金斗争。金要巩固在华北的统治和争取在宋金战争中握有主动权，陕西五路在战略上至关重要。而金军在陕西战场上一直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相反，宋廷派张浚在川陕指挥抗金，不少金占的城邑，又纷纷换上宋朝的旗帜。因此，金采取东守西攻的战略，即把东部战场的兵力抽出，集中于陕西方面，以夺取陕西五路，而后进占“天府之国”四川，达到既可剪除南宋一臂，又可凭借四川资源进攻南宋的战略目的。南宋自然不能坐视，加强川陕防御，以阻挡金军西进。于是，金宋两军在西部战场上，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第二节 刘豫齐国的建立

一、刘 豫 降 金

刘豫是宋景州阜城（今属河北）人，字彦游，生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祖辈世代务农。“豫少无行，尝盗同舍生白金盂、纱衣。”^①在宋哲宗元符年间，他考取进士。政和二年（1112年），被任命为殿中御史。他因农民出身，且有过劣迹，初登仕途，就有人攻击他，“发其宿丑”。^②任职以后，他多次上疏论述礼制问题，不料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宋徽宗挖苦道：“刘豫河北种田叟，安识礼制？”^③还免去他的殿中侍御史之职，出他为两浙察访。^④直到宋徽宗宣和六年（1125年），北宋灭亡的前两年，他才被召回朝，判国子监，不久又除河北提刑。这不能不使心胸狭隘的刘豫耿耿于怀，“怨望之迹已见”^⑤。

金军南下灭宋，河北首当其冲，刘豫弃官逃到真州（今江苏

①②③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上》，第13793页。

④ 《大金国志》卷三十一《齐国刘豫录》。

⑤ 《会编》卷一百八十一《伪豫传》。

仪真)。南宋建国后，刘豫通过中书侍郎张恣的门路，在建炎二年（1218年）正月，又被起用为济南知府。刘豫不愿意到外有金兵窥视，内有造反民众的山东赴任，请求朝廷改派到长江以南地区的州郡任职。但是，执政大臣对他十分厌恶，坚持不更改任命。刘豫无奈，最后怀着愤懑的心情到济南上任。

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金东路军进入山东。十二月，金军主帅完颜宗弼率主力由东平南攻徐州，遣完颜昌率一支偏师攻济南。在最初的接战中，济南守军曾迫使金军解围后撤。济南城防坚固，如果刘豫充分调动和利用军民抗金的高昂斗志，守住济南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心怀积怨的刘豫，在敌人的利诱之下，决定背宋降金。他先杀害骁将关胜，然后，“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豫缒城纳款”^①。

刘豫降金后，被金朝授命统辖大河以南新得之地，不久又被金朝立为齐国皇帝，从此他死心塌地为金朝卖命。

二、齐国的内政及其军事制度

齐国是继大楚之后，金朝又树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金太宗在诏书中明确地说：“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②当时，金廷在南宋降臣中物色的齐帝人选，除刘豫之外，还有折可求。“众议折可求、刘豫皆可立。”^③力主册立刘豫的是完颜宗翰和完颜昌二人。完颜昌以左监军镇抚山东，得到不少刘豫进献的奇器珍玩。“豫亦使子麟斋重宝阴赂金虏酋长挾辣（挾懒）。 ”^④因此，“挾懒力举刘豫”。^⑤完颜宗翰与刘豫并无特殊关系，他之所

①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上》，第13793页。

② 《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第1760页。

③ 《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④ 杨尧弼：《伪齐录》卷上，藕香零拾本。

⑤ 《金史》卷七十七《完颜昌传》，第1764页。

以推荐刘豫是“恐为挹懒所先”，而“恩归他人”。^①于是完颜宗翰遣谋士高庆裔从大同赶到刘豫的家乡景州（今河北景县）及山东的德州、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平府等地，胁迫当地官吏和居民书写拥戴刘豫的《愿状》，奏明金太宗。金天会八年（1130年）九月，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划山东、河南、陕西为大齐国的辖区，齐国立都大名府，建元阜昌。

刘豫称帝后，随之的一套制度也建立起来。齐国先后设置三京，以大名为北京，升东平府为东京，以宋东京为汴京，取消宋南京，改为归德府。朝中设三省六部，刘豫任命一批南宋降臣和家人亲信担任要职。

齐国建立机构的同时，对地方府州设置也进行了调整。阜昌元年（1130年），把中原地区的淮宁、颍昌、顺昌、兴仁、寿春等府降为州。阜昌二年，又对陕甘地区进行了调整，升渭州为平凉府，降庆阳、延安府为州。齐对州一级官员的配备也极为重视，选派曾任州事的人充任，或由朝臣兼任。州以下建置仍采用宋县、乡旧制。乡以下采取寨保制度，“依仿金国法，乡各为寨，推土豪为寨长”^②。并采取“五家为保”的办法，以便于控制居民。

在政治制度建立的同时，还逐步制定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政策。检括民田，实行“什一税法”^③。这种纳税方法取自“古人助法”，以期达到“乐岁输多，歉岁寡取”。^④但是，实施起来问题颇多。“豫以什一税，名为古法，其实哀敛，而刑法严急，吏胥缘为暴。”反而使老百姓“益穷困，陷罪者众，境内苦之。”^⑤以后在右丞相张孝纯和范巽、李上达等朝臣的反对之下，刘豫才同意改为“五等税法”，但“民犹以为重”。^⑥齐国的税收相当大的部分用于军备。

① 《会编》卷一百四十一《金虏节要》。

② 《大金国志》卷三十一《齐国刘豫录》。

③ 杨尧弼：《伪齐录》卷上。

④ 《金史》卷九十二《李上达传》，第2034、2035页。

⑤⑥ 《金史》卷一百五《范拱传》，第2313页。

齐国税收极繁，“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蔬果”。^①即使百姓的菜地、果园也要每年“三季输税”^②。民间“房缙以十分为率，五厘纳官”。^③甚至庭院内种菜也要纳税。同时还实行人头税，“四民凡含齿戴发，上至耆老，下至髫髻，微至昌优，无日不纳官钱。”^④齐国人民在纳税和“供贍射士”的压迫下生活十分艰难困苦。

刘豫还铸造货币，发行阜昌元宝、阜昌通宝、阜昌重宝；制定法律，发布《诸律刑统疏议》、《阜昌敕法格式》等，并开科取士，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日臻完备。

齐国军队的核心主要是由刘豫家乡景州和济南、东平、大名等四郡招募的青壮组成，人数有6000人。^⑤以后，又建立了兵役制度，在齐国统治区域内广泛征兵。如“将山东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签发为兵”。^⑥但是，基本上采取“双丁籍为一军”的签军制。^⑦这种兵役制与寨保制相关连。当一户出军后，与其连保的四户，须提供衣甲、武器等费用，由寨长会集，再交送到部队驻地。在城镇也同样实施这种兵役制度。“州县市民亦各籍为伍。”^⑧虽说是两丁抽一，实则单丁也不能逃避兵役。齐兵制规定，“单丁夜巡，双丁上教”。^⑨单丁要在当地担负巡夜的任务，成为维护地方秩序的乡军。齐国为侵南宋，一次“发乡军三十万”^⑩。乡军与经选拔合格的“效果正军”即正规军，成为齐国统治的支柱。

刘豫还建立了一支禁卫军，分翊卫、勋卫、亲卫，统称“三卫”。担任三卫的军官有严格规定，须是齐国境内三代有官职，或者本身有官职的才有资格充任。卫士要经过三个等级，二年可以升一等，六年后经过考试武艺，合格的人方可为军官。

①② 《要录》卷一百二十八，第2078页。

③⑩ 《伪齐录》卷上。

④⑦⑧⑨ 《会编》卷一百八十一《伪豫传》。

⑤ 《大金国志》卷三十一《齐国刘豫录》记：“六千人”，《伪齐录》等作“数千人”。

⑥ 《大金国志》卷六，第103页。

刘豫使军权一直掌握在刘氏家族手中，子刘麟为兵马大总管，弟刘益先后任北京留守和汴京留守，都握有重兵。刘豫还专门建立一支皇子府军，“麟籍乡兵十余万为皇子府十三军”。^①以维护其统治。

齐国建立之后，陆续有南宋治下的游寇、叛军投降刘豫，使齐国的武装力量有所加强。但是，仅靠齐国自身的武装力量还不能与南宋抗衡，齐国各地还驻有大量的金军。

三、金与齐的关系

金太宗在《册大齐皇帝文》中说：“命尔为皇帝，……世修子礼，永贡虔诚”。^②明确地规定了金齐的父子关系。刘豫是金朝树立的傀儡，名为大齐皇帝，实际上是听命于金朝的儿皇帝。

金扶植齐国，目的在于金与南宋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通过齐实现“辟疆保境”，“按兵息民”。^③金在齐国驻有大量的军队，“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④。金驻军既有防御宋军北伐，又有监视齐国的作用。齐国的任何决策，都要经金朝的首肯。“凡军国事，以至赏刑斗讼，毋巨细，申元帅府取决。”^⑤齐国某些重要的州郡，金朝还直接派女真官员控制。“京东诸郡名虽属伪齐，其实权出金人，两路皆以番官副之。”^⑥

身为齐国皇帝的刘豫，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如“临深履薄”^⑦。因此，他惟金朝之命是从，甘当儿皇帝。凡是有可能引起金朝不快的事情一经发生，刘豫处置十分果断。进士邢希载进言遣使

①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传上》，第13796页。

② 《大金吊伐录》卷四《册大齐皇帝文》，守山阁丛书本。

③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传上》，第13800页。

④⑤ 《要录》卷五十三，第937页。

⑥ 《伪齐录》卷下《伪齐宰相张孝纯上大宋书》。

⑦ 《伪齐录》卷上《伪齐僭立赦文》。

密通南宋,或者与西夏结盟。刘豫听罢,立即下令把邢希载押到街市斩首,并在市中张贴榜文说:“上国闻知,与生灵为害不细”^①。

金朝臣僚对刘豫齐国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支持刘豫的是完颜宗翰和高庆裔等人。随着金内部派系斗争加剧以及金朝对宋策略的改变,刘豫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四、宋对齐的策略

在宋疆土之上出现齐国,使南宋统治者感到十分棘手。如果仅仅是刘豫僭立,南宋政府也会采取出兵征讨和口诛笔伐的强烈做法。但是,齐国有强大的金朝势力为后盾,软弱的南宋政府投鼠忌器,竟“以金故,至以大齐名之”^②。实际上是认同了齐国的合法性。南宋不但“待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皇帝。”^③而且优待留在江南的齐国大臣家属。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宋高宗颁旨:“诏存恤张孝纯、郑亿年、李鄴家属,命所在州根刷期以上亲赴行在,候到取旨迁擢。”^④齐国臣僚亲属受到功臣般款待,南宋政府又是慰问救济,又是要擢官升职,家属遇有丧葬等事,宋高宗还要赐予钱物,以示关怀。如绍兴二年(1132年)三月,齐臣郑亿年妻韩氏死于台州,“赐郑亿年家钱千缗”^⑤。南宋政府以德报怨,试图感化金、齐,换取苟安江南的局面。

南宋的感化政策也多少起到了一点作用,齐国丞相张孝纯曾投书宋高宗,表白事齐属迫不得已:“臣及诸驱虏之士出于不得已”^⑥,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并透露刘豫将派刺客暗杀宋君臣的阴

① 《伪齐录》卷下。

② 《要录》卷四十九,第873页。

③ 《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

④ 《要录》卷五十,第892页。

⑤ 《要录》卷五十二,第921页。

⑥ 《伪齐录》卷下《伪齐宰相张孝纯上大宋书》。

谋。其目的不过是鼠首两端，留一条后路而已。总体上看，南宋的怀柔感化政策没有多大成效。

齐国对宋朝的怀柔政策并不感恩戴德，相反，更加变本加厉招揽南宋叛臣降将，诱胁江南军民。甚至在宿州等地设立招受司，从事策反活动。齐国的做法收效甚巨，如受宋军追剿的流寇李成部、蕲黄镇抚使孔彦舟、流寇刘忠、文人施宜生等，先后投依齐国，被委任要职。甚至宋御营忠锐第八将徐文，也以所部战船 60 余艘，军兵 4300 多人降于齐，被齐国授以海道总管，对宋朝威胁很大。

宋朝在齐国“招徕人士诱以官，日以倾我为事”^①的情况下，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付措施。南宋主要采取的对策是派人到齐国境内活动，“募人往京东、河南伺察金、齐动止，仍斋诏慰抚忠义保聚之人”^②。同时，派遣使臣秘藏蜡书诏旨，往淮宁、蔡州等地寻找刺客进行暗杀活动。南宋还针对齐国的诱叛政策，对齐国上层人士进行策反。宋丞相吕颐浩曾暗中策动齐应天府知府凌唐佐起义，后事情暴露，凌唐佐被刘豫所杀。对齐国民间士人也进行招纳，南宋政府指示刘光世“招纳蕃汉及淮北人民，来归者不绝”。^③ 河南镇抚使翟兴也联络河东、北结寨自保的反金武装。

随着南宋军事力量的增强，宋知枢密院事张浚在绍兴六年（1136 年）十二月，提出发兵取河南，擒获刘豫父子，灭亡齐国。但是，当时的丞相赵鼎不同意张浚的建议，认为刘豫父子不过几上之肉，主要背后有金朝支持。即使擒灭刘豫得到河南地区，也难保金军不出兵。^④ 因此，在齐没有大的举动之前，宋对金一直采

① 廖刚：《高峰文集》卷一，四库珍本初集本。

② 《宋史》卷二十六《高宗纪三》，第 490 页。

③ 《会编》卷一百五十一炎兴下帙五十一。

④ 《要录》卷一百七，第 1738、1739 页；《宋史》卷三百六十《赵鼎传》，第 11291 页。

取被动应付的态度。^①

第三节 金对川陕的重点进攻及其失败

一、富平之战

自建炎四年（1130年）春季，金军退回江北以后，昔日争夺激烈的京西、两淮、山东等战场，也渐趋于平静状态。但是，息兵不足半年，转而在西北战场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事。这是宋、金开战以来，南宋军队首次主动组织的一次会战，对后来金、宋相持阶段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

建炎四年（1130年）夏季，金东部战场上的完颜昌部向驻留淮南的完颜宗弼部靠拢，大有再次渡江南犯的态势。宋廷害怕金军卷土重来，指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在陕西发动攻势，以转移金军的视线，减轻江南的压力。张浚认为：“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②既可前控六路（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又是守可屏四川，攻可取河南、河东。故战前即治兵汉中，军势颇盛。张浚受命后，急于转守为攻。将军曲端等认为：出兵平原旷野，利于金骑兵驰突，难与争锋，主张“精练士卒，按兵据险”^③，待金军粮尽兵疲，伺隙出击。张浚未听，即调集秦川五路（即秦凤路、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和熙河路）兵

① 关于金、宋与齐的关系，参阅（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三）《刘豫の齐国を中心としてみた金宋交渉》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67年4月版。

② 《要录》卷二十八，第563页。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曲端传》，《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高宗建炎四年。

马，扬言消灭陕西金军，“一扫金人尽净”^①。初期，宋军一连打了几个胜仗，赵哲收复鄜州（今陕西富县），吴玠收复长安（今陕西西安），许多金占州县军民也起义响应，回归宋朝。

宋军在陕西的行动震动金朝，金太宗召开御前会议。取得“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的一致意见后，^② 命完颜宗弼率 2 万精兵赶赴陕西战场，与攻陕的娄室会合，又委派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前往陕西指挥作战。

建炎四年九月，张浚调骑兵 6 万，步兵 12 万集结于耀州富平县（今属陕西），军需物品堆积如山。张浚洋洋自得，认为此战必能克敌至胜，甚至可以“径入幽燕”^③。这时，金军完颜宗弼部已进至据富平 40 里的下邽（今属陕西），而娄室部远在 600 里的绥德军（今陕西绥德）。张浚拒绝诸将提出的突袭下邽金军的建议，而是多次派人下战书约定会战日期。因此，贻误战机，使娄室军迅速赶到前敌，与完颜宗弼军会合，完成战前准备工作。张浚错误认为，金军拖延不战是出于畏惧宋军的声威。于是张榜军前云：有能活捉娄室者，“虽白身亦授节度使，赏银皆万计”。^④用意是刺激金军会战。娄室针锋相对也在军前贴出榜文：“有能生致张浚者，赏驴一头，布一匹。”^⑤对张浚极为蔑视。

战役开始后，金军分为左右两翼向宋军发起进攻。完颜宗弼领左翼军从东面杀入宋阵，^⑥陷于宋军重围，大将韩常也被宋军射中一目。金左翼军拼死苦战才突破重围，向后退却。娄室率金右翼负责从北面进攻宋军。北面地形比较复杂，一片芦苇塘成为宋军的屏障，不利于金骑兵行动。娄室挑选 3000 骑兵为先锋军，用柴土垫路，悄悄逼近宋军外围担任支前的乡民小寨，突然发动攻

①③④⑤ 《会编》卷一百四十二炎兴下帙四十二。

② 《金史》卷十九《世纪补·睿宗》，第 409 页。

⑥ 关于金军左右翼统帅，《金史》卷七十二《娄室传》作：“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已右翼力战”。卷十九《世纪补·睿宗》云：“娄室为左翼，宗弼为右翼”。今取《娄室传》之说。

击，乡民惊恐奔逃，冲入宋军营寨，引起宋军的混乱，环庆路经略使赵哲率先溃逃，其他四路宋军也随后溃散。金军大获全胜，“所获军资不可计”。^①

富平之战后，张浚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招集散亡，仍有10余万。于是分遣吴玠守大散关和尚原，阻挡金军来路；关师古领熙河兵屯驻岷州大潭；孙握、贾世方等收集泾原、凤翔驻兵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北）三州，以保障四川安全。

富平之战是以少胜多的一次战役，几万金军打败了近20万宋军，这在历代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宋军败北的原因主要是五路军马缺乏会战的经验，战前临时集兵，部署未完，互不协调，拘泥于“约日会战”。而金军，故意示怯，以骄其气，拖延约战日期，先行攻击。正如娄室战前评论宋军所说：“人虽多，营壁不固，千疮万孔，极易破耳。”^②

富平之战后，陕西地区为金军占领，并划归刘豫的大齐所管辖。从此，西线宋军无力东进，金朝控制的河东地区更加稳固。

二、和尚原之战

金军在陕西初定之后，企图沿秦岭进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但是，金军在和尚原遭到了宋军的顽强阻击，未能入川。

绍兴元年（1131年），金宋两军先后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进行了两次激战。绍兴元年五月，金军骑兵数万分两路向和尚原推进：一路由金将没立率领自凤翔西攻箭筈关（今陕西千阳西南），南下至和尚原；一路由乌鲁折合率自阶、成出散关，攻和尚原。乌鲁折合率部先期抵达和尚原，立即列阵北山向宋军挑战。

据守和尚原的宋将是吴玠。自富平失利后，吴玠收集散兵，扎

① 《要录》卷三十七，第712页。

② 《会编》卷一百四十二炎兴下帙四十二。

营和尚原，修筑工事，积聚粮食，训练士兵，准备在此死守。有人劝他放弃和尚原退到汉中，他拒绝了这一消极的建议，指出，和尚原地位十分重要，守住和尚原，“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蹶其后，是所以保蜀也。”^①以后的事实说明，吴玠的做法是正确的。金军不惜重兵攻击和尚原目的也正是如此。

战斗开始以后，吴玠对敌采用的是疲劳战术。首先，命令诸将坚守住阵地，在营垒巩固之后，指挥将士轮番出战，交替休息。金军骑兵在狭谷石多的山地上作战，机动灵活的战术不能发挥，只得下马步战。四次交战宋军全胜，金军败走黄牛岭，等待没立部金军的到来。

没立率领的另一路金军迟迟未到，是在箭箬关遇到宋军阻截。吴玠派兵一部把没立部挡在箭箬关外，使其不能如期到达和尚原与乌鲁折合会师。吴玠才能全力对付乌鲁折合部。乌鲁折合等不到没立，借大风雨天，率军狼狈逃回凤翔。金第一次攻和尚原宣告失败。

绍兴元年十月，金朝决定再次攻和尚原。这时，长期经营陕西的娄室已病死，于是完颜宗弼独自统帅金军攻和尚原。完颜宗弼领兵号称10余万，自宝鸡南攻和尚原。这一次金军吸取上次失利的教训，结连珠营，垒石为城，以保障补给线畅通。此法果然奏效，金军顺利到达和尚原。吴玠也早有准备，挑选善使硬弓的射手，猛射金军，“连发不绝，繁如雨注”^②。金军抵挡不住“驻队矢”的威力，队伍稍稍向后移动。吴玠抓住时机，发兵从旁边冲击，断绝了金军的粮道。完颜宗弼见补给线被截断，不敢恋战，指挥金军撤退。吴玠派人抄近路赶到金军前面，在金军必经之路的神垆设伏。夜晚，金军行至神垆，宋军伏兵大起，金兵大乱，宋军乘势猛攻，金军大败，死伤无数。完颜宗弼也身中二箭，丢下残兵败将只身逃走。宋军杀死和俘虏金军将士数以万计。^③吴玠也

①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第11410页。

③ 《要录》卷四十八，第862页。

由于两次打败金军，升任镇西军节度使。

宋军在和尚原两败金军并非出于侥幸，而是具备了胜利的条件。

第一，将士同仇敌忾。富平失败后，吴玠收集了一支数千人的残兵败将，得不到朝廷的消息，士气低落，甚至有人要劫持吴玠、吴玠兄弟北走。面对“朝问隔绝，人无固志”，^①危机四伏的局面，吴玠不是靠严刑重典镇慑部下，而是与将士歃血为盟，以忠义爱国的道理激发将士的爱国之心，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将士皆感泣，愿为用。”将士一心，同仇敌忾，是克敌致胜的首要条件。

第二，民众的支持。吴玠率军驻守和尚原受到附近民众的支援，连金军占领区凤翔的百姓也“相与夜输刍助之”。吴玠对于百姓送来的物资，不是无偿占有，而是回偿以银币。这使百姓很高兴，于是“输者益多”。金军为截断民众与吴玠军队的联系，实行连坐法，甚至设伏渭河旁截杀送粮的人。但是仍无济于事，“民冒禁如故”^②。民众的支持是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第三，军事部署的正确。吴玠转战陕西多年，对山地战有一定的经验。在富平之战时就曾向张浚建言：利用地势，“宜择高阜据之”^③。可惜未被张浚所采纳。但是，可以从中看到他的军事才能。他所指挥的两次和尚原之战都是利用山地地形特点，居高建立起一个巩固阵地，然后封锁住隘路，从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三、饶风关和仙人关之战

绍兴二年（1132年），金军吸取两败和尚原的教训，以撒离喝取代完颜宗弼指挥金军，采取迂回进攻的战术。撒里喝一军西入仙人关（陕西略阳、甘肃徽县境）、熙河地区，牵制吴玠部；自领主力避开和尚原，由长安进攻商州（今属陕西）。绍兴三年（1133

①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

②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第11409、11410页。

年)正月,进至上津(今属湖北)的金军又西攻洵阳(今陕西旬阳),击败宋将王彦部,继续沿汉水西进,占领金州(今陕西安康),兵锋指向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①宋兴元知府刘子羽一面派部将田晟据守饶风关,一面向吴玠求援。吴玠留吴玠把守和尚原,亲自率部数千人日夜奔驰300里,及时赶到饶风关与金军对垒。金军身披重甲,从山下向上仰攻,采用三人一组的编队,一人在前冲锋,二人随后保护,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补充。吴玠军弓弩齐发,大石狠砸,激战六天六夜,敌人横尸漫山遍野,仍猛攻不退。吴玠决定采用攻守结合战术,招募5000人组成敢死队,准备夹击敌人。不料,有一名小校叛降金军,引领金军走小路绕到关后,居高临下攻击宋军,吴玠抵挡不住败退西县(今陕西勉县西)。金军乘势攻入兴元(今陕西汉中),刘子羽退入潭毒山。金军虽然在饶风山之战取胜,但是也损失惨重,伤亡过半。四月间,放弃兴元北撤,在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南)遭到吴玠军邀击,“堕涧死者以千计,尽弃輜重”,^②退回凤翔。

饶风关战后,吴玠感到宋军防线过长,和尚原远离四川运输困难,决意放弃和尚原,全力经营仙人关防线。于是,下令吴玠从和尚原转军到仙人关右,修筑营垒,称“杀金坪”,作好迎敌的准备。金军于当年十一月占领和尚原。

绍兴四年(1134年)二月,金军在川陕战场上又发动了一次攻势。此次金军“决意入蜀”。^③金对组织这次战役十分重视,派出完颜宗弼、撒离喝、韩常等名将,并纠集齐国将领刘夔,统领金、齐联军10万人,^④杀奔仙人关。面对强盛的金军,宋军毫无畏惧,严阵以待。吴玠派1万宋军把守仙人关,^⑤担负正面阻击敌军;主要兵力在杀金坪筑起两道防线。金军先集中兵力攻杀金坪,

① 见《会编》卷一百五十五炎兴下帙五十五。

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

③ 《要录》卷七十四,第1221页。

④⑤ 关于金、宋两军人数,见《要录》卷七十三,第1215、1216页。

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宋军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军身披重甲鱼贯而上，吴玠和将士死战，箭发如雨，金军冒死前进，西北箭楼几次濒危，但均被宋军顽强守住。吴玠抓住时机，派大将田晟带一支精兵，手执长刀大斧攻左右翼，挫伤敌军锐气。夜间，激战一天的金军刚要休息，宋军在四面山上点火，敲起战鼓，乘夜冲出营垒，宋右军统领王喜、王武等各领一军杀入敌营，金军惊溃，韩常也被射中一箭，金军败走。右军统制张彦领一军劫横山寨成功，斩首千余级。统制官王俊奉命埋伏在河池负责切断金军归路，又对败退的金军截杀一阵，金军大败退回凤翔。从此，金军不敢再窥四川。

金宋川陕争夺战后，吴玠于当年四月又乘胜收复了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秦州（今甘肃天水）、陇州（今陕西陇县）。于是南宋川陕防务更趋于巩固，金军控制长江上游、迂回南下的战略遭到失败。

1130年富平之战后，金军轮番在川陕地区发动重点进攻，历时3年多，但最终失败结束。金军的失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未能乘胜而进，丧失有利战机。金军于富平之战大败宋秦川五路兵马，本应乘宋军溃散，一举夺取战略要点，控制入川之路。然而，在富平之战后的半年之久，金军并没有进一步发动大的攻势，任凭宋收拾残军，退守和控制要点。金军不及时发动攻势有其客观原因。富平之战期间，金朝皇位继承人、谥班勃极烈、都元帅完颜杲病死。^①接着，带病参加富平之战的金军重要将领娄室也于战后病死。^②杲与娄室，一为都元帅，一为长期经略陕西的主要将领，二人之死对金军事行动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直到第一次和尚原之战，金也仅派没立和乌鲁折合两员末将领兵作战。

① 《金史》卷三《太宗纪》，《金史》卷七十六《完颜杲传》。

② 《金史》卷三《太宗纪》，《金史》卷七十二《娄室传》：“时娄室已有疾，睿宗与张浚战于富平，……娄室以右翼力战”。

二是缺乏山地作战的经验，失误于一味采取强攻的战术。金军长于平原野战，进攻川陕金军骑兵面对山高谷狭的地形，丧失其机动灵活的特点，不但行动缓慢，而且常常被迫下马步战。在宋军占有地利严阵以待的情况下，金军仍采用单调的强攻战术，而造成损兵折将的结局。

第四节 岳飞经略荆襄及宋齐之战

一、岳飞经略荆襄和岳家军

当川陕战场激烈进行之际，刘豫乘机进兵荆襄地区。

绍兴三年（1133年）冬，刘豫乘宋朝注意力集中于川陕，荆襄地区防务空虚之际，发兵进占邓州（今属河南）、随州（今属湖北）、襄阳（今湖北襄樊）、郢州（今湖北钟祥）等地，把南宋江汉防线撕开一道缺口。这样，齐国既可以切断南宋朝廷与川陕联系的通道、策应进攻川陕的金军，又可以威胁荆南、窥伺淮甸。刘豫准备在第二年麦熟季节大举南攻。他派使者潜入洞庭湖地区，策动杨么农民起义军配合作战，企图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占荆湖地区。

南宋方面对于齐国的军事行动十分重视，君臣多次商讨对策。丞相朱胜非说：“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①朱胜非对襄阳战略地位的分析及收复襄阳的提议，立即被采纳；经过研究，把收复襄阳的重任交给了岳飞。^②

岳飞（1103～1142），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北宋末年投军，参加过燕京之战。靖康元年（1126年）十

① 《要录》卷七十五，第1241页。

② 关于岳飞事迹，参阅邓广铭《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二月，岳飞在相州加入赵构建立的大元帅府军队，上书要求抗金，以“越职”罪，被革职驱逐。在热切的杀敌卫国之心驱使下，他投奔河北招抚使张所，任中军统领，不久升任统制。从河北转战江南，先后参加过大小数十次战斗，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将领。绍兴二、三年间，岳飞部下已有 2.3 万到 2.4 万，人数仅次于当时最负盛名的将领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的军队。由于岳飞治军严明，军队英勇善战，特别是在当时军风军纪普遍败坏的情况下，他提出“冻杀不拆屋，饿杀不虏掠”的口号，深得民心，人民亲切地称岳飞的军队为“岳家军”。

岳飞早有收复襄阳六郡北伐中原的志向，为此曾上书宋高宗说：“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然后，以襄阳为基地，连结河朔，乘其不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他任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后，绍兴四年四月，率军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沿江向西北挺进。五月，自鄂州（今湖北武昌）渡江，直指郢州（今湖北钟祥）。岳飞在渡江时发出誓言：“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① 表现出一个军事家所具有的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

二、岳飞第一次北伐

（见附图 4）

岳飞收复襄阳六郡，率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郢州。绍兴四年（1134 年）五月五日，岳飞的军队抵达郢州。齐国驻守郢州的将领是荆超，他原是北宋“班直”，作战勇猛彪悍，号称“万人敌”。荆超在郢州有军队 1 万多人，企图利用城防工事死守，以阻扼宋军北进。岳飞在派张宪劝降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发动攻击。经过一天的激战，攻占郢州城，荆超兵败投崖自杀。这一仗歼敌 7000

^① 以上引文见岳珂：《金佗粹编》卷二十一《鄂王传》。

人，岳飞也险些被敌人炮石击中。

首战告捷后，岳飞分兵两路：张宪率一军向东北攻随州（今属湖北），岳飞自率主力往西北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守襄阳的齐国将领李成，原是被岳家军击败逃奔齐国的流寇头目，不敢接战，弃城而逃。五月中旬，岳飞占领襄阳；张宪也在牛皋的支援下收复随州。^①

齐国连失三郡，企图反扑。六月初，在襄阳东北和随州的枣阳县（今属湖北）以及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两州集结军队。这支号称30万人的军队，主要以李成部队为主，加上部分金驻军及两河签军，企图夺回襄阳。

岳飞因情制定了破敌方案：先以少数军队作诱饵，待敌深入后，进行前后夹击。齐军在岳飞与担任诱敌的别将王万的夹击下，大败而逃。此战，宋军受命诱敌的两位将领之一的荆南镇抚司统制辛太临阵脱逃，幸而没有影响全局。

齐军第一次反扑失败后，七月中旬，再次集结军队进行反扑，金朝也派刘合李董统领一支金军协同齐军作战。这支金、齐联军有数万人，由刘合李董和李成率领，“聚于邓州西北，扎三十余寨”^②。

岳飞正准备进兵会战之时，连接宋廷圣旨，让岳飞措置已得的三郡，“大军回就鄂州歇泊”^③。岳飞不愿半途而废，仍按朝廷收复襄阳六郡的旨意，进行部署。他派部将王贵领一路军经光化（今湖北光化北），张宪领一路军出横林，两军进逼邓州，正面与金、齐联军作战；又派王万、董先两军突袭敌营。联军几面受敌，支持不住，四散奔逃，一部分军兵退入邓州闭门死守。岳家军冒着矢石，乘胜攻克邓州。随后，唐州、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也

① 参见《会编》卷一百五十五炎兴下帙五十五，《要录》卷六十九，《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

② 《金佗稗编》卷十六《邓州捷奏》。

③ 《金佗稗编》卷六《照会措置防守已收复州郡省札》。

相继收复。自此，襄阳等六州全部收复。岳飞第一次北伐按预定计划胜利完成。

这次北伐的胜利，除岳飞的指挥正确和岳家军作战英勇之外，朝廷的支持也是取胜的重要条件。首先在人员的配备上给予岳飞支持，把湖北路安抚使司的两军和荆南镇抚司的兵马拨归岳飞节制，同意齐国起义将领牛皋、董先部并归岳家军，下令刘光世派兵予以增援。据统计，岳飞这次北伐直接动用兵力约 3.5 万人。其次，朝廷在物质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调拨米 6 万石，钱 40 万贯作为军需，另外还拿出 20 万贯钱以犒赏三军。这更使岳家军如虎添翼。

襄汉之战后，岳飞没有继续挥师北上，而是留军把守襄阳六郡，自领主力回到鄂州。这是遵照朝廷旨意：出兵仅限于收复襄汉六郡，“不得辄出上件州军界分”，不得“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如有违背，“虽立奇功，必加尔罚”。^①岳飞不敢违令，于是按计划撤军。尽管如此，收复襄汉六郡意义是重大的。

三、金、齐联军南攻与宋军的防御

金军受挫于陕川，岳飞收复襄邓，引起金朝统治者的震动。在刘豫“假兵五万，下两淮”的请求之下，^②金朝决定出兵配合齐军攻宋。

绍兴四年（1134 年）九月，金任命完颜宗辅为左副元帅、完颜昌（挾懒）为右副元帅、完颜宗弼为前军统帅，征调渤海、汉军 5 万以及大量的河北、河东签军，以配合刘麟率领的齐军南下攻宋。战前，金、齐联军首脑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避开实力较强的岳家军襄邓防区和西线吴玠的战区，沿汴河南攻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兵渡淮河，占领盱眙（今属江苏）；然后分兵迅速

① 《金佗粹编》卷一。

② 以下引文见《要录》卷八十，第 1131~1133 页。

南下取滁（今安徽滁州）、和（今安徽和县）、扬（今江苏扬州）三州。在装备战舰之后，分两路渡江，一路自采石渡江攻建康（今江苏南京），一路自瓜洲渡江攻京口。另派东路军攻掠海（今江苏连云港）、楚（今江苏淮安）二州，策应渡江金军。

宋朝得到金、齐军南下的消息后，“举朝震恐”。有人建议宋高宗分散百司，远遁避敌。宰相赵鼎力主迎敌，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于是南宋政府开始部署迎敌。宋采取的对策是加强东南地区的防御。以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三将，领本部军兵分守采石、马家渡等地，江西沿江制置使王玠驻军江州，加上杨沂中的神武中军，南宋在这一地区部署兵力达16万多人。

九月末，金齐兵分道渡淮，楚州守将樊序弃城而逃，金军占领楚州。韩世忠部不战而从承州退到镇江。十月，宋高宗诏令韩世忠还军扬州。同时，命张俊率部往援韩世忠，刘光世部移驻建康，以阻止金齐军南下，宋高宗一面扬言：“亲统六军，往临大江，决于一战”^①。一面又派遣魏良臣等向金军求和，表示“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②要求使臣答应金军提出的任何条件。韩世忠领军还至江北后，乘金军不备，在扬州西北的大仪镇，伏击金军骑兵一部；部将董旼又于天长县境鸦口桥、前军统制解元也于承州击败金军一部。宋军虽然打了几个小胜仗，但并没有能扭转整个战局。

十一月，金军占领滁州，宋军放弃江北防线，退至江南。韩世忠部退守镇江，张俊部退守常州，刘光世部守建康，组成长江下游防线，以阻挡敌军；又抽调岳飞军增援淮西，以牵制淮东金军。张浚临危受命，以知枢密院事担负全军指挥之责。十一月底，淮西形势出现转机，淮西将领王帅晟、张琦收复南寿春府（今安徽寿春），俘虏齐知府王靖。十二月中旬，徐庆和牛皋率岳家军先头部队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击败金、齐联军，完成牵制敌军的任务。

① 《要录》卷八十一，第1321页。

② 《会编》卷一百六十一炎兴下帙六十一。

完颜宗弼部金军进至滁州（今安徽滁县）后，陷入困境，40余天军事上毫无进展。前有宋军的重兵和长江拦阻，侧翼又受到岳飞军的威胁，虽然“于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①，但想出其不意克敌致胜，已不可能。滁州储备缺乏，时至岁末严寒，雨雪交加，造成金军粮道不通，给养不济，野无所掠，只能杀马以食。恶劣的环境，引起士兵怨愤，甚至有汉人签军给金将投送匿名信件，说：“我曹被驱至此，若过江，必擒尔辈以献南朝”^②。十二月末，当金太宗病危的消息传到军前，金军不敢再停留，连夜撤兵。齐军主帅刘麟接到金军命令，立即抛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300多里，至宿州（今安徽宿县）方敢稍事休息。

宋军抓住敌军退兵之机，开始组织反击。张俊率军从六合（今属江苏）北上，追击金军。在淮河畔追上殿后的金军，杀敌甚众，俘获金骁将程师回、张延寿。刘光世遣将领郦琼北克光州（今河南潢川），齐知州许约投降。淮东将领崔德明收复盱眙（今属江苏）。金、齐联军南攻计划彻底破灭。

一年以后，张浚还组织过一次北伐，虽然由于准备不足，没有成功。但是，反映南宋在军事上已有一定主动权。

四、岳飞第二次北伐

（见附图4）

绍兴六年（1136年）七、八月间，岳飞又率军进行了第二次北伐齐国之战。

岳飞制定了两路出兵、声东击西的战略。命左军统制牛皋领一偏师，从邓州（今属河南）往东北挺进，以吸引敌军的注意。岳飞的主力部队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向西北进击。

八月初，牛皋部先攻下镇汝军（今河南鲁山一带），擒获齐骁

① 《要录》卷八十二，第1356页。

② 《要录》卷八十三，第1370页。

将薛亨。接着，继续东进，陷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东），而后南下蔡州（今河南汝南），焚烧敌军屯积的粮草器械而还。与此同时，岳飞派王贵、董先、郝晟等率军出邓州，攻占虢州卢氏（今属河南），缴获粮食 15 万石。接着，又分兵取虢略（今河南灵宝）、朱阳（今河南朱阳镇）和栾川（今属河南）。而后迅速西进，占领商州（今属陕西）全境。

商、虢两州属陕西路，为战略要地，北可控扼黄河，东可入洛阳，西可攻关中。宋军控制商、虢，恰似一把钢刀，把齐国辖区一劈两爿。宋廷得战报，下诏嘉奖岳家军说：“遂复商于之地，尽收虢略之城”，“长驱将入于三川，震响傍惊于五路。”^①充分肯定了此役在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岳家军取得商、虢之役胜利后，再分兵取道栾川、西碧潭、太和镇，向东攻伊阳（今河南嵩县）。八月中旬，王贵命副将杨再兴领一军由卢氏向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进攻。杨再兴在业阳击败齐顺州安抚司都统制孙某与后军统制满在率领的数千齐军，在孙洪润击溃齐顺州安抚使张某的 2000 齐军，攻占长水，缴获粮食 2 万石。岳家军又相继攻克永宁（今河南洛宁东北），距西京洛阳仅几十公里。形成“声震河、洛之郊”的态势。^②

岳家军的攻势使齐国大为震惊，一方面调集军队正面与岳家军顽抗，一面派兵深入岳家军后方以牵制宋军。八月底，两股齐军进至德安府应山县（今属湖北）和邓州高安镇，造成夹击岳家军襄阳基地的态势，以逼迫岳家军撤军。岳飞审时度势，决定班师。班师的主要原因还是后方供应匮乏，军需不足。“敌强兵少，钱粮不继，已勾回干事军马。”^③

岳飞撤军后，齐军随后重得镇汝军、顺州四县等地。商州全境和虢州大部分地区仍被宋军控制，宋廷任命邵隆为商州知州，

① 《金佗续编》卷三《复商虢二州及伪镇汝军抚问诏》。

② 同上《辞免起复太尉仍加食邑不允诏》。

③ 李纲：《梁溪全集》卷九十《乞拨那军马奏状》。

“披荆棘，立官府，招徕离散，各得其心。”^① 商州遂成要塞。

岳飞第二次北伐，是南宋立国后较大规模的一次战略反攻。李纲曾评论此战为“十余年来所未曾有”^②，但其他各路宋军缺乏积极配合。

第五节 齐国的灭亡

一、内 外 交 困

齐国能够存在主要是靠两个条件：一是金朝的支持。二是南宋的衰弱。但是，随着金朝统治阶级内部对齐政策的变化和南宋军事力量的逐步增强，齐国的处境极其艰难。

1134年，金、齐联军攻宋的失败，齐国在军事上从此一蹶不振。与军事形势相比，齐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更加不妙。

齐国立国已有六七年，因治国者的无能，加上战火不绝，水旱频频，使齐民的经济生活十分困苦。粮食和布帛等基本生活用品奇缺，“山东艰食而帛踊贵，商人多市江浙米帛”^③。“人民相食”^④，史不绝书。经济本来已是很困难，为给金朝进贡，还要横征暴敛。“逆豫方行什一税法，聚以资敌”。^⑤ 结果“境内苦之”^⑥，更加民不聊生。

齐从金朝得不到资助，只能通过与南宋的贸易来缓解缺粮少

① 《会编》卷一百七十炎兴下帙七十。

② 《梁溪全集》卷一百二十八《与岳少保第二书》。

③ 《要录》卷五十二，第919页。参见同书卷三十五建炎四年七月己未：“时海、密诸州米麦贵踊”。卷三十六建炎四年八月壬申：“山东米麦踊贵”等记载。

④ 《大金国志》卷五《太宗纪五》、卷六《太宗纪六》。

⑤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二。

⑥ 《金史》卷一百五《范拱传》，第2313页。

帛的局面。初期，“刘豫置榷场，通南北之货”，^① 受到南宋响应，宰相吕颐浩“亦以为便，乃奏通商估”^②。齐、宋先后在宿州、泗州、濠州、庐州、寿春府等地置市易务以及“于沿海诸州置通物场”^③。南北互通有无，对两方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互为敌国，相互戒备，榷场时常被关闭，从而影响正常发展贸易。民间私下交易，也经常因为军事原因被禁止。南宋屡次发布禁令，“不许透漏海舟出界”^④，限制民间商人前往北方贸易。并采取“五家为一保”^⑤，以“补承信郎，赏钱三千缗”，来重赏举报人，“犯者依军法，巡捕官失察者抵罪”^⑥等措施，限制江南米帛及军用物资流入北方。虽有私下贸易，但是往日那种“南海巨艘大舶首尾连属，过山东沿海州军贩卖者不可胜计”的现象^⑦，已不复见。加之，刘豫担心宋军“乘风北济”，于绍兴六年（1136年），“罢沿海互市”，^⑧海上商道被明令禁止。结果，齐国经济更加困难。

齐国军事上的失利和经济上的困难，直接影响了政治的稳定。刘豫手下官员多数是原宋朝旧臣，与南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齐国日暮途穷，使这部分人大多不愿意再为刘豫卖命，向南宋通报齐国消息和伺机叛齐归宋的也大有人在。刘豫依靠儿子刘麟、侄子刘猊掌握军权，才能勉强控制局面。但是，随着金朝对齐政策的变化，刘豫的统治难以维持了。

刘豫在金朝的支持者主要是金太宗、完颜宗翰和高庆裔三人，“豫之立也，高庆裔推之，粘罕主之，虜主吴乞买从之。”^⑨ 金太宗吴乞买于天会十三年正月病死，完颜宗翰和高庆裔也失去金熙宗信任。刘豫过去“知恩出三人，又三人虜之最用事者，豫每岁厚有馈献，蔑视其他酋长，故余者无不憾之。”^⑩ 金太宗死后，金熙宗

①② 《会编》卷一百四十九炎兴下帙四十九。

③④⑤ 《要录》卷八十九，第1491页。

⑥ 《要录》卷五十二，第918页。

⑦⑧ 《伪齐录》卷下。

⑨⑩ 《会编》卷一百八十二引《金虜节要》。

即位。金熙宗和当权的金臣不再信用刘豫，立即调整了与齐国的关系。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诏齐自今称臣勿称子。”^①改父子关系为君臣关系，而有意疏远齐国。第二年的八月，“诏齐国与本朝军民诉讼相关者，文移署年，止用天会”。^②取消齐国年号，为最终取消齐国做准备。当年二月，南宋韩世忠部北伐，兵围淮阳军，刘豫向金朝求援，完颜宗弼统兵增援齐军，击退宋军。九月，刘豫再次向金朝告急时，领三省事完颜宗磐说：“先帝（金太宗）所以立豫者，欲豫辟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进而不能取，又不能守，兵连祸结，愈无休息，从之则豫受其利，败则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尝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许之！”^③把刘豫视为包袱。金朝没有答应派兵攻宋，只派完颜宗弼屯兵濬州黎阳县，观望情势。金对齐政策一变，刘豫齐国难以立足了。

二、出兵攻宋

刘豫向金朝求援不成，决定孤注一掷，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调集齐国军队倾巢而出，试图扭转不利的局面。

齐阜昌七年（1136年）九月，刘豫签军30万，号称70万，分三路大举攻宋。^④刘麟统中路军由寿春府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刘猷领东路军由紫荆关出涡口，攻濠州定远县（今属安徽）；孔彦舟率西路军由光州攻六安（今属安徽）。

刘豫深知，这是决定齐国命运的关键一战。为了配合这次军事行动，齐抽调大批军政要员，加强军事领导机构。刘豫仍以其子刘麟为统帅，加封淮西王。任命主管殿前公事兼开封尹许清臣为诸路兵马大总管，尚书右丞李鄴为行台右丞、讲议军事，户部

①② 《金史》卷四《熙宗纪》，第70～71页。

③ 《要录》卷一百五，第1711页。

④ 参见《要录》卷一百五，第1712页。《会编》卷一百六十九炎兴下帙六十九：签军人数作“二十万”。

侍郎冯长宁为行台户部侍郎兼行军参议。同时，征调熟悉宋朝情况的李成、关师古等宋降将为将领。刘豫为造成金、齐联合作战的假象，命齐国士兵身着金军服装，以迷惑和恐吓宋军。^①

齐军兵指两淮，引起宋朝统治集团的震动。在如何御敌的问题上，宋廷内部出现撤退和迎战两种意见。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对宋齐双方兵力强弱看法不同。宋朝的主力部队是岳家军、韩世忠军、刘光世军以及张俊的军队。这时，岳家军驻守鄂州地区，韩世忠驻防楚州一带，在两淮的宋军只有刘光世军和张俊以及接受张俊指挥的杨存中殿前司军。刘、张、杨三军部署在庐州、盱眙和泗州。刘光世和张俊还未与齐军接战就纷纷告急，请求朝廷派兵增援。刘光世又声称庐州难守，要求撤至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在这种情势下，左相赵鼎与签书枢密折彦质等主张弃淮保江，传檄刘光世、张俊等部队弃淮退守长江，调岳家军火速东援，行在撤回临安（此时宋高宗刚至平江）。^②宋高宗赞同这一战略决策，并亲手书诏，送给在建康督战的右相兼枢密院事张浚。张浚反对撤退，力主迎战，上疏宋高宗，认为弃淮保江，“则无淮南，而长江之险与敌共矣”；岳家军东援之策也不可取，“岳飞一动，襄、汉有警”；皇上回蹕临安会造成“人心解体”；^③探齐南下，仅刘麟淮西军6万。张浚有意缩小齐军人数，以免引起宋高宗恐惧。吏部侍郎都督府参议军事吕祉也支持迎战，在宋高宗榻前再三晓喻“士气当振，贼锋可挫”的道理。^④折彦质见迎战主张占上风后，向宋高宗密奏说：张浚、吕祉是误国的晁错，“异时误国，虽斩晁错以谢天下，亦将何及”。^⑤

宋高宗得知并无金军南下，遂安下心来，转而同意张浚的迎敌意见，下诏迎敌。“诸将始为战计。”^⑥张浚接到宋高宗诏书，立即疾驰采石，对正在撤退的刘光世军下令：“有一人渡江者斩！”^⑦

①⑥ 《会编》卷一百七十《张浚行状》。

②④⑤ 《要录》卷一百六，第1717页。

③⑦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第11304页。

阻止了刘光世军后撤，稳住了宋军的阵脚。于是张浚“奖率师旅，分布要害”。^①刘光世派部将王德、郾琼等出淮西，迎击刘麟的齐中路军。杨沂中部也由泗州进驻濠州，准备迎击齐刘猷的东路军。张浚驻守盱眙防止齐军进入淮东。同时，宋朝任命梁汝嘉和王彦为浙西、淮东沿海制置正、副使，驻军通州（今江苏南通市）附近，防止齐军沿江海袭击平江行在。

齐军恫吓的阴谋未能得逞，兵力不足、战斗力不强、力量分散的弱点，随之暴露出来。十月，刘猷的东路军按预定计划进至定远县，向东南推进，以策应刘麟的中路军，然后从六合（今属江苏）南攻建康。东路军前锋刚进至定远东南的越家坊，与宋杨沂中军相遇，败退藕塘（今安徽滁县西南）。杨沂中率军乘胜随后追击到藕塘。刘猷指挥齐东路军依山列阵，发箭如雨，以阻止宋军攻势。杨沂中命统制吴锡率劲骑5000猛冲敌阵，趁齐军阵乱，指挥宋军从正面发起猛攻，自己带一队精骑绕到齐军侧翼进行攻击。这时，宋江东宣抚司前军统制张宗颜等率领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也加入战斗。齐东路军大败，刘猷仅带数名骑兵逃走，齐军将领李洵、李亨等数十人被宋军俘虏，士卒万余人投降。^②

刘麟率领齐中路军未敢贸然突进，他坐镇顺昌（今安徽阜阳），分别派遣崔皋、贾泽、王遇率军先行渡淮，经寿春南下。齐军与经谢步北上寿春的宋刘光世部将王德、郾琼军相遇，双方接战，齐军受挫；转而围攻寿春城，又被宋寿春守将孙晖趁夜劫寨，齐军多有死伤。刘麟见南攻庐州计划失败，又听到刘猷东路军失败的消息，下令撤军。孔彦舟统领的齐西路军进展更不顺利。首战就遭到宋光州守将王莘有力的狙击而久困于光州城下，当听到两路兵败后，也引兵北撤。

这次战役，宋军缴获齐军“舟数百艘，车数千辆，器甲金帛

① 《会编》卷一百七十引《张浚行状》。

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杨存中传》；《要录》卷一百六，第1721页。

钱米、伪齐钞告敕军须之物，不可胜计”。^①刘豫三路攻宋失败后，引起“北方大恐”。齐国难以生存下去了。

三、刘豫兵败被黜

刘豫攻宋失败，损失惨重，齐国随时都有被南宋灭亡的危险。面对这一形势，使处于政治改革之际的金朝迅速做出反映，“废齐国以省徭赋，柔宋人而息兵戎”，^②决定黜刘废齐。

金朝先借口齐军兵败，遣使问罪。刘豫以刘猊为替罪羊，废刘猊为庶人，丢卒保帅。刘猊是齐国的重要将领，在刘氏家族中地位仅次于刘麟。刘豫驱除刘猊，如同砍掉自己一臂，削弱了刘氏的力量。

齐阜昌七年（1136年）冬天，刘豫得到金朝要废除他的情报，立即派遣皇子府参谋冯长宁使金，请求金朝立淮西王刘麟为太子。刘豫此举是带有试探性的，目的是掌握金朝的真实意图。金熙宗答复说：“先帝所之立尔者，以尔有德于河南之民也。尔子还有德耶？我未之闻也。徐当遣人咨访河南百姓以定之。”^③金熙宗回答得十分巧妙，既回绝了刘豫立太子的要求，又使对方摸不清金朝的意图。

刘豫见立太子不成，又谋划与宋发生冲突，以寻求金朝支持，保住皇位。阜昌八年（1137年）二月，齐国派遣奸细潜入淮河流域和长江沿岸诸州纵火。一时间，宋山阳、仪真、广陵、京口、当涂等地火警不绝。刘光世军驻地当涂郡治起火，“军须帑藏，一夕而尽”。^④太平州录事参军吕应中、当涂丞李致虚也被大火烧死。七月，刘豫以宋军迫近长、淮为由，派户部员外郎韩元英使金，乞

① 《要录》卷一百六，第1721页。

② 《大金集礼》卷四。

③ 《要录》卷一百七，第1750。

④ 《要录》卷一百九，第1763页。

求金朝发兵南攻，又被金朝拒绝。八月，宋监军吕祉处置军中矛盾不当，激起兵变，宋淮西军将领郾琼率所部4万人渡淮投降齐国。^①刘豫大喜过望，急忙又派遣冯长宁使金，以郾琼带来宋要发兵攻齐的消息为由，恳请金朝出兵攻宋。金朝担心刘豫得郾琼军而实力增强，“兵众难制”^②，以防郾琼诈降为名，命令遣散投降的宋军。同时，调动军队乘机以武力解决刘豫。

于是，金军假意答应出兵攻宋，要求齐国人马服从金朝统一指挥。刘豫和刘麟父子欣然从命，并按照金朝的指示，把军队和武器装备及钱粮运到陈、蔡、顺昌、宿、亳之间，集结待命。^③十一月，金朝得知齐国京城汴梁兵力空虚后，派兵向汴梁进发。指挥这次废齐军事行动的是左副元帅完颜昌和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决定先擒掌握齐国军权的刘麟，使齐军群龙无首。完颜昌把军队布置在黄河北岸的武城镇，约刘麟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会面。刘麟率200骑兵渡河，经过武城镇时，被金军骑兵包围俘虏。

金军俘虏刘麟后，完颜宗弼率金军急驰汴梁城。金军先占领城门，登城守卫。完颜宗弼等领兵由东华门进城，经垂拱殿入后宫门，在讲武殿遇见刘豫，把他强行押走，送到金明池囚禁。^④金熙宗下诏，废除齐国，降刘豫为蜀王。^⑤金在齐旧地设立行台尚书省，以张孝纯权行台尚书省左丞相，契丹人萧保寿奴为行台右丞相，完颜宗弼留镇汴京。在金朝的卵翼下，刘豫勉强维持了七年，最终被主子所废除，原齐国军队归属于金朝。

齐国建立之始，即蕴涵着必然灭亡的结局。金扶植傀儡统治中原地区，不过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政策。金灭辽历时十余年，因

① 关于郾琼投齐兵力数，诸书记载互异，有4万、3万、7万等说法，今采用《要录》卷一百十三第1828页所考证的4万之说。

②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传上》，第13801页。

③ 《会编》卷一百八十炎兴下帙八十。

④ 《会编》卷一百八十一炎兴下帙八十一。

⑤ 《伪齐录》卷下《金虏废刘豫诏》。

此可以逐步建立与辽地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金从天会三年（1125年）十二月开始攻宋，到天会四年（1226年）十二月破宋都城汴京，占领中原地区，前后仅一年时间。军事进展之迅速，使金朝统治者无法立刻建立起与中原封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于是，金朝旧制与中原封建关系发生剧烈的冲突。这不仅影响金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而且军事上也难以进一步发展。金统治者企图通过扶植宋朝降臣为傀儡治理中原地区，使金朝政治制度有时间得到相应的调整，最终建立统一政体的目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金太宗先扶植张邦昌建立楚国，以统治中原地区。但是，金撤兵后，张邦昌旋即被宋高宗所杀，楚国亡。金为此又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宋战争，兵锋深入江南。然而，终因灭宋条件尚不成熟被迫退兵。随后，金一面在中原地区继续扶植刘豫建立齐国，一面对金朝的政治制度和军事部署进行调整，为最终灭宋做准备。经过几年的准备，从金太宗晚年的初改定制度，到金熙宗的全面改革政治制度，金朝封建统治制度已经初步确立起来。尽管此时金朝政治制度中还保留不少女真旧制，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金朝封建制确立后，金朝廷直接统治中原地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无论刘豫攻宋的结果如何，齐国灭亡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第八章 南宋反攻与宋金相持局面的形成

金熙宗统治时期，金朝对宋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一味地采用军事行动，转向以和议为主。促使金熙宗改变政策的原因是金朝没有力量迅速灭亡南宋，连年用兵影响了国内政治、经济建设，女真旧的统治方式出现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调整对宋政策势在必行。于是，出现金宋第一次和议。随之，金军在军事上开始了相持阶段。

第一节 金熙宗时期对宋政策

一、金对宋战略的变化

金太宗统治时期，金朝的战略目标是灭亡南宋。为此，金军屡次发动攻宋战争。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金太宗病死，完颜亶即位，是为熙宗。金熙宗即位后，重新调整对宋战略，改灭宋为议和。金对宋战略转变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金朝崛起之初，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上升时期，内部较稳定，统治较巩固，通过对外战争获取的奴隶和财富猛增，使其奴隶制得到迅速发展。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耕地和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往掳掠奴隶的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金实行对降附区平民身份的居民，采取强迫迁往女真内地的做法。如迁徙大批山西州县的汉族居民至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子）及浑河（源出今辽宁清原东龙冈山，西南流会太子河入辽河）地区，原辽中京道的润（今辽宁绥中前所镇）、隰

(今辽宁兴城县西南)、来(今辽宁绥中前卫镇)、迁(今河北山海关)四州民被迁到沈州(今辽宁沈阳)。这种迁居的办法,实际上仍然是变相的掳掠奴隶。由于不断遭到广大农民的反抗,因此无法全面推行。

随着金统治领域的扩展,尤其是占领燕云地区和中原地区后,金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在全国范围推行奴隶制的政策。在金太宗统治后期,已从奴隶制经济转变为奴隶制经济与封建经济并存的格局。除在金朝内地继续实行奴隶制经济之外,在燕云地区和中原地区保留了辽、宋的封建经济关系。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对金朝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地带来影响。这时,金朝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主张接受汉文化进行封建制改革。金熙宗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对金朝旧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金熙宗的改革,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官制。金熙宗废除女真勃极烈辅政制,皇帝以下设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尚书省设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及左、右丞(副相)。尚书令为荣誉之职,实权归于丞相。朝廷设立御史台,以行监察之事。推行“换官”之法,对原任旧职的官员依照新官制统一换授。经过这一改革,金朝统一采用了汉官制度。于是,金朝内地和汉地官制统一起来。

二是制定礼仪。女真旧礼极简,君臣无序,等级不明,不利于加强皇权统治。金熙宗命百官参照汉制,详细制定了各种礼仪。皇帝有特制的冠服,百官也须穿新制朝服上朝。同时,在上京会宁府仿汉制兴建宫殿、太庙、社稷坛等。

三是调整猛安谋克制。金熙宗即位后,“罢汉、渤海千户谋克”^①,改变原来编汉人、渤海人为猛安谋克的制度。同时,把女真猛安谋克大批南迁,“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②。在汉族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迁

① 《金史》卷八十《大臬传》。

② 《大金国志》卷三十六《屯田》。

往中原的女真族也开始逐步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过渡。

金熙宗对内进行改革的同时，首先需要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随之，金调整对宋战略，从一味进攻，改为与宋议和。于是，金、宋双方在军事上出现了暂时的缓和。

二、第一次宋金和议

金熙宗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维护女真传统旧制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对，金朝统治集团内部也由此引发激烈冲突。金熙宗为推行其改革措施，与反对派进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金熙宗即位初，军权掌握在都元帅完颜宗翰手中。完颜宗翰是创建金国的功臣，也是亡辽和灭北宋战争中功劳最大的将领，以后又几次统兵进攻南宋。他作为金朝主战派的领袖，在朝中很有影响。金熙宗调整对宋政策，首先削夺完颜宗翰军权。金熙宗在升任完颜宗翰为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封晋国王的同时，免去他的都元帅之职，目的是“以相位易兵柄”^①。天会十四年（1136年），金熙宗又以太师完颜宗磐、太傅完颜宗幹与完颜宗翰并领三省事，削弱其相权。

天会十五年（1137年）六月，金熙宗处死完颜宗翰的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等人。完颜宗翰曾提出免去自己的官位，替高庆裔赎罪，遭到金熙宗拒绝。在“兵权既离掌握，庆裔不免于诛”的情形下，完颜宗翰“愤恚以死”。^②完颜宗翰死后，金熙宗任命完颜昌（挾懒）为左副元帅，掌管金朝军事，推行与南宋议和政策。这一年，金朝废掉齐国，裁减军兵，并向南宋通告宋徽宗和宁德皇后病死的消息，做出向南宋表示和解的姿态。完颜昌在会见南宋使臣王伦、高公绘时说：“好报江南，既道途无壅，和议自此平

① 《大金国志》卷九《熙宗纪一》。

② 《大金国志》卷二十七《粘罕传》。

达”。^① 主动提出与南宋议和。

宋高宗和秦桧等人对于能与金议和，保全偏安江南的局面，自然是兴高采烈。于是，压制反对意见，遣使与金朝接洽，商谈议和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是：金以河南、陕西之地予宋，宋向金纳币称臣。

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三月，宋东京留守王伦到达开封，接收齐国旧地。金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将“应交割州军官物，十分留二分，八分赴河北送纳”。^② 随后，领兵出开封城从沙店渡河到祁州（今河北安国）。金废齐后曾于汴京设行台尚书省，这时“金遂移行台于大名”^③。驻军归德府的金葛王完颜褒也如约“割地而归”^④。河南、陕西地区又回归于宋朝。

三、金朝毁约和四路攻宋

在对待南宋问题上，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与主和两派。只是在金熙宗和完颜昌强行推行之下，和议才勉强得以实现。但是，两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战派完颜宗弼等人伺机再起，挑起战争。

完颜宗弼等人采取许多阴谋手段，以达到夺取军政大权的目的。首先，在金熙宗与主和派之间制造矛盾。他们一再向金熙宗进谗言，攻击完颜昌和太师完颜宗磐、左丞相完颜宗弼阴结南宋，图谋作乱。

天眷二年七月，金熙宗以谋反罪处死完颜宗磐和完颜宗弼，贬完颜昌到燕京任行台左丞相。同时，任命完颜宗弼为都元帅。完颜宗弼掌握了军事大权后，立即杀掉完颜昌及其支持者，积极准备再

① 《要录》卷一百十七，第1894页。

② 《要录》卷一百二十七，第2062、2063页。

③④ 《要录》卷一百二十七，第2063页。

次发动攻宋战争。“乃举国中之兵，集于祁州元帅府大阅”。^①

天眷三年（1140年）五月，金朝撕毁条约，分兵四路大举攻宋。聂黎贝堇出山东，李成打河南，右副元帅完颜杲（撒离喝）自河中攻陕西，都元帅完颜宗弼领兵从黎阳趋汴京。^②

金军此次兴兵，首先要夺回陕西、河南地区。完颜宗弼领兵10余万，^③进入河南，如入无人之境，几天之内抵达汴京，宋东京留守孟庾率官属开门迎降。汴京周围府州纷纷降金。李成也轻而易举占领洛阳。完颜杲自河中（今山西永济）渡河，经同州（今陕西大荔），急驰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市），陕西原齐属州县又尽为金军所有。

金军以唾手之劳，轻取河南、陕西，并非兵力强大，而是南宋一开始就没有，也不愿做认真的防御。南宋在获得河南、陕西之后，本应加强军政建设，使之成为反击金朝的基地。然而，宋高宗一心一意做金朝的臣属，接收两地后，仅派遣了几名官员往东京等地任职。当有人提出派兵驻东京时，宋高宗说：“朕今日和议，盖欲消兵，使百姓安业，留司岂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弹压内寇足矣。”^④宋高宗明确指示，对两地采取的方针是“虚内而事外”^⑤，即不驻军，不设防，财政上不予支援。对原齐政权的军政官员采用“因其人以守”^⑥的原则，不做任何变动而全部留用。

① 《要录》卷一百三十五，第2166页。

② 参见《要录》卷一百三十五，第2166页，《金史》卷四《熙宗纪》，第75页。

③ 《要录》卷一百三十五载：金“分四道入犯，……宗弼自将精兵十余万人”。《大金国志》卷十一《熙宗纪》：“遂分四道南征。……兀术自将精兵十余万”。台湾《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二册（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云：“四路兵共十余万”，这显然把宗弼一路军人数误为四军人数。另外该书记：“右副元帅完颜杲与右监军萨里干出河中入陕西”。亦误，完颜杲与萨里干实为一人。

④⑤ 《要录》卷一百二十六，第2047页。

⑥ 《要录》卷一百二十五，第2044页。

以此换取金朝统治集团的好感。河南、陕西复陷后，宋高宗把失地的责任归结为“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和“士大夫不能守节”。^①这种文过饰非的态度，只能使事情越来越糟。

金军占领河南、陕西，取得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后，兵分两路：完颜杲领兵从陕西入川；金军主力继续南攻，企图经亳州（今属安徽）、顺昌（今安徽阜阳），渡淮河南下。面对险恶的局势，宋高宗被迫下诏，命令各地军民抗击金军。于是，金宋战争又全面爆发。

第二节 宋朝战略反攻

一、顺昌保卫战

（见附图5）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带领原王彦旧部八字军到开封赴任。五月中旬，刘锜抵达顺昌（今安徽阜阳），准备继续乘船逆颍水而上。这时，金军攻占东京，大举南下的消息传来，部下有人劝说刘锜掉头顺流而走。顺昌北濒颍水，南近淮河，东接濠、寿（今安徽凤阳、寿县），西临陈、蔡（今属河南），是屏障淮河要点，通往汴梁要道。刘锜号召大家，“当同心力，以死报国家”。^②并下令把船凿沉，催促后继部队及辎重火速入城，准备抗击金军。

刘锜军队进入顺昌城后，得到顺昌府官民的有力配合，知府陈规提供军粮，通判府事汪若海赶往朝廷求援，当地人“作乡导间探”。由于顺昌军民的支持，六天之内使“守备全缺”的顺昌城，“设战具，修壁垒”，^③城防粗具规模。

五月底，金军从陈州（今河南淮阳）、亳州（今属安徽）南攻顺昌。刘锜在城下设伏，俘获金游骑二人，得知金将韩常在距城

^① 《要录》卷一百三十五，第2172页。

^{②③} 《要录》卷一百三十五，第2171页。

30 里的白龙涡下寨。刘锜派 1000 余名兵士偷袭金营，杀敌不少。金军三路都统完颜褒与龙虎大王突合速随后赶到，人数 3 万多，直逼顺昌城下。^①刘锜令守城军士用神臂弓和强弩猛射敌军，乘敌军后撤，以兵出击，使金军难以组织攻城。金军被迫移营到城东 20 里的拐李村。刘锜派骁将阎充领勇士 500，夜间劫金营，当夜电闪雷鸣，宋军见留辮发者就杀，金兵大乱，死伤很多，退至颍河北岸的老婆湾（今安徽太和县境）。

六月上旬，完颜宗弼率 10 万大军赶到顺昌，在颍水北岸扎营，金军营寨绵亘 15 里。完颜宗弼见顺昌城垣简陋，十分蔑视，对部将说：“彼可以靴尖趂倒耳。”^②并扬言明天进顺昌府衙去吃早饭。第二天，金军 10 余万越过颍河浮桥，从东西两面攻击顺昌城，完颜宗弼亲统 3000 亲军往来助攻。完颜宗弼的亲军都是铁兜重甲的骑兵，号称“铁浮图”（铁塔），作战十分勇猛。

刘锜军不满 2 万人，除去守城军兵，能够出战的仅有 5000 人。但是，刘锜和部下军兵决心“背城一战，于死中求生”。^③他并不一味死守城池，而采用防守与出击结合的战术。上午金军攻势猛烈，宋军重在防守，用强弓抵御金军。午时天气炎热，金军疲惫，又饥又渴，一部分人马饮食了宋军预先投放毒药的颍河水、草而病倒。刘锜见时机已到，派兵突然冲出西门和南门，直捣完颜宗弼中军，宋军用枪挑金军铁兜，长刀大斧砍劈，金军伤亡惨重，退驻近郊。^④

完颜宗弼攻城受挫后，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沿顺昌城挖壕堑，建立营寨，隔绝顺昌与外面的联系。刘锜识破金军的阴谋，不断派出小股宋军骚扰，使金军挖壕修寨工作进展缓慢。正逢盛夏雨季，平地水深一尺多，颍河水暴涨，金军营寨上下没有干的地方，又不断遭到宋军攻击，金兵日夜不得安宁。完颜宗弼坚持了

①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刘锜传》，第 11401 页。

②③ 《要录》卷一百三十六，第 2181 页；《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刘锜传》。

④ 《宋朝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锜传》。

几天，终于支持不住，率军渡颍水撤至太和（今属安徽），留大将韩常、乌噜、翟某等分守许州、归德、陈州等地，自己领兵回开封。宋军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胜利。

顺昌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城邑防御战。宋军兵力不过2万，能成功地抗击10万金兵强大攻势，其主要原因有几点：一是军民同心协力誓死与城共存亡。战役组织者通过战前宣传鼓动和沉船等措施，激发起守城军民高昂的抗金情绪。二是创造条件以增强防御能力。由于迅速加固城防和添加战具，从而弥补了城小的劣势，使作战军队有较坚固的防御设施可以依托。三是粮储等作战物资丰富，后勤补给充足，使军队的战斗力不受影响。四是及时掌握金军的动向，进行有针对性的防御部署。通过探马、斥候获得敌情，并利用完颜宗弼的轻敌心理，派间谍诈敌，助长其骄傲情绪，率军轻装急进，无重型炮具配合仓促攻城，致使金军顿兵挫锐。五是以逸待劳，攻守结合，战术运用得当。宋军抓住金军远来疲惫，逐次增兵的过失，采取守中有攻，以攻促守，攻守结合的战术。特别是充分利用了金军不习惯于酷暑、阴雨，疾病流行的弱点，轮番袭击，使其既不能速克城垣，又不能长围久困，最后在遭到重大伤亡后被迫撤退。

宋军顺昌之战的胜利，有力打击了金军主力的进攻，策应了宋军在东、西两翼及西京地区的作战，从而全线抑制了金军的攻势，为南宋军队的大举反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川陕争夺战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西路军主帅完颜杲（撒离喝）领兵出长安西攻，占领凤翔，企图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沿嘉陵江入川。^①宋川陕守军奋起反击，金宋两军在川陕展开了激烈

^① 见《会编》卷二百炎兴下帙一百，《金史》卷四《熙宗纪》，《金史》卷八十四《完颜杲传》。

的争夺战。

南宋川陕的军事，原由四川宣抚使吴玠主持。吴玠于绍兴九年病逝，宋廷任命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负责军事。^①金军占领长安和凤翔，胡世将正与将领吴玠等在渭水以南的河池（今甘肃徽县），而半数以上的川陕宋军被隔断在渭河以北，形势十分危急。^②胡世将采纳吴玠的建议，决定在原地组织兵力抗击金军。吴玠被授权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率2万宋军赶赴宝鸡抗击金军。胡世将又调遣都统制杨政和郭浩配合作战。

五月二十八日，金军进攻凤翔府的石壁寨，吴玠派统制官姚仲等领兵阻击，金军受挫，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旧武功）。郭浩部也击败围攻耀州（今陕西耀县）的金军。

六月上旬，金宋两军在扶风（今属陕西）会战。完颜杲派鹞眼郎君率3000骑兵直冲宋军，宋都统制李师颜等以骁骑迎击，金军败退扶风县城。李师颜等乘胜追击，攻下扶风，俘虏金军将士120人。完颜杲亲自领兵出战，在百通坊（扶风西南）列阵20余里。姚仲率军力战，大败金军，完颜杲退入凤翔。郭浩派兵收复醴州（今陕西乾县），吴玠进驻大虫岭（宝鸡县东北），形成东、西、南合围凤翔之势。

六月中旬，完颜杲决定放弃进兵西南的计划，留部分金兵守凤翔，以全军主力北攻，企图夺取邠州（今陕西邠县）。郭浩率军进驻三水（今陕西旬邑），泾原经略使田晟遣部将曲汲、秦弼领兵据守青溪岭（今陕西邠县西南），阻截金军北上。胡世将又派将领杨从仪等分道而出，从背后牵制金军。完颜杲率军攻青溪岭，曲汲、秦弼抵挡不住，弃岭败走，田晟杀曲汲示众。金军北上途中，

① 《宋史》卷三百七十《胡世将传》载：“绍兴九年，玠卒，以世将为宝文阁学士、宣抚川、陕。”似胡世将任川陕宣抚使。但据《要录》卷一百二十五第2174页载：“诏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军前合行黜陟。……近旨令胡世将如遇军事及赏罚等，待报不及，许一面便宜施行。”由此可知，胡世将任宣抚副使。

② 据《要录》卷一百三十五载：“时右护军之戍陕西者五万人，始渐至所屯州县，而蜀口一带，正兵不过三万人。”

被宋鄜延经略司公事王彦部击败，完颜杲被迫退回凤翔。

闰六月上旬，完颜杲再次领兵出凤翔，北攻泾州（今甘肃泾川），^①田晟率军凭借山势险要阻击，几次击败金军，缴获大量的战马、器械。金军绕道至田晟背后，击败田晟军。但是，金军也付出惨重代价，被迫再次退回凤翔。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完颜杲为配合完颜宗弼攻两淮，再次于陕西发动攻势，进据秦州（今甘肃天水）。八月，完颜杲派遣部将胡盏与习不祝统兵5万集结于秦州附近的刘家圈，伺机南下入川。胡世将与各路将领屯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北、甘肃徽县境），商讨破敌之计，决定主动出击，收复秦陇地区。胡世将命吴璘率2.8万人主攻秦州，杨政部出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郭浩部出商州（今属陕西），分别从北、南两翼策应西攻主力。

九月十三日，吴璘领兵抵秦州城下，杨政部也进入陇州（今陕西陇县）东南的吴山。三天后，吴璘部攻占秦州，进兵刘家圈。刘家圈前临峻岭，背靠腊家城（今甘肃秦安东），地势险要，金兵据险自固，并不把宋军放在眼里。吴璘为麻痹敌人，派人通知金军明日决战。夜间，宋军利用阴雾掩护，登上岭坡修筑工事，部署军队。随后万炬齐燃，金兵惊恐，胡盏仓促出战。吴璘采用叠阵法，以步兵长短兵器不同姿式，前后重叠排列，骑兵负责掩护。经过数十战，金兵败退，宋军骑兵追击，杀死和俘虏金兵数千，降者1万余人。胡盏和习不祝败入腊家城。与此同时，杨政部在渭河北岸击败金万户通检精兵1万，生擒通检。郭浩部也收复了虢、同、华等州。宋军成功地遏止了金军南下四川的战略企图。金宋川陕争夺战，最后以金军失利而暂告一阶段。^②

① 据《金史·完颜杲传》载：“宋兵九万会于泾州，……撒离喝留诸将屯环庆，独以轻骑取泾州。”宋军会于泾州兵力似无9万之数。但从此处记载可见宋军已逐步完成了集结。

② 参见《金史》卷四《熙宗纪》；《宋史》卷三百七十《胡世将传》，卷三百六十七《郭浩传》、《杨政传》；《要录》卷一百四十一，第2270～2276页。

三、岳飞反攻中原

(见附图 6)

金军毁约攻宋之时，岳飞正驻防鄂州（今湖北武昌），得到金军南下的消息后，积极准备北上反击金军。绍兴十年（1140 年）六月间，岳飞留下全部水军和部分守城军兵防守后方，指挥七八万人出鄂州北上。岳飞分兵三路：将领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等进兵河南，分取河南府（洛阳）、陈州等地，东西呼应梁兴、董荣、孟邦杰等渡黄河，联络抗金义兵，攻取河北、河东州县，以便南北呼应；岳飞随后率主力直指东京。

闰六月间，岳家军接连取得颍昌、陈州、郑州、河南府（洛阳）等战的胜利，先后歼灭和击溃敌军几万人，为攻击开封扫清了障碍。宋军的胜利，迫使在汴京（开封）的金军主帅完颜宗弼改变分兵据守的部署，集中兵力反击岳家军。当侦知岳飞的宣抚司驻扎郾城（今河南许昌东南），而重兵在颍昌等地后，完颜宗弼决定攻击郾城岳家军指挥部。^①

七月上旬，完颜宗弼率领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赛里和韩常等将领，挑选精壮骑兵 1.5 万人，突袭郾城。岳飞得报后，率军迎击，两军在郾城北 20 里处相遇，展开激战。岳飞命令岳云带领背嵬（亲军）和游奕马军首先出战，随后步军各持麻扎刀、提刀和大斧攻击金军骑兵。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进行殊死搏斗，鏖战几十回合，岳家军挥舞刀斧，上砍敌人，下砍马足，金兵横尸遍野。岳家军也多有伤亡，大将杨再兴也身中数十枪。战至天色昏黑，金军终于抵挡不住岳家军的攻势，向临颖方向败退。两天后，金将阿李朵孛堇统领 1000 多名骑兵，突袭郾城北的五里店。岳飞率军出郾城迎击，大败金军，阿李朵孛堇身死，把金军赶到

^① 《要录》卷一百三十七，第 2202 页；《会编》卷二百四炎兴下帙一百四。

20里以外。岳飞部将杨再兴、王兰等率领300名军士，深入到临颖附近的小商桥，与完颜宗弼大军相遇，300余名宋军将士全部英勇战死。岳家军焚化杨再兴遗体，竟得箭镞两升。^①

七月中旬，完颜宗弼两败于郾城之后，决定转攻颍昌（今河南许昌东）。遂以骑兵3万，步兵10万，直扑颍昌，列阵舞阳桥南，头尾10余里。金军攻颍昌在岳飞的预料之中，事先已派岳云领兵前去增援，并请求顺昌刘锜派兵支援。岳家军集中在颍昌的兵力有3万人，主要将领有王贵、董先、姚政、胡清、冯赛、岳云等。岳家军采取战守结合的方针，董先和胡清领三分之一兵力守城，王贵、岳云、姚政等率三分之二兵力出战。岳云一马当先，率800背嵬骑兵冲入敌阵，步兵从两翼护卫骑兵攻击金军，与金兵左右拐子马（左右翼马军）接战。两军血战几十回合，岳家军将士人和马都被血染成红色，仍勇战不退。时至正午，董先和胡清率守城的踏白与选锋两军突然冲出城来，金军阵脚大乱，全军溃败。这一仗，岳家军杀死完颜宗弼女婿统军使夏金吾和副统军粘汗孛堇（受伤身死）及千户5人，活捉金军大小头领78人，歼敌5000多人，俘虏金兵2000多人，缴获战马3000多匹。完颜宗弼率残兵往汴京（开封）方向败退。^②

岳家军获得郾、颍之战的胜利后，继续向东北方向的汴京进军。从临颖出发的张宪部途中击败6000金军骑兵，追敌15里。岳飞指挥各部到达距开封45里的朱仙镇，与完颜宗弼军对垒而阵。岳家军奋力出击，金军败回汴京。金军因死伤、逃亡和投降而大量减员，完颜宗弼想签军以补充兵力，继续与宋军作战，结果无兵可签。他哀叹道：“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屡见挫衄。”^③金军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不敢再战，准备渡河北归。宋军处于全线反攻的有利时机。岳飞

①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杨再兴传》，第11464页。

② 《金佗粹编》卷十六《王贵颖昌捷奏》，《金佗续编》卷二十三《智谋》。

③ 《金佗续编》卷十四《忠愍谥议》。

请求宋高宗下达“诸路之兵火急并进”的命令。^①但是，宋高宗和秦桧一心停战求和，反而急令张俊、杨沂中等军从宿州、亳州和泗州撤军。同时，连下12道“金字牌”，逼迫岳飞退兵。岳飞无奈，长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②岳飞被迫退兵，民众“哭声振野”，中原州郡又被金军占领。岳飞反攻中原之战，如果不是被迫班师，宋军完全可以进据汴洛控制黄河一线要点，这将会对南宋的发展和北进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岳飞军为主的南宋军队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反攻中原的胜利。然而，在南宋统治者的阻挠之下，大好的反攻形势被轻而易举地断送掉。尽管如此，反攻中原之战的历史作用及其在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在这次反攻作战中，南宋军队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从军事上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反攻的战略方针正确。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就提出以襄阳为基地，连结河朔（黄河以北义军），直捣中原的战略方针，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准备。此次反攻，由于作战方针明确，并符合当时情势，从而减少了军队作战的盲目性。二是军队的素质提高，战斗力增强。经过多年与金军作战，南宋军队的战斗力普遍有所增强，尤其是岳家军的军纪严明，“将勇而兵精”，战斗力甚至超过金兵。此次作战各路宋军勇于进取，配合默契，一改过去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畏敌惧战状况。三是有效地抑制金军骑兵的攻势。针对金军长于重甲骑兵野战的特点，岳飞指挥宋军步骑以坚阵和长兵器正面抗击金骑兵密集冲击，运用侧后迂回等战法，以打乱敌阵，乘势予以重创。

四、柘、濠之战

宋朝从中原撤军后，完颜宗弼得到喘息之机，休战不到半年，

① 《金佗粹编》卷十二《乞乘机进兵札子》。

② 《宋史》卷一百二十四《岳飞传》，第11391页。

又再次发动攻宋战争。

绍兴十年十二月下旬，金军主力南移，伺机攻击宋军兵力较弱的淮西地区。翌年正月中旬，完颜宗弼统金兵9万，^①渡过淝水，攻占寿春（今安徽寿县）。宋廷急令在杭州的淮西宣抚使张俊渡江组织迎敌。同时，征调刘锜、杨沂中和岳飞等部军马增援淮西。刘锜领所部2万人，率先从太平（今安徽当涂）赶到庐州（今安徽合肥），但是看到此城难以据守，遂与守将关师古南撤至依山傍水的东关（今安徽巢县东南），准备凭借地势截击金军。金军随后占领庐州、含山（今属安徽）、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二月上旬，张俊以部将都统制王德为前军，渡江收复和州。金军放弃含山、巢县（今属安徽）、全椒（今属安徽）、昭关（今属安徽）等地，收缩兵力，退至巢县东北的柘皋镇（今安徽柘皋），企图利用平坦的地势，以发挥骑兵的优势。各路宋军向柘皋镇汇集，准备与金军会战。金军方面由邢王阿鲁补、韩常等指挥，参战兵力约有7万人。^②宋军方面有杨沂中殿前司军3万，刘锜军2万，王德和关师古部3.2万多人，总兵力8万多。^③二月中旬，金宋两军柘皋会战，金军仍采用左、右两翼夹道攻击的战术。宋军预先并未制定出统一的作战方案，各部分头进击。刘锜部从石梁河下游架桥过河，作应战准备，等待后续部队。杨沂中部从石梁河上游浅水处涉水过河，孤军贸然突进，被金军击败。王德与关师古见形势危急，率部从桥上冲过石梁河，攻击金军右翼骑兵。王德一箭射死一名金将，大声呼喊冲入敌阵，

① 关于金兵力，《要录》卷一百三十九，第2227页作：“签两河军与蕃部凡十余万”；《金佗续编》卷十一：金军“实有九万来军马。”

② 《要录》卷一百三十九，第2235页载：柘皋金军“铁骑十余万”，与实际情况不符。此时完颜宗弼和突合速部尚在寿春。

③ 杨沂中、刘锜兵力见《要录》卷一百三十九，第2228、2229页。张俊部共有8万人，并未全部参加柘皋会战，仅派王德一军参战。王德兵力数目，据《宋史·刘锜传》：“沂中与德将神勇步骑六万人。”从《要录》知杨沂中兵3万，故王德部当有3万，加上关师古2000人，宋军共有8万多。

诸军随后进击，杨沂中率军兵用长斧砍杀金军骑兵，金军大败，退至柘皋北面的紫金山。驻军和州的张俊也借机收复庐州。

三月初，金兵围濠州，张俊会同杨沂中和刘锜部前去救援，行至距濠州 60 里的黄连埠，濠州已被金军占领。刘锜提出：据险下寨，先巩固后方，然后出兵进击的方案。但是，张俊轻信金兵已撤离的谍报，命王德与杨沂中领步骑 6 万直趋濠州。王德和杨沂中率先头部队 2000 骑兵刚到濠州城西岭上，突然城上举烟火，埋伏在城南的万余名铁甲金骑，分两翼冲来，宋骑兵奔逃，毫无准备的后续步兵，在金骑兵追杀下伤亡惨重。杨沂中领残兵逃至宣化镇（今江苏浦镇），渡江返回临安。最后退兵的刘锜部队队伍严整，缓缓而行，金军不敢追击。刘锜退到历城屯驻，朝廷下达班师命令后，从采石还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金军虽然濠州获胜，但不敢恋战，渡淮水北归。在淮西的几支宋军先后南还。金宋战争暂告结束。^①

第三节 宋金和议的形成

一、议和的政治原因

从军事角度来看，金朝从淮南撤军，短期无力再组织力量进行战争，故希望休战。宋朝击败金军进攻，保住半壁江山，以宋高宗、秦桧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希望就此罢兵。于是金、宋双方从战场走向谈判桌。毋庸置疑，促进金、宋第二次和议的直接原因是军事。然而，在军事的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

宋高宗即位之初，在金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如丧家之犬，朝不保夕，不断向金朝乞和。史籍载：“盖自上即位，遣使使虏（金）者，无虑十数辈，而未尝报聘。”^②在乞和无望的形势下，宋

① 参见《要录》卷一百三十九，第 2234～2242 页。

② 《会编》卷二百十三《朱胜非行状》。

高宗不得不依靠主战派文臣武将抗击金军。然而，随着南宋战略形势好转，尤其在军事上已经具备了反攻中原的能力之后，宋高宗不再担心亡于金，而处心积虑的是来自两方面的威胁：

一是钦宗还朝之虑。徽、钦二帝被金军掳去，宋高宗才有可能即位。如果宋军占领中原，逼迫金放徽、钦二帝还朝，宋高宗的帝位必然受到威胁。东京陷落时，徽宗已是太上皇，他还朝对高宗帝位还威胁不大。但钦宗不同，被俘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还朝后自然有复位的问题。因此，宋虽然多次遣臣使金，但对请求金朝放还二帝并不积极。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春，宋高宗得知宋徽宗死讯（宋徽宗死于绍兴五年）后，立即派徽猷阁待制王伦为“迎奉梓宫使”赴金，^①以祈请徽宗柩还朝，但对健在的钦宗却是另一种态度。王伦使金前，曾就钦宗之事请旨。宋高宗仅让王伦带200两黄金交给钦宗，而左相赵鼎却对他说：当今皇上登位已久，你见到孝慈渊圣皇帝（钦宗尊号），告诉他，目前君臣的名分已定，难道可以更改吗？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年），金放随徽、钦二帝北狩的韦后还宋朝，钦宗再让她转达还朝之意。韦后还朝后，知朝议已定，便不再说钦宗求归之事。以后，早年使金被囚的张邵还朝也曾上书秦桧，表明金有归孝慈渊圣皇帝之意，劝秦桧遣使迎请。秦桧不但不派人迎请，为此还迁怒于张邵，嫌他多事。显然钦宗还朝遇到很大的阻力。

二是将帅擅权之忧。自北宋以来，皇帝担心武将军权过重威胁皇权，因此对武将防范和箝制甚严，采取以文制武和将从中御等方式，有意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南宋建立后，迫于外患威胁，从而放松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国策，使岳飞、韩世忠等武将的军事才能得到一定的发挥。然而，随着岳飞、韩世忠等将帅兵权日重，威望益隆的情况下，引起了宋高宗等人的猜忌，惧怕他们仿效“陈桥兵变”，夺取皇位。当时，确实有的武将（如刘光世）难以驭制。因此，宋高宗不顾舆论及削弱军事力量，决心与金谋

^①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王伦传》。

和，以解决武将军权过重的问题。

宋高宗出于上述考虑，才决定宋军力增强的形势下与金议和。宋高宗曾对秦桧说过：“敌人议和，熟思所以应之，若彼我之势强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强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惧我之意也。”^①他在明知南宋军事力量已超过金朝的情况下，不向金朝发动反攻，而是削弱、限制抗金力量，以讨好金朝，求得皇位巩固。这正是宋朝不惜屈辱议和的政治原因。

金朝议和也有深刻的政治背景。金熙宗与完颜宗弼是依靠镇压主和派来贯彻攻宋的军事部署。但是，随着攻宋失利，金熙宗和完颜宗弼受到来自主和派的巨大压力。在前线的完颜宗弼几次从军中还朝处置朝中反对派，以免他们乘机夺权。天眷三年（1140年）九月，金熙宗杀“事辄异论”，并反对出兵的原左丞相完颜希尹、右丞肃庆及希尹子昭武大将军把搭、符宝郎漫带等。^②皇统元年（1141年），金熙宗又接连罢免参知政事耶律让和行台平章政事耶律晖等人。同时，为了争取主动，金熙宗和完颜宗弼调整对外政策，改军事进攻为与宋议和。因此，金与宋在议和问题上很快趋于一致。

二、罢宣抚、收兵权、杀岳飞

宋高宗、秦桧等人为减少议和的阻力，采取罢宣抚司、收三将兵权、杀害岳飞等一系列措施，铺平与金议和的道路。

南宋绍兴年间，宋军中以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将的实力最强，三将分别担任一方面的宣抚使，在南宋军队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秦桧等人经过密谋后，企图削夺久握重兵的三将兵权。宋高宗、秦桧以犒赏宋军为由，诏岳飞、韩世忠、张俊入朝。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间，三将奉诏到达临安，秦桧盛

① 《要录》卷一百四十二，第2280页。

② 《会编》卷一百九十七引《金虏节要》，《金史》卷四《熙宗纪》。

筵款待，赵构亲自召见，随后发布三道制词，以韩世忠、张俊改任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实际目的是把三将拘羁在朝廷，与手下军兵脱离。接着，下诏令撤销三将的淮东、淮西、京湖三宣抚司，原宣抚司中的统制官各统所部，自为一军，其军衔加“御前”二字，规定“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①把三个宣抚司的兵权收归朝廷。宋廷罢三将兵权之后，张俊一味迎合秦桧等人，主张和议。韩世忠、岳飞坚决反对宋高宗、秦桧的求和活动，多次上书表示意见。秦桧为搬掉向金朝求和的障碍，加紧了迫害韩世忠和岳飞的行动。

五月上旬，宋廷派张俊和岳飞前往淮东，以“措置战守”为名，处置韩世忠军。张俊把韩世忠军从楚州调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府，其中精锐背嵬亲军分调到临安屯住，并拆毁了海州城（今江苏连云港）。本来张俊此行还有收买韩世忠部将、罗织罪名加害韩世忠本人的使命，由于岳飞的坚决反对而没有得逞。于是，秦桧、张俊更加记恨岳飞。八月，宋高宗下诏罢免岳飞枢密副使之职。九月，秦桧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王俊、王贵，诬告岳飞谋反。十月，宋高宗和秦桧把岳飞投入监狱，接着又罢了韩世忠的官。十二月，秦桧遵照完颜宗弼提出的“必杀岳飞才可议和”^②的条件，把岳飞害死在狱中。同时遇害的还有岳云和部将张宪。岳家军的将领被株连者甚多，朝中同情岳飞、坚决主张抗金的文武官员纷纷被贬斥，南宋的抗金力量遭到巨大打击。秦桧为迫害岳飞、韩世忠曾拉拢张俊，暗约议和后“兵权归俊”，等到目的达到之后，便指使僚属江邈上疏弹劾张俊，罢免了他的枢密使之职。于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③

① 《要录》卷一百四十，第2248页。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一百二十四。

③ 《要录》卷一百六十九，第2771页。

三、第二次和议

宋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代表经过谈判，正式签订和约。这是自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议和以来，双方第二次达成停战协议，两次和议相隔三年时间。此次议和，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金朝方面，军事实力仍较强的宋朝，却甘愿签订屈辱的条约，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金宋和议的主要条款是：宋向金称臣，宋每年向金贡奉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以淮水、大散关为界。按照条约的规定，宋朝将士浴血奋战得到的大片土地，包括岳家军克复的唐、邓、商、虢等州，吴玠等部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曾拼死坚守的和尚原要害，全部拱手献给金朝。宋朝统治集团依靠如此沉重的代价，以换取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宋高宗以“臣构”的名义向金朝敬献“誓表”，奴颜婢膝地表示：“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①金熙宗在册封赵构文中说：“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守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②完全是居高临下，用过去对待楚、齐傀儡的口吻对待南宋王朝。

宋金签订和约之后，宋高宗恪守臣节，每年春季把贡奉的银、绢送抵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交纳。这巨额贡奉的负担，全部落到南宋人民头上，加上南宋统治集团难填的欲壑，南宋人民的生活较议和前更加艰难。秦桧“见财用不足，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③宋高宗和秦桧等人只管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哪管人民的死活。

南宋政府自议和后，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严格约束宋军不准与金军发生磨擦，以免触怒金朝。宋高宗多次下诏给边臣，命

① 《金史》卷七十七《完颜宗弼传》，第1755页。

② 《金文最》卷十《命宋康王为皇帝册文》，中华书局本，第132页。

③ 《要录》卷一百六十九，第2772页。

他们“保守见存疆界，不得出兵生事，招纳叛亡”。^①成州团练使、知叙州的邵隆，曾几次派兵出入金境，秦桧恨之入骨，密使人以毒酒将他害死，“叙人皆悲哭，人为罢市”。^②秦桧等人用破坏和议的罪名，大肆残害忠良，滥施淫威。绍兴十八年（1148年），秦桧之子秦熺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秦桧又进一步控制了军事大权。秦桧执政期间，选用庸才出任军队的将帅，“任其将帅，必选驽才”，^③以便受其驾驭。南宋的军事力量被削弱了。

第二次议和之后，秦桧又执掌南宋朝政长达14年之久。他在朝廷内外广植私党，“非桧亲党及昏庸谄佞者，则不得仕宦”。出任地方监司帅守都要走他的门路，“必数万贯乃得差遣”。每逢他生日，各地州县官送寿礼“岁数十万”。为了控制朝野舆论，秦桧一伙派出数百名暗探在井市察访，逮捕揭露其奸邪的人，送交大理寺狱处死。凡有敢于上书谈论朝政的官员，必定被贬到边远地区。于是“略无敢言其非者”。秦桧身边的佞幸小人整日为他歌功颂德，称他为“元圣”、“圣相”，把他执政期间谀颂为“中兴圣政”。用制造出来的万民拥戴的假相，以掩盖“百姓愈困”的真情。^④秦桧的倒行逆施，引起南宋军民的普遍愤懑，欲杀之而后快。绍兴二十年（1150年）正月，殿前司后军使臣施全，乘秦桧上朝之际行刺，被捕后慷慨激昂地说：“举国与金为仇，尔独欲事金，我所以欲杀尔也。”^⑤道出了南宋军民坚决抗金，反对投降的心意。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病死，宋高宗任命参与谋害岳飞的万俟卨任丞相，继续奉行金宋议和条款。

金朝在与南宋议和后，利用休战的有利时机，进行恢复和发展生产。战争期间，关、陕以西地区“百姓多失业”，议和后出现

① 《要录》卷一百四十二，第2293页。

② 《要录》卷一百五十三，第2469页。

③ 《要录》卷一百六十九，第2772页。

④ 以上引文见《要录》卷一百六十九，第2771、2772页。

⑤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宋纪一百二十八。

“民多还归者”。^①史称金熙宗统治期间，出现了“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的局面。^②

① 《金史》卷八十七《徒单合喜传》，第1942页。

② 《金史》卷七十《思敬传》，第1626页。

第九章 宋金相持阶段的战争（上）

自从金熙宗与南宋议和之后，八九年间金宋未有战事。随着外部的稳定，金廷内部矛盾加剧，终于发生金熙宗被杀的宫廷政变。海陵王即位之后，继续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金朝又发动了攻宋战争。由于客观条件并不成熟，海陵王旨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以失败结束。

第一节 金朝宫廷政变与海陵王即位

一、金宫廷政变

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十月，执掌金朝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病死，金廷内部由权力之争，终于引发了金熙宗被杀的宫廷政变。

金朝宫廷内部派系斗争一直十分激烈，完颜宗弼在世时，集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行台尚书省于一身，无人能与之抗衡，尚能维持住朝政正常的局面。完颜宗弼死后，金熙宗亲自过问政事，受到派系所左右，在用人问题上处理不当，因而激化了派系矛盾。

完颜宗弼死后，军政最高职务曾空缺两个月，直到当年十二月，金熙宗才任命完颜宗贤为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萧仲恭为太傅、领三省事，完颜宗幹之子完颜亮为尚书右丞相。皇统九年（1149年）正月，在金熙宗皇后裴满氏与完颜亮等人合力攻击下，执政不足一月的完颜宗贤被贬任南京留守，由原领行台尚书省的完颜勗任太师、领三省事，完颜亮以右丞相兼都元帅，二人

分掌军政大权。但是没有几天，金熙宗改任完颜亮为左丞相，金太宗子完颜宗本为右丞相，都元帅一职改任金太祖子完颜宗敏，又复任完颜宗贤为太保、领三省事。三月，金熙宗改任完颜亮为太保、领三省事，两个月后又贬完颜亮领行台尚书省。金熙宗试图通过对朝臣的频繁调动，以缓解派系矛盾，集权于自身。结果适得其反，引起了各派贵族大臣的普遍不满。金熙宗无力协调与大臣的关系，遂滥用刑罚进行威慑，以达到控制局面的目的。五月间，金熙宗以诽谤罪杀翰林学士张钧，以诬告罪杀武库署令耶律八斤。八月，杖平章政事完颜秉德，杀左司郎中三合。十月，杀二弟北京留守胙王完颜元和完颜查剌。十一月，杀皇后裴满氏及德妃乌古论氏、夹谷氏、张氏等，又杀已故邓王完颜奭子阿懒和挾懒。《金史》称：金熙宗“末年酗酒妄杀，人怀危惧”。^① 一次，他曾赐酒给弟完颜元，完颜元不能饮，他仗剑逼迫，完颜元逃走，他命左丞完颜宗宪去找，二人未回。金熙宗发怒，把身边毫无罪过的户部尚书完颜宗礼亲手杀死。^② 金熙宗的残暴终于招致了杀身之祸。完颜亮组织和发动了推翻金熙宗统治的宫廷政变。

完颜亮被贬领行台尚书省时，途经北京，曾与北京留守萧裕密谋起兵河南，夺取皇位。不久，他被召回朝任平章政事，起兵之事未果。完颜亮还朝后，联络左丞相完颜秉德、左丞唐括辩、大理卿乌带，策划政变。接着，他们又暗结金熙宗护卫和近侍作内应。十二月初九日夜，寝殿小底、权近侍局直长大兴国取符钥开宫门，假传圣旨召完颜亮入宫。完颜亮与完颜秉德、唐括辩、乌带等带兵刃闯入金熙宗寝殿，金熙宗急取榻上佩刀，不料已被大兴国藏起，护卫十人长忽土、阿里虎和完颜亮将金熙宗刺死。参与政变的众人拥立完颜亮即皇帝位（海陵王）。这次政变对金代的政治和军事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① 《金史》卷四《熙宗纪》，第87页。

② 参见《金史》卷六十九《胙王元传》。

二、军事与政治制度改革

海陵王即位后，大力进行政治与军事制度的改革，目的是集中军政权力，以实现“混一天下”。

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海陵王下令废除行台尚书省。金朝设立行台尚书省始于金太宗时期，金熙宗时期继续沿袭这一制度，在燕京、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行台尚书省的特点是实行不同于中央的一套制度，在军政方面有一定的独立性，加之距金都城较远的地理条件，使朝廷很难控制。完颜宗弼执政时一直兼领行台尚书省事，力求使中央和行台尚书省步调一致。完颜亮曾出任汴京行台尚书省事，企图利用行台尚书省为基地起兵北上夺取政权，也反映了行台尚书省易于与朝廷离析的特点。因此，海陵王即位后，立刻对有一定独立性的行台尚书省采取废止的果断措施，目的是统一政令，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海陵王在罢行台尚书省的同时，对金朝最高军事机构都元帅府进行了改革。金太宗、熙宗时期，以都元帅府负责作战事宜。都元帅府的官长为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等，他们握有重兵，常驻军于京外要地，以实力干预朝政。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任左副元帅和右副元帅期间，各领一军屯驻燕京和云中（今山西大同），被当时人称为“东朝廷”和“西朝廷”。由此可见，都元帅府在金朝的地位和影响。海陵王废除都元帅府，仿汉制设立枢密院，由朝廷直接任命枢密使和枢密副使，负责主管军事，受尚书省节制。^①同年还对诸路节镇和猛安谋克进行了整顿。减少合并了中京、东京、临潢、咸平、泰州等路节镇及猛安谋克，取消金熙宗

^① 《金史》卷五《海陵纪》：天德二年十二月己未，“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同书卷四十四《兵志》作：天德三年“以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之官。”《本纪》年月日记载明确，《兵志》仅系年份，故采用《本纪》。

时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的做法，但称为“诸猛安谋克”。^① 天德三年（1151年），又取消了“子孙相继，专揽威权”的万户一职。^② 贞元间，海陵王又设置侍卫亲军司统辖侍卫亲军，并于原常选诸军择材武者组成护驾军。正隆二年（1157年），又在侍卫亲军内选30岁以下6600人，骑兵称龙翔，步兵称虎步，专备宿卫。正隆五年（1160年），又废除亲军司，以所掌付大兴府，置左右骁骑，称为从驾军，设都副指挥使和步军都副指挥使，分别隶属点检司和宣徽院。海陵王对军事制度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强皇权，便于他直接控制军队，发动战争。

海陵王在“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③，把分散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之后，又开始了对中央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下诏废除中书、门下两省，仅留尚书省，直属于皇帝。金熙宗时，沿袭勃极烈制，设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领三省事，三师“皆正一品，师范一人，仪刑四海”^④，权力很大，左右朝政。海陵王撤销中书、门下省，只设尚书省主管朝廷政务。以尚书令为尚书省最高长官，仍设立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等官，不再设置平章政事官。尚书省下设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等机构。尚书省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唯一最高权力机构，这对于中央权力的集中和政令的统一十分有利。

海陵王经过对军事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完全掌握了金朝军政大权。他在早年曾对尚书省令史高怀贞说过他的三大志向：“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⑤ 第一志向实现后，海陵王又开始实施第二个志向。

①②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993、1003页。

③ 《金史》卷五《海陵纪》，第96页。

④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第1217页。

⑤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高怀贞传》，第2789页。

第二节 金两次迁都与谋划攻宋

一、两次迁都

海陵王先后作出了两次迁都的重大决策：第一次是从上京迁至燕京（中都），第二次由中都迁至汴京。8年时间，两次主动迁都，历史上并不多见。海陵王迁都的实际目的是向南发展，为进攻南宋作准备。

海陵王以前，金朝一直以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作为统治中心。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海陵王毅然下诏迁都。掌管修造营建法式的有关部门，向海陵王进献了所绘制的燕京城宫室设计图，此图照阴阳五行规划。海陵王认为“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①否定了以凶吉为依据的都城设计方案，任命右丞张浩主持修建燕京都城，历时三年竣工。海陵王下诏改燕京城为中都，原析津府改名大兴府，汴京为南京，大定府为北京，辽阳府仍为东京，大同府为西京。

贞元元年（1153年）二月，海陵王携百官从上京会宁府赴中都（今北京），大批女真贵族随之南迁。以后，又在中都附近的大房山（今北京市房山西）营建皇陵，把太祖、太宗棺木由上京迁葬大房山。正隆二年（1157年）十月，下令拆毁上京会宁府旧宫殿和世家大族的第宅，其址夷平作耕地。^②表明海陵王决心与女真旧制度决裂。海陵王迁都燕京，标志着金朝最终完成了向中原封建制的转化。几年后，海陵王又决策第二次迁都南京（汴京），进而实现统一江南的宿愿。

海陵王的迁都汴京和出兵南宋一经提出，招致绝大多数朝臣

① 《金史》卷五《海陵纪》。

② 参见《金史》卷五《海陵纪》。

的反对。但是，由于惧怕获罪，“皆不敢对”。^①尚书令程颢温敦思忠发表意见，认为时机不到，十年以后才能考虑灭宋的问题。海陵王对程颢温敦思忠的回答十分不满，有杀思忠之意，只因思忠为四朝老臣，才勉强容忍。海陵王又采用另外的方式实施迁都伐宋的计划。一天，他召集部分大臣，声称昨夜梦见两个金甲力士带他到上天，接受了一道“天策上将令征某国”的宣敕。他析梦说：“岂非天假手于我，令我取江南也。”^②不久，海陵王又召吏部尚书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晖、翰林直学士韩汝信等人争取支持。海陵王对李通说：“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卿意如何？”^③李通回答说：“正天时人事不可失。”海陵王听后很高兴，又问翟永固的意见。翟永固认为，燕都修成才几年，经济还没有恢复，岂可再营汴都！江南厚币尽礼，岂可无名出师！迁都伐宋，二事俱不可。敬嗣晖赞同李通，韩汝嘉赞同翟永固。海陵王发怒把翟永固、韩永嘉二人赶出朝廷，升李通为右丞，敬嗣晖为参知政事，强行推行迁都攻宋的计划。

正隆三年（1158年），海陵王诏左丞相张浩和敬嗣晖营建汴京宫室，征发大批的工匠、民夫，调运各地林木花石到汴京，拆毁汴京宫室，片瓦不留，全部更新。建成后“华丽之极，不可胜记”^④。正隆四年（1159年）冬，使宋的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回朝，进献临安图。海陵王命作画屏，题诗屏上云：“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⑤表现出南北统一的强烈愿望。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迁印造钞引库到汴京。第二年四月，命百官先赴汴京治事，五月海陵王到达汴京，^⑥从而完成了第二次迁都之举。

① 《金史》卷八十四《程颢温敦思忠传》，第1882页。

②③ 《会编》卷二百四十二引《正隆事迹记》。

④⑤ 《会编》卷二百四十二《正隆事迹记》。

⑥ 《金史》卷五《海陵纪》，第114页。

二、战前的军事准备

海陵王为了攻宋，大规模地征丁、征用人力和物力进行战前准备。

正隆四年（1259年）二月，海陵王下令征调各路丁壮充军，“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听”。^①女真、契丹、奚被征丁壮24万，“修长者为正军，矮弱者为阿里喜（女真语，意为“副”、“次”）”。^②汉人、渤海人中签军27万，以万人为一军，共分为27军。海陵王又从女真等军中挑选身强善射的军兵，组成人马全装的精锐“硬军”。他扬言：“所签者数十万，但可张其势，取江南者此五千人足矣。”^③签军的同时，还征调大批的工匠、水手、马夫等，曾一次“籍诸路水手得三万余人”。^④在战具、马匹等物力方面也做了充分准备。海陵王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今北京通县）督造战船，遣使赴诸道总管府督造兵器，收集各地库藏兵器。征用各地马匹，以作战马和驮运军用物资。官至七品，仅能留马一匹供乘坐。诸路以户口为率，富室征马多至60匹，共征调56万匹马。此外，还积聚大量军粮和饲料，“诏河南州县所贮粮米以备大军，不得他用，而骡马所至当给刍粟”。^⑤

海陵王的备战，完全不管财力是否能够承受，任意决定，强制推行。如当所征集的军马缺少饲料，主管官员向他请示办法，他说：“今禾稼满野，骡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岁不获，亦何伤乎。”^⑥简直利令智昏。这类备战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征发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⑦众多的丁壮被迫背井离乡，妻离子

①④⑤⑥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李通传》，第2784、2785页。

②③ 《会编》卷二百四十二《正隆事迹记》。

⑦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李通传》，第2785页。

散，“百姓以父行而子留，泣号盈城，三日不绝”^①。一片悲惨的景象。大批的马匹死于运输途中，“狼籍于道”^②。各地制造兵器所用材料，“皆赋于民”，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③修造战船，“毁民庐舍以为材”^④。广大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海陵王十分关心战前的军备情况，曾亲临通州造船工地巡视。但是，他根本不懂政治攻势及“人和”在战争中的作用。太医使祁宰说：“宋人无罪，师出无名”，^⑤谏阻出兵，被海陵王杀死。他的嫡母、太后徒单氏反对迁都和伐宋，也被他杀死。“百官箝口结舌，无更言者”。^⑥依靠诛杀以求得一致，结果只能是离心离德，自我削弱。

金朝从金熙宗与宋议和到海陵王统治前期，社会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时期。海陵王为兴师备战，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空国以图人国”^⑦，影响了金代社会的正常发展。

第三节 海陵王攻宋

（见附图 7）

一、金军四路进兵与南宋的抗战部署

正隆六年（1161 年）九月，海陵王把征发的各路军队统编为神策、神威、神捷等 32 军，每军设都总管、副都总管，军以上设左、右领军大都督及左、右监军和左、右都监。以太保、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为左副大都督，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为右领军副大都督，御史大夫徒单贞为左监军，同判大宗正事徒单永年为右监军，左

①⑥ 《会编》卷二百四十二《正隆事迹记》。

②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李通传》，第 2785 页。

③④⑦ 《金史》卷五《海陵纪》。

⑤ 《金史》卷八十三《祁宰传》。

宣徽使许霖为左都监，河南尹蒲察斡论为右都监。全军由海陵王亲自统帅，分为四路攻宋：水路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府尹完颜郑家为副都统制，率领水军从海道进攻临安。中路以太原府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府尹仆散忠义为副都统制，自蔡州攻荆襄。西路以河中府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平阳府尹张中彦为副都统制，由凤翔取大散关，待命入川。海陵王亲领金军主力为东路，以武胜、武平、武捷三军为前锋，从淮西南下。^①出兵前，海陵王在尚书省设宴款待诸将，亲授攻宋方略，并预言“远则百日，近止旬月”，一举灭宋。^②十月，金军大举攻宋，金宋战争全面展开。

金军南下之前，宋朝已有所察觉。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宋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孙道夫使金还朝后，报告了金朝正在备战的动向。^③中书舍人陈刚中和知兴元府姚仲都提出在川陕备战的建议。以后，权尚书吏部侍郎叶义问建议宋高宗，以防盗等名义，“遣沿边戍卒”，秘密备战。^④大臣李宗闵上奏，建议朝廷从严守备、募新军、通邻国三个方面加强战备。^⑤国子司业黄中、中书舍人洪迈等人，都提出“密为边备”的建议。但是，这些建策遭到宋高宗和左丞相汤思退、同知枢密院事王纶等人的压制，造成“士之有识者，默为此虑，而未敢显言为备”^⑥。直到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末，金朝贺宋正旦使施宜生向宋朝透露了金兵即将南侵的消息，宋高宗才感到形势严峻。绍兴三十年（1160年）春，派

① 《金史》卷五《海陵纪》，《金史》卷一百二十九《李通传》。

② 《金史》仅记金出兵“三十二军”数，并记征兵“数十万”。有关金兵力情况可参见《会编》卷二百三十五载：“大金起兵六十万，以十万出清河口，渡江不战，但为疑兵，以当淮东之军；以二十万分往京西、淮西，以三十万随主来。”

③ 参见《宋史》卷三百八十二《孙道夫传》。

④⑥ 《要录》卷一百八十一，第3005页。

⑤ 同上，第3015～3016页。

叶义问使金，打探消息。^①当金军南侵的消息被证实后，群臣激愤，要求罢免汤思退，宋高宗被迫将汤思退罢官。^②随后，南宋开始作应战的军事部署。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在金使到临安，逼迫宋朝割让淮南地区后，宋廷感到战争已不可避免。右丞相陈康伯召集三衙帅赵密、成闵、李捧及杨存中、虞允文等文武大臣，商议抵御金军的对策。随后任命吴玠为四川宣抚使，与四川安抚置制使兼知成都府王刚中负责川陕防务。命夔路安抚使李师颜随时策应荆南。成闵率3万人至武昌，防守长江中游。调集浙东五郡禁军弓弩手于明州，听候判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该指挥。浙西诸郡及衢、婺二州军兵，集结于平江府，由浙江副总管李宝统辖。江东诸郡兵，集中于池州，由都统制李显忠统领。福建诸郡兵集中太平州，归属御前破敌军统制陈敏指挥。湖南北沿边诸郡兵集中于荆南，由都统制李道指挥。江西诸郡兵集中江州，由都统制戚方指挥。任命汪澈为湖北、京西宣抚使，负责湖北、京西地区的军事。起用老将刘锜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担当江淮地区抗敌的重任。在金军大举进攻之前，南宋的防御体系基本建立起来。^③

二、金军西路受挫和中路兵败

正隆六年（1161年）九月初，徒单合喜、张中彦统领的金西路军首先发动攻势，从凤翔进取大散关，顺利完成了预定计划。于

①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叶义问传》载：“上闻金有犯边意，遣义问奉使觐之，还奏：‘彼造舟船，备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驻沿海要害备之。’”

②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汤思退传》，第11531页。

③ 参见《要录》卷一百九十，第3174~3180页。《宋史》卷三十二《高宗纪九》。

是，“深沟高垒以自固”^①，等待入川的命令。随后，仅派出小股游骑深入到西南的黄牛堡（今陕西黄牛铺），遭到宋守军的神臂弓阻击，即撤回大散关。宋四川宣抚使吴玠接到黄牛堡守将李彦仙的敌情报告后，立即上杀金坪（今陕西略阳北、仙人关东北）指挥宋军抗击金军，命部将高嵩领一军增援黄牛堡，随后吴玠亲领大军进驻黄牛堡南面的青野原。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刚中也及时赶到，与吴玠协力拒敌。吴玠决定调集各路军队分道而进，反击金军。九月中旬，吴玠领李彦仙、高嵩等继续在黄牛堡、青野原等地与徒单合喜金军主力对垒。与此同时，派部将彭清率一军深入到宝鸡渭河，夜劫金军守备的桥头寨，以扰乱金军后方；派前军统领刘海、同统领王中正、左军统领贾士元率军 3000，进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以切断秦州与大散关之间联系。九月下旬，刘海部占领秦州。彭清桥头寨获胜后，进克陇州（今陕西陇县）及方山原（今陕西宝鸡西）。金军驻守的洮州（今甘肃临潭）、兰州（今甘肃兰州市旧皋兰），也相继投降。十月，吴玠又指挥川陕宋军分路进击，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的东洛谷口、伏羌城、顺德等地击败金军，攻占陕西许多州县。^②金西路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直到战争结束，败势尚未扭转。

刘蕐、仆散忠义率领的金中路军，于九月下旬，从蔡州（今河南汝南）进攻光化军（今湖北光化北）。^③宋鄂州都统制吴拱派游奕军统制张超增援，刚入光化城，金先锋骑兵数百随后冲入光化城。两军展开巷战，金骑兵战败，退出光化城。十月初，刘蕐又派兵西攻，接连攻克信阳、罗山、光州等地。十月中旬，刘蕐

① 《要录》卷一百九十二，第 3217 页。

② 参见《要录》卷一百九十二，第 3217～3226 页。

③ 光化军，《要录》、《金史》等书均作“通化军”。故后人著述常把该地误为陕西永康西北的通化。《大金国志》卷十五《海陵炀王下》作：“又攻光化军”。光化军曾一度被称通化军，《金史·光英传》记其缘故说：金天德四年二月，海陵王立子光英为皇太子，金避忌改某些衙等名称。“宋亦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为‘期思县’，‘光化军’为‘通化军’云。”

遣 3000 骑兵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宋军已有准备，吴拱也从鄂州（今湖北武昌）领兵进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金军受阻于樊城护城河外，宋将翟贵、王进出击，金军撤退，宋军随后追击，误中金军的埋伏，翟贵、王进战死，士卒死伤过半。但扼止金中路军攻势，迫其转向淮东。宋均州知州武钜趁河南金军兵力空虚，派忠义民兵和官军收复邓州（今属河南）。成闵等京湖方面宋军大举反击，到十月下旬，先后收复了光州（今河南潢川）、新蔡（今属河南）、平舆（今属河南）、蔡州等地。

三、金水军覆灭与东路军渡淮

正隆六年（1161 年）十月初，苏保衡与副统制完颜郑家（金郾王完颜昂之子）率由数百艘战船组成的金水军，沿海道向南进发。^①海陵王命令水军于当月十八日赶到钱塘江，配合金军主力攻击南宋都城临安。金水军船队刚到胶州湾口，便遇海上风暴，战船无法行驶，被迫停泊在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州）的陈家岛，以等候大风过后继续行驶。

南宋方面一直“注意于海道”，^②并在海门县的料角（今江苏海复镇附近）做了严密的防备。战前几个月，楚州通判徐宗偃又提出在楚州盐城县（今江苏盐城）增兵驻防，并装备战船，以配合料角控扼海道。宋在浙西和通州（今江苏南通）等地，也都部署有“海舟兵”^③。同时，派出侦探刺探军情，“谍者得其实以闻”^④。金水军的兵力、装备、进兵路线和战略意图，尽在宋军的掌握之中。在此基础上，南宋形成了主动迎击金水军的作战方案。驻守平江府的浙西马步军副总管李宝，主动请求率军迎击金水军。

八月中旬，李宝率水军 3000，战船 120 艘从江阴（今属江

① 参见《金史》卷六十五《完颜郑家传》。

② 《要录》卷一百八十六，第 3117 页。

③④ 同上，第 3118 页。

苏)起航,东出长江口,战船迎风北上。舰队航行三天,海风大作,舰队被风暴打散,随风向南漂流,李宝收集流散船只,入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的关澳停泊。

九月下旬,李宝率船队出明州关澳继续北上。十月初,李宝舰队抵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在此之前,忠义兵民魏胜已占领海州(今属江苏),进入沂州(今山东临沂),被金军击败,退守海州。金兵进而包围海州,形势十分危急。李宝率军赶到后,立即登岸投入战斗,击溃金兵,解海州围。而后,李宝挥师沿海道北上。

十月下旬,李宝水军进至密州胶西的石臼岛。这时金军水军副都统完颜郑家领一部分战舰停泊海口外的唐岛,两军相隔30余里。李宝趁金军没有察觉,突袭唐岛金军,金水军慌忙起锚升帆,宋军火箭齐发,金船队起火,火势迅速蔓延,金水军几百艘战船被火烧毁,金兵跳海溺死者甚众,侥幸逃到唐岛岸上的金兵,也都被宋军俘虏,完颜郑家也死于战火之中。在陈家岛的金水军统制苏保衡见势不妙,率余部退入胶州湾。这一仗,宋军俘获金兵3000余人,缴获“其统军符印与文书、器甲、粮斛以万计。”^①

正当金军西路、中路、水路与宋军作战的同时,海陵王亲统东路军主力大举攻宋。正隆六年(1161年)九月,海陵王从开封南下,派左监军徒单贞(海陵王妹夫)领兵2万,直指东南的淮阴(今属江苏),在清河口张大声势,吸引南宋两淮的兵力。^②大军随后迅速逼近淮河北岸的渦口(今安徽怀远南)。十月初,海陵王大军从正阳镇(今安徽正阳关南)渡淮河,占领寿春(今安徽寿县)。而后主力向庐州(今安徽合肥)、和州(今安徽和县)方向推进,分出一军由大将萧琦率领,经定远(今属安徽)、滁州

① 参见《宋史》卷三百七十《李宝传》;《要录》卷一百九十三,第3251~3252页。

② 关于徒单贞部兵力,见《金史》卷五《海陵纪》,《会编》卷二百三十五《野叟续录》。

(今属安徽)取扬州(今属江苏),以接应徒单贞从淮阴南攻。

在金军主力渡淮之前,南宋方面已经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老将刘锜扶病从镇江(今属江苏)赶到扬州指挥迎敌,派副帅王权负责淮西防务,要求各军严密防范几处淮河渡口,把金军阻截在淮河以北。但是,战争爆发后,宋军部署出现了很大的漏洞。首先,刘锜中了海陵王的声东击西之计,注意力被进攻淮阴的金徒单贞部吸引过去,领兵进驻楚州,部署大量军队,增调数十艘海船,以阻止金兵从清河口渡河。其次,担负淮西防务的王权畏敌如虎,迟迟不肯进兵,在刘锜的严令之下,才勉强进庐州。而且,未及时在淮西设防,使金军得以长驱直入,渡淮南下。王权不敢抵抗,放弃庐州南逃,把淮西拱手让与金军。淮西一失,淮东难以保全,宋御敌于两淮的计划破产。

金军抓住战机,发动攻势,以扩大战果。萧琦部经定远轻而易举占领滁州。金兵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安抚占领区居民,使百姓各安其业。萧琦部再攻真州(今江苏仪征),与宋侍卫步军司右军统制邵宏渊部发生激战,击败宋军,并不入城,从山路直取扬州。刘锜在后方受到威胁,又接到朝廷命他退守江南的“金字牌”,于是率军从楚州往扬州撤退。金徒单贞部乘势渡河占领盱眙(今属江苏),继续向扬州进击。刘锜自知难以抵挡两支金军攻击,从扬州退守瓜州(今江苏扬州市长江北岸老运河入江处)。金军占领扬州后,追击刘锜至瓜州,刘锜退回镇江。海陵王也率军连克庐州、和州(今安徽和县)。金军追击王权溃军到长江边,王权乘船逃到东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找不到船的宋兵跳江逃命,溺死者过半,金军进而占领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今安徽和县东)。至此,金军取得渡淮之战的胜利。^①

金宋第一阶段的战争,历时一个多月,从整个战局来看,对

^① 参见《要录》卷一百九十三,第3232~3249页;《会编》卷二百四十二《正隆事迹记》,《金史》卷五《海陵纪》,《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刘锜传》。

金方有利。虽然金西路受阻于陕西，但是牵制住兵力较强的川陕宋军。中路的作用是掩护东路主力，尽管受挫于襄阳，但损失不大，转移淮东有效地配合了主力作战。水军一路是四路军中最弱的一路，直到十月下旬还未离开胶州湾，它的失败并不影响整个战局。两淮是金宋双方争夺的主战场，金军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并获得胜利。此战第一阶段的优势在金不在宋。

四、金东京政变与海陵王兵败

正隆六年（1161年）十月八日，金东京留守完颜雍（金太祖孙）利用海陵王在前线作战的时机，在金东京（今辽宁辽阳）发动政变，杀死副留守高存福等，即皇帝位，改元大定。^①完颜雍（金世宗）即位后，对参与政变的将领授予军事要职，任命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高忠建为元帅左监军，完颜福寿为右监军。金世宗为了争取各地握有兵权的将帅支持，升领兵3万驻守归化（今河北宣化）的西北面行营都统完颜劄英为左副元帅，肇州防御使神土懋为元帅右都监，大批海陵王朝旧官员被授以原职。同时，下诏历数海陵王的罪恶，号召军民归附新君。

东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前线后，对海陵王和攻宋金军造成很大震动。海陵王叹道：“我本欲灭宋后改元大定，岂非天命乎。”^②于是，派右议军郭瑞孙领一军回师北攻，镇压黄河以北的反叛；并亲自领军继续南攻，准备灭宋后再解决内乱。十月底，金兵全线推进到长江边，海陵王督责将士昼夜赶造战船，准备从杨林口渡江。

金军进至长江边，宋廷惊慌失措，宋高宗又想逃到海上躲避金军，文武官员也纷纷准备逃离临安。由于左仆射陈康伯和太傅杨存中等人的坚决反对，宋高宗才同意作抗击金军的部署，并派

① 见《金文最》卷五《世宗即位大赦改元诏》。

② 《金史》卷五《海陵纪》。

遣中书舍人虞允文到前线犒师。十一月上旬，虞允文到采石，宋残兵败将三五成群坐在路旁，主帅刘锜病重居镇江，副帅王权被罢官，新帅李显忠尚未到任，宋军官兵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之中。见此情景，虞允文毅然负起抗击金军的重任，立即组织军队，鼓舞士气，部署迎敌。宋军以步骑列阵江岸，水军战舰分为五队，两队沿两岸巡视，一队部署在江中流，另外两队作为预备队隐蔽在小港中，当涂民兵也驾船协同作战。虞允文刚部署完毕，金军便开始发动渡江之战。^①

海陵王派战船渡江攻采石，并亲临岸边指挥作战，岸上设置红黄两种旗帜，红旗举则进，黄旗倒则退。金战船首尾相衔，鱼贯出杨林口，进逼南岸。宋水军驾海鳅车船把金舰队拦腰截断，随后向金船队发动攻击，两军展开水战。金军使用的都是底阔如箱的平底船，行动迟缓，又不熟悉江道，战斗一开始就陷入被动，首批渡江船队很快被宋军消灭。第二天，宋军战船直抵杨林口攻击金军剩余船队，再次击败金军，并“以火船焚其余舟一百八十余艘”^②。海陵王采石渡江失败，被迫退回和州。采石之战是金军由胜至败的转折点。

十一月下旬，海陵王率军转移到扬州，企图从瓜洲渡江。虞允文、杨存中、成闵、邵宏渊等部宋军也进至镇江，作抵御金军的部署。南宋水军大小战船布列江中，24艘高大车船，“中流上下，其转如飞”，金兵“相顾骇愕”。^③海陵王不顾将士的反对，孤注一掷，命令金军三天内全部渡江南下，后渡者处死，促使金军发生内变。金兵部尚书、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和猛安唐括乌野、骁骑副都指挥使王祥、武胜军都总管徒单守素等人经过秘密策划，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黎明，发动兵变，攻入海陵王寝帐，杀死海陵王，

① 见《要录》卷一百九十四，第3260、3261页；《宋史》卷三百八十三，第11794页；《会编》卷二百四十一引《虞尚书采石毙亮记》。

② 《要录》卷一百九十四，第3264页。

③ 《大金国志》卷十五《海陵炀王下》。

同时处死李通、郭安国、徒单永年、梁琬、大庆山等军政要员。^①十二月初，完颜元宜领金军北还，海陵王攻宋最后以兵败身亡告终。

海陵王攻宋失败的原因，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轻视南宋力量，战备欠充分。海陵王不听臣下灭宋准备“以十年为期”的建议，声称取江南有5000硬军就够了。认为“远则百日，近止旬月”，就能一举灭宋。在这种轻敌的思想指导下，因而缺乏充分的战备。

二是占领两淮后没有及时调整战略。金军在两淮战场获胜后，应及时调整战略，集中各路兵力于两淮，并进行必要的休整补充，为下一阶段战役作准备。然而，海陵王急于求成，不顾水军力量不足，贸然渡江，结果被占优势的南宋水军击败。

三是水军力量不足。海陵王建立起第一支金朝水军，改变了金军无水师的状况。但是，水军尚未发挥作用即败于南宋水军。金水军的覆灭是海陵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后方政变，造成军心不稳。金东京发生政变，使前线金军有后顾之忧，军心动摇，起到了瓦解金军斗志的作用。

海陵王在金朝大力推行封建化，镇压贵族反对派，迁都燕京，改革政治制度，并发动攻宋战争，试图建立统一南北的封建政权。尽管海陵王的统一事业未能实现，但他所改革的政治制度，却为以后的统治者所继承，为金朝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完颜元宣传》，《会编》卷二百四十一引《神麓记》、卷二百四十三引《炀王江上录》。

第十章 宋金相持阶段的战争（下）

海陵王攻宋失败后，宋金实力均衡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仍处于军事上相持阶段。金军有秩序地撤退，兵力损失不大，宋军乘势北伐却损兵折将，于是金宋双方议和。南北议和使双方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金朝的政治、经济基本完成了封建制改革，国力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金对宋采取和缓政策，遵守双方订立的协议，努力避免发生战事。南宋高宗退位后，经孝宗、光宗到宁宗，政治较为稳定，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宋宁宗和执政大臣韩侂胄等人认为北伐时机成熟，不断挑起事端，以至发动大规模的北伐战争。金朝组织南征军予以还击，结果金军获胜，宋金双方再签和约。

第一节 宋孝宗即位及对金政策的转变

一、和战之争与高宗退位

南宋抗击金海陵王获胜后，形势极为有利。是乘胜出兵反击？还是继续遵循以往的求和政策？成为南宋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南宋统治集团由此引发的和战之争，使南宋政局发生了某些新变化。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宋廷得到通报，金使将于二月渡淮到临安。对于金使前来，南宋君臣的态度不一。有人认为，金使此行的目的是“欲观吾进退，视吾虚实”。一些更主张坚决拒之国门外。宋高宗说：“今若拒之，则未测来意，有碍交好。”指示礼待金使。在如何接待金使的问题上，不少人认为，金毁约南侵，原盟已绝，接待金使当用敌国礼，不能再用臣礼。宋高宗表

示：“朕料此事终归于和”，“以小事大，朕所不耻”，^①继续实行投降求和的政策。闰二月，金使高忠建等将入宋境，要求宋行臣礼和索要战争期间被宋军收复的诸郡。宋接伴使洪迈批驳了金使的无理要求，用对等的敌国礼接待金使于虹县（今安徽泗县）北虞姬墓。这是自和议后宋对金首次抗礼相交。三月，金使到达临安，宰相陈康伯等又以对等礼接待。宋高宗派洪迈为国信使赴金，又付札说：“若彼能以河南地见归，必欲居尊如故，正复屈己，亦何所惜。”^②仍一心要“屈己”称臣。洪迈当即回复说：“山东之兵未解，则两国之好不成。”^③让宋高宗放弃称臣求和的想法。洪迈到燕京，金朝强迫他执臣礼，洪迈不从，被关押三日后遣还。

当时，南宋朝野主张乘胜反击金军的呼声很高，不仅要求恢复中原，而且还要一举灭金。军民希望坚决抗金的张浚出来主持南宋军事（张浚是在前一年形势危急时才被任命为建康知府），但是宋高宗却任命主和派杨存中（原名杨沂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全面主持前方军务，另以虞允文充任副使。宋高宗不用“众望属之”的张浚领兵，“中外大失所望”。^④给事中金安节、起居舍人刘珙提出：“宜别择重臣，以副盛举。”^⑤宋高宗大怒，认为这是专为张浚说话。刘珙等人不畏强权，继续上书抗争，宋高宗只改任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两淮地区的军权仍交付杨存中。有人气愤不过，劝张浚辞职，张浚认为当前的情况下应该以国事为重，继续留任建康（今江苏南京），积极备战。张浚被“军民恃以为重”，^⑥充分反映出人民反对求和主张抗战的愿望。

宋高宗的投降政策，在军民的一片抗敌声中难以继续下去。宋高宗有意退位，与宰相陈康伯商议，陈康伯建议先立太子以正名

① 以上引文见《要录》卷一百九十六，第3313、3314页。

②③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洪迈传》，第11571页。

④⑤ 《要录》卷一百九十六，第3315页。

⑥ 同上，第3306页。

分。^①五月，诏立赵玮为太子，改名昀。六月，传位给太子赵昀（宋孝宗）。宋高宗退位，标志着投降求和政策结束。

宋孝宗即位后，开始着手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整整半年之久的和战之争，使南宋丧失了北伐的有利时机。宋高宗在退位前夕，又有意设置障碍，撤销招讨司、宣抚司等军事机构，对南宋的军事部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金朝方面则利用这一时机，及时地调整了军事部署，有效地阻止了宋军的反击。

二、孝宗的决意抗金及其半途而废

宋孝宗即位后，一改宋高宗投降求和的政策，决意抗金，积极备战。因而，在指导思想、人事任免和军事部署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宋孝宗为皇子时就积极主张抗金，金海陵王领兵南下，“朝臣多陈退避之计”，他非常愤慨，请求“率师为前驱”。^②他即位后，对军事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视。六月十一日，内禅礼刚过，在颁行的大赦诏制中，他对军中克剥士卒等弊端进行严责，要求将领对士卒，“务加优恤，以养士气”。并明确规定，“不许私役战士盖造私第，营葺房廊，修筑园圃及兴贩工作等”。不久，又亲自札付工部长官，下令革除军器所私役工匠的旧习，要求“专一造作军器，务要精致”。^③当月宋孝宗又亲自召在建康的张浚相见，商议军事。宋孝宗对张浚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④张浚极力陈说和议的错误，劝宋孝宗坚决备战，以图进取。宋孝宗立即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节制屯驻军马，加少傅，封魏国公。七月，宋孝宗又下诏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岳飞原官爵，依礼改葬于栖霞

① 参见《宋史》卷三百八十四《陈康伯传》。

② 《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一》。

③ 以上引文见《要录》卷二百，第3387页。

④ 《要录》卷二百，第3391页。

岭下，还特予录用了岳霖等岳飞子孙。岳飞抗金有功而被杀，引起人们长久的怀念和不平，主战派和太学生也多次上书为岳飞鸣冤。海陵王南侵后，宋朝群情激愤，抨击秦桧主和祸国，要求给岳飞平反的呼声达到了高潮。但是，宋高宗等一直置之不理。宋孝宗即位，起用主战派张浚取代杨存中负责两淮军事，昭雪岳飞冤狱，表明了抗击金军的决心，在当时是很得人心之举。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史浩为右相兼枢密使，陈康伯任左相。他又起用因反对和议遭到宋高宗和秦桧贬逐的辛次膺为同知枢密院事。曾上书力斥和议，要求斩秦桧等人的胡铨，也被从编管之地召回朝，后升任兵部侍郎。在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并禁止擅自到行在。^①一时间，主战派在朝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宋孝宗即位后的举措，使南宋军政为之一振，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但是，宋高宗虽然退位，仍以太上皇的身份起着一定的作用。宋孝宗在给岳飞平反时，表示这是秉承高宗的圣意。对待宋高宗安插的主和派史浩，也一再委以重任。史浩在朝中散布他的和战论：“战与和则在彼不在此，彼战则战，彼和则和”，^②不但反对积极主动反击金军，而且提出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张浚驳斥了史浩的“不守两淮而守江干”的主张，认为这是“息战守之气”，向敌人示弱，筑城也应在淮河上的泗州。^③张浚的抗金部署，“浩必沮挠”。^④宋孝宗在他的影响之下，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外交方面，宋孝宗不顾张浚的反对，听从史浩的意见，派使臣前往金朝通报即位，“金责旧礼，不纳而还”。^⑤军事方面，解除了李宝的水军指挥权，^⑥遣散东海舟师。^⑦又误听弃三路（秦凤、熙河、永兴）以守川口之议，下诏命吴玠从川陕前线退兵，结果为金军所乘，宋军死伤惨重，3万将士仅7000人撤

①⑥ 参见《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一》。

②④⑤⑦ 《要录》卷二百，第3394页。

③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第11308页。

回，川陕前线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等地区，又全部丧失。^①以后，宋孝宗虽在隆兴元年五月，罢免史浩，但造成的损失已不可挽回。

第二节 金世宗稳固内部、缓和外部的方针

一、稳固内部的措施

金世宗是一位崇尚儒学、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的女真贵族，他在东京即位后能很快控制全国的政局，这与他实行了稳固内部、缓和外部的方针有很大的关系。

金世宗东京称帝之后，对待海陵王及其制定的政策，并未采取全盘否定的做法，而且分寸掌握得十分恰当。在下诏历数海陵王的罪恶时，仅限于揭露其篡位、杀戮、荒淫和兴土木之工等。^②金世宗虽表示“将拨乱而反正”，^③但在政治体制和军事制度等方面基本上仍沿用海陵王改革后的成制。当时，拥立金世宗的女真旧势力主张完全恢复女真旧制，并建议金世宗还都上京会宁府。金世宗“无牵于众惑”，采纳了参知政事李石的建议，“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④入据中都后，金世宗采取和缓的方式对朝廷内部进行整饬，使金朝政权平稳地完成了过渡。

金朝政权得以平稳过渡，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人政策稳当。金世宗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而是“内外大小职官并与覃恩，仍委尚书省条奏施行”。^⑤继续任用海陵王时文武官员，并竭力争取女真贵族的支持。完颜昂（奔睹）是海陵王很信任的重臣，曾

① 参见《宋史》卷一百二十五《吴璘传》；《要录》卷二百，第3402页。

② 参见《金文最》卷五《世宗即位大赦改元诏》。

③ 同上卷五《上闵宗谥号诏》。

④ 《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第1912页。

⑤ 《金文最》卷五《世宗即位大赦改元诏》。

任太保、枢密使、都元帅等职。海陵王死后，金世宗仍授予他太保、都元帅，掌握兵权。金世宗亲写手诏给正在陕西领兵作战的统军使徒单合喜，说：“卿军不多，未宜深入，当领军屯境上。陕右重地，非卿无能措画者。俟兵革既定，即当召卿，宜自勉之。”^①表示了对徒单合喜的信任，并继续让他袭任陕西路统军使的原职，不久又升任元帅右都监。因此，金政权交替过程中，金军进退有序，使宋军无可乘之机。张浩在海陵王朝任太傅、尚书令，“在省十余年，练达政务”，^②金世宗即位后立即派人召谕，封他为太师、尚书令。张浩入朝后，处理政务，举荐人才，朝政得以正常运行。

金世宗还善于争取反对派。枢密副使、北面行营都统白彦敬与副都统纥石烈志宁都是海陵王时期主持一方军事的重要官员，当得知世宗将称帝，联络会宁尹完颜蒲速赉、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等，准备出兵讨伐。金世宗即位后，派九人使团招白彦敬、纥石烈志宁，他们尽杀金世宗使者以拒，并领兵与金世宗的军队作战，后穷蹙被迫归降。金世宗仍予以重任，以白彦敬、纥石烈志宁分任曷速馆节度使和临海节度使，领兵参加镇压移剌斡窝起义，对稳定金朝的北边起到重要作用。以后不久，二人又都被召入朝，白彦敬任兵部尚书、御史大夫，纥石烈志宁任副元帅、平章政事等职。纥石烈志宁后来成为对宋作战的主要将帅。

金世宗对下层军民也采取较为和缓的政策。在前线保留部分骑兵等精锐部队，以防止宋军反击的前提下，放免海陵王强征来的河北、山东、陕西等路的征南步军回家。派遣大臣安抚山东等地，对起义农民和逃避徭役的流民，“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使他们能“归业，及时农种”。^③下诏河南、陕西、山东等地，要求把官军掳掠的所谓盗贼予以释放。这些做法，对于阶级矛盾的缓解，社会的稳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① 《金史》卷八十七《徒单合喜传》，第1942页。

② 《金史》卷八十三《张浩传》，第1864页。

③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金世宗的统治也由此得到了巩固。

二、以战促和的战略

金世宗在海陵王被杀后，主要精力用于金朝内部的整顿，并无意继续海陵王的灭宋之举。但是，为了防止宋军乘胜反击，于是采取以攻为守、以战促和的战略，主动向宋军发动攻击，最终达到议和的目的。

大定元年（1161年）十二月，金世宗任命左副元帅完颜劄英负责南边及陕西等路军务。^①从大定二年（1162年）正月，在完颜劄英的指挥下，金军对河南、两淮等地的宋军接连发动攻势。^②正月初，金兵攻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宋枢密院忠义前军正将刘泰领兵救援，金兵撤退，刘泰身受重伤而死。^③正月中旬，金兵攻蔡州（今河南汝南），宋侍卫马军司中军统制赵樽率军据城抵御，京西制置使吴拱派踏白军统制焦元增援。金兵攻入蔡州，宋军与金军展开巷战，迫使金兵退走。^④

二月中旬，金军攻汝州（今属河南），击败驻守汝州城的宋鄂州统制官王宣，包围汝州。王宣接到班师诏，领兵弃城突围，退到唐州（今河南唐县）。金嵩州刺史石抹突刺等领兵在寿安（今河南宜阳）击败宋军，金郑州防御使蒲察世杰取陕州（今河南陕县）。^⑤金军取得陕州、寿安、汝州等战胜利后，集中兵力再攻蔡州。金将裴满领兵数万据蔡州城西北一里，依汝河安营，准备攻城。守城宋军赵樽、焦元等部共6000人，宋京湖制置使吴拱率军进驻南阳（今属河南），声援蔡州守军。金兵攻破蔡州南门，赵樽亲自领兵从西城赶来增援南门，在宋军的坚决抵抗之下，金兵败出城。此

①⑤ 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② 参见《金史》卷七十二《完颜劄英传》。

③ 参见《要录》卷一百九十六，第3305页。

④ 同上，第3308页。

战金军死亡 1000 余人，宋军也伤亡 4000 多人。几天后，金兵再攻蔡州西门，又被宋军击退。吴拱一面派遣 1.3 万步骑从南阳赶赴蔡州，一面下令赵樽弃蔡州撤退。吴拱部统制官游皋领援军行至确山（今属河南），驻军不进。吴拱再派王宣领兵往援，王宣行至距确山 35 里处安营。金将裴满派一军前往阻击，两军在确山展开激战。王宣以骑兵 3000，分三阵前进，步兵随后进击，右军副将汲清领 200 骑兵率先冲入敌阵，金军向蔡州方向退却，王宣不敢追击。赵樽乘夜率军民撤出蔡州，经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还至德安（今湖北安陆），王宣也还军襄阳（今湖北襄樊）。蔡州被金军占领，金军取得蔡州争夺战的胜利。^①

二月下旬，金世宗命都元帅完颜昂置元帅府于山东，负责对宋作战。^②完颜昂是随金太祖灭辽的开国老将，参加过灭北宋和两次攻南宋的战争，曾多年驻军山东。海陵王攻宋，他为左领军大都督，海陵王被杀后，他指挥军队有秩序地北撤。金世宗派完颜昂到前线“经略边事”^③，是很有眼光的。完颜昂与完颜玠英一东一西展开攻势，金军接连收复了淮宁府（今河南淮阳）和亳州（今属安徽）、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

在川陕方面，金世宗仍授以徒单合喜为陕西统军使、元帅左都监等职，并增兵与宋军争夺陕西。金军取得华州（今陕西华县）、河州（今甘肃和政北）等战胜利后，又在德顺州（今甘肃静宁）和原州（今宁夏固原）等地击败川陕宋军主力，占领陕西全境。^④

金世宗即位初期的对宋作战，仅投入很少的兵力，实施以攻为守的策略，目的是赢得时间，使金军主力能迅速镇压北边契丹起义军。大定二年（1162 年）六月，金军镇压了契丹起义军后，主

① 参见《要录》卷一百九十七，第 3326～3329 页。

② 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③ 《金史》卷八十四《完颜昂传》。

④ 参见《金史》卷八十七《徒单合喜传》。

力南移，宋军此时再进行北伐，已失去战机。

第三节 淮东争夺战与重订和约

一、淮东争夺战

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在宋孝宗的支持下，张浚指挥集结于盱眙（今属江苏）、濠州（今安徽凤阳）、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的宋军，率先向驻守淮南东路地区的金军发动攻击，宋金战争再次爆发。

五月中旬，宋军两路出击，主管殿前司李显忠从濠州出兵，渡淮河北上攻灵璧（今属安徽），建康都统邵宏渊出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进攻西北的虹县（今安徽泗县）。李显忠部进至灵璧县南的陡沟，与金右翼都统萧琦遭遇，宋军击败金军的拐子马，萧琦退至灵璧城下列阵迎战。李显忠亲率军猛攻敌阵，金军败逃，宋军占领灵璧。^①邵宏渊围攻虹县遭到金守军的顽抗，久攻不下。李显忠军东趋虹县，并派灵璧金降卒招降了虹县金军。邵宏渊认为李显忠抢了他的功劳，心怀忌妒。李显忠又杀了抢金降将佩刀的邵宏渊部兵，于是二将结怨，埋下隐患。宋军占领灵璧、虹县后，张浚渡江视师，士气大振，金右翼军都统萧琦也向李显忠投降。随后，李、邵两军西攻宿州（今属安徽），在护城河外击败金军，进至城下。李显忠部署攻城，邵宏渊不服从调动，李显忠率所部攻入城，邵宏渊领军也随后入城，经过激烈巷战，宋军占领宿州。宋孝宗手书嘉奖前线作战的将士，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②宋朝方面对于战局过于乐观。

金朝方面对于宋军的北伐早有准备，金军主力已从北方调到南方前线，纥石烈志宁部业已进驻睢阳（今河南商丘），右丞相兼

^① 参见《宋史》卷三百六十七《李显忠传》。

^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第11308页。

都元帅仆散忠义也赶到南京（开封）负责指挥金军作战。金世宗并不想把战事扩大，战前指示仆散忠义：“彼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①五月下旬，金军开始大规模反攻，纥石烈志宁领精兵万人，从睢阳攻宿州。纥石烈志宁在宿州城西布满旌旗，作为疑兵，以三猛安军部署在城南；自己亲领大军驻扎城东南，以截断宋军退路。李显忠并未把纥石烈志宁军放在眼里，扬言：“当令十人执一人也”。^②望见城西敌旌旗蔽野，误认为金军主力在城西，决定避实击虚，先消灭东南面的少数金军。李显忠派步骑数万，手执盾牌背城列阵。金右翼都统夹谷清臣率军向宋军发动进攻，两军短兵相接，宋军阵脚大乱，在金军的追杀下，败退城中。第二天，两军再战，李显忠以骑兵居前，五六千骑兵为一队，向金军发起冲锋，步兵随后进击。纥石烈志宁指挥金军迎战，仍以夹谷清臣为前锋，金军奋勇力战，宋军大败，自相践踏，伤亡惨重，宋军争相入城，城门阻塞，士卒爬城而上，被金兵射死很多。此战宋军骑兵死伤1.5万人，步兵死伤3万余人。金军乘势攻城，李显忠拼死抵抗，击退金军。由于外无援兵，邵宏渊又不合作，还散布流言动摇军心，李显忠被迫连夜撤军。金军追至符离（今安徽宿县北），又斩杀宋兵4000余人，宋兵落水溺死不可胜计，金兵缴获铠甲3万副，兵器辎重甚众。^③淮东争夺战的结果，宋军失利。

二、金逼宋重订和约

宋军兵败符离，张浚正在盱眙，立即渡淮河前往泗州抚慰宋军将士，并果断地在军事上做了应变的部署：以刘宝为镇江诸军都统制，委派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

① 《金史》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第1937页。

② 《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第1932页。

③ 参见《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宋史》卷三百六十七《李显忠传》。

合，集中水军于淮阴，马军于寿春，在高邮、巢县、滁州关山等地，修筑城防工事，加强守备，从东到西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防御体系。^①张浚的部署稳定了军士，阻止了金军乘胜继续扩大战果。但是，主和派抓住宋军失利，大肆攻击张浚主战之误。宋孝宗也对再战发生了动摇，起用汤思退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准备同金朝议和。张浚被降职，辛次膺反对起用汤思退与议和，也辞官而去。宋金又开始了议和谈判。

金宋和谈，主动权一开始就掌握在金朝方面。在军事较量中金朝是胜方，所提出索要海、泗、唐、邓四州，宋对金称臣，继续贡纳岁币等苛刻条件，并以武力相威胁。隆兴元年八月，宋派卢仲贤赴金营谈判，宋孝宗“戒勿许四郡”^②，汤思退却暗地告卢，可以许割四州求和。卢仲贤到金营后，屈服纥石烈志宁的威胁，全部答应了金朝的条件。张浚和侍御周操等人接连上书，谴责卢仲贤“擅许四郡”，“辱国无状”，^③卢仲贤被下大理寺论罪。汤思退又派秦桧余党王之望为使，“将割弃四州”^④。由于张浚、右正言陈良翰等人的激烈反对，宋孝宗手诏王之望，“待命境上”，而另派胡昉前往，并向金表示不能割让四州。金军扣留胡昉，和谈破裂。但是，宋孝宗最后还是屈服于主和派的压力，“遂决弃地求和之议”^⑤。

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宋孝宗解除了张浚军权。六月，虞允文拒不执行放弃唐、邓二州的命令，也被召还朝。汤思退命令解散张浚所设的万弩营，停修海船，拆除水陆防御工事，撤退海州、泗州守军，完全废除了张浚精心部署的防御体系，以此向金表示议和诚意。张浚被排挤出朝，行至余干(今属江西)病死，遗嘱对“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⑥，而自责。张浚一死，汤思退立即派魏杞等去金朝议和。兵部侍郎胡铨、太学生王质先后上书反对议和，却遭

① 参见《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一》，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

②③④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汤思退传》，第11530页。

⑤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第11310页。

⑥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第11311页。

到汤思退的打击报复，主战派官员 20 余人被捕下狱。汤思退唯恐议和不成，竟密令心腹孙造通告金朝“以重兵胁和”。^①

十月，金以“宋人议和不能决”^②，于是再次发动攻势，迫使宋朝接受和谈条件。仆散忠义和纥石烈志宁各领一军，分别集结于泰和（今安徽太和南旧县）、临涣（今安徽临涣集），准备渡淮河攻击楚州（今江苏淮安）和濠州（今安徽凤阳）。十月下旬，金军进至淮河北岸，船队从清河口（今江苏清江市西南）入淮河，谎称往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运粮。宋楚州知州魏胜准备拦截，都统刘宝以正在议和，下令不许出兵阻击。金军顺利渡淮，向宋军发动进攻。魏胜率军与金军战于淮阳（今江苏邳州西），刘宝弃楚州逃走，魏胜力战而死，金军占领楚州。^③

十一月，金军连克濠州、盱眙（今属江苏）、滁州（今属安徽）、和州（今安徽和县），进逼扬州（今属江苏）。金都统高景山也在西面发动攻势，攻占商州（今属陕西）。宋被迫求和。金宋双方签订和约：割海、泗、唐、邓、商、秦 6 州给金朝，两朝以淮水到大散关为界，双方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岁贡”改称“岁币”，数额减少 10 万。金以战促和的目的达到后，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退兵，金留下 6 万人驻守金宋边界，以当年岁币犒赏金军将士。^④ 对于宋、金此次议和事件，史称“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的结果，使金朝基本上得到了海陵王侵宋前的利益。此后，金宋约 30 多年无大的战事。

三、“隆兴和议”后的宋、金形势

“隆兴和议”后，宋、金双方由激烈的军事冲突转向相对和平

①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汤思退传》，第 11531 页。

② 《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

③ 参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八《魏胜传》。

④ 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

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从此化干戈为玉帛，而是各自在进行调整和积蓄力量。

宋孝宗即位初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北伐失败后，屈从于宋高宗和主和派的压力，被迫与金订立屈辱的“隆兴和议”。对此，宋孝宗十分愤慨，一心要改变条约规定的宋、金不平等关系。和议过后，宋孝宗首先在人事方面进行调整。先后贬主和派右相汤思退永居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出汤思退党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王之望知福州。同时，选调一些抗战派官员入朝担任军政要职。乾道元年（1165年），以虞允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王刚中同知枢密院事。以后，又升任虞允文右相兼枢密使，并陆续起用一批主战派担负两淮、荆襄、川陕方面的军政事务。在宋孝宗的支持下，虞允文等主战派积极进行备战。这一时期，南宋在军事上主要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是加强军队建设。对现有的正规军进行选择将官和补充兵员等整顿的同时，又新增设一些新军。如乾道五年（1169年）十一月，“复置淮东万弩手，名神劲军”；“增置广东水军”；“以明州定海县水军为御前水军”。^①宋孝宗还多次下诏要求各地民兵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如乾道四年（1168年）正月，“籍荆南义勇民兵，增给衣甲，遇农隙日番教”。乾道五年九月，“诏淮东诸州，农隙教阅民丁”。南宋还对“归正忠义人”（来自金统治区的军民）实行优待政策，使之成为南宋军队的后备力量。宋孝宗前后曾5次大规模地检阅军队，并身体力行进行军事训练，以至在一次习武中，“帝以射弩弦断伤目”。

二是进行物质准备。“隆兴和议”之后，南宋修筑扬州、真州、六合、庐州、和州、襄阳、楚州等城防，甚至对两淮的山水寨堡也进行修缮。如乾道三年（1167年）二月，“措置淮东山水砦”。乾道五年九月，“命淮西安抚司参议官许子中措置淮西水砦”。南宋还加紧进行修整和储备军器、修造战船等军事准备工作。同时，命

^① 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三十四《孝宗纪二》。

两淮等地军队进行屯田，命四川“会计财赋所入，对立兵额”等，^①目的都是为反攻中原做物质准备。

南宋经过一段时间的备战，军事实力有所增长，形势也有所好转。乾道六年（1170年）夏，南宋派遣使臣赴金朝，索要河南之地，并要求改变不平等关系，为金朝所拒绝。于是，宋孝宗表示要诉之武力，像唐太宗那样建立赫奕功业。乾道八年（1172年）初，宋孝宗升虞允文为左丞相兼枢密使，表示要与其共雪靖康之耻。^② 这年九月，虞允文以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原为岳飞等勋将所拥有之头衔）出任四川宣抚使，并被封为雍国公。宋孝宗要虞允文西面从四川出兵攻金，他东面派兵由江淮进击，约期会师河南，以收复失地。虞允文担心难以协调配合。宋孝宗说：“若西帅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③ 虞允文前往四川赴任时，宋孝宗为其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予以厚望。此后，宋孝宗巡视和检阅军队，更加积极备战。宋孝宗决定以改变金、宋不平等的受书仪式为由，对金用兵，并命令虞允文做好出兵的准备。乾道八年十二月，金贺宋正旦使到临安，宋孝宗以受书仪式不合，诏令改期。但是，太上皇宋高宗出来阻挠，命令按照旧仪受书。宋孝宗被迫表面同意，却暗中命人于宾馆夺书，宋、金关系又骤然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宋孝宗所倚重的虞允文却在此时病死在四川任上。虞允文原为文臣，自指挥采石之战获胜后，曾任职于川陕、荆襄和枢密院，主持一个地区或全面防务，威望日隆，为宋孝宗所依凭。虞允文一死，宋孝宗依靠他从事恢复的计划成为泡影。此后，宋孝宗失去北伐中原的信心，尽管仍注意战备，但完全是采取守势。

金朝在“隆兴和议”后，一直密切注意宋方动向，并未放松

① 以上引文见《宋史》卷三十四《孝宗纪二》。

②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虞允文传》记：“上尝谓允文曰：‘丙午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

③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虞允文传》，第11799页。

戒备。但金世宗与宋孝宗不同，并不想从宋朝获得更大利益。相反，他想缓和金、宋关系。大定五年（宋乾道元年，1165年）五月，金世宗主动撤销山东路都统府，“以其军各隶总管府”^①。以后，又撤销陕西都统府，徙陕西元帅府于河中。以此向南宋表示无用兵之意。他不断告诫金军守边将领不要滋事和宋方发生争端。大定九年（宋乾道五年，1169年）二月，金朝“制妄言边关兵马者，徒二年”^②的刑律，也是防范有人制造事端挑起与南宋的军事冲突。金世宗派往使宋大臣，一般都是文臣，以免武臣意气用事。完颜璋使宋，由于没有能按旧仪式呈书受到处分，但金世宗并不想就此对宋用兵，而是另派使臣交涉，在宋做出让步后，适可而止。

金世宗是很有见识的君主，他曾对尚书右丞唐括安礼说：“度宋人之意且起争端”，^③说明他对宋朝战备情况是很清楚的。但他能采取克制的态度，以求“南北讲好，与民休息”^④。从而换来有利于发展金朝经济的大好形势。史称：“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廩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⑤金世宗统治时期，金朝社会出现快速发展的新景象。

“隆兴和议”后，宋、金几十年无战争，从而为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南北的相互交流。这从双方开放榷场互市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金熙宗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金、宋商议，双方各在沿边地区置榷场。虽后，金设榷场于寿、蔡、泗、唐、邓、秦、巩、洮、凤翔等地。南宋也在光州、枣阳、安丰军、花靥镇、盱眙军等地设置榷场。金海陵王发动攻宋战争后，金、宋边境的榷场贸易停止。“隆兴和议”后，金、宋榷场贸易又重新恢复，这对双方都很有利。金向宋输出北珠、貂皮、人参、松实、甘草、北绫、北绢、

①②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③ 《金史》卷八十八《唐括安礼传》，第1964页。

④⑤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蕃罗等物品，南宋向金输出茶、象牙、犀角、乳香、檀香、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牛、米等货物。金、宋双方对于出口商品都有严格的管理，并设官征收商税。金世宗大定间，金从泗州榷场每年税收 53467 贯；从秦州西子城榷场年税收 33656 贯。到大定末、承安初，泗州榷场年税收增加一倍，秦州西子榷场年税收增加四倍。南宋每年也从榷场获得很高的利润。榷场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①

宋淳熙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十月，太上皇宋高宗病死，相隔一年多，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春，金世宗也亡故，金章宗即位。宋高宗一死，使长期受其制肘的宋孝宗有所解脱。但宋孝宗已是 60 多岁高龄，锐气全消，又不情愿以“隆兴和议”之约向 21 岁的金章宗屈尊称侄皇帝。于是，他让位给光宗，自己当太上皇。光宗是孝宗第三子，在长子庄文太子死后，孝宗认为他“英武类己”，^② 故不按顺序特立为太子。然而，宋光宗为庸庸碌碌之辈，在位 5 年毫无建树。史称：光宗“夫宫闱妬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③ 宋孝宗当了 5 年太上皇，病死于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1194 年），当年光宗也让位给宁宗，成为太上皇。宁宗即位后，宋、金形势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四节 宋金战争的再起

一、南宋的备战与金朝的避战

13 世纪初，宋、金双方经过几十年休战，各自内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金世宗已故去多年，金章宗完颜璟在位。宋朝经孝宗、

^① 参见《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下八》。

^{②③} 《宋史》卷三十六《光宗纪》。

光宗，到了宁宗统治时期。金章宗与宋宁宗在对待前辈订立的和约问题上，二人态度截然不同。金章宗一直满意于遵守议和条款，谨慎维护两朝的关系，不想再与宋发生冲突。因此，金章宗一再告诫臣僚以大局为重，保持与南宋和平相处的局面。他要求涉宋机构，“凡馆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语言相胜，务存大体”。^①金使赴宋前，金章宗常常亲自召见，叮嘱对宋要谨慎从事，不要以势压人，“不宜争细故伤大体”^②。

宋宁宗与金章宗的态度不同，对于南宋的屈辱地位不满，支持柄政的韩侂胄对金采取强硬的政策。韩侂胄是北宋名将韩琦的曾孙，宁宗皇后韩氏的叔祖，以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事的职位，总揽了军政大权。他以抗金作号召，受到南宋主战派官员的支持。于是，南宋开始积极备战，企图利用金朝着力对付北方游牧部族的骚扰之机北伐。宋宁宗与韩侂胄为了鼓舞士气，打击主和派，追封岳飞为鄂王，^③削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④同时，“缮器械，增屯戍”，^⑤作北伐的军事和物质准备。宋边境守军还不断派出小股军队进入金境，对金朝的兵力状况进行试探，并有意挑起争端，为发动战争寻找口实。

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1204年），金廷不断接到宝鸡（今属陕西）、郿县（今陕西眉县）等地遭到宋军袭扰的报告。泰和五年（1205年），宋军的军事行动增多。正月，入确山（今属河南）界抢掠民间马匹。三月，入秦川、巩州（今甘肃陇西）、邓州（今属河南）境，焚毁平氏镇（今河南平氏）；抄掠白亭巡检家，并抢走官印；遂平（今属河南）、唐州（今河南唐河）都发现宋军和间谍。“宋兵攻围城邑，动辄数千”，^⑥对金朝边界地区造成很大的危害。

① 《金史》卷十一《章宗纪三》。

② 《金史》卷一百六《张行简传》。

③ 《两朝纲目备要》卷八《宁宗》。

④⑤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奸臣传三》，第13765页。

⑥ 《金史》卷九十八《完颜匡传》。

金朝对于宋军在边界的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在金河南统军司请求增兵的情况下，泰和五年五月上旬，金章宗派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括战马，并于临洮（今属甘肃）、德顺（今甘肃静宁）、巩州等地各置弓手4000人。^①但这仅仅为了加强防御，并不想与宋军发生战事。金章宗让仆散揆出面给宋朝写信，质问宋朝兴兵的原因？宋朝一面以边臣生事和盗贼剽掠作答，一面继续出兵攻掠。

五月底，宋镇江都统戚拱派兵攻占涟水县（今属江苏）。六月，金军收复涟水。金章宗召集大臣商议“备宋之策”。当时许多金朝大臣认为，金朝的御宋措施是“设备养恶”。金章宗以“南北和好四十余载，民不知兵，不忍先发”。^②反对主动反击宋军。接着，在同年八月，金章宗召仆散揆还朝，罢宣抚司，遣散临洮、德顺、秦、巩等地新置弓箭手，向宋朝表示和解。但是，宋朝仍不断出兵进犯金境，杀死金军官兵。十一月，宋军进入内乡（今属河南）之后，金章宗下诏给山东、陕西帅臣，让他们“训练士卒，以备非常”。^③同时，送给边帅银15万两，用以召募当地百姓监视宋军的行动。派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完颜太平、殿前右卫副将军蒲察阿里到前线，指挥金军歼灭入境宋军。尽管如此，金章宗仍希望金宋不发生大规模战争。

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年）正月，宋臣陈克俊使金辞归，金章宗派御史大夫孟铸传话说：“大定初，世宗皇帝许宋世为侄国，朕遵守遗法，和好至今。岂意尔国屡有盗贼犯我边境，以此遣大臣宣抚河南军民。及得尔国有司公移，称已罢黜边臣，抽去兵卒，朕方以天下为度，不介小嫌，遂罢宣抚司。未几，盗贼甚于前日，比来群臣屡以尔国谕盗为言，朕惟和好岁久，委曲涵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详知。若依前不息，臣下或复有云，朕虽兼

① 《金史》卷九十八《完颜匡传》。

②③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

爱，事亦岂能终已。卿等归国，当以朕意具言之汝主。”^①金章宗想通过委曲退让化解矛盾，避免战争。“章宗本无意用兵，故再三谕之。”^②

然而，宋宁宗、韩侂胄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命安远军节度使苏师旦、两淮宣抚使邓友龙、四川宣抚使程松等负责指挥军事；下令各军准备北伐，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为赏功费，任命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兼任陕西、河东路招抚使，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分任京西北路招抚使、副使，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渡淮北上收复山东等地。宋金战争再度爆发已不可避免。

二、宋军全线出击与金军数路反击

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宋军不宣而战，出兵占领了淮南路的重镇虹县（今安徽泗县）、颍上（今属安徽）、新息（今河南息县）、褒信（今河南息县包信镇）等地。五月，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诏书中说：“声罪致讨，属胡运之将倾；兵出有名，师直为壮。”^③宋军全线出击，皇甫斌率军攻唐州（今河南唐河），建康都统制李爽领兵攻寿州（今安徽寿县），郭倪遣部将郭倬、李汝翼攻宿州（今属安徽），江州都统王大节统兵攻蔡州（今河南汝南），“开禧北伐”全面展开。

宋金战争爆发后，金廷立即调兵遣将予以迎击。金章宗任命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赶赴汴京指挥金军对宋作战。军事机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以山东东、西路统军使纥石烈执中为山东两路兵马都统使，定海军节度使、副

①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

② 《金史》卷一百《孟铸传》，第2202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三《北伐更盟》。

都统完颜撒剌为副使，陕西统军使完颜充为陕西五路兵马都统使，通远军节度使胡沙、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为副使。针对宋宁宗下诏北伐，金章宗也下诏南征。初期，金军兵力部署是：集郑州（今属河南）、汝州（今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等地金兵于昌武（今河南许昌），聚亳州（今属安徽）、陈州（今河南淮阳）、襄邑（今河南睢县）的金兵于归德（今河南商丘），河南路副统军徒单铎部驻兵汴京，山东东、西路军 7000 人驻于大名（今属河北），河北东、西路军 1.7 万人屯驻河南。调河北、大名、北京、天山等地金兵 1.5 万结集于真定（今河北正定）、河间（今属河北）、靖州（今河北青县）、献州（今河北献县）等地，以策应河南金军。^①

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五月至九月间，金军几乎在所有的战场上都取得了胜利。金安国军节度使纳兰邦烈击败围攻宿州的宋郭倬、李汝翼部，并追击到蕲县（今安徽蕲县集），将宋军包围；金蔡州防御使完颜佛住击败攻蔡州的宋军；唐州刺史吾古孙兀屯和泌阳副巡检纳合军胜合兵击败宋皇甫斌军；金寿州刺史徒单羲阻击宋李爽部于寿州城下一月之久，后与河南统军判官乞住及买哥率领的援军内外夹击，大败李爽军；金右翼都统完颜赛不击败宋曹统制于溱水（今河南臻头河）；金将完颜王喜击败攻盐川（今甘肃陇西西）的宋吴曦部；陕西路都统副使完颜承裕击败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的吴曦军 5 万，陕西金将蒲察贞击败攻方山原的宋程松军。^②

宋军全线败退之后，韩侂胄先后罢免了指挥军事的邓友龙、苏师旦和领兵官皇甫斌、李爽、王大节、李汝翼，处死郭倬，任命丘岳为两淮宣抚使，负责指挥两淮军事。这时，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尚为宋军所占。丘岳认为泗州孤城难以拒守，于是放弃泗州，还军盱眙。宋军全线出击失败后，宋军兵力部署形成东西两翼，西面四川宋军虽然受挫，但损失不大，尚有较强的作战能

^{①②} 参见《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

力；东面两淮的宋军损失较重，收缩到淮南东部一隅，随时准备撤回长江以南。战场形势对宋军十分不利，宋军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御。

十月初，金军统帅仆散揆指挥金军乘胜对宋展开强大的攻势，一改以往金军常用的兵分三路的战术，分兵九路：仆散揆亲领行省兵3万出颍州（今安徽阜阳）、寿州；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领兵3万出涡口（今安徽怀远入淮河处的涡河口）；元帅完颜匡领兵2.5万出唐州、邓州（今属河南）；左监军纥石烈执中领山东兵2万出清河口（今江苏清江市西南）；右监军完颜充领关中兵1万出陈仓（今陕西宝鸡）；右都监蒲察贞领岐、陇兵1万出成纪（今甘肃天水市）；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以汉、蕃步骑1万出临潭（今甘肃临潭西南）；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领陇右步骑5000出盐川；陇州防御使完颜璘领兵5000出来远镇（今甘肃武山西南）；金南征军总兵力共计14.5万。^①

十月下旬，纥石烈执中从清河口渡淮，占领淮阴（今属江苏），兵围楚州（今江苏淮安）。十一月，完颜匡先后攻下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光化军（今湖北光化北）、随州（今属湖北），进围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分兵攻占安陆（今属湖北）、应城（今属湖北）、云梦（今属湖北）、孝感（今属湖北）、汉川（今湖北汉川北）、荆山（今湖北南漳西）等县。^② 纥石烈子仁攻下定远（今属安徽）、滁州（今属安徽）、来安（今属安徽）、全椒（今属安徽）等地。^③ 完颜纲攻下祐川（今甘肃岷县东南）、荔川（今甘肃理川）、间川（今甘肃间井）、宕昌（今属甘肃）等地。^④ 蒲察贞

① 参见《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卷九十三《仆散揆传》。关于此次金投入的兵力，《大金国志》卷二十一《章宗纪下》载：“十一月，起民兵于河南，十七万人入淮，十万人入荆襄。又起河北十万戍居庸关及韩水大鸡川，以防北边，……”。看来《金史》所载准确。

② 《金史》卷九十八《完颜匡传》。

③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

④ 《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

攻取天水（今甘肃天水西南）和西州（今甘肃西和县白石镇城）。①仆散揆佯装在下蔡（今安徽凤台）渡淮，把宋将何汝励、姚公佐兵力吸引到下蔡对岸的花靥（今安徽寿县西北），却派兵突然从浅水处八叠滩涉淮，宋军惊慌奔逃，金军随后追击，占领颍口（今安徽正阳关东）。接着，仆散揆攻下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南），取霍丘县（今属安徽），兵围和州（今安徽和县），进至长江北岸，金军队伍严整，沿江大张旗帜，江南震动。金军九路南征，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取得全线胜利。

三、宋朝内乱与金军凯旋

金军陈兵长江北岸，宋军北伐失败已成定局。导致宋军失利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原因还是宋朝军事领导集团的无能造成的。主持北伐的韩侂胄本身缺乏军事才干，又任用不懂军事的心腹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辅佐指挥军事，所任命的将帅大都没有实战经验，因而屡屡失利。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左右战局的宋东、西两帅又各行其事，宋朝又被迫求和。

开禧二年（1206年）十二月，宋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接受金授予的蜀王封号，叛宋附金，还师入益昌，夺取总领所仓库。四川宣抚使程松从兴元（今陕西汉中）出逃。②吴曦叛变，宋西部防线解体。主持东部防线军务的主帅丘崈，在金军的压力下，向金军“奉书乞和”。③金军主帅仆散揆一边派人与丘崈接洽和谈条件，一边向真州（今江苏仪征）发动猛攻。宋军溃败，2万多人被歼，真州失陷，宋军退守长江以南。

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吴曦派人引金军入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并献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和（西和，

①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

② 参见《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吴曦传》。

③ 《金史》卷九十三《仆散揆传》，第2070页。

今甘肃西和、西)、凤四州给金军，利用金军的支持，吞并四川各支军队，兵力有10万。金将完颜匡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吴曦派部将禄祁、房大勋戍万州（今四川万县市），泛舟下嘉陵江，准备配合金军攻襄阳。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岳乞和，韩侂胄“不知所为”，下令罢免丘岳，改任张岩负责江淮军事，出家财20万以补军需。并准备封吴曦为王，以争取吴曦。同时，派使臣方信孺到开封与金议和。

吴曦的叛变，引起四川军民的激烈反对。他的部将有采用自杀、自残、出走等方式进行反抗。更有一些人暗中活动，准备以武力反抗吴曦。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与吴曦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朱福，相约讨伐吴曦。兴中军正将李好义也联络军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策划诛杀吴曦。杨、李经过协商，决定联合行动。二月二十九日，李好义率74人闯入吴曦的蜀王宫中，杀死吴曦及其死党。吴曦称王总共41天，他被杀后，“军民拜舞，欢声动天地”。^①杨巨源、李好义等乘势向金军发动攻击，收复西和、成州、凤州、大散关等地，准备夺取秦陇，支援两淮。

吴曦死后，四川军政大权却落入安丙之手。安丙原为随军转运使，吴曦叛变，他出任吴曦的丞相长史。李好义、杨巨源认为，吴曦死后应推举一个职位较高的人镇抚四川，使安丙乘机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安丙上奏宋廷，窃取了镇压吴曦的功劳，被任命为四川宣抚副使。正当宋军在川陕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安丙却下令，“谨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气皆沮”^②。安丙还勾结吴曦亲信部将王喜等阴谋破坏抗金斗争，先后谋害了李好义和杨巨源。李、杨之死，几乎引发兵变，对西线抗金造成很大损失。刚有起色的西线战局，又被安丙等人断送。

韩侂胄北伐的失败，引起朝中主和派围攻，以礼部侍郎史弥

① 《宋史》卷四百二《李好义传》，经12199页。

② 《宋史》卷四百二《李好义传》，第12200页。

远为首的主和派，不仅大造北伐之误的舆论，而且阴谋发动政变。十一月，史弥远与宁宗皇后杨氏、皇子荣王赵曁、参知政事钱象祖等，假称得密诏，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杀韩侂胄于玉津园。杨后、史弥远等人控制军政大权后，把主战派赶出朝廷，主和派钱象祖升任右相，史弥远任同知枢密院事，不久又改任宰相。史弥远等人掌权后，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赠谥，并向金朝求和。

金朝原本是被迫应战，但是随着战果的扩展，又想从宋朝获得更多的利益。在金军进占长江北岸后，金章宗要求金军统帅仆散揆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亲自设计了三种方案：一、径渡长江，二、际江为界，三、逼宋和谈。仆散揆选择了第三种方案，留军驻守濠州（今安徽凤阳）、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还军下蔡（今安徽凤台），等待宋朝接受金朝的议和条件。泰和七年（1207年）二月，仆散揆病死，金以左丞相完颜宗浩兼都元帅，赶赴开封主持前线军务，并继续与宋谈判。金章宗最初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奉表称臣，岁增贡币，缚送贼魁，还所俘掠”。^①以后成为金朝议和的基本条件。由于金坚持要求惩办发动战争的主谋，而使韩侂胄无法接受。宋廷进退维谷，战不成，和也不成。史弥远等杀掉韩侂胄和苏师旦，遣使送韩、苏头与金，和议方成。

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年），金、宋签订议和条款：宋对金称侄，岁币增至30万，犒军银（战败赔款）300万两，宋、金维持原来的边界。金朝目的达到后，撤军回到淮北。

宋宁宗和韩侂胄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不顾客观条件的冒险举动。事后宋宁宗曾说过：“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②北伐一直是主战派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但是自绍兴和议之后，南宋已没有灭金的实力。此次北伐失败后，史弥远等主和派掌握朝政，南宋国力从此愈加衰弱。

① 《金史》卷九十三《仆散揆传》，第2070页。

②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韩侂胄传》，第13777页。

第十一章 南宋、金农民战争

南宋、金农民为反压迫进行的武装斗争波澜壮阔，据史书不完全统计，大大小小的有 400 余起。其地域分布之广，频率之高，斗争之激烈，形式之新颖，都是以往所不多见的。尽管当时没有出现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战争形式，但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仍有许多新的发展。诸如，杨么农民军的水战，江西、湖南等地山区农民军的游击战，金西北起义牧民采用的退中突然反击的战术等等，都是对中国军事史的丰富和发展。由于篇幅所限，本章着重阐述有代表性的、规模较大的几次农民战争。

第一节 南宋农民战争的历史背景

一、土地兼并

南宋王朝的重建，主要是靠一批南迁的文武官员以及地主和商人的支持。这批人被迫抛弃了北方的产业，迁徙到南方。北方损失南方补偿的心态，使他们对土地掠夺达到惊人的地步。因此，南宋土地兼并的剧烈程度是北宋以来所未有的。豪强之家依仗权势强占土地的现象，在南宋极为普遍。长江下游的很多圩田，都被权贵之家所霸占。绍兴府鉴湖地区的农民辛勤开垦的几千顷湖田，全被豪族所占有。甚至有些地区驻防军兵所开垦的荒地，也被将领们划归私人的庄田。南宋占有土地数万亩，收租米数十万斛的大地主为数不少。淮东土豪张拐腿每年所收租谷，达 70 万斛。南宋初，建康府永丰圩，有圩田约 10 万亩，收税 3 万石，先是韩世忠的产业，以后转到秦桧名下。大将张俊广殖田产，分布于十二个县，其家

每年收租米 60 万斛。宋高宗时将领杨存中，在楚州、吴门等地有大批田产。他曾一次献楚州田 4 万亩充作屯田。当时，兼并土地成为一种风气，官员、豪绅竞相占地。另外，还有大量的寺院地主，漳州的寺田竟占全部土地的七分之六，明州天童寺每年收租多达 3.5 万石。其他占地数十顷的寺院，在各地比比皆是。

南宋初期，朝廷掌握着一部分官田，包括职田、学田、绝户田、抛荒田以及新辟的圩田等。虽然官田在南宋垦田总额中所占比重很小，但是直到淳熙元年（1174 年）总数还有 2000 万亩。南宋政府可以采取逐步扩大官田的办法，以缓解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然而，恰恰相反，在以皇帝为首的兼并者肆无忌惮的掠夺下，官田迅速减少。掠夺官田的方式多种多样，皇帝以官田赏赐给皇亲国戚和文武官员，有时一次赐田多达 10 万亩。官府出卖和出租官田，也造成官田数量减少。官府和豪绅勾结之下，大量的官田以合法的名义，通过各种渠道，落入官僚和大地主的手中，“朝籍于官，暮入势家”^①。更加促使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

南宋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对此，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业已感受到土地兼并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宋理宗时，曾任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的刘克庄，在一次奏疏中说：“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开辟以来，未之有也。”^② 殿中侍御史谢方叔也曾对宋理宗说：“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③ 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了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二、苛捐杂税

南宋的捐税，除正税之外，还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这些捐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九之三十二。

②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一《备对札子》。

③ 《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农田》。

税大大加重了南宋人民的负担，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南宋的赋税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田赋、杂税和徭役。田赋以夏秋两季征收，又称为夏秋二税。夏秋二税所征收的形式和税额似乎与北宋差别不大，但是二税的附加税却大大增加，远比北宋更加繁重。

二税的附加税，以加征“耗米”和“折帛钱”，使农民负担最为沉重。秋税所征“耗米”，往往超过应征秋税的正额，有的甚至是正税的4倍。夏税纳钱，实际缴纳时又折钱为帛绢，所以又称折帛钱。此税数额远比北宋加重，再加上吏胥利用绢价的变动从中获利。因此，折帛钱成为南宋农民的沉重负担。

南宋新增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其中以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帖钱和身丁钱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大。

宋高宗绍兴时，经总制钱年收入多达1725万缗。当时，经总制钱给南宋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叶适曾对经总制钱评论说：“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①

绍兴十七年(1147年)以前，东南各路每年所征收上缴的月桩钱有453万余贯。宋宁宗时，东南各路所征的月桩钱仍有390多万贯。当时，月桩钱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参知政事李光曾说过：“诸路月桩最为民间重害，而江东西为甚。”^② 版帐钱所征收的范围，“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③ 这种“非法妄取”的征税方法，为南宋所新创。身丁钱即人头税，是套在贫民下户和客户头上的枷锁。有的地区，官吏还妄自扩大身丁的范围，把十二三岁的少儿列入丁籍，年逾六十和死亡者不及时除去丁籍，从而使农民大受其害。当时有民谣揭露其弊：“三岁孩儿便识丁，更从阴府役幽魂。”^④

① 叶适：《水心别集》卷四《经总制钱二》。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四之七十九。

③ 《文献通考》卷十九《征榷考·版帐钱》。

④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七《广右钱丁》。

贫苦农民被身丁钱逼迫，“生子往往不举”^①，甚至“宁杀子不欲输丁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身丁钱对农民剥削的残酷性可想而知。

南宋苛捐杂税的繁重，本已超过前代，而在赋税管理上又弊病很多。官户、上户虽然拥有大量的田产和人丁，但凭借权势免交和逃避赋税。大量的赋税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到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的头上。广大农民在承担赋税的同时，还要负担大量繁重的徭役。贫苦农民生活无着，大批人被迫流亡他乡。

南宋初期，军费开支浩大，置专项税收，增加人民负担。还另立名目，进行搜刮，随意科敛。例如，箭杆、翎毛、铁叶、船只以及竹木、麻皮、牛皮、羊皮、筋角等，都可以被列入军需，强行摊派，甚至不管是否产自当地。江西抚州一次要收箭杆 200 万，翎毛 100 余万。这些物品在出产州县已经供不应求，非产地州县的农民要花费十倍以上的价钱去收购。于是造成箭杆价格猛涨，买一根箭杆需要几百钱。有的农民因弄不到箭杆、翎毛，而被县官处死。船只是水上作战和运输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船民遭殃，船“或夺充纲运”，人“则籍为水手”。^②修城和建筑防御工事，征集砖石、木料、麻皮以及民工等，常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政府往往采取“白著横科”^③，即白拿白要。军需成为南宋人民沉重的负担。

三、官兵游寇的屠掠

南宋军队是在北宋溃军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军法废弛，军纪涣散，一直是南宋军队所存在的弊病。军队鱼肉百姓，激起民变之事时有发生。像岳飞军队那样军纪严明的实属凤毛麟角。对于南宋军纪败坏，当时朝臣的奏章和史籍中多有反映。如监察御史

① 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一《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② 《梁溪全集》卷八十五《乞蠲免伤路分人户四年积欠札子》。

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折估钱》。

韩璜曾于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上书说：“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①《中兴小纪》也载：“比年大兵所过，恣为剽掠，有甚于贼。”^②官兵给百姓带来的危害，甚至不亚于金兵。“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问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败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③南宋初期，黎民百姓所受的兵燹之灾相当严重。

南宋各地还有许多打着抗金名义的武装集团，这部分武装大多是原宋朝政府召集起来的北方民间抗金武装，北方沦陷后流落到江南。南宋政府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另眼看待，对首领授予虚衔，在军需方面常采用不供应钱粮，任其自筹粮饷的办法。这些军队本来就成分复杂，纪律败坏，加上南宋政府政策上的失误，逐渐沦为危害地方的武装组织。如曾受宗泽指挥、参加过开封保卫战的张用部，南下后盘踞大别山区，有军兵数万，四处抄掠粮食，所过为之一空，外号张莽荡。活动在淮南一带的原濮州民兵首领王善，由于官府不发放钱粮，沿途掳掠，后王善率部众降金。一部分人不愿降金，在祝友的率领下过江，以掳掠为生，后被宋将刘光世收编。京西游寇桑仲，曾被朝廷任命为襄邓随鄂镇抚使。张浚表示不满说：“举四郡数千里之百姓，委之饿虎之啄。”^④百姓生活在游寇的虎口中，其艰难可想而知。

这些武装集团之间也常常为争夺势力范围发生战争。如绍兴元年（1131年）初，曹成、李宏、马友三支军队先后进入汉阳军（今湖北汉阳境），宋安抚使李允文不能提供粮饷，让他们南下觅食。三军进入湖南后，掳掠百姓，相互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当地百姓经他们蹂躏，“类皆裸露”。^⑤

①③ 《要录》卷四十一，第759页。

② 《中兴小纪》卷十一，绍兴元年十二月丁丑。

④ 《要录》卷四十二，第765页。

⑤ 《梁溪全集》卷七十二《乞正李宏擅杀马友典刑奏状》。

在南宋政府的横征暴敛及军队和民间武装的侵扰掳掠之下，广大人民的生活陷入艰难困苦的境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

第二节 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战争

(见附图 8)

一、钟相起义

宋建炎四年(1130年)，洞庭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前后坚持了六年时间，是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洞庭湖地区的农民起义，最初是由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所组织和领导的。钟相在洞庭湖地区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早在起义的二十多年前，他利用秘密宗教和乡社形式团结和组织民众。经过多年的宣传和鼓动，在他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环数百里间，……翕然从之，备糒相谒，旁午于道，谓之拜爷。”^①

钟相之所以在贫苦农民当中有巨大号召力，绝不是有的封建文人说：“善为诞漫”，“小民无知者”^②，受其诱惑。而是他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贫富过于悬殊，农民生活困苦等严重社会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在广大贫苦农民中间产生了共鸣。他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③。这一主张，虽然带有空想的成分，但是由于否定了所谓天然合理的“法分贵贱贫富”的封建法权制度，要求建立一个政治上“等贵贱”，经济上“均贫富”的农民理想社会，从而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

①②③ 《会编》卷一百三十七炎兴下帙三十七。

靖康二年（1127年）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号召各地组织“勤王之师”。钟相立即组织勤王民兵300人，由其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保卫南京抗击金军。宋高宗赵构不久又决意南逃，下令遣散勤王的各路忠义民兵，让他们“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①。宋高宗的做法，极大地挫伤了民兵抗金的积极性，使他们丧失了对重建的南宋王朝的信心。

钟子昂带队回乡后，钟相并没把这支武装解散，而是“依旧将元募人团集在家”^②，以此为核心，招兵买马，扩充队伍，设置旗帜器甲，修建营寨，等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

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军渡过长江，扫荡两浙之后，由江西入湖南，沿途大肆杀掳，许多重镇被屠掠一空。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政府只顾自己逃命，任凭金军肆虐。金军北撤后，官军和土匪武装又趁火打劫，“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③。洞庭湖地区原是较为富庶的鱼米之乡，与许多地区一样经过动乱之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农民除了反抗别无他路。

建炎四年初，孔彦舟的部队到洞庭湖地区。这支武装集团人数号称数十万，名义上是接受宋朝指挥的官军，实际上是一支杀人越货的武装。这年二月，孔彦舟洗劫了澧州（今湖南澧县），兵逼鼎州，“人情惊扰”。钟相看到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于二月十七日在武陵宣布起义，从而点燃了洞庭湖地区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

钟相在武陵起义后，立即着手政权的建设，立国号楚，建元天载（一说天战），钟相称楚王，立钟子昂为太子，设置将相官属。农民政权的建立，推动了农民革命迅猛地发展。

起义队伍日益发展壮大，人数号称40万。周围各州县官员慑于农民军的声势，纷纷弃官逃命。如岳州守臣单世卿，起义军还

①② 《金佗续编》卷二十五《鼎澧逸民叙述杨么事迹一》。

③ 《要录》卷四十一，第759页。

未到就逃奔龙阳，“登舟东下，仅以身免”^①。起义军在攻打鼎州桃源县时，知县钱景持率领保甲兵丁进行抵抗，农民军击败军官，杀死钱景持。澧州守臣黄琮与农民军对抗，城破后被农民军杀死。农民军很快占领了鼎州和澧州的八县，江陵府的枝江、松滋、石首、公安四县，峡州宜都县，岳州华容县，辰州沅陵县，潭州的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四县，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占领十九个县。洞庭湖周围农民起义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钟相农民军公开宣布，宋朝的“国典”为邪法。他们焚毁官府、寺庙、豪门大户，处死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保护“执耒之夫”等贱民的利益。农民军把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称为“均平”，把处死统治者和剥削者叫做“行法”。他们还对最能体现贫富差别和封建道德的丧葬制度进行了变革，规定“死者不许行丧”。钟相自称老爷，农民军称爷儿。在起义军控制的地区里，钟相宣扬“等贵贱，均贫富”的道理，以取代儒、佛、道之教等封建意识形态。起义军所到之处，“无税赋差科，无官司法令”，打乱封建统治秩序，解除套在农民头上的封建枷锁。广大贫苦农民认为农民军的行动合理，“人皆乐附而行之”。^②

钟相农民军的声势震撼了南宋王朝，孔彦舟的武装勾结地主豪绅一同镇压起义军。南宋朝廷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进入鼎州，以镇压钟相起义军。南宋驻守鄂州的宣抚司访察使李允文也调动军队，开赴洞庭湖地区镇压农民军。孔彦舟部从澧州向鼎州进发，途经药坪遭到起义军邀击，孔彦舟仓皇逃走，军队损失很大。以后又与农民军作战，接连吃了几次败仗。于是采取狡诈手段，派奸细以“入法”为名，混入起义军内部进行破坏。同时，放回所俘的起义军战士，散布说：“爷（钟相）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③并大张旗鼓地赶制竹筏，大造马上撤离鼎州

① 《会编》卷一百三十七炎兴下帙三十七。

② 以上引文见《会编》卷一百三十七炎兴下帙三十七。

③ 《中兴小纪》卷八，建炎四年四月。

的舆论，以麻痹起义军。钟相没有识破孔彦舟的阴谋诡计，放松了警惕。

建炎四年三月间，孔彦舟突然向农民军发动进攻，与混入农民军内部奸细里应外合，打败了起义军，占领了起义军营寨。钟相和钟子昂突围后，转移到山谷里，不幸被地主武装俘获，在押解途中，遇害于湖南攸县。钟相的牺牲，使刚刚兴起的农民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

二、杨么农民军的陆耕水战

钟相的牺牲，并未使洞庭湖畔的农民起义烈火熄灭，起义军在杨太领导下，继续进行战斗。

杨么^①领导农民军余部转移到龙阳县。钟相的另一个儿子钟子仪（一说钟子义）也在农民军的护送下来到龙阳。杨么等奉钟子仪为“太子”，号召各地起义军聚集龙阳。杨么原名杨太，由于他年龄较轻，荆湖方言称幼为“么”，因此起义群众又亲切地叫他“杨么”。农民军在杨么等人的领导下，又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这时，围剿农民军的宋军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孔彦舟在打败钟相后，屠掠了鼎州、潭州等地，率兵北走，投降了齐国刘豫。建炎四年六月，南宋朝廷委派程昌寓为鼎、澧州镇抚使兼知鼎州，镇压洞庭湖地区起义军。

程昌寓部分水陆两路向鼎州开进。程昌寓由水路出公安县的油江，沿鼎江顺流而下，经龙阳抵鼎州。船队沿途抢掠，搜刮军费，引起人们的无比愤恨。船队进入龙阳县鼎口一带，兵丁又上岸抢夺猪羊鸡鸭等，驻守在这一带的起义军立即投入战斗，消灭了这支船队。程昌寓见势不妙，慌忙换乘小船，掉头而逃，“仅能

^① 当地习俗称兄弟中最小者为“么”(yāo)，因此杨太又被起义农民亲切地称作“杨么”。

脱免”^①，辎重全归农民军所有。程昌寓逃至公安县，不敢再走水路，改由陆路到鼎州。

程昌寓一向以凶残著称，发誓要报“鼎口之辱”，对所抓获的农民军战士用酷刑折磨至死。为了消灭起义军，他搜刮钱粮，招募军队，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程昌寓在武力进攻起义军的同时，还采用招降和收买刺客等阴险手段，以瓦解起义军。起义军中首领杨幺，经不住利诱，投降了程昌寓。但是，杨幺和广大起义群众对敌人的招降阴谋，斗争非常坚决。杨幺“极口骂杨华不是丈夫汉”^②，并处死程昌寓派去招安的刘醇。程昌寓几次想收买刺客刺杀杨幺，都因起义军防范严密不能得手。宋高宗时的侍御史张致远曾说：“洞庭阻固，累年于兹。招安之人屡遣而大半不还，水陆之师每进而无敢深入。”^③起义军的不屈不挠斗争，使南宋统治阶级颇为棘手。

在杨幺领导下起义军日益壮大，仅一年多就控制了“北达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长沙之界”^④的大片地区，洞庭湖沿岸各州县的广大农村几乎都被起义军所控制。南宋官军只能龟缩在几座孤零零的州县城里。绍兴三年（1133年），杨幺自号“大圣天王”，建立了农民政权，起义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

洞庭湖地区，因河湖交汇，汊湾水巷纵横交错，芦荡丛生，农民起义军根据当地的特点，制定了“陆耕水战”的战略，大力发展水军。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一支装备先进，进退自如，机动灵活，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起义军春夏耕耘，秋冬战斗，兵农相兼，水陆两栖，势力逐步扩大。

起义军最初组建的水军，骨干力量是洞庭湖一带的“舟人渔子”，^⑤装备也是平时用来打鱼的各种渔船、渔叉。以后，农民军

①② 《金佗续编》卷二十五《鼎澧逸民叙述杨幺事迹一》。

③ 《要录》卷八十五，第1403页。

④ 《要录》卷七十三，第1209页。

⑤ 《梁溪先生文集》卷一百三《与宰相论捍贼札子》。

在鼎、澧地区的德山、钦山、药山、夹山，采伐了几万棵松、杉、樟、楠等木材，用以打造海鳅、擢櫓等战船，改进了水军的装备。在与敌军作战中，不断用缴获的敌舰装备自己。起义军的战船“出没重湖”，“势焰愈炽”。^①

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起义军与程昌寓新组建的水军，进行了一场水战。程昌寓的军兵大都是从蔡州带来的陆军，“兵力单薄，又未有水军”^②。为了战胜起义军的船队，攻破起义军的水寨，他也组建一支水军。桃源县是木材集聚地，木材商在这里存有大量文溪杉板。程昌寓强行拘收杉板，充做造船材料，并找来工匠制造车船，企图在水上占据优势。车船是一种带翼轮的船只，轮子安装在船舷两侧，以一轴连结两轮，轴上设有踏板，用脚蹬踏，使翼轮旋转激水，速度快于手摇桨櫓的普通船。南北朝时，已有车船，但是仅有两轮（一车）简单的车船。在程昌寓的督责之下，高宣带领工匠赶制成一批车船和战舰。程昌寓急不可待，调遣军队水陆并进，向起义军发起猛攻。程昌寓部下统制覃某率领水军驾乘八车船两只和海鳅船20只，从芷江直攻起义军夏诚大寨，总管杜湛率步兵沿芷江从陆路配合水军作战，“并力夹攻，要必破其寨”^③。起义军严阵以待，寨门大开以迎敌。宋军船队进了芷江口，河窄水浅，车船搁浅。陆军也因“连日阴雨”，众兵淹浸泥淖中”。起义军伺机出击，大获全胜。车船全被起义军缴获，高宣也成了起义军的俘虏，海鳅船凭借灵巧轻便，从芷江口侥幸逃回鼎州。程昌寓从此不敢再与起义军作战。

起义军获得两艘八车船后，也开始制造车船。仅两个月时间，就造出“大小车楼船十余，制样愈雄壮”。后来增加到29艘，准备发展到40多艘。起义军所改进创新的车船，大的可装载士兵千余人，前后有人踏车，进退自如，“以轮激水，疾驶如羽”^④。船上

①② 《金佗续编》卷二十五《鼎澧逸民叙述杨么事迹一》。

③ 以下引文见《金佗续编》卷二十五《鼎澧逸民叙述杨么事迹一》。

④ 《金佗粹编》卷六《行实编年》。

还装有“长十余丈，上置巨石，下作辘轳”的炮（抛石机），遇敌船近，可用以发石击碎。^①当时起义军中著名的车船有杨么“和州载”号二十四车大楼船，杨钦的“大德”号三十二车船，夏诚的“大药山”号船，刘衡“大钦山”号船，周伦“大夹山”号船，高癩的“小德山”号船，刘说“小药山”号船，黄佐的“小钦山”号船，全宗“小夹山”号船，以及“望三州”、“浑江龙”等号的车船。威武的车船，加上几百艘轻舟快舰，乘风破浪，蔚为壮观。

起义军在发展水军的同时，还创建许多山水寨，前后有70个，形成要点。杨么的大寨设在鼎口（今湖南汉寿县西北40里）南岸，“据陆向水，维舟岸侧”^②。起义军吸收钟相失败的教训，加强戒备，在杨么大寨周围20里内，陆路有军兵巡逻，水路有船只游弋，昼夜不绝。“寨门外令群刀手把定，便大虫（老虎）、豹子也则入去不得。”^③宋军再想搞偷袭和行刺都相当困难。夏诚的营寨在芷江口，东西各阻陂湖，只有西南面临平地，起义军在这里修筑“重城重壕”，外面设陷马坑。其他营寨也都有牢固的防御设施。

农民军的营寨里“茅竹为舍，密比如栉”^④，起义群众既是战士，又是劳动者，一边打仗，一边生产，种植农桑，饲养家畜。根据地的农民组成乡社，平等互助，有农副产品交换的集贸市场，实现了钟相“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理想。起义军不再以攻取州县作为主要目标，在军事上扬长避短，尽量避免陆地作战，以发挥水上优势。起义军所采取“陆耕水战”的策略，“恃水出没”，“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⑤在军事和生产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功。

① 《要录》卷五十九，第1026页。

② 《要录》卷六十六，第1117页。

③ 《金佗续编》卷二十六《鼎澧逸民叙述杨么事迹二》。

④ 《金佗续编》卷五《再据刘愿申杨么贼连作过省札》。

⑤ 《要录》卷七十三，第1209页。

三、抗宋反齐斗争的胜利

起义军占据洞庭湖区，特别是水军的发展壮大，直接威胁到江南地区与四川联系的长江水道，使南宋朝廷极为震恐。南宋统治者决心全力围剿视为“腹心之害”的杨么起义军。刘豫的齐国也趁机插手，派人拉拢起义军与他们合作。杨么领导起义军将士英勇抗击了宋军的进攻，挫败了齐国的阴谋，取得了抗宋反齐斗争的胜利。

绍兴三年（1133年）六月，宋廷任命神武军统制兼淮南宣抚司都统制王瓚为荆南府、潭、鼎、澧、鄂制置使，带领6万大军，会同湖南安抚使折彦质等赶赴洞庭湖地区镇压杨么起义军。王瓚带兵多年，老谋深算，事先令人绘洞庭湖口岸地图一册，以掌握了解湖区的地形情况。但是，王瓚一到洞庭湖地区就陷入了困境。程昌寓“平欺无能，不伏节制”。自称守城的职责是守住州城，“平贼”是制置的事。^①折彦质也以王瓚原系“部下兵官”，“不肯济师”。^②从八月至十月间，王瓚部队多次与起义军接战，每次都损兵折将。一次，王瓚在鼎江口与起义军遭遇，起义军车船高数丈，以二尺多长的尖木，削尖两端作投掷武器，与矢石俱发，叫做“木老鸦”。宋军大败，王瓚本人也为流矢和木老鸦击中。^③其后王瓚分一部分军权给程昌寓，王、程两军才开始联合作战，并制定了上游进击，下游拦截的作战方案。

十一月初，王瓚指挥水陆两军先从德山进攻龙阳起义军大寨。与此同时，由统制崔增、吴全带领水军主力1万余人，在岳州扁山、湘江口及洞庭湖口、牌口（今属湖南益阳）等处，沿湘江及洞庭湖东岸一带把守。宋军此役企图实现上游（西边）进攻，迫使起义军败退，下游宋水军拦截，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一举消灭

① 《金佗续编》卷二十五《鼎澧逸民叙述杨么事迹一》。

② 《要录》卷七十，第1178页。

③ 《要录》卷六十九，第1173页。

起义军的计划。

上游战斗异常激烈，从月初到十三日，宋军先后攻破农民军设在德山大溪口、泛州村、黄店等地营寨。杨么为保存实力，决定暂时放弃鼎口南岸大寨，所有人员、牲畜撤到水上，船队转移至鼎口下 50 里西港停泊。宋军攻入杨么大寨，已是一座空寨。起义军对形势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在下游担任阻截的宋水军“都是撇头船子及海船，湖中使用不得”。于是制定先攻击下游宋水军，然后集中兵力再攻打上游宋军的作战计划。起义军派出少部分人牵制上游宋军，发八车船数只，船上不树旗枪，战士埋伏在船仓里，顺水飘荡而下。下游宋军以为起义军被上游宋军杀败，漂来空船，水军船队一轰而上，乱次争先，企图抢掠。船到湖面宽阔的鄱官树一带，起义军车船突然战鼓雷鸣，喊声大作，踏车船回旋，横冲直闯，将宋军大小数百艘战船击沉。宋将崔增、吴全与部下 1 万余人，葬身湖中。留在沙滩上的宋军也被起义军歼灭。起义军所获器甲、旗幡、枪刀之属无数，“其势转加威猛”^①。

起义军“已无下流之虑，遂一意抗拒上流官军”，全力向上游宋军发动了攻势。这时，王玢和程昌寓正在下芷江口营帐，还没有得到下游宋军覆没的消息。驻守鼎口的宋军，忽然看到东岸有 100 多人的起义军队伍，身穿新衣服，红锦青绦战袍，打起鼓板，吹着羌笛，舞弄气球，来到宋营前，用竹竿系着一卷文书，插在沙嘴上，叫宋军来取。宋军以为是起义军来递交“受招安文字”，打开一瞧，见是宋朝官告和随军钱粮司印等。起义军以此减灭宋军士气。

当天晚上，起义军乘船从西港西进，车船战舰鱼贯而行。船上满载精锐全装铁甲战士，各执雁翎长刀，光彩夺目。王玢得报，“传令速即回军”，并命 4 只车船和 30 只海鳅船殿后，掩护撤退。起义军大小车船不计其数，紧追敌船不舍，一直追到风金口湖面宽阔处，两军展开激战。宋军在起义军猛攻之下，伤亡惨重，有的车船两边护车板都被打烂，一船 300 余人，“落得头破额裂，满

① 以下引文见《杨么事迹二》。

身中箭”。^①最后，宋军靠灰炮和密集的箭雨，才狼狈逃走。

王瓚与起义军几经较量之后，不敢再主动出战，而采取在要冲建立营寨，据守咽喉要地，派人破坏起义军根据地的庄稼，企图长期围困起义军。起义军决心保卫胜利果实，打破敌人的围困封锁。在绍兴四年（1134年）八月，利用江水泛涨，水陆两路向宋军的重要据点社木寨（今湖南常德市东）发起猛攻，杨钦率车船火烧敌寨，高癩率一军从陆路进攻。一天之内，全歼一寨五六百名宋军。龟缩在孤寨中的宋军士气低落，有的营寨将士“烧寨反乱”^②。王瓚围困起义军的计划又宣告失败。在“官由货授，政以贿成，军心坐离”^③等一片指责声中，被连降三级，调离湖湘地区。

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使刘豫的齐政权觉得有机可乘，妄图以联军灭宋，“裂地而王”^④，招诱起义军与他们合作。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齐国派人带着金帛礼品到起义军水寨，提出要起义军水陆并进，与齐国人马联合，顺江而下，大举攻宋，“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⑤。起义军严正拒绝与之合作。一月后，齐国又派35人组成的使团，带着官诰、金束带、锦战袍、羊羴等，来到起义军大寨，“再三相约诸寨首领，克日会合”^⑥。起义军把来人用酒灌醉，全部处死，沉尸江中。宋朝政府得知此事后，派人携带宋高宗的诏书，褒奖起义军“忠义”，并以官禄招抚起义军首领，也被杨么拒绝。起义军不为利禄所诱，坚持抗宋反齐斗争。

四、宋军剿抚并行与起义军的失败

绍兴五年（1135年），宋朝宰相张浚亲自坐镇湖湘，宋高宗又下令把精锐的岳飞军从抗金前线调往洞庭湖地区，全力镇压杨么起义军。

①②⑤⑥ 《杨么事迹二》。

③ 胡寅：《斐然集》卷十二《王瓚降三官》。

④ 《要录》卷八十一，第1332页。

张浚和岳飞在当时都是极有声望的人物，使起义军遇到前所未有的劲敌。张浚以宰相之尊指挥调动各路兵马，无人敢于抗命。岳飞的部队将勇兵精，其素质在宋军中首屈一指。这次宋军集中的兵力约有5万多人，主力是岳飞军1万多人，与起义军相比，兵力上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张浚和岳飞针对起义军的情况和活动规律，采取“剿抚并行”策略，给起义军构成很大的威胁。

张浚和岳飞一反前几任主帅冬季进兵的做法，改为盛夏进攻。以往宋军认为，夏季水涨，起义军易于发挥水军优势；冬季，“江湖水浅”，“宜发兵进讨”。^①张浚和岳飞认为，盛夏作战，迫使起义军“不得守其田亩”，出兵“蹂践”起义军的“禾稼”，造成起义军“秋冬绝食”，^②从而导致耕战体系的破坏。与此同时，又调集诸路官军，将龙阳、沅江、安乡、岳州等起义军水寨分割包围，环湖周围筑起许多牢固的城堡，城城相连，实行陆地封锁，逐步推进的方针，企图“大兵四合，一战破贼众殆尽”^③的目的。

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岳飞还按照宋高宗“且招且捕”，“恩威并济”的旨意，^④采取安抚的策略。通过政治诱降，收买叛徒，释放部分被俘的起义群众，分化瓦解起义军。岳飞认为：“湖寇之巢，艰险莫测，舟师水战，我短彼长。入其巢而无向导，以所短而犯所长，此成功之难也。若因敌之将，用敌人之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后王师乘之，覆亡犹反手耳。”^⑤经过岳飞等人的精心策划，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案。

起义军方面对于官军此次围剿，却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仍然以不变应万变，遵循以往的作战经验，几十个水寨各自为战，造成了兵力分散的弱点。四、五月间，本是洞庭湖区涨水季节，但

① 《杨么事迹二》。

② 《要录》卷八十六，第1422页。

③ 《要录》卷九十，第1498页。

④ 《金佗粹编》卷一。

⑤ 同上卷六《行实编年》。

是这一年恰逢大旱，水位低似隆冬，使起义军的车船运行困难，水军优势难以发挥。起义军领导层中出现个别思想游移不定、斗争不坚决的分子，又没有及时加以解决。在宋军软硬兼施策略面前，重要首领之一的黄佐，首先率部投降。宋朝立即封他为武义大夫、阁门宣赞舍人，“赏予特厚”。^①岳飞亲自慰抚黄佐部众，并设宴款待黄佐。岳飞抚着黄佐的背，称赞黄佐是“知逆顺祸福”的“真大丈夫”，如果能立功，封侯也不在话下。黄佐感激涕零，表示“愿以死报”。岳飞实施“以水寇攻水寇”的诡计，让黄佐再回湖中，“视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语劝者招之”。黄佐的叛变给起义军带来巨大的危害。

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黄佐率军偷袭岳州农民军的水寨，由于他熟知路径，很快攻占了起义军水寨，俘虏陈贵等9名首领，杀害不少起义军将士。岳飞马上为之请赏，提升黄佐为武功大夫。岳飞又派遣黄佐潜入素称“骁悍之尤”的杨钦大寨进行招安活动。岳飞认为：“以王师攻水寇则难”，“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故难；若因敌势，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而后以王师乘之”则易破也。故着力于招降活动。正当杨钦犹豫之际，岳飞决定再给他一点压力，逼他投降。六月二日，岳飞派人到杨钦水寨，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如再不出降，强弩火箭将水寨焚烧一空。于是，杨钦率全寨出降。杨钦的龙阳大寨有人口1万余人，大小船只400余艘，尽归岳飞所有。岳飞立刻申报在潭州都督行府的张浚，授予杨钦武义大夫，并把宋高宗所赐金束带和战袍转送杨钦。“一行首领，各次第推赏，补授名目”。^②士兵挑选强壮编入官军，老弱遣返本乡，“耕种田土”。黄佐、杨钦相继投降，给起义军队伍带来极大震动，全琮、刘洸等也随后向岳飞表示归顺。

起义军控制的地区不断在缩小，坐落在龙阳县江北岸的杨么

① 以下引文见《金佗续编》卷十八《章尚书颢经进鄂王传之一》。

② 以下引文见《杨么事迹二》。

大寨完全暴露在官军面前。杨么仍然是“不伏出首”，坚持战斗到底。岳飞亲自统领“精兵虎旅”，向杨么大寨发起猛攻。杨钦为表功，呈进制服起义军车船之计。岳飞采纳其计，用草木等障碍物堵塞湖中港汊，引诱起义军到浅水作战。杨么率军出战，车船的翼轮被宋军所设置的木草缠绕，无法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在官军猛烈攻击之下，起义军船队夺路而走，行至港汊又被巨筏阻挡，部分车船被巨木撞毁。危急关头，起义军统制陈瑁叛变，劫持帅船向官军投降。杨么见大势已去，先将钟子仪投入水中，自己也纵身跳入水中。官军水手入水将杨么俘获，押送岳飞面前，杨么宁死不屈，高喊数声“老爷”（钟相的称号），引颈受戮。钟子仪侥幸从水中逃脱，回到大寨后却被几个准备投降的部下逮捕，送到潭州张浚都督行府。

起义军营寨 70 余座，或破或降，最后仅剩夏诚据守的一座营寨。夏诚大寨地处芷江下游，三面临江，背靠高山，重城深壕，十分险要。岳飞采用从芷江上游投放大量木草，充塞下游河道。然后派出 2000 名军士在起义军营寨外叫骂挑战，以激怒起义军。起义军从寨中向外投掷瓦石予以还击。官军利用木草瓦石铺成一条路，攻破夏诚大寨。^①

洞庭湖农民起义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给南宋王朝以沉重打击。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在洞庭湖地区建立根据地，实行陆耕水战，取得一系列辉煌的战绩。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为以后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三节 南宋其他地区的农民战争

一、江西的农民战争

宋金战争期间，江西是受兵火之灾较少的地区。此地所发生

^① 《要录》卷九十，第 1502、1503 页；《会编》卷一百六十八炎兴下帙六十八。

的农民战争，完全是由南宋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所造成。建炎四年（1130年），扈卫孟太后的宋军进入虔州（今江西赣州），他们强买财物，甚至白昼行抢，焚烧虔州民居，激起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虔州数万人在乡兵首领陈新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包围虔州城，后虽战败，但继承者不断，以吉州（今江西吉安）与虔州两地农民战争声势大，持续久。

陈新起义不久，吉州农民在彭友（一名彭大或彭铁大）、李满（号李动天或李洞天）等领导下，组成几万人的农民军，与南宋官军作战。吉州农民军很快攻占8座县城。随后，虔州十几万农民在陈颙、罗闲十、钟超、王彦、钟大牙等领导下，再举义旗。虔、吉两县农民军建立山寨500余座，互相联络，彼此声援，共同与官军作战。农民军还不断向外发展，在各地流动作战。绍兴元年（1131年），陈颙领军攻克雩都（今江西于都）、信丰（今江西信丰）等县。绍兴二年（1132年），出兵攻陷广东循州治所龙川县（今龙川），福建汀州的武平县（今武平）。绍兴三年（1133年），围攻过潮州（今广东潮安）。短短的几年间，江西农民军战场地域包括江西虔州、吉州，广东循（龙川）、梅（梅县）、惠（惠阳）、英（英德）、韶（韶关）、广（广州）、南雄（今南雄）等州，福建的汀州（长汀）、邵武军（邵武县西）等广大地区。江西农民军的作战方式，主要采取据守险要和游击战，予以南宋官军沉重打击。江西、广东、福建地方官员纷纷向朝廷奏报，要求派岳飞军去镇压农民军。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岳飞率军到达吉州。彭友领导的吉州农民军转移到虔州雩都山区，联合永新县（今属江西）尹花八等两支农民军3000多人，据险抵御。岳飞派人向农民军劝降，彭友坚决回绝说：“吾宁败，不肯降，毋以虚声恐我也！”^①岳飞指挥军队猛攻山寨，彭友“跃马驱突”，率农民军与官军血战，农民军战败，彭友被俘。李满率余部退守距雩都百里的固石洞，继续抗击官军。岳飞派兵包围固石洞，经过激战，农民军终因力量悬

^① 《金佗粹编》卷五《行实编年》。

殊，固石洞被岳飞军攻占，李满被俘，农民军大部壮烈牺牲。

岳飞率军镇压了吉州农民军后，继续进攻虔州农民军设在兴国县衣锦乡的营寨。虔州农民军拒绝岳飞的招降，据寨坚决抵抗。由于农民军缺少统一的指挥，几百座山寨被岳飞军各个击破。吉、虔农民军首领陈颙、彭友、李满等人都会被岳飞杀害。

与吉、虔农民军同时而起的明教首领王念经（王宗石）领导的信州（今江西上饶西北）、饶州（今江西波阳）农民军几万人，攻占贵溪，屡次击败辛企宗部宋军。刘光世派部将王德、靳赛等统兵前往镇压，经过激烈战斗，农民军战败，王念经等26名首领被俘，押送越州（今浙江绍兴）杀害。宋军对贵溪、弋阳两地农民进行残酷的屠杀，20万农民死于官军的屠刀之下。

吉、虔等地的农民军失败后，江西各地的农民起义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一伙才了，一伙又生，无有穷已。”^①继续与南宋统治者进行斗争。绍兴十五年（1145年），江西安抚使李迥请求留下统兵官李通部驻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以对付农民起义军。宋高宗说：“诸处有盗贼，旋来请兵，未为良策，须帅臣豫有方略乃善，可下诸路措置行之。”^②反映出各地农民起义军很多，南宋感到兵力不敷分配。

二、福建的农民战争

南宋统治时期，福建农民不断遭到兵变、灾害和赋税的侵害，农民起而反抗，组建农民军与官军展开武装斗争。

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建州（福建建瓯）农民发动起义，推私盐贩范汝为做首领，开展武装反抗南宋统治的斗争。“时方艰食，饥民从之者甚众”。^③八月，建州守臣韩玘派州兵出战，被农

① 李纲：《梁溪全集》卷一百六《申省措置酌情处断招降盗贼状》。

② 《要录》卷一百五十五，第2503页。

③ 《要录》卷三十六，第696页。

民军击败。宋神武副军都统制李捧率部 3000 进攻农民军，亦被击败。十一月，农民军发展到数万人，并攻占建阳城。十二月，范汝为接受南宋朝廷招安。虽然范汝为拒绝“散其徒”，仍屯驻建阳城外，但是农民军发展势头受挫，部分首领率部出走。绍兴元年（1131 年）七月，范汝为再度起兵反宋，攻下建州，入邵武军，复有兵力 10 万。南宋朝廷派韩世忠统军攻打农民军。绍兴二年（1132 年）正月，宋军攻下建州城，起义军伤亡惨重，范汝为自焚。范忠率农民军余部转战闽浙，继续与宋军作战。建州农民军又坚持斗争一年之久，才最后被宋军镇压。

建州农民军失败后，福建其他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斗争风起云涌，不断与南宋统治者进行斗争。宋高宗统治时期，南宋在福建驻扎的正规军及地主武装共有 14 万人，对付农民起义军仍感到力量不足，常常调外路军协同作战。绍兴十五年（1145 年），福建又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汀、漳、泉、剑等 8 个州军的数十万农民，不能忍受地主阶级沉重的剥削和压迫，组织起来与南宋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农民军首领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邱崇、廖大嫂、满山红等领导的 10 多支农民军，活跃在各地，进行游击战。农民军常常利用“官军不习山险”^①，与官军周旋作战，时而转战“熟识小路”，时而“直冲县镇”。官军“难于掩捕”。福建路钤辖李贵带兵与农民军作战，被管天下领导的农民军擒获。福建安抚使薛弼改从地主武装中选拔军兵，组建殿前司左翼军，与农民军作战。福建农民军先后被镇压下去。

三、湖南、湖北的农民战争

从建炎年间开始，湖南、湖北地区一直都有农民起义军活动，但人数不多，规模较小。

宋孝宗统治时期，湖南南部和湖北南部地区成为农民武装斗

^① 《要录》卷一百五十三，第 2475 页。

争的活动中心。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郴州（今湖南郴县）、宜章农民在弓手李金领导下发动起义，参加农民军的有数万人。农民军“鼓行而前，直捣县邑，众以万计，器甲部伍粗备”^①。攻破郴州、道州（今湖南道县）、桂阳军（今湖南桂阳），逾南岭，攻入英、韶、连（今广东连县）、广、德庆（今广东德庆）、肇庆（今广东肇庆）、封（今广东封开）、梧（今广西梧州）、贺（今广西贺县东南）等9府州之境。湖南安抚使刘珙遣田宝、杨钦（杨么军中叛徒）领大军镇压农民军，两军战于宜章、龙冈，农民军战败，李金率部撤入莽山（湖南石坑崆）。李金后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农民军余部进入深山，继续坚持斗争。

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湖北一部分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在荆南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从湖北入湖南，转攻江西，南进广东，以后又回到江西，主要活动在永新、安福、萍乡等地山区。起义军转战于崇山峻岭之间，多次击败官军和地主武装的围阻。南宋朝廷一边调兵镇压，一边用重赏官爵等办法，号召地主武装起来镇压起义军。因镇压起义军不利，江南西路兵马总管贾和仲被罢官除名，江西安抚使汪大猷也被降职。起义军不但战术机动灵活，而且与广大农民群众联系密切。农民群众及时向起义军通报官军的行动，故起义军在作战中能知己知彼。起义军设伏打击官军，官军设伏往往扑空。七月，南宋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全力镇压这支起义军。辛弃疾派大军深入起义军活动的山区，截断起义军与当地农民群众的联系，随后进行大规模追剿。八月间，起义军从安福转向萍乡途中，与官军遭遇，失利。起义军转移到兴国，处境十分不利。辛弃疾乘机派人到起义军中游说，赖文政被诱骗至江州杀掉，起义军失败。

淳熙六年（1179年），湖南郴州、宜章又爆发了陈峒、李念九等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农民军数千人，攻下道州的江华（今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西北）、桂阳的蓝山（今湖南蓝山）及临武（今

^① 《宋会要辑稿》兵十三之二十四。

湖南临武)等县。起义军活跃在丛林之间,装备有弩、礮石、手炮等武器,利用地形,多次打败官军的进攻。南宋政府出动驻在潭(今湖南长沙)、鄂(今湖北武昌)、衡(今湖南衡阳南)、全(今广西全州)等州的正规军,并招募郴州、桂阳等地的地主武装及诸溪峒兵,约2万人,与农民军作战。同时,广东的摧锋军驻于连州边界,形成四路围攻,南北夹击之势。农民军的空冈根据地被官军袭破,辎重粮草被烧毁,农民军战士死伤很多。陈峒率余部南下突围到英德府(今广东英德)境,后被当地乡兵所败,陈峒等人牺牲。

南宋宁宗统治时期,湖南南部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又掀起新高潮。嘉定二年(1209年),郴州农民在李元砺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东攻吉(今江西吉安)、南安(今江西大庾),西入郴、衡,南下韶、石,北抵攸县,纵横几千里,破安仁、茶陵、桂阳,整个湖南震动。南宋多次派兵镇压,都被农民军挫败。后因农民军内部出现叛徒,李元砺被俘就义,坚持一年多的农民武装斗争最后失败。在嘉定年间,湖南郴州桂阳、道州江华县还先后爆发过钟志一、苏师军等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都有一定的规模。

四、广西的农民战争

南宋时,广西也是农民起义军活跃的地区。宋孝宗隆兴、淳熙年间,广西的农民起义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

隆兴元年(1163年),藤州(今广西藤县)农民在王宣、钟玉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农民军攻入藤州城,焚毁官衙,官吏纷纷逃走,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隆兴二年(1164年)初,南宋东南第十一副将李宏率领摧锋军主力进攻农民军,结果被农民军击败,李宏也被俘虏。起义军发展到数千人,攻克雷州(今广东海康)。在官军的围攻下,王宣、钟玉向官军投降,被处死,藤州农民起义斗争失败。藤州农民起义的同时,普宁县(今广西普宁)人

李云也聚众 3000 人武装起义，活跃在藤州、容州（今广西容县）一带，镇压地主豪绅。

淳熙六年（1179 年），广西陆川爆发了李接（一作李楫）领导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农民军“所至州县，不专杀戮，往往开发仓廩，赈施贫乏”。^①而且，“出榜约不收民税十年，故从叛如云，称之为李王，反谓官兵为贼”。^②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攻占容、雷、高、化、玉林、贵、藤等州县。李接起义军政治纲领明确，组织较为严密，开仓济贫，扶危解困，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周围州县的农民纷起响应，开展武装斗争。当时，较大的农民军有陈子明、陈南容、徐铁条等 10 余支，其中有的队伍人数多达数千。南宋政府派兵“疲于征戍”^③，耗费很大的人力财力，经过半年多时间，才把起义军镇压。^④

第四节 金朝中期各族人民起义

金朝在海陵王统治时期，各族人民起义较多，规模也较大。主要原因是海陵王的迁都和备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困乏破产的贫苦农民揭竿而起，打击了金朝统治者，加速了海陵王攻宋战争的失败。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西北等地，特点是比较分散，为时较短，还没有形成全国规模。

一、山东、河北等地农民起义

正隆三年（1158 年），山东沂州临沂（今属山东）赵开山领导

① 蔡戡：《定斋集》卷一《御盗十事札子》。

②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三《盗贼》。

④ 本节参阅《中国史稿》第五册第五章第三节《南宋农民武装起义》，1983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版；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第十三章第二节《南宋中期各地农民起义》，1985 年 4 月人民出版社版。

当地农民起义。赵开山把姓名倒置，以开为姓，号称开山赵，表示了要颠倒金朝统治的决心。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在开山赵率领之下，占领密州（今山东诸城）、日照（今属山东）等地。接着，向淄（今山东淄博东）、齐（今山东济南）等州发起进攻，队伍日益壮大，人数发展到30多万。这时，山东明椿、刘异、李机、李仔、郑玄等相继起义，与赵开山相互配合，向金军发动攻击。海陵王发动南侵战争后，李宝水军到达山东，赵开山派人接洽合作，被授予修武郎。起义军曾围攻城阳军（今山东莒县），以配合李宝水军进攻金胶西水军。李宝又授予赵开山为山后都统制，让他等待宋军反攻，“且为声援”^①。

正隆六年（1161年），济南农民耿京、李铁枪等6人，因赋税繁重难以为生，率当地农民起义，攻取莱芜县（今属山东）、泰安军（今山东泰安），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周围州县人民纷起响应，历城人辛弃疾率众2000人，蔡州人贾瑞率数十人，加入耿京起义军，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耿京自称天平军节度使，并派贾瑞和辛弃疾去南宋联络。宋廷授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军马。^②以后，耿京部将张安国、邵进等降金，杀害耿京。起义军分裂，马军将领王世隆率部众归于南宋，被授予山后都统制。辛弃疾从临安反回海州后，招集流散起义军，俘虏并杀已出任金济州（今山东巨野）知州的张安国，率领万余名起义军将士投南宋。

正隆六年八月，南京路单州（今山东单县）人杜奎率众起义，起义军占领州城。海陵王派都点检耶律湛、右骁骑副都指挥使大磐（大蒲速越）等领兵镇压。^③同年九月，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人王九率众起义，占据州城，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所到之处，人

① 《要录》卷一百九十三，第3231页。

② 《要录》卷一百九十六，第3308页、3312页。

③ 参见《金史》卷五《海陵纪》。

民纷起响应，“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①，声势浩大，地方官军不敢与起义军对抗。当时，“民不堪命，盗贼蜂起”。^②潼关以东、淮河以北的各族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海陵王最忌讳听到有关起事的消息，对奏报“盗贼事”的官员，采用廷杖和除名的办法加以处罚。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并不能使人民的反抗斗争有丝毫的缓解。

二、西北路契丹的民族起义

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为准备发动攻宋战争，派牌印燥合等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20岁至50岁都在应征之列。金使不顾契丹人免征的请求，强行威逼，于是引发了契丹人民武装起义。西北路契丹起义军是金中期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战斗力最强的一支起义队伍。

海陵王统治时期，西北路的军事机构是西北路招讨司，司治设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负责控制这一地区部族，职责是“招怀降附、征讨携离”^③。当时，任西北路招讨使是完颜沃侧，其父麻吉、伯父银术可都是金朝的名将。他本人17岁从军，参加过灭辽和北宋以及攻南宋等战争，并屡立战功。他在陕西华州任防御使期间，镇压过饥民起义。^④海陵王派牌印燥合等到桓州传令“起西北路兵”^⑤，完颜沃侧照令而行。契丹人的仇恨首先集中在燥合和完颜沃侧等人身上。组织和发动契丹人起义的是曾在西北路招讨司担任过契丹译史的撒八，他熟知招讨司内部情况，与孛特补率契丹起义军突袭招讨司，杀死燥合和完颜沃侧，夺取招讨司

① 《金史》卷五《海陵纪》。

②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李通传》。

③ 《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三》。

④ 参见《金史》卷七十二《完颜沃侧传》。

⑤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移刺窝斡传》。

器甲，武装起义。而后推举都监老和尚为招讨使，在桓州竖起义旗。

撒八、孛特补起义后，金群牧司管辖的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畜养马匹的牧民），纷起响应，击杀诸群牧官，先后有10余位群牧使和副使被杀。^①东北路契丹人也起义响应西北路契丹人起义，杀招讨使乌林答蒲卢虎，与室鲁部节度使阿厮列作战失败，千户十哥带领余部投西北路，同撒八起义军会合。咸平府谋克括里联络咸平府富家奴隶2000人起义，占领韩州（今吉林梨树县北偏脸城）和柳河县（今辽宁昌图八面城古城），进攻咸平府（治今辽宁开原老城镇），击败咸平少尹完颜余里野的官军，占领咸平，打造器甲，出府库财物募兵，声势大振。曹家山猛安绰质率兵千余扼守干夜河，企图阻止起义军东进，起义军击败绰质，进攻济州（今吉林农安），中途在信州（今吉林怀德西北新集城）被金军击败，转攻东京辽阳府，行至沈州长安县（今辽宁沈阳市附近），闻听东京有备，撤军投奔撒八。

契丹军是海陵王攻宋的主要兵力之一，契丹人的起义削弱了南攻金军的实力。海陵王对契丹人起义十分重视，派枢密使仆散忽土（师恭）、西京留守萧怀忠领兵1万，与右卫将军萧秃剌军镇压起义军。^②萧秃剌率军与起义军相持数日不能获胜，后方粮饷供应不上，撤回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撒八担心金军会大举围剿，率众沿龙驹河（今克鲁伦河）西行，计划投奔西辽。仆散忽土、萧怀忠、萧秃剌追撒八至河上而还。海陵王发怒，以逗留纵贼的罪名将三人处死，并杀北京留守萧赳，另外任命枢密副使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兵部尚书纥石烈志宁为副都统，领北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临潢府、泰州（今吉林白城东南）三路军追剿撒八起义军。

① 参见《金史》卷一百二十一《忠义传一》。

② 参见《金史》卷九十一《萧怀忠传》、卷一百三十二《仆散师恭传》、卷一百三十三《移剌窝斡传》。

起义军在西行途中发生内讧，以义军六院节度使移刺窝斡、兵官陈家为首反对西行的契丹人杀撒八，囚禁老和尚、李特补等，移刺窝斡自任都元帅、陈家为都监，率军返回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不久，攻临潢府，俘虏出城作战的金总管移室懣，起义军发展到5万人。^①

正隆六年（1161年）十二月，移刺窝斡称帝，改元天正。这时，海陵王已死，金世宗继续派兵围剿起义军。金世宗派元帅左都监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颜骨只救援临潢。移刺窝斡放弃临潢，转攻泰州，途中击败吾扎忽的追兵和泰州节度使乌里雅的骑兵，乘胜进攻泰州城，遭到泰州守军的顽抗，起义军损失很大，撤军攻济州。

大定二年（1162年）正月，金廷又派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诸军参加镇压契丹起义军。金集中在西北路军队有：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曷懒路总管徒单宁、广宁尹仆散浑坦、肇州防御使唐括乌、临海节度使纥石烈志宁、曷速馆节度使神土懣、同知北京留守完颜骨只、淄州刺史尼庞古钞兀等10余支军队，为镇压契丹起义军，金廷不惜动用大批精兵强将，足见起义军声势的浩大。

金廷在重兵围剿起义军的同时，采用政治手段分化瓦解起义军。金廷宣布：1、归顺者不论首从和良人、奴婢，一律无罪释放。2、原有官职和率众来归者依本品量材录用。3、原为驱奴、宫籍监人一律放免为良人，并自愿选择居地，同时免三年差役。4、捕杀义军首领者授官和重赏，捕获移刺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和奴隶加五品官授刺史。

金廷的分化策略，达到了军事围剿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起义军中出现了叛徒，为金军出谋划策，并导引金军偷袭起义军大本营。移刺窝斡正领兵进攻济州，回师救援大本营。起义军行至长泆（今吉林乾安、农安之间），金军伏兵四起，起义军奋力激战，

^①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移刺窝斡传》载：“贼遂围临潢，众至五万。”

伤亡很大，被迫突围西走。金军在临潢东南的霖霖河追上起义军，起义军突然反击，金前军纥石烈志宁部仓促应战，纥石烈志宁左臂中箭，金后续大军及时赶到才抵挡住起义军的攻势。起义军据上风纵火，乘烟攻击金军，金军被烟熏处于危殆之中，忽然下了一场大雨，风止烟消。于是金军奋力进击，起义军败走。起义军渡过溪涧，反击金追兵，金军败退到涧北，不敢再战。移刺窝斡率军自懿州（今辽宁阜新东北）破川州（今辽宁北票西南），起义军8万人越大青山西攻，金北京大定府震动。^①

大定二年五月，金世宗以作战不利，解除完颜谋衍、完颜福寿的兵权，召还中都。六月，改任尚书右丞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并从中都运去弓1.5万张，箭150万支，命令金军全力围剿起义军。^②

移刺窝斡率军从花道（今内蒙古赤峰东南）西走，仆散忠义和纥石烈志宁率金军在裒岭西陷泉（今辽宁巴林左旗境）追上起义军，金军抢先占领南冈制高点，依南冈对起义军构成月牙形包围，金军从后面赶杀，许多起义军将士陷入泥中，被金军斩杀和俘虏上万人。金军乘胜追击，在落括冈西尽获起义军辎重，俘获起义军5万余人。移刺窝斡突围后收集部众，得1万余人，进入奚族居地。

移刺窝斡在奚族居地补充部分奚兵，在鲁古淀、古北口、兴化之间转战，并击败古北口温迪罕阿鲁带守军。^③八月，金世宗命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领兵入奚地，会合仆散忠义军追击起义军，移刺窝斡北走沙陀。^④起义原将领、奚族猛安稍合住是隐藏在起义

① 参见《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卷一百三十三《移刺窝斡传》。

② 参见《金史》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卷一百三十三《移刺窝斡传》。

③ 《金史》卷七十二《完颜谋衍传》。

④ 《金史》卷七十《完颜思敬传》。

军内部的叛徒，他接受纥石烈志宁的委派，拉拢移刺窝斡亲信，九月，擒移刺窝斡，送交金军，移刺窝斡被押到中都处死。^①起义军继续在北京、临潢、泰州等地作战，一年半以后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契丹人民起义在军事方面有其特点：第一，起义军成分主要是牧民，战士几乎是清一色的骑兵。第二，起义军多采用集中数万名骑兵在数百里范围内流动作战的方式。第三，经常采用退却中突然反击的战术。

^①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移刺窝斡传》。

第十二章 金对西夏和北方部族的战争

金朝西面毗邻西夏，北方草原生息着阻鞑^①等游牧部族。金朝强盛之时，西夏臣服，阻鞑等接受辖治。但是，随着金朝国力衰落，西夏不断出兵进犯，阻鞑等族频繁南下袭扰。金、夏军事对抗，彼此削弱了力量。金朝派兵征讨阻鞑等族，修筑界壕，暂时阻止了阻鞑等族的南下。结果，却为蒙古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节 金夏结盟与军事冲突

一、金夏结盟

金、辽战争期间，与辽关系密切的西夏曾派兵援助辽朝，先后都遭到失败。天会元年（1123年），金将完颜宗望追击辽天祚帝，进驻天德军，西夏震恐。随后，金遣使与西夏接触，提出让西夏协助俘获辽天祚帝，金以所获部分辽地馈赠。夏崇宗慑于金军威力，应允金朝的要求，并决定弃辽附金。金朝回赠“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冻之西”地^②。此后金、夏结盟。

金灭辽后，发动灭宋战争。西夏决定出兵助金，进攻北宋。西夏军东攻武州（今山西五寨北）、朔州（今山西朔县）、丰州（今陕西府谷西北）、麟州（今陕西神木西北）等地。金天会三年（1125年）三月，西夏军队从金肃、河清两地渡过黄河，占领天德（今

① 阻鞑（bǔ），也作阻卜，《辽史》、《金史》中对鞑靼的称呼。

②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外国传上·西夏》。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等地。四月,又攻占震威城。西夏接连告捷,特别是占领战略要地天德、云内为金军所不容,遂以武力驱逐西夏军,强行占领天德、云内。金军的此举引起西夏的不满,西夏遣使向金质问。金应允夺取陕西后,“以陕西奉偿”。^①西夏转而向南发展,攻占西安州(今宁夏海源西)和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北)等地。

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金灭亡北宋后,仅把陕西北部给西夏。以后西夏又向西拓展,把乐州(今青海乐都南)、积石州(今青海循化)、廓州(今青海尖扎北)纳入版图。对此,金朝予以承认。

南宋建立后,金专力对付南宋,与西夏关系较为和睦,但有所戒备。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答应西夏请求,在金、夏边境地区设置榷场。金先后设立东胜州、环州、保安、绥德、兰州等榷场。榷场设立后,西夏从金朝获得铁、纺织品等生活必需品,对西夏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益处。

金世宗统治时期,金、宋签订和约,于是金对西夏的政策有所转变。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朝下令关闭保安、兰州两榷场。几年后,又罢绥德榷场。西夏对外贸易渠道仅剩东胜州和环州,一东一南,十分不便。后经西夏再三恳请,于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金只同意恢复绥德榷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在蒙古军事压力下,金开始拉拢西夏,开放全部边境的旧有榷场。但是,随着蒙古军队的南下与西攻,金夏联盟就难以维持了。

二、金夏军事冲突

金、夏结盟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因此一旦形势有变,双方就会兵戎相见。

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西夏乘金废刘豫齐国之时,出兵

^① 戴锡章:《西夏纪》卷二十三。

攻占府州（今陕西府谷）。次年，金军毁约攻宋，西夏趁机出兵攻延安，企图尽占陕西全境，联宋反金。金、宋和议后，西夏才从延安退兵。此后金一直封锁西夏边境，阻止西夏与南宋往来。但是，西夏一直暗中与南宋交往。金海陵王攻宋前，西夏曾派使臣屈移两次到南宋。

金世宗统治时期，着力发展国内经济，对南宋和西夏政策比较和缓。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金、夏也屡有局部性的战争发生。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西夏派大将蒲鲁合野进陷麟州，“夏人掳金帛子女数万，毁城而去”^①。

金章宗统治时期，西夏对金的骚扰增加。明昌元年（1190年），西夏军攻入岚州（今山西岚县）、石州（今山西离山）等地。明昌二年（1191年），西夏军攻破鄜州（今陕西富县）、坊州（今陕西黄陵），又攻保安州（今陕西志丹）。泰和末年，西夏受到蒙古军攻击，斡罗孩城陷，金拒不发兵救援，两国关系更加恶化。

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年），蒙古军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西夏遣使向金朝告急，请求发兵援救。金臣提出发兵联合抗蒙的主张，却遭到卫绍王的反对。卫绍王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②自此金、夏决裂。西夏在暂时度过危机后，多次发兵攻金。大安二年（1210年），西夏先后发动二次逾万人的攻金军事行动。一次兵围东胜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金派大军增援，西夏撤军。一次大举攻葭州（今陕西佳县）。

金、蒙战争爆发后，西夏转而附蒙攻金。大安三年（1211年），西夏乘蒙古军围攻金中都之机，攻入金泾州（今甘肃泾川北）、邠州（今陕西彬县），又进围平凉府（今甘肃平凉）。崇庆元年（1213年），西夏军攻陷保安州、邠州、巩州（今甘肃陇西），兵围庆阳府（今甘肃庆阳）。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西夏军攻庆州、原州（今宁夏固原）、延安等地。贞祐三年（1215年）正月，

① 《大金国志》卷十七《世宗圣明皇帝中》。

②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十。

西夏军攻环州（今甘肃环县）、积石州，入安乡关；二月，再攻环州；五月，攻第五将军城；十月，再攻保安、延安；十一月，兵围临洮。

西夏对金采用游击战术，金“以兵应之，悉皆遁去，据还巢穴”^①。金朝对此一筹莫展，被动应付。贞祐三年五月，金廷“谋伐西夏，遣大臣镇抚京兆”^②，决定对西夏发动攻势。贞祐四年（1216年）闰七月，金军攻夏，庆阳总管庆山奴出怀安寨，环州刺史完颜胡鲁出环州，提控颜狗儿攻兰州西关堡。八月，金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庆寿领兵在安塞堡击败西夏军，右都监完颜赛不在结耶觥川、车儿堡接连击败西夏军。西夏军并不示弱，利用蒙古成吉思汗大举攻金的机会，进攻延安、代州（今山西代县）、潼关（今陕西潼关县东旧潼关）等地。十一月，西夏军4万余人围攻定西（今甘肃定西县南），被金军击败。十二月，金军出大兵攻夏，左监军陀满胡土门和延安总管古里甲石伦领兵攻盐州（今陕西定边境）、宥州（今陕西靖边西北长城外红柳河南岸）和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北长城外红柳河北岸），庆山奴和知平凉府移剌达不也率军攻威州（今宁夏中宁东南韦州镇）、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会州（今甘肃靖远）等州。

金、夏军事冲突时间持续较长，彼此都付出了很大代价。“搆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③直到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年），夏、金才达成和议，以“兄弟之国”相称。^④此时，蒙古军乘金、夏军事力量削弱之机，加快了灭亡夏、金的步骤。

①③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外国传上·西夏》。

② 《金史》卷十四《宣宗纪上》。

④ 关于金夏议和的时间，《金史》卷一百三十四《外国传上·西夏》记：“至大元年，和议成，自称兄弟之国。”但据《金史》卷十七《哀宗纪》载：正大元年十月，“夏国遣使修好”；正大二年九月，“夏国和议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国书称弟”。本纪较传记载翔实，故采用本纪之说。

总之,金夏军事冲突反映了双方战略指导都存在重大失误。金应当联结西夏,以其抵御蒙古势力南下。西夏不应当采用在诸强对抗中依附一方、联彼击此的战略,“偪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①。其正确的选择是战略西移,向今青海方向发展。

第二节 金朝在北方的军事行动

一、金与阻鞑等族的战争

金章宗时,随着金朝势力的衰弱,原受金朝统治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袭扰,对金朝北部地区造成威胁。金朝先后几次派兵深入北方草原与阻鞑等族作战,这是金中期在北方地区进行的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金章宗明昌年间,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有阻鞑(鞑靼)、蒙古等族。当时蒙古各部尚未统一,受到实力强大的阻鞑压迫,蒙古孛儿只斤等部被迫西迁到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源头,广吉剌、合底斤、山只昆等部南迁到贝尔湖一带。阻鞑各部控制着呼伦湖与贝尔湖之间广大地区。阻鞑与蒙古势力的发展,对金朝北方地区构成威胁。

明昌五年(1194年),金廷决定用兵北方,以遏止北方游牧部族势力的南下。同年九月,金在上京等九路选调乱军3万人,计划第二年春出兵。明昌六年(1195年)五月,金章宗任命左丞相夹谷清臣行省于临潢府(今辽宁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负责这次军事行动。夹谷清臣派人“侦知虚实”,^②以轻骑8000,命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完颜充和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分领前队,自领精兵1万为后队,进攻蒙古合底斤、山只昆等部。金军进至呼伦湖,攻克营垒14座。北阻鞑首领斜出出兵配合金军

① 《金史》卷三十四《外国传上·西夏》。

② 《金史》卷九十四《夹谷清臣传》。

作战，缴获大批羊马物资。夹谷清臣谴责斜出擅自抢掠，并要求他以财赎罪，引起阻鞑起兵反金。金章宗解除夹谷清臣兵权，改任右丞相完颜襄负责北边军事。

明昌六年十二月，完颜襄到临潢指挥与阻鞑作战，统金军进至大盐泺（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额吉纳尔苏莫附近），击败阻鞑，“杀获甚众”。^①随后，派完颜充进军斡罗速城。承安元年（1196年）初，完颜襄分兵东西两路继续北攻，东路军进至龙驹河（今克鲁伦河），被阻鞑包围，三天突围不成。完颜襄得报，率西路军乘夜疾驰救援，突袭敌军，东路军也乘势从围中杀出，阻鞑大败，逃奔斡里札河（今蒙古乌勒吉河）。完颜襄派西北路招讨使追击，重创阻鞑。九月金军得胜班师。

金廷与阻鞑战事结束未久，契丹人又起兵反抗。承安元年十一月，北边契丹人德寿聚众反金，占据信州（今吉林怀德西北新集城），建元身圣，众号数十万。完颜襄调上京等军队6000人，与临潢府军前往镇压，德寿兵败被俘。

承安二年（1197年），阻鞑再度起兵反金，完颜襄又赴前线指挥金军作战。以同判大睦亲府事完颜宗浩率一军出泰州（吉林扶余东北他虎城）；右丞完颜衡设行枢密院于抚州（今河北张北），出兵西北路阻击阻鞑；完颜襄自领一军出临潢；三路夹击阻鞑。北阻鞑首领斜出到抚州投降。

在北部的广吉剌等部也屡次入塞攻掠，驻军泰州的完颜宗浩负责指挥金军征讨。承安三年（1198年），完颜宗浩派主簿完颜撒领兵200为先锋北攻，大军继后，广吉剌投降，完颜撒得广吉剌骑兵1.4万。完颜宗浩率大军北进，遣使约完颜撒会师移米河（今内蒙古海拉尔市南伊敏河），进攻合底斤、山只昆。由于使臣误入婆速火部，两军失去联系。完颜宗浩前军至忒里葛山，击溃山只昆所统石鲁、浑滩两部，斩首1200，俘生口车畜甚众。金军进至呼歇水（今黑龙江省辉河），合底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

^① 《金史》卷九十四《完颜安国传》。

胡必刺投降。完颜宗浩又进击在移米河的山只昆属部迪列土，斩首 300，缴获牛羊 1.2 万。合底斤部渡移米河西逃，完颜撒与广吉刺部长忒里虎追击，于窟里不水大败合底斤部。随后又击败婆速火部，“获驼马牛羊不可胜计”。^①

二、修筑界壕加强边防

金廷镇压了北方部族的反抗后，采取两项重大举措以巩固北边地区。一是把东北路招讨司机构从泰州迁到金山（今吉林白城市西北大兴安岭），并增设副招讨二员，以加强边防地区的管理。一是修筑界壕，以防御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界壕的修筑，是金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新的尝试。

金世宗后期，曾于北边地区修筑过界壕，但是边堡质量“参差不齐”，壕堑“旋为沙雪烟塞，不足为御”。^② 金章宗时，完颜襄又提出“穿壕筑障”的建议，他说：“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利”。^③ 在金章宗的支持下，完颜襄总督军兵、民夫，历时 50 天，修筑了临潢府路的界壕，西北、西南两路也相继修筑了界壕，加上东北路界壕，金朝形成了东北起自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经科尔沁右翼中旗东北、巴林左旗北、达来诺尔，西南到今四子王旗、呼和浩特西北，全长 1500 多公里的一道军事防线。

金界壕包括壕堑、界堤、壕堡、边堡等设施。壕堑宽 8~10 米，深 4~5 米。界堤分为主堤和副堤，主堤高 6~8 米，宽度为 8~10 米。筑堤材料均就地取材，平地取自挖壕的土方夯筑，山地用石料垒砌。主堤顶部构筑有雉堞，每隔 150 米左右建一个马面，上有铺房供守军休息。主堤上还设有小城门，以便出入。城门外修

① 《金史》卷九十三《宗浩传》，第 2074 页。

②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第 563、564 页。

③ 《金史》卷九十四《完颜襄传》，第 2090 页。

有瓮城，外观与马面相近，增加了小城门的隐蔽性和防御能力。从壕堑底部到主堤顶部，高达10~13米，形成一道近似城墙功能的防御墙，故有“金长城”之称。为增强主堤的防御能力，在主堤与壕堑前修筑附属的副堤和副壕，副堤高约4米、宽约5米，副壕深、宽度都是4~5米。

壕堡的构造为方形，每道力墙长约百米，高度和宽度与主堤大致相同。壕堡建于主堤内侧，设有房舍和营库，可以屯驻少数守军和储备兵器。壕堡与主堤之间，有门和梯道连接。每座壕堡之间的距离通常是3~7公里，位置多选在利于观察敌情和地形条件优越之处。^①

边堡是具有一定规模和设施的边防小城，建于壕堑、界堤和壕后面的险要处。边堡内军事设施齐备，外有护城河环绕，形成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城堡。边堡与壕堑、界堤和壕堡结为一体，军队进可以出击，退可以据守，坚固程度和规模都超过壕堡。金世宗后期，在泰州境内设有边堡19座，临潢有24座。金章宗时，边堡的数量有所增加。

金修筑界壕以阻北方游牧部族南下，在军事上有一定价值，但壕堑易为风沙所填平，失去效用。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嗣后，强大的蒙古骑兵越过界壕，发动了灭金战争。

^① 参见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中册第2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十三章 金与南宋的灭亡

金朝从章宗时开始走向衰落。这时，漠北草原上蒙古族完成统一和建国，并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经过五年的准备，蒙古出兵攻金，两国战争爆发。金蒙战争前后长达 23 年之久，公元 1234 年蒙宋联军攻占蔡州，金朝灭亡。随之，宋蒙由合作转向对立，宋蒙战争全面展开，历经 40 余年，南宋最终被元朝灭亡。

第一节 金朝的灭亡

一、金朝的衰落

金章宗时，官僚政治腐败，水、旱、蝗、地震、饥荒等灾害频仍，仅见于史书的大灾有 40 起。^①尤其是黄河三次决堤泛滥，使山东、河北、河南等路的大批农田被淹，农民流离失所，“农岁不登，流殍相望”^②。生产停滞，农业歉收，对外战争不断，食禄冗官倍增，官僚地主搜刮有增无已，给金朝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国家收入日益减少，支出与日俱增。财政出现“所入不充所出”的窘境。^③金代财政困难的程度，在历史上也实为罕见。正如《金史·食货志》所说：“其国之财匮，比比有之，而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④金朝的国势开始迅速衰落。金朝为解决财政困难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举措：

① 据《金史·章宗纪》、《金史·食货志》统计。

②④ 《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

③ 《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志四》。

一是加重赋调的征收。各路赋调，“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①同时，大幅度提高盐、酒、茶、商等税额。如盐税，山东、沧州、宝坻三盐司，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每斤盐三十文，到承安三年（1198年）十二月每一斤增为四十二文。这一年，其他地区盐税也随之增长。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两京煎盐旧法每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法每石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七盐司旧税年收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②金朝还在承安年间恢复了大定时已废除的醋税，并增设军需钱等新税。

二是大量发行货币。金章宗时，以大量发行交钞来弥补财政亏空。正如《金史·食货志》所说：“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③承安二年（1197年），因过量发行交钞，以致一贯以上的大钞在民间“艰于流转”。官府不得不采用以大钞兑换小钞的办法，回收部分大钞。承安三年（1198年）正月，金朝命令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凡一贯以上的交易，必须使用交钞和宝货，不许用铜钱。九月，“民间钞滞，尽以一贯以下交钞易钱用之”。小钞也成为无人愿要之物。随后，金朝又发行一种“三合同交钞”，此种交钞只行于民间，官府不收，信誉极差。直至泰和二年（1202年），金朝才允许百姓交税时可以使用此钞，但以税额的十分之一为限。由于政府屡变钞法，盘剥百姓，“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于市”。章宗指示御史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泰和七年（1207年）七月，金朝规定民间交易、典质额在一贯以上者，全用交钞，不得用钱。法令再严，而交钞在民间仍难

① 《金史》卷十《章宗纪二》。

② 《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志四》。

③ 以下引文均见《金史》卷四十八《食货志三》。

以流通。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外出巡按，也以大钞“难支用，命取见钱”。为此招致“沮坏钞法”之罪名，受到“杖之七十，削官一阶解职”的惩处^①。金朝想通过币制的变更来敛财，结果造成货币贬值，经济衰退。当时“至以万贯惟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②

三是括田。金章宗时，金朝试图通过括田的方式收回民间冒占的官田和逃税的土地，分授给因负担沉重的军役以及因本身腐化而濒于破产的猛安谋克屯田军户，以解决养兵问题。承安五年（1200年），章宗命枢密使完颜宗浩、礼部尚书贾铉前往山东、河北、陕西等路括田，“凡得地三十余万顷”^③。在收括的土地中，有些是冒占的官田，但也“包取民田”^④，“百姓旧业辄夺之”，侵夺了许多私田。参知政事张万公曾向章宗上书反对括田，说：“夺民（田）而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并提出“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田租）贍军，则军有坐获之利，而民无被夺之怨矣”。^⑤章宗不予采纳。金朝以括田的方式来解决军户生计，结果造成“无益于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⑥，军民矛盾激化。元好问也曾揭露括田的弊病，他说：“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山东河朔上腴之地，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兵日益骄，民日益困，养成痼疽，计日而溃”。^⑦

金章宗通过增税、变钞、括田等举措企图解决政府经费问题，结果不但目的没有达到，相反经费更加匮乏。

与经济凋敝的同时，金朝的军事力量也日益衰落。昔日剽悍善战的猛安谋克，进入中原后，占田敛财，生活腐化，军纪松弛，

① 《金史》卷四十八《食货志三》。

②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

③ 《金史》卷九十三《完颜宗浩传》。

④ 《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二》。

⑤ 《金史》卷九十五《张万公传》。

⑥ 《金史》卷一百七《高汝砺传》。

⑦ 《元遗山先生全集》卷十六《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

战斗力下降。太傅徒单克宁曾对章宗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①章宗为了扭转猛安谋克的衰势，在括田的同时接连颁行多项军法，但仍无济于事。重要军事支柱猛安谋克的衰落，使金朝的统治动摇了。

卫绍王统治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更加衰落。正如《金史》所说：“卫绍王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②

二、金蒙战争的爆发

大蒙古国建国后，经过几年准备，于1211年大举南攻金朝。卫绍王允济得到蒙古军南攻的消息，遣西北路招讨使粘合合打前去求和，遭到拒绝。随后作出御敌对策，派平章政事独吉思忠（一名千家奴）、参知政事完颜承裕（一名胡沙）行省事于西北路，授予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行枢密院事，分别负责在西北和西南两路指挥抵抗蒙古军。

独吉思忠等领兵到达北部边地后，见西北路约300公里界壕，“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③。他立即组织军兵重新加固界壕，对乌沙堡（今河北张北县西北旧兴和西）等重要边堡进行修缮，共“用工七十五万”。金军企图凭借险隘阻击蒙古军南进。

成吉思汗拥兵10余万，由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将军木华黎、哲别等分统。七月间，蒙古军分路进攻。成吉思汗率领主力由达里泊向金境推进，先锋哲别领兵攻乌沙堡，乘金军失于戒备之际，一战而下，再取乌月营（今内蒙兴和附近）。乌沙堡与乌月营失陷，金军仓皇后撤，西北防线瓦解。成吉思汗随后南攻，占领昌州（今内蒙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抚州（今河北张北）。

① 《金史》卷九十二《徒单克宁传》。

② 《金史》卷十三《卫绍王纪》。

③ 《金史》卷九十三《独吉思忠传》。

八月间，金卫绍王以“乌沙堡之役不为备”^①，解除独吉思忠兵权，改由完颜承裕主持军事。完颜承裕率金军退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金兵40万（一说30万），据守险要。成吉思汗率军从獐儿嘴通道进击，金军大败，“死者蔽野塞川”，南退宣德（今河北宣化）。金军在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被蒙古军追及，两军激战三天，成吉思汗指挥3000精骑突入金阵，随后发起全面攻击，金兵大溃。完颜承裕仅脱身，逃入宣德城。

蒙古军在浍河堡歼灭金军主力后，兵锋指向东南的金中都，金军望风而逃。大安三年九、十月间，蒙古军乘势攻克德兴府（今河北涿鹿西），进至缙山（今北京市延庆），距居庸关仅数十里。金居庸关守军弃关而逃，蒙古大将哲别领先锋军顺利逾关而入，直抵中都城下。

由成吉思汗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的另一路蒙古军队抵金西南路界壕，为金朝守边的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领蒙古军顺利地通过界壕，进入金西南路境。金朝负责西南路军事的纥石烈执中竟毫无御敌的准备。蒙古军接连攻占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古城）、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武州（今山西五寨北）、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地。^②

纥石烈执中放弃西京，领7000劲兵逃往中都。在定安（今河北蔚县东北吉安庄附近）北，与蒙古军遭遇，激战到傍晚，纥石烈执中率部分随从丢下部队逃走，金军溃败。纥石烈执中逃经蔚州（今河北蔚县），进入紫荆关，逃入中都。^③

十二月，金中都守将完颜天骥趁蒙古军兵力尚未集结，派兵突然出击，斩首3000人。蒙古军从南顺门攻城，完颜天骥设拒马于南柳街诱敌骑入城，展开巷战。蒙古骑兵被拒马羁绊，金军又

① 《金史》卷九十三《承裕传》。

② 《元史》卷一《太祖纪》。

③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纥石烈执中传》。

点燃街道两旁民屋，街狭屋倒，蒙古军死伤甚众，退据南顺门。火熄后，蒙古军再发动攻势，完颜天驷力战而死，蒙古军占领中都外城。完颜律明领兵入守内城，卫绍王亲自巡城劳军。蒙古军再攻内城，金军从城中发炮攻击，四城兵从城上射击，蒙古军攻势受阻。金遣使求和，遭到拒绝。蒙古军再次猛攻内城，终因金军顽强抵抗，无法攻入内城。^①

崇庆元年（1212年）正月，蒙古军从中都撤军，转攻辽东。哲别领先锋军围东京，强攻不下，佯装撤军。金守军中计，放松警惕，蒙古军回师攻城，东京失守，蒙古军掳掠后退兵。

当年秋天，成吉思汗领兵再攻西京。此前纥石烈执中弃西京后，蒙古军并未派兵驻守。金廷任命西京按察使抹捻尽忠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进驻西京。成吉思汗久攻西京不下，身中流矢，撤军回阴山。

至宁元年（1213年），成吉思汗再次出兵，蒙军10余万，沿上一次进兵路线，从宣德、德兴南进，在怀来和缙山与金军遭遇，击败金尚书左丞完颜纲的10万金兵和术虎高琪统领的30万人马。从北口进至居庸关外，见金军防守严密，留军对垒，分军攻掠河北、山东、河南地区。第二年春，金居庸关守将讹鲁不儿献关投降，蒙古军入关，再围中都。^②

三、中都陷落

金卫绍王完颜永济是一个昏庸且又刚愎自用的皇帝。金兵败乌沙堡之时，尚书右丞相徒单镒就曾向他建议说：“彼（蒙军）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备御。昌、桓、抚三州素号富实，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势，

① 《大金国志》卷二十二《东海郡侯上》。

② 参见《元史》卷一《太祖纪》，《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卷一百六《术虎高琪传》。

人畜货财，不至失亡”。^① 这一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入保重镇之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遭到卫绍王的斥责。随后徒单镒又提出：辽东是根本要地，距中都有数千里，万一受到蒙军进攻，州府互相观望，没有统一的指挥，必然贻误大事，建议派大臣行省事于辽东，总领辽东军政事务。卫绍王以“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不予采纳。结果导致辽东被蒙古军占领。随着金朝军事上的失利，终于引发卫绍王被杀的军事政变。

大安元年（1209年），主持西南路军事的纥石烈执中，擅弃西京逃回中都，卫绍王并不问罪，授予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职务。于是“执中益无所忌惮”。^② 崇庆元年（1212年），他向朝廷要步骑2万屯驻宣德州，金廷仅给3000人，命驻妫州。他对此十分不满，口出恶言，被罢归田里。至宁元年（1213年），卫绍王又要起用纥石烈执中“预计军事”。左谏议大夫张行信、右丞相徒单镒、参知政事梁瑾等纷纷反对。卫绍王不听劝阻，同年五月，任命纥石烈执中权右副元帅，率武卫军5000人屯驻中都城北。蒙军逼近中都，纥石烈执中“止务驰猎，不恤军事”。卫绍王派人责问，纥石烈执中愤而谋反。

八月，纥石烈执中分武卫军为三军入城，大呼蒙古军已到北关，诱杀知大兴府徒单南平、没烈父子。符宝祗候鄱阳、护卫十人长完颜石古乃闻乱，领大汉军500人奋起抵抗，全部战死。纥石烈执中从东华门攻宫城，护卫斜烈、乞儿、亲军春山开门引叛军入宫。纥石烈执中劫持卫绍王出宫，自称监国都元帅，指使宦官杀死卫绍王，处死完颜纲等大臣，迎立金世宗孙完颜珣即皇帝位（宣宗）。纥石烈执中把沿边诸军全部调到中都平州，命骑兵屯驻蓟州（今天津市蓟县），自此“边戍皆不守矣”^③。

九月，金宣宗即位，任命纥石烈执中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封泽王。提点近侍局庆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奏请除掉

① 《金史》卷九十九《徒单镒传》。

②③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纥石烈执中传》。

纥石烈执中，金宣宗念其援立功，不许。纥石烈执中处死完颜纲后，从镇州（今北京市延庆）调回术虎高琪军守卫中都以南。十月，术虎高琪军在良乡被蒙古军击败，退回中都。纥石烈执中说：“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①术虎高琪出战又败，还军包围纥石烈执中宅第，杀纥石烈执中。十一月，金宣宗任命术虎高琪为左副元帅。十二月，又任命术虎高琪为都元帅兼平章政事，主持军政事务。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派完颜承晖到城外蒙古军营议和。成吉思汗应允金献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各500人、马3000匹等条件，同意撤军。金宣宗派完颜承晖送蒙古军退出居庸关。^②当时，在居庸关附近活动的李雄等民间抗蒙武装，准备凭险截击蒙古军。完颜承晖传金宣宗圣谕：“已南北讲和，不许擅出兵！”^③蒙古军带着大量的战利品顺利出关。金廷屈辱求和，暂时度过了危机。

蒙古军从中都撤军后，仍控制着中都以北地区，意在灭金。金朝君臣多次商议对策，形成坚守中都与南迁汴京两种意见。元帅左都监完颜弼说：“今虽议和，万一轻骑复来，则吾民重困矣。愿速讲防御之策。”^④他提出迁都汴京，认为汴京“阻长淮，拒大河，掘潼关以自固”。参知政事耿端义、枢密使乌陵用章、中书舍人孙大鼎等，也都请迁都避敌。左丞相徒单镒反对迁都汴京，认为“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⑤提举军器使完颜宗鲁也认为迁都之策不可取，说：“有中京则有河北、河南，无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岂能独立乎？”^⑥一部分宗室亲王也以山陵、宗庙在中都为由，反对迁都。两种意

① 《金史》卷一百六《术虎高琪传》。

② 《元史》卷一《太祖纪》。

③⑥ 《大金国志》卷二十四《宣宗皇帝上》。

④ 《金史》卷一百二《完颜弼传》。

⑤ 《金史》卷九十九《徒单镒传》。

见一直争执不下。

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十一日，金宣宗决意迁都汴京，诏告国内。太学生赵昉等400人上书极论利害。金宣宗“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予以驳回。^① 任命完颜承晖为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抹捻尽忠为左副元帅，与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五月十七日，用车3万辆、骆驼3000匹，装载珠宝和文书先行出京。次日，金宣宗带着宗王和文武大臣，在卫军的扈从下出中都南迁。

金宣宗迁都避战，引起留守中都军民的恐慌。原驻扎在涿州、良乡的乱军哗变，打起反金旗号，进攻中都，并派人到蒙古军营接洽投降。成吉思汗立即派军南下，配合乱军进攻中都。金宣宗召太子完颜守忠到汴京，表明有意放弃中都，从而加速了金朝分崩离析。

贞祐三年（1215年）正月，据守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的右副元帅蒲察七斤率部降蒙，中都危在旦夕。完颜承晖遣使向金宣宗告急。金宣宗命元帅左监军永锡带领真定、中山、保、涿等州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带领大名军1.8万人，西南路步骑1.1万人，河北兵1万人；御史中丞李英负责自清州（今河北清县）督运粮草，援救中都。李英先到大名（今属河北），收集义军数万人，进至霸州（今河北霸县）北，与蒙古军遭遇，金军大败，所运粮食全部丧失。乌古论庆寿和永锡军未与蒙古军交锋，便向南溃逃。^② 此后金廷不再组织救援中都。

中都外援断绝后，主持中都军务的左副元帅、平章政事抹捻尽忠与心腹密谋弃中都南逃，右丞相兼都元帅完颜承晖拦阻不成，自杀殉国。抹捻尽忠出逃汴京，当日中都陷落。

金军之所以失败，除了政治上腐朽没落外，在战争指导上也犯有重大失误。一是金统治者对新兴的蒙古势力认识不足，没有

^① 《金史》卷十四《宣宗纪上》。

^② 参见《金史》卷一百一《李英传》、《李术鲁德裕传》、《乌古论庆寿传》。

做好充分的战备。在成吉思汗作攻金准备时，前线将领已经发觉并报告了卫绍王，但金统治者盲目轻视蒙古，不做积极准备。二是采取分兵把口，实行一线防御部署，具有明显被动的缺陷。金在蒙军的进攻方向上，既有高山峻岭的天然屏障，又有界壕和边堡的人工筑垒，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进行重点设防，迟滞和消耗蒙军，伺机集中兵力进行决战，打破其进攻。但是金弃长取短，企图以漫长的界壕，挡住蒙古的大举进攻。结果防不胜防，处处失败。战争初期，徒单镒已经指出这一方针的不当，建议收缩兵力，重点布防。但金帝未予采纳，以致在后来的战争中完全陷入被动。另外，在增派援兵时，不是逐次增派，便是各部援军行动不一，相互脱节，不仅不能予对方以有力反击，反被对方各个击灭，以致完全丧失战争主动权，最终造成了中都之战的失败。^①

四、红袄军起义

在北方形势急剧恶化之际，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红袄军起义。

金末红袄军不是一支统一的武装集团，而是多部独立作战且时有配合的农民武装。由于成员主要来自自耕农、佃户、驱丁（奴隶）和下层商贩，又都以身穿红袄为标志，因此当时被统称作“红袄军”。红袄军各部以益都杨安儿、潍州（今山东潍坊）李全、泰安（今属山东）刘二祖、密州（今山东诸城）方郭三、真定（今河北正定）周元儿、胶西（今山东胶州）李旺、兖州（今属山东）郝定等部影响最大。

（一）益都杨安儿部

杨安儿部是起义时间最早的一支红袄军。益都人杨安儿，原

^① 参阅《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三册第11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有关蒙金中都之战简评。

名杨安国，起义前以贩卖鞍材为业，人称杨鞍儿，于是自名杨安儿。杨安儿最初是在金泰和六年（1206年），借助宋军北伐，聚众起义抗金。后来接受金朝招安，隶属诸军，被金廷授予刺史、防御使等职。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成吉思汗攻金，金调杨安儿戍边，行至鸡鸣山，逃回山东，与张汝辑等率众再次起义，攻城略地。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从中都退兵，金廷利用这一时机，调动军队，全力镇压杨安儿等部红袄军。

金廷派曾任拱卫直都指挥使、右副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元帅左都监等军事要职的仆散安贞，负责组织围剿红袄军。杨安儿部在益都城东被仆散安贞击败，向东转移，进入莱阳（今属山东），金莱州（今属山东）守将徐汝贤以城降。杨安儿部将邹都统领兵至登州（今山东蓬莱），登州刺史耿格开门迎入起义军。杨安儿入登州，自立王号，设置官属，建年号天顺。随后，杨安儿部攻陷宁海州（今山东牟平），进兵潍州。其他各支红袄军也在各地发动攻势，一时间红袄军声威大震。

贞祐二年七月，仆散安贞分兵两路，以沂州防御使仆散留家为左翼，安化军节度使完颜讹论为右翼，进攻杨安儿部。杨安儿派徐汝贤领兵10万拒战于昌邑（今属山东）东，红袄军战败，人员和军械损失甚众。杨安儿部将棘七领兵4万，临辛河列阵。仆散安贞派仆散留家率部从上游胶西渡辛河，大军随后进击，红袄军大败。仆散安贞领兵至莱州，杨安儿部将史泼立领20万人出城东列阵。^①仆散留家以少数兵力攻城，分散红袄军注意力，然后大军全力攻击，红袄军损失近半数，退守莱州城。仆散安贞以重赏招降，被红袄军拒绝。于是采用里应外合之计，派莱州黥卒曹全、

^① 《金史》卷一百二《仆散安贞传》记：杨安儿部将徐汝贤、棘七、史泼立等部兵力数目，分别为“十万”、“四万”、“二十万”。但据《金史》卷十四《宣宗纪上》载：“山东宣抚使仆散安贞遣提控仆散留家等破杨安儿步骑三万，歼其众，降伪头目三百余人、胁从民三万余户。”可见，起义军虽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是没有战斗力的随军家属。

张德等入城诈降，潜伏城中。九月，金兵内外合作攻下莱州，徐汝贤和许多将领被杀，杨安儿脱身向东败退。耿格、史泼立投降。杨安儿部红袄军所占州县几乎全部丧失。杨安儿与部将汲政等乘舟入海，准备退往岈嵎山（今山东栖霞县东北），被舟人曲成袭击，落水而死。杨安儿军余部由刘全、杨妙真（杨安儿妹）率领，与潍州李全部红袄军会合。

（二）潍州李全部

李全原为潍州农民，因善使铁枪，人称李铁枪。贞祐二年（1214年），他与兄李福聚众数千在潍州起义。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农民军先后归附，实力大增。随后进兵西南的临朐（今属山东），扼穆陵关（今属山东），准备北上攻取益都。这时，仆散安贞的主力军在益都。李全部转而南下到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与刘全、杨妙真率领的益都红袄军万余人会师。李全与杨妙真结为夫妻，两部合力与金军作战。红袄军战败，李全率主力向东南撤至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刘全领一军退驻大沫垆（今山东费县西南）。

兴定元年（1217年），李全部红袄军开始反攻，分兵攻占莒州（今山东莒县），俘虏金将蒲察李家；于洋夺取密州，李福攻占青州（今属山东）。李全接受南宋授予的京东路副总管的官职。

兴定二年（1218年）四月，金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又夺回密州，李全领兵援救胶西县失利。五月，黄掴阿鲁答在莒州和日照县（今属山东）南，再创李全军，分三路追击红袄军40里。李全部退至涟水（今属江苏），获南宋支援的“器甲金谷”，再组织反击金军。六月，李全出兵北上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旧海州），遭到金经略阿不罕、纳不刺的顽抗，攻城不下。七月，金郛城（今属山东）、单州（今山东单县）、邳州（今江苏邳州西南古邳城）、徐州（今属江苏）等军增援，李全与金军战于高桥，不能取胜，退守石秋。九月，李全出兵突袭密州，俘虏黄掴阿鲁答和金同知节度使夹谷寺家奴。十月，李全攻占邹平（今属山东）、临朐等县。在安丘（今属山东）击败三路金兵，杀死金提控王显，进取寿光

(今属山东)。李全采用流动作战的战术，作战不利就退入宋境，休整后再行出击。金军一直受其困扰。

(三) 泰安刘二祖部

金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年)，泰安人刘二祖领导当地农民起义。以后，刘二祖率部转战淄州(今山东淄博)、沂州(今山东临沂)等地，与杨安儿部红袄军相呼应。贞祐二年(1214年)，杨安儿部被金军镇压后，刘二祖拒绝了金廷的招安，率部继续在山东东路作战。

贞祐三年(1215年)二月，金帅仆散安贞指挥金军全力围攻刘二祖红袄军。提控纥石烈牙吾塔等攻破巨蒙(今山东费县西北)等四堙及马耳山(今山东诸城西南)，刘二祖部众4000多人战死，重要将领宣差程宽、招军大使程福及8000将士被俘，3万余随军家属和百姓被招降，红袄军损失惨重。仆散安贞又派兵与宿州提控夹谷石里哥军合攻大沫堙，刘二祖部1000多人出堙力战，遭到夹谷石里哥的骑兵冲击，全部战死。金提控没烈军从北面攻入大沫堙，另一军夺取红袄军水寨，金大兵随后进击。刘二祖部5000余人战死，刘二祖也在战斗中负伤，被俘遇害。红袄军余众退守大、小峻角子山(今山东费县附近)，继续抵抗。金军进击，上万名红袄军将士牺牲和被俘。

刘二祖牺牲后，余众推霍仪为领袖继续坚持抗金。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裴渊、葛平、杨德广、王显忠等部红袄军先后归附，实力不断增强，队伍扩展到数万人。

贞祐四年(1216年)春，霍仪率部攻邳州(今江苏邳州西南古邳城)，在黄山(今江苏徐州东南大黄山)两败于金邳州刺史、徐州界都提控纥石烈桓端军，退入北山中。转而进军东南，围攻沂州。纥石烈桓端军出邳州，完颜霆军经徐州(今属江苏)增援沂州，两军与金沂州守军内外夹攻，打败红袄军。霍仪战死，部下万余人牺牲。石珪、夏全等投降。彭义斌等领残部投归李全。

(四) 密州、兖州等部

自从杨安儿、刘二祖起义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纷起响

应，“相复团结”，组成大大小小的起义队伍，并“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红袄军此伏彼起，“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

贞祐二年(1214年)，密州人方郭三聚众起义，自称元帅，占领密州。随后，方郭三部在沂州、海州等地作战。最后被金军镇压。

贞祐三年(1215年)九月，河北红袄军首领周元儿聚众起义，攻占河北东路的深州（今河北深县南）及属县束鹿（今河北束鹿东北）、安平（今属河北），河北西路的祁州（今河北安国）、中山府的无极县（今属河北）。最后被真定府金军镇压，起义失败。

同年冬，兖州泗水（今属山东）人郝定聚众6万，攻占泰定州（今山东泰安）、兖州（今属山东）、滕州（今属山东）、单州及莱芜（今属山东）、新泰（今属山东）等十余县，并夺取邳州碭子堙（今江苏邳州西北运河岸），得船数百艘。郝定自立大汉皇帝，设置百官。贞祐四年(1216年)春，郝定派宣徽使李寿甫领数万人攻入临沂、费县境，被金军击败，李寿甫被俘。金廷担心红袄军过河西进，派尚书省右丞侯挚行省于东平（今属山东）、权本路兵马都总管，指挥镇压郝定部红袄军。在徐州的枢密院副使仆散安贞镇压了刘二祖部后，也派兵参与围剿郝定部。红袄军连战皆负，伤亡9万人，3万余人投降，郝定撤回泗水。金军攻占泗水拓沟村，郝定被俘，押送汴京处死。

兴定二年(1218年)春，胶西人李旺聚众起义，占据胶西，称黑旗军。四月，金权知益都府田琢派治中张林领兵进攻黑旗军，击败增援的李全部红袄军，占领胶西城，俘获李旺。八月，金莱州经略使术虎山寿军攻占黑旗军元帅邹某坚守的小堙，前锋于水等30人被俘，800多人战死。金军又在朱寒寨击败黑旗军。余部退到胶西、高密（今属山东）的农村及海岛间，继续抗金。

兴定二年六月，石州（今山西离石）人冯天羽率数千人起义，占领临泉县（今陕西临县西南）。金帅府派兵镇压，被起义军打败。石州刺史纥石烈公顺采用诱降之计，冯天羽等数十人出城归降，被金军捕杀。金军占领临泉，起义军撤入积翠山（今山西临县东北黑查山），继续抗击金军。金将王九思攻破寨栅，起义军2000人

牺牲。余众仍据险坚持战斗。金宣宗派国史院编修官马季良持告敕金币招降，起义军首领安国用等 5000 多人投降。安国用被委任同知孟州防御使事，起义群众被分别安置在绛（今山西新绛）和霍州（今属山西）之间，起义军被瓦解。

当时，除以上几支起义军之外，还有邢州（今河北邢台）程邦杰、恩州（今山东恩城西北）赵福、秦州（今甘肃天水）赵用和刘高儿、真定（今河北正定）石海、定州（今河北定县）阎显和阎德用、海州于忙儿、海州涟水（今属江苏）郭伟和祝春、浚州黎阳（今河南浚县）王二、彰德府（今河南安阳）王九等数支起义队伍。^①

尽管红袄军斗争很英勇，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失误，他们各自为战，缺乏远图，没有提出鼓舞人心的口号，许多人初起事时就称帝建号，招致金大兵的围攻，对起义的发展十分不利。起义军进攻的重心是州县城，占领州县城却未能守备，或掳掠财物后撤出，或很快被敌军攻占。

五、金南下拓地的失败

在蒙古军的打击下，金朝北方丢失，疆土日蹙，形势对金朝越来越不利。金廷决定向南拓展，企图攻占南宋之地来挽救衰势。于是金、宋再起战事。

金朝自章宗逼迫南宋重订和约后，金、宋双方一直未发生大的战事。这主要是两国的军事力量都处在衰落时期，无力再起争端。但是金宣宗和大多数臣僚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以为金朝实力强于南宋。早在贞祐元年（1213 年）金迁都汴京前，有人提

① 以上有关红袄军资料参阅《金史》卷十四、十五《宣宗纪》，卷一百二《仆散安贞传》、《田琢传》，卷一百三《纥石烈桓端传》，卷一百八《侯挚传》，《宋史》卷四百七十六《李全传》，《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五，《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

出汴京迫近南宋，不宜为都。直学士孙大鼎说：“吾国兵较北（蒙古）诚不如，较南（宋）则制之有余力。”^① 孙大鼎的观点当时被大多数金臣所接受。

金廷南迁后，术虎高琪由平章政事晋升尚书右丞相，总揽朝政。在术虎高琪的支持下，主张伐宋的人受到重用。贞祐四年（1216年）冬，陈言人王世安进献攻取盱眙、楚州策，枢密院奏请授予王世安招抚使，并派往淮南招诱红袄军和淮南宋军。兴定元年（1217年）正月，术虎高琪又力劝金宣宗出兵伐宋，“以广疆土”^②。四月，金宣宗以宋岁币不至为由，发兵攻宋。自此金、宋绝交，进入战争状态。

金军从南面和西面同时出击。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负责南攻，元帅右都监完颜阿邻等领秦州、巩州和凤翔金军在西面发动攻势。完颜赛不在信阳（今属河南）击败宋军，歼宋兵8000，俘虏宋统制周光，接着与宋军战于陇山、七里山等地，六战皆捷。而后渡过淮河，西经中渡店，攻克罗山（今属河南）、光山（今属河南）、定城（今河南潢川）等地，破光州（治今河南潢川）两关，歼宋军万余。五月，乌古论庆寿在泥河湾石壕村击败宋军，攻樊城（今湖北襄阳），进围枣阳（今属湖北），受挫败退，还汴京后被下狱。十一月，金宣宗下诏唐、邓、蔡州行元帅府举兵伐宋。西面完颜阿邻领一军出秦州（今甘肃天水），南攻天水军（治今甘肃天水镇）；金将完颜白撒（承裔）领一军出巩州盐川镇（今甘肃陇西西南），配合完颜阿邻军攻皂郊堡（今甘肃天水南）；凤翔府副都统完颜赞率步骑万余，从凤翔（今属陕西）攻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十二月，金西路攻占天水军和大散关。^③

① 《大金国志》卷二十四《宣宗皇帝上》。

② 《金史》卷一百六《术虎高琪传》。

③ 参见《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卷一百三《完颜阿邻传》、卷一百十三《完颜赛不传》、《白撒传》。

兴定二年（1218年）三月，宋军在西部战场发起反攻，在皂郊堡击溃金军，完颜阿邻战死。四月，完颜白撒军攻克皂郊堡（今甘肃天水南），进攻西和州（今甘肃西和东）。宋西和、成州（今甘肃成县）、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守将弃城逃走，金军尽占三州，获粮9万斛，钱数千万及大量兵器。南路完颜赛不领兵再攻枣阳，遭到宋军抵抗，金军败退。

兴定三年（1219年）正月，由于蒙古军攻占太原，金宣宗召集百官商议对策。这时前线伐宋捷报送到，金宣宗更认为南攻决策正确，并指示金军继续南攻。随后，右副元帅完颜赛不、左副元帅仆散安贞、元帅左都监纥石烈牙吾塔、权右都监完颜讹可领兵分道南攻。完颜讹可再攻枣阳，宋军据城坚守，金军围攻80多天。宋军里外夹击，完颜讹可大败北逃，宋军追至邓州（今属河南）。纥石烈牙吾塔军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滁州（今属安徽）、光州等地击败宋军。仆散安贞领兵攻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击败宋兵7000，追宋军于淝水，先锋抵达采石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在宋军和抗金民兵攻击下，金撤军北还。以后金军在兴定五年（1221年）、兴定六年（1222年）两次发动攻宋战争，都被宋军击败。金弃北图南的战略宣告失败。^①

六、宋蒙联军灭金

金朝向南求发展，被宋军击败，南宋并没有继续进行反攻，主要是由于军事力量难以与金朝对抗。1233年蒙古军占领汴京，金帝逃至归德，后转移至蔡州。南宋君臣预见“金人必亡”。^② 宋廷内部出现了几种不同应对之策。一种意见认为，金亡之后，蒙古必然南下，主张继续向金纳贡，使金朝能有力量抵御蒙古，以避

^① 参见《金史》卷十五、十六《宣宗纪》、卷一百二《仆散安贞传》、卷一百十一《完颜讹可传》、《纥石烈牙吾塔传》。

^②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真德秀传》。

免与蒙古直接对抗。另一种意见，主张乘金朝即将灭亡，亟图自立之策，加强军备，准备对付蒙古。也有意见认为，宋朝应配合蒙古军灭亡金朝。

蒙古成吉思汗在临死前曾提出“假宋灭金”方略：“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① 窝阔台、拖雷正是遵照这一战略决策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蒙古仍想继续利用“宋、金世仇”，与南宋联合灭金。

金天兴元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窝阔台遣使到南宋，提议联合灭金。宋臣多认为“可遂复仇之举”，赞同与蒙古联合。兵部侍郎赵范反对说：“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不可不鉴。”^② 宋理宗不听赵范劝阻，派使臣前往蒙古军营，双方达成协议，蒙古应允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南宋。

宋与蒙古达成灭金协议后，并未立即出兵，而金军却向宋军主动发起进攻。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驻扎在唐、邓地区的金军武仙、武天锡、移刺瑗等部，出兵进攻南宋的光州（今河南潢川），企图打通河南通往四川之路，将金哀宗迎往四川。宋军予以反击，在光化、吕堰击败进攻的金军，乘胜北攻金顺阳（今河南旧淅川东北），大败武仙军，武仙败逃马蹬山。宋军占领顺阳、邓州、申州等地，斩武天锡，金将移刺瑗投降。七月，宋将孟珙进攻马蹬山，再创武仙军，俘降其部众甚众。^③ 接着宋军又攻占唐州。武仙军是金朝最后一支人数较多且稍有战斗力的军队，其军被歼，使在蔡州的金朝君臣束手无策。

天兴二年（1232年）八月，蒙古军由塔察儿率领，宋军由孟珙率领，联军攻蔡。九月，蒙古军进至蔡州城下。蔡州地处淮河支流

^① 《元史》卷一《太祖纪》。

^② 《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会蒙古兵灭金》。

^③ 参见《宋史》卷四百十二《孟珙传》。

汝水上，与南宋接壤，城小粮少，无险可依。金哀宗在重九日拜天，对群臣说：“国家自开创涵养汝等百有余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劳效起身，披坚执锐，积有年矣。今当厄运，与朕同患，可谓忠矣。比闻北兵将至，正汝等立功报国之秋，纵死王事，不失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虑不为朝廷所知，今日临敌，朕亲见之矣，汝等勉之。”^①随后向群臣赐酒，以激励金军将士保卫蔡州。金哀宗在蔡州城四面和子城布防，以总帅孛术鲁娄室和完颜承麟守东面，参知政事乌古论镐、总帅元志守南面，殿前都点检乌林答胡土、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守西面，忠孝军元帅、权殿前右副点检王山儿和纥石烈柏寿守北面，殿前右卫将军、权左副都点检完颜斜烈和都尉王爱实守子城。由于金军全力坚守，并不时出击，使蒙古军难以得手。于是蒙古军在蔡州城外筑高垒，企图长期围困。

蔡州被围，处境危急。金哀宗下令括城中粮食，禁止公私酿酒。十月，放部分老弱饥民出城，并让饥民乘船到护城河采菱芡水草充饥。同时，下诏征诸道兵救援蔡州。此时金未下州县屈指可数，且他们自身尚且难保，已无力援蔡。蔡州外无救兵，内无粮草，金朝君臣被困于危城之中。

十一月，宋派江海、孟珙率宋兵万人到蔡州，并运粮 30 万石助蒙古军攻蔡州。宋、蒙会师后，协力围困蔡州，以防止金军粮尽后突围。宋军负责进攻南面，蒙古军围攻东、西、北三面。蔡州城南 3 里有柴潭，堤岸高五六丈，上设敌楼巨弩，潭外是汝水，金军凭借柴潭阻击宋军攻蔡州。宋军决潭放水，用柴草填潭，夺取柴潭，进至蔡州城下。

十二月初九，蔡州外城被蒙古军攻破，金外城守将宿州副总帅高刺哥战死。蒙古军进攻东城，被金军总帅孛术鲁娄室挡住。攻南城，炮击城楼，参知政事完颜仲德领兵救援，蒙古兵退。蒙、宋军四面同时进攻，完颜仲德难以四面应援，举荐完颜承麟为总帅，代孛术鲁娄室守东面。十九日，蒙古军攻破西城，完颜仲德在城

^① 《金史》卷十八《哀宗纪下》。

内筑栅浚濠，阻挡蒙古军前进。他选调三面精锐，拼死抵御西面，蒙古军始终不能攻入城内。金军也伤亡很大，都尉王爱实战死。炮军总帅王锐杀元帅夹谷当哥，投降蒙古军。二十四日，金哀宗化装领兵乘夜出东城逃跑，到城栅处与蒙古军相遇，被迫退回。

蔡州被围三个月，城中粮尽，金哀宗杀尚厩马 50 匹、官马 150 匹分给将士食用。城中一般居民只能用人畜骨和芹泥充饥。天兴三年(1234 年)正月元旦，蒙古军在城外会饮奏乐，“城中饥窘愁叹而已”。金军自“围城以来，战歿者四帅、三都尉，其余总帅以下，不可胜纪”。^①金哀宗把近侍和各级官吏都派出守城。初九日，蒙古军在西城凿通五门，挥军入城。完颜仲德督军鏖战，战至傍晚，蒙古军暂时退却。金哀宗见大势已去，召集百官，传位给东面元帅完彦承麟。完彦承麟坚辞，金哀宗说：“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趑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②完彦承麟受诏即皇帝位。此时城南已树起宋军旗帜，蒙、宋联军攻入城中，完颜仲德率精兵 1000 巷战，抵挡不住蒙、宋联军的攻势。金哀宗见败局已定，自缢于幽兰轩里。完颜仲德闻听皇帝自尽，投汝水自杀。孛术鲁娄室、元志、王山儿、纥石烈柏寿及军士 500 余人也随后投水自尽。完彦承麟被乱兵杀死，金朝灭亡。

蔡州陷落后，各地金军纷纷投降，只有巩州元帅左都监郭虾蟆据守不降，坚守巩州（今甘肃陇西）孤城近三年之久，后城破，自焚而死。城中无一人投降。

第二节 南宋的灭亡

一、南宋的军事准备

宋军在蔡州之战后，主将孟珙带着战利品，领兵回师襄阳

① 《金史》卷一百十九《完颜仲德传》。

② 《金史》卷十八《哀宗纪下》。

(今湖北襄樊)。在河南等地的宋军，分守信阳(今属河南)、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并益兵饬备，经理唐、邓屯田”^①。为下一步转入军事进攻做准备。

金的灭亡，使长期受金压迫的宋朝顿时有解脱之感。于是，南宋朝臣“动色相贺”。然而，蒙古取代金成为北方的统治者，其军事力量远比金强大得多。南宋臣僚中，只有少数人看到蒙古潜在的威胁。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监察御史洪咨夔上奏说：“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②这种不合时宜的忧虑声音，很快就被欢乐的浪潮所吞没。当时，以宋理宗为首的南宋统治者对形势的看法盲目乐观，认为“鞑人(蒙古人)已归，中原空虚”^③，正是北上进取的大好时机。尽管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但由于宋廷内部主张收复中原的臣僚占据上风，故南宋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积极进取的基础之上。其战略部署是：以河南为战区，先出兵收复开封、洛阳、归德等地，然后西据潼关，北扼黄河，形成能与蒙古抗衡的局面。这一战略构想，如果能够实现，对阻止蒙古势力南下，确保南宋在江南的统治当然有着重大意义。南宋为实现此战略目标，进行以下的军事准备。

一是调动军队。向临近河南地区集结。当时，南宋决定动用两淮宋军担负进攻的主力。宋理宗任命淮东安抚使赵范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军马兼沿江制置副使，其军从淮东调往黄州(今湖北黄冈)、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准备进兵陈州(今河南睢阳)、蔡州；淮东制置使赵葵为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统领淮东军5万人，准备取泗州(今江苏盱眙)、宿州，进而攻汴京；以知庐州(今安徽合肥)全子才率淮西军1万余人，准备从寿州(今安徽凤台)渡淮河，由亳州北攻汴京；实现以三京为中心占领河南全境。

①② 《宋史》卷四十一《理宗纪一》。

③ 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一《奏论今日进取有甚难者三事》。

二是组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南宋以枢密院为此役的最高指挥机构，以右丞相郑清之兼枢密使，乔行简为知枢密院事，郑性之为签书枢密院事，陈贵谊为同知枢密院事，并对原枢密院的其他人员也作了相应的补充和调整。枢密院直接听命于宋理宗的指挥。前线指挥官分别由赵范、赵葵、全子才等人担任。

三是进行军事侦察。金亡后，南宋方面频繁地派遣官员出入三京地区，所谓进行“按循故壤”等活动，实则包含着对这一地区的军事侦察。宋理宗还下令“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府并实封以闻”。通过搜集军事情报，为下一步军事行动做准备。

四是舆论配合。南宋在出兵之前，为配合军事行动大造舆论，以宣扬出师的正义性。从而达到激励宋军将士，安抚归属蒙古的河南战区官吏民众的作用。宋廷还专门发布出师檄文，指责金、蒙争夺中原的战争，“甚于豺狼之交噬”，造成“百姓至此极也，多亡罔堪顾之”。宣扬此次兴师之目的是“往清余孽”，收复“故疆”。^①

五是后勤保障。南宋为配合军事行动，在后勤保障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担负此役军需运输任务的主要是两淮地区。采用水运和陆路相结合的运输方式，“自合肥部舟至京口支装，涉湖而江，又溯湖而淮，北过徐、泗，南过盱眙，历濠梁，抵寿春”^②。而后再征用民夫由陆路运往河南。当时，动用了大量的民夫，仅桐城（今属安徽）一县征用民夫就多达1.5万人。^③

二、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六月，宋理宗下诏收复原宋东京开封、南京归德、西京洛阳。随后，宋军开始分别从庐

① 《宋史全文》卷三十二。

② 陈栋《陈定宇先生集》卷九《通守陈公传》。

③ 吴泳《鹤林集》卷十七《论保淮事宜疏》。

州、滁州、和州等地出兵河南。七月间，宋军进入开封、洛阳；八月底，宋军兵败洛阳；史称此役为“端平入洛”。

宋军开始向河南进发是在六月十二日，以开封为第一阶段主攻目标。宋军兵分两路：知庐州的全子才领淮西军1万人，由庐州向开封进发；主将赵葵率淮东兵5万，计划先取泗州、宿州，而后与全子才部会师于开封。此役宋出动总兵力实6万，号称20万。

六月十八日，全子才率部进至寿州，北渡淮河西进。蒙军闻宋军进兵，决黄河南寸金堤，放水淹没开封到寿春大片地区，“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因此，宋军行进十分艰辛。二十一日，宋军抵达蒙城（今属安徽）。然而，“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①宋军兵不留行，沿涡水继续向西北挺进。次日，到达城父（今安徽亳州西南），昔日号称“小东京”的名城，经兵火之灾，城毁民亡，仅存官舍、民居不过十余所。二十四日，宋军进至亳州，原降蒙的守城官兵归降。接着，宋军沿涡水西进，经卫真（今河南鹿邑）、泰康（今河南太康）等县，向开封进军。七月初二，进抵开封城东郊外。这时，降蒙的金将李伯渊等人发动兵变，杀元帅崔立等，以开封城投降宋军。七月初五日，全子才率部进入开封。

在全子才部西进的同时，赵葵率5万部众，取泗州、宿州等地后，在七月二十日赶到汴京，与全子才部会师。收复丧失百余年的东京开封，对南宋来说是一个很大胜利。宋廷得到捷报，遂晋升赵葵、全子才、赵范等分任知应天府南京留守、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知开封府东京留守。

宋军实现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后，随即实施第二阶段夺取西京洛阳的目标。赵葵派监军徐敏子、部将范用吉统兵1.3万为前军，杨谊（一作杨义）领兵1.5万为后援，西攻洛阳。七月下旬，徐敏子、范用吉统兵向洛阳进军。由于蒙军此前已撤出洛阳，宋军于七月底顺利进入洛阳。然而，洛阳的粮储已被蒙军运走，宋

^① 周密：《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

军无法就地补充。宋军所带少量口粮已尽，后援无着落，以致军士四处觅食，采蒿草为食，处境十分艰难。

宋军的行动立即招致蒙军的反击。驻军陕州（今河南陕县）的蒙古速不台部迅速东进。塔察儿也命部将刘亨安率部设伏于洛阳城东，阻击攻洛宋军。

杨谊领 1.5 万后援部队，于七月二十九日行至洛阳东 30 里处，突然遭到蒙军伏兵的攻击。刘亨安横槊跃马，率领蒙军从山而下，直冲宋军。宋军正休息用食，仓促无备，全军大溃，被蒙军追杀入洛水死者无数，杨谊仅以身免。杨谊兵败，“于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①

蒙军获胜后，全力向洛阳城进攻。八月一日，蒙军前锋抵洛阳城下，主力逼近洛水西岸。入洛宋军自知困守洛阳城等于坐以待毙，决定出城与蒙军作战，夺路回师。徐敏子一面派兵袭击蒙军前锋营寨，一面自率主力东渡洛水，背水而阵。宋军屡次击退蒙军的进攻，但无法突围。八月初二日，蒙军发动更大攻势，在团牌的掩护下逼近宋阵，将宋军分为三段，使其相互难顾。宋军殊死苦战，杀伤蒙军 400 余人，夺取团牌 300 余只，再次击退蒙军攻势。然而，宋军官兵已绝粮 4 日，饥疲之师难以久战，决定择路突围。徐敏子采纳部下“若投东面，则正值北军（蒙军）大队，无噍类矣。若转南登封山，由均、许走蔡、息，则或可脱虎口”的献策，指挥军队向南突围。蒙军觉察宋军之举，随后追杀百余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徐敏子中箭负伤，战马死在乱军中，徒步走小路侥幸逃脱，部下所剩官兵 300 余人，沿途采摘桑叶、梨蕨逃回南宋。在开封的赵葵、全子才，闻听入洛之师兵败，不敢久留，随即率军从开封撤退。蒙军又夺回洛阳、开封等地。南宋端平入洛之役，造成“兵民死者十数万，资粮器甲悉委于敌”^②的严重损失，付出了沉重代价。

① 以下引文见《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

② 《宋史》卷四百七《杜范传》。

南宋收复三京计划失败后，蒙古派使臣王楫来责问宋朝毁约，南宋也遣使报谢。但是，双方关系已经恶化，“自是河、淮之间无宁日矣”^①。

南宋端平入洛的失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军队腐败，战备不足。南宋自孝宗以后，军事上益趋下坡。宋理宗时，军队的状况更加衰败，“至于治兵足食之方，修车备马之事，乃缺略不讲”，^②而造成“将帅非才”，专司盘剥士卒之事，以致“军怨于掊克”，^③军纪涣散，军队训练废弛，战斗力极弱。战前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曾对宋理宗说：“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④他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监察御史李宗勉也指出：南宋军队“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等弱点。^⑤在这种情势下，发动入洛之役显然难以取胜。

二是对蒙军反击的能力认识不够。南宋军事指挥者认为，蒙军主力已撤至黄河以北，宋军出兵可以顺利地“据关、阻河，为坚守计”^⑥。而轻视了蒙军反击能力。实际上蒙军早已做好了反击宋军的准备。宋军在蒙军的决河放水、空城诱敌、伏兵围歼之策的反击下，处处被动，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三是军队部署失误。南宋战略指导者把主攻军队做远离战区的进攻部署，这既不利于突然制敌，又使军队的体力和物力消耗在进军途中，加上将帅轻遣偏师，各部失于协调，“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⑦。

南宋进兵河南失败后，不但“规恢故疆”的愿望化为泡影，而

① 《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三京之复》。

② 《宋史》卷四百八《吴昌裔传》。

③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徐侨传》。

④ 《宋史》卷四十七《乔行简传》。

⑤ 《宋史》卷四百五《李宗勉传》。

⑥ 《宋史全文》卷三十二。

⑦ 《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

且引起国内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的危机。宋理宗在处罚有责任的将帅之时，下罪己诏，以安抚民心，缓解国内矛盾。尔后，调整对蒙的战略，改进攻为防御，“严守御之备”，做迎击蒙军南下的军事部署。

宋廷根据蒙军作战特点，凭借江淮之险，采取分区防御，“藩离三层”的部署。两淮战区，在要地加筑城寨，增添兵力；在要道处挖掘沟洫（三里一沟，五里一洫），以限制蒙古骑兵长驱奔袭。京湖战区，宋廷任命孟珙为襄阳兼镇北都统制，措置边防。镇北军是专门针对蒙古组建的军队。其军有1.5万人，全部由“中原精锐百战之士”组成^①。孟珙把这支军队部署在樊城、新野、唐州和邓州之间，以阻止蒙军南下。并采取“藩离三层”之策，加大防御纵深。即在夔（今四川奉节），鼎、澧（今湖南常德、澧县），辰、沅（今湖南沅陵、芷江）分别置军设防。四川战区，增加兵力，设营置寨，利用山险，筑城坚守，并在江中分布战舰，以为配合。

经过上述调整之后，南宋的防御能力有所增强，并形成了点面结合，分层次，有纵深，较为巩固的防线。

三、蒙古出兵攻宋

南宋发动端平入洛之役后，蒙古指责南宋“开衅致兵”，破坏盟约，并积极进行大举南下攻宋的军事准备。

端平二年（元太宗七年，1235年）春，窝阔台决策攻宋，蒙军三路南下，攻势十分猛烈。西路军横扫东至三峡、西至大渡河之间的大片蜀地，曾一度占领成都，迫使宋军退守夔门；中路军攻占襄阳要地，兵围江陵；东路军在两淮也前出至舒、庐，“谋捣江面”^②，引起江南震动。但是，由于各地宋军的积极抗击，蒙军

^① 《宋史》卷四十二《孟珙传》。

^② 魏了翁：《鹤山集》卷二十七附二十八《奏虜犯随信光黄等处事宜》。

未能进一步深入。此次攻宋之战，蒙军之所以未能达到灭宋的预期目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战略指导有误。同时开辟三大战区，战线过长，主攻方向不明，兵力分散，而无法实施各路军协同作战。二是蒙军深入江淮和巴蜀的河网高山地区，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难以发挥，而暴露了蒙军缺乏水军的劣势。如入蜀蒙军仅郝和尚拔都选骁勇 9 人乘轻舟往来于江上，^① 却无力顺流而下，东攻两湖。中路军进至枝江，遂“自枝江、宜都竞上，伐竹木，毁室庐，斧斤之声日闻，直欲为渡江计”。^② 然而，临时造船，难以竞渡。不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水军，蒙古难以实施灭宋计划。

尽管如此，蒙军仍取得不小战绩。开辟了全面对宋作战的战场，摧毁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许多城防设施，达到了不占有领土而破坏其生机的目的，为以后攻宋创造了条件。

1241 年窝阔台病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纷争激烈，几易其主，因此无暇全力部署攻宋，仅有零散的局部战争。直至蒙古内部稳定后，再次发动了对宋的攻势。

在蒙军南进的威胁之下，宋廷也加强了防御。南宋仍采取分区防御之策，在京湖、两淮、四川三个战区设防，重点是加强四川战区的防务。

京湖地区，自 1239 年击退蒙古中路军收复襄、樊后，孟珙出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主持整个京湖地区的防务。孟珙上书朝廷，提出加强襄、樊防务：“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③ 在孟珙的精心筹措之下，南宋部署在荆襄一带的兵力近 13 万人。孟珙病逝于 1246 年。以后，京湖地区在李曾伯主持下，继续重点“经理襄樊”，这对防御蒙军再次进攻起了积极作用。

① 见《元史》卷一百五十《郝和尚拔都传》。

② 《鹤山集》卷二十九《督府奏陈》。

③ 《宋史》卷四十二《孟珙传》。

两淮战区，自蒙古东路军北撤后，南宋对两淮防务进行了适当调整。鉴于安丰和寿春位于淮河南、北两岸，隔淮而峙，为两淮门户，又是以往蒙军东进的主攻目标，于是宋廷决定以安丰、寿春为要点，加强淮河中流防务。从1243年末，即对收复的寿春城进行修复和加固，并设串楼、排杈木于城周围，以增强防御蒙军骑兵的能力。此后，宋军依托城防设施，抗击了蒙军的东进。

四川战区，自蒙古西路军攻入四川后，对四川西部地区造成很大破坏。由于四川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南宋以四川为重要的设防区进行部署。1242年，南宋朝廷委派著名将领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主持四川防务。余玠到任后，对四川地方军政进行整饬，并依据四川地形的特点进行大规模的城防建设。先后修筑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大获（今四川苍溪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云顶（今四川金堂）、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四川万县西）等10余座城池，都是利用山势筑成坚固的城堡，迁徙合、沔、利等州治到这些城堡内，屯兵聚粮，作长期固守的准备。由于余玠的积极筹措，使四川防御力量大为增强。蒙军虽占领四川部分地区，但始终不能利用四川进攻南宋的东南地区。宝祐元年（1253年）余玠死后，王坚出任兴元都统兼知合州，主持兴元军政事务。王坚在余玠修建的钓鱼城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建，仍为合州州治，并加紧训练军队，储存粮食战具，积极加强战备。这对于以后抗击蒙军的进攻，保卫合州及四川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宝祐六年（元宪宗八年，1258年）二月，蒙哥汗分兵大举进攻南宋。

蒙哥率蒙古军4万，分三道入蜀。七月，蒙哥统中军由六盘山出发，入散关；末哥率一路军从洋州入米仓关；另一路由李里义统率由鱼关入沔州。十月，蒙哥军渡嘉陵江，进抵利州，攻打苦竹隘。宋将杨立率领军民坚守，多次打退蒙古军的进攻。守城军中有人投降，开东南门引蒙古军入城，杨立领兵巷战，兵败身死，蒙古军占领苦竹隘。随后，进占鹅顶堡、大获、青居等山城，

兵逼合州治钓鱼城。

宋开庆元年（元宪宗九年，1259年）初，蒙哥派人到钓鱼城招降，王坚杀来人于阅武场，以示坚决抵抗。二月，蒙哥留乞台不花军守青居山，命纽璘在涪州（今四川涪陵）造浮桥，封锁江面，以拦截荆湖方向的南宋援军。随后亲统大军围攻钓鱼城。此时，合州周围的山城几乎都被蒙古军占领，诸路蒙古军会集合州城下。王坚率合州军民奋力坚守，屡次挫败蒙古军的攻势。

合州的危亡直接关系着四川整个战局的胜败。驻军重庆的宋四川制置使蒲泽之战守无策，被宋廷罢免，改任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从荆湖方面救援合州。六月，吕文德率水军沿长江西攻，突破蒙古军在涪州的封锁线，进入重庆。然后，吕文德率战舰千余只，逆嘉陵江而上，援救合州。蒙古史天泽分军为两翼，顺流纵击，吕文德战败，退回重庆。

合州军民在孤立失援的情况下，仍顽强抗击蒙古军，把蒙古军阻击在钓鱼城下达五个月之久。蒙古军先锋将汪德臣一度乘黑夜攻入合州外城马军寨，被王坚、张珏等又率众夺回。汪德臣见强攻不成，在城下喊话劝降，“几为飞石所中，遂感疾”^①而死。七月，蒙哥也在督军攻城中被炮石击伤，不久死于军中。蒙古军被迫从合州等地撤军。蒙古军是在重兵围困孤城，“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②的情况下战败的。王坚等领导的合州保卫战是一次成功的山城防御战，对于巩固南宋西南防线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钓鱼城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山城要塞防御战。蒙古以数万精兵，围攻长达5个多月之久，却无力攻克这座山城，最后以蒙哥汗身亡，损失惨重而撤军。南宋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阻止了蒙军迂回包围战略计划的实现，使南宋的危势得以暂时缓解。钓鱼城之战的意义在于，不仅积累了山城防御战的宝贵经验，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而且起到了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

① 《元史》卷一百五十五《汪德臣传》。

②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张珏传》。

蒙古军主力受阻于合州，正是南宋政府组织力量反击进犯荆襄的蒙古中路军的极好时机。但是，此时南宋贾似道当权，贾乃“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的花花公子，凭借“其姊入宫，有宠于理宗”而发迹。^①他一天也没带过兵，却以枢密使任京湖、四川宣抚大使，全面负责长江中上游的防务。中路蒙军塔察儿部只顾抄掠财物，在未遇到宋军有力抵抗的情况下，进至长江边，无功返师。蒙哥于是改令忽必烈统帅中路军马，进攻鄂州。

宋开庆元年（元宪宗九年，1259年）八月，忽必烈兵渡淮河，入大胜关。九月初，末哥从四川遣使通报蒙哥死讯，忽必烈不愿意丧失战机，仍继续进兵。当月由湖北黄陂突破长江天险，进围鄂州。从云南经广西、湖北北上的兀良哈台部，斩将夺关，进至潭州，也北上与忽必烈军会合。

南宋政府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丞相丁大全因隐匿军情不报，被弹劾罢相。十月，贾似道担任了右丞相兼枢密使，仍兼京湖、四川宣抚大使。宋理宗下罪己诏，并命贾似道督师以援鄂州。临安府招募新兵义勇守城。平江（今江苏苏州）、绍兴等地也都加筑工事。当时边报日急，朝野震动。内侍董宋臣竟提出迁都四明（今浙江鄞县）以避敌锋的主张，以便随时准备逃往海上。当时，任节度判官的文天祥上书宋理宗，严词驳斥了董宋臣的逃跑主张，指出“六师一动，变生无方”。要求“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②在主战派的反对之下，宋理宗才没有逃离临安。

十月，鄂州东南隅被蒙古军攻破，宋军急忙赶筑新城，又被蒙古军攻破，宋将张胜、高达率军奋勇拒战。吕文德从重庆率师东下援鄂，冲破蒙古军的围阻，进入鄂州城，增加了城中守御力量。十一月，蒙古军攻势仍不减弱，鄂州守军伤亡已达1.3万多人，鄂州危在旦夕。正在忽必烈全力攻取鄂州时，后方传来留守

①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

②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卷三《封事》。

和林的弟弟阿里不哥图谋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决定退兵回去争夺汗位。蒙古军一面作撤军准备，一面声称将直趋临安。贾似道惊恐万分，派人到蒙古军营求和。忽必烈答应贾似道请求，条件是以长江为界，宋每年奉献银 20 万两、绢 20 万匹。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隐瞒了求和的真相，奏报战功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① 贾似道因鄂州退敌有功，宋理宗加封他为少师、卫国公。

南宋在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成功地抵御了蒙军攻势，其主要原因是：首先，针对蒙军的特点而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防御体系。南宋军民利用山城寨堡等防御设施和水战的特长，抑制了蒙军优势的发挥。其次，前线指挥官在组织抗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南宋还可以抓住蒙军退兵的有利战机，实行局部的反攻，以取得更大胜利。但是，由于贾似道畏敌乞和，而坐失战机，铸成蒙军卷土重来的隐患。

四、襄樊之战

忽必烈自鄂州退兵后，第二年在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五十里）即皇帝位。接着，北上击败了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逐步稳定了在北方的统治；并实行汉法，以农为本，发展经济；积极准备灭亡南宋的战争。

蒙军在战略上有重大调整，以襄樊为主攻方向，中间突破，直趋临安。郝经、郭侃曾先后建议忽必烈采取“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和“先取襄阳”，“直趋临安”的方略而未果。宋咸淳三年（元至元四年，1267 年）八月，宋降将刘整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如覆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② 于是，忽必烈采取中间突破战略，任命阿术为主帅，发兵争夺襄樊。又命西

① 《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二《蒙古南侵》。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路汪良臣攻重庆，郑鼎攻嘉定，扎刺不花攻泸州；东路董文炳于淮西备战。东西路配合襄樊之战。襄阳和樊城地处汉水中游，两城隔水相对，为鄂、豫、陕交通要冲，北瞰汴洛，南扼长江中游，系咽喉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襄阳城曾于端平三年（1236年），一度被蒙古军占领，后被孟珙收复，以后一直掌握在宋军手中。襄樊二城又经过近三十年的营建，城防坚固，互为依托，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决心保卫襄樊。襄樊之战的成败关系着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其争夺激烈的程度为蒙宋开战以来所罕见。

襄樊之战前后进行了6年。初期，蒙古军采取强攻战术，被宋军击退。随后采取切断汉水通道、绝襄樊之援等办法，企图困死襄樊守军。蒙古军前后在鹿门山、白河口等地夹江修筑堡垒，并筑台于汉水中流，堡台设置弓弩炮石，有效地封锁了汉水通道。阿术、刘整等又“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得练卒七万”，^①为夺取襄樊创造条件。据统计，襄樊之战蒙军投入战船约1.33万舰次，水军约15万人次。^②

襄樊被围后，宋军也多次组织救援。宋咸淳五年（元至元六年，1269年）三月，宋京湖都统张世杰率军援襄樊，与蒙古军战于赤滩圃，兵败退走。^③七月，宋将夏贵率战船3000进至鹿门山，攻新城堡，被蒙古万户解汝楫、李庭率水军击败。^④九月，宋将范文虎领兵进至灌子滩也被击败，“兵乱，士卒溺汉水死者甚众”。^⑤是年冬，宋廷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各路军进援襄樊。范文虎从中作梗，致书贾似道说：“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

①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刘整传》。

② 参见陈世松等著《宋元战争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

③ 《宋史》卷四十六《度宗纪》。

④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⑤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李庭芝传》。《元史》将此事系于至元七年，有误。

但无使听命于京阍（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①贾似道答应范文虎的请求，并升任他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李庭芝每要进兵，范文虎在其间掣肘，以朝廷之命未到拒不进兵，从而延缓了李庭芝援助襄樊计划的实施。十二月，襄阳守将吕文德病死，弟吕文焕接替指挥襄阳军事，文焕才能远不如其兄文德。

宋咸淳六年（1270年）六月，范文虎曾利用汉水涨潮，从水路攻鹿门，被蒙古军击败，尽弃战舰及輜重逃走。在以后的一二年内，宋廷没有再组织增援襄樊，听任襄樊军民苦战。

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在攻宋不断胜利的形势下，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发布诏书，表示要“绍百王而纪统”。^②宣扬元王朝是封建正统，灭亡南宋是封建统一战争。

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1272年）三月，樊城外城为元军攻破，宋军退守内城。襄樊被围五年，外援断绝，城中缺乏盐和布帛。这时，李庭芝领兵屯郢州（今湖北钟祥），得知襄阳西北有一条清泥河，源于均、房州，于是造轻舟百艘，三舟相连，中舟装载物资，左右两舟用以掩护，招募义勇3000人，以张顺、张贵为都统，准备冒死突破元军防线，增援襄阳。五月二十四日，张顺、张贵率领3000义勇，携带火枪、火炮、巨斧、劲弩和炭火，乘夜色掩护，冲破元军封锁线，转战120里，黎明抵襄阳城下。张顺身中四枪六箭牺牲。襄樊“城中久绝援，闻救至，踊跃气百倍”。^③张贵入城后，又遣人泅水去范文虎营地，约定自郢州发兵夹攻元军。张贵到期出战，范文虎失约。张贵率军冲出重围，到达约定地点龙尾洲，被元军战舰包围，张贵与部下死战，全军阵亡，张贵身中数十枪，被俘不屈遇害。

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采用张弘范

①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李庭芝传》。

②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③ 《宋史》卷四百五十《张顺传》。

断绝襄阳和樊城间联络的建议，攻断襄樊之间的浮桥，集中兵力用“回回炮”等战具猛攻樊城。于是樊城被元军攻破，守将范天顺战死，牛富率百余名士兵巷战，兵败投火自杀。二月，吕文焕献襄阳城投降。

襄樊之战，元军采用围困与强攻，围城与打援，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等手段，经6年之久，终于夺取了屏蔽江、汉的战略要地襄樊。从而为中间突破，切断长江上下游联系，顺江东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丁家洲之战

襄樊失陷，南宋江汉险要顿失，舆论多指责主政的贾似道。贾似道把罪责推给李庭芝等人，贬李庭芝及部将苏刘义、范友信于广南，对范文虎反而包庇，只降一官知安庆府。太府寺丞兼权侍右郎官陈仲微对此不满，上书说：“襄之罪不专在于庸阍、疲将、孩兵也，君相当分受其责”。^①贾似道大怒，贬陈仲微出任江东提刑。宋度宗、贾似道对当时朝臣提出的救亡建议，一概置之不理，醉生梦死，寻欢作乐。

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命伯颜、阿术领兵20万，水陆并进，大举灭宋。十二月，宋鄂州守将程鹏飞投降。伯颜留军4万驻守鄂州，乘势挥军漫江东下，直指临安。一路势如破竹，南宋大小官员望风迎降，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连连陷落。

南宋政府惊恐万状，仓促无应对之策。宋度宗已于这一年的七月死去，四岁的儿子赵昀即位，朝政由谢太后（宋理宗后）主持。谢太后一面督促贾似道出兵拒战，一面下诏各地起兵“勤王”。

贾似道既无心抵抗，又求和不得，慑于群情，只得勉强督师

^①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陈仲微传》。

迎战。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贾似道率各路军兵13万，“金帛輜重之舟，舳舻相衔百余里”，^①进驻芜湖，与夏贵军会合。贾似道先派人向伯颜求和，表求“输岁币称臣”，遭到伯颜的拒绝。于是贾似道被迫作应战准备，派孙虎臣统领步兵7万为前军，驻丁家洲；夏贵领水军战舰屯驻鲁港（今安徽芜湖南）。元军水陆而来，步骑夹岸而进，又用战舰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孙虎臣军溃败，逃到鲁港。夏贵临阵弃军而逃，军资器械尽为元军所获。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从鲁港逃往扬州。元军乘势攻击，宋军水陆两军主力几乎全部丧失。

南宋政府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贾似道罢官，贬到循州，途中贾似道被押解官杀死。

六、临安陷落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元军在丁家洲大捷后，继续沿江东下。太平、和州等地的宋将投降，元军进至建康府。驻守建康的宋沿江制置大使赵溍弃城逃走，建康都统翁福出迎元军。三月，元军进入建康。伯颜分兵取镇江、江阴、无锡、常州、广德等地。这时，南宋政府的对策是诏谕宋降将吕文焕、范文虎、陈奕等出面向元朝“通和议息兵”^②。同时，任命王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右丞相兼枢密使，二人并都督诸路军马，以作最后的抵抗。宋将张世杰在镇江集结战船万艘于焦山（今江苏镇江以东）水域，以十舟为一方，抛锚江中，阻击元军。元将阿术采取火攻，兵分三队，两翼夹射，自率中队冲击，乘风施放火箭，焚烧宋军船篷。宋军连舟沉锚，转动困难而败退。此后宋军和平江、安吉、广德、溧阳、常州也打了几个胜仗，元军进攻的势头有所减弱。但是，宋终于无法扭转败局。

①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

② 《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纪》。

七月，伯颜至上都面呈战况，请求增兵以攻临安。忽必烈同意所请事项，并命阿术与博罗欢进攻淮南牵制宋军南援；命阿里海牙攻湖南，宋都觥等取江西，以截断南宋东西联系。

十一月，元军三路进攻临安。一路由阿剌罕统率，从建康出广德，直取余杭县西北的独松关；一路由董文炳统率，取嘉兴府的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循海而南；伯颜居中道节制诸路，出平江，期会临安。

元军大兵分道进逼临安，南宋官员多乞降者，主张抗战到底的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等数人。

张世杰原是金将张柔的部下，张柔降元后，他率部投宋。伯颜大举南进时，他驻守的郢州，挡住了元军的去路。伯颜绕道由唐港走水路入汉东。勤王诏下，张世杰领兵入卫临安，途中收复饶州。陈宜中见他来自元军后方，不加信用。以后他率军收复平江、安吉、广德、溧阳等地，兵势颇振。不久，他与刘师勇率舟师在镇江焦山作战失利，退守临安。

文天祥是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以状元出任赣州知州。勤王诏下后，他“尽以家赀为军费”^①，组织勤王军队至临安，先受命驻守平江，后奉调守余杭。元军攻占常州、平江、独松关等地后，他还守临安。

文天祥与张世杰商议说：“淮东州郡坚如铁壁，闽广之地完整无损。今勤王兵尚有数万，与敌人血战，万一得胜，即命淮东出兵截杀元兵后路，国事还有转机。”二人联名提出建议，丞相陈宜中一意求和，怕因此触怒元军而不从。

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元军进至离临安仅有30里的皋亭山。文天祥、张世杰再三恳求三宫（太皇太后、太后、皇帝）入海，他们愿率军背城一战。陈宜中和谢太后已决意投降，拒绝一切抵抗的要求。正月十八日，谢太后亲具降表，遣监察御史杨应奎送上传国玺乞降。伯颜接受降表，派人叫陈宜中

^① 《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传》。

出城商议投降事宜。陈宜中怕被元军扣留，连夜逃往温州。张世杰不愿投降，率兵扬帆入海，撤往福州。“文武百官，亦潜相引去。”为了避免元军尽虏宋宗室，谢太后封瀛国公（恭帝）赵昀之弟赵昰为益王，判福州；赵昺为广王，判泉州；由苏刘义护送出走婺州。元兵追赶，不及而还。

陈宜中逃走后，国事没人主持，伯颜又定要丞相出城接洽。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前往元营谈判。文天祥与伯颜“抗论皋亭山”，伯颜“怒拘之”，^①押解到镇江。二月，赵昀正式上表投降。元改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并发布文告接管临安。三月，伯颜进入临安，赵昀被送往大都（今北京），谢太后因病暂留，稍后也被送往大都。临安失陷后，宋军残部仍在各地继续进行抗战。

七、重建新朝与厓山之战

谢太后和赵昀投降后，下诏书命各地继续抵抗的宋军投降。扬州守将李庭芝射杀来使，拒绝投降，直至最后兵败牺牲。元军先后镇压了南宋少数分散反抗势力，占领江西、湖南、四川、两浙、江苏等大部分地区。张世杰等率部陆续集中到福州，准备重建新朝，恢复旧疆。

德祐二年五月一日，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拥立益王赵昀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陈宜中任左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宋兵仍有17万。这时，文天祥从镇江逃出，走海路至温州。五月下旬，文天祥到福州后，被新朝任命为右丞相、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他见陈宜中居中用事，自己不过徒有虚名，便连上辞章。结果改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提出领兵由温州、台州方面恢复两浙，为陈宜中所阻。

^① 《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传》。

七月，文天祥离开福州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募兵，谋收复江西。文天祥在南剑州建立督府，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组建了一支由原江西旧部为核心的抗元队伍。以后，文天祥移兵汀州，派督军赵时赏、督咨赵孟滌率一军取石城，收复宁都。遣督赞吴浚率一军从瑞金收复雩都（今江西于都）。

九月，元军占领广西、广东大部分地区后，又分道进攻赵昀朝廷控制的福建、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地区。元将阿剌罕、董文炳率舟师从海道出明州，塔出、吕师夔、李恒以骑兵出江西。元兵入福建，知处州李珣出降，知南剑州王积翁弃城而逃。赵昀小朝廷受到威胁，陈宜中、陆秀夫、张世杰等奉皇帝赵昀乘海船逃往海上。元兵攻占福州，进至福安县，秀王赵与择战死。十二月，赵昀等的海船停泊在广东惠州附近，在水上飘流。

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七年，1277年）正月，文天祥率部移驻漳州龙岩（今福建龙岩），三月又移屯南岭下的梅州（今广东梅县）。文天祥派往江西的两军失利，赵时赏、赵孟滌从石城撤军，吴浚率部降元。五月间，文天祥率军挺进江西。

从元军进陷江西时起，江西人民就不断起来反抗。吉州泰和县针工刘士绍联络当地人民，企图夺取县城，失败被俘后，咬破手指写血书：“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①然后自尽。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巡检李梓起兵守城，到文天祥进兵时，已坚持斗争长达一年之久。文天祥的军队一到，江西各地纷纷起而响应。文天祥的妹夫彭震龙在永新（今属江西）起兵，收复县城。另一妹夫孙栗也在吉州龙泉起兵。抚州何时起兵收复崇仁县。文天祥率军迅速挺进会昌，在雩都败元军。接着，攻下兴国，收复赣州和吉州属县。文天祥亲驻兴国指挥攻打赣州和吉州城。与此同时，宋将张镇孙复广州，张世杰复潮州。淮西人刘源起兵复黄州、寿昌。张虎起兵宝庆府（今湖南邵阳），攻下新化、安化、益阳、宁乡等县。衡山人赵璠起兵湘乡。长沙人张唐起兵

^① 《文文山全集》卷十九《附录》。

收复衡山、湘潭、攸三县。攸县人陈子全、王梦应率众攻克袁州萍乡县，袁州元兵赶来镇压，被义军击败，杀死元军曹千户大小头目多人。接着，义军再败来万户所率元军，杀死元军多人。

文天祥派人到各地去联络，各地抗元力量也纷纷派人前来兴国与文天祥取得联系。一时颇有起色。但是，文天祥等人抗元的胜利，是在元军主力北撤，南线空虚的情况下，暂时取得的。从至元十二年（1275年）起，元西北地区发生了宗王火忽的叛乱。至元十三年（1276年），又有阿力麻里的诸王昔里吉叛乱。一时漠北震动，居庸关外戒严，元世祖忽必烈被迫把伯颜、阿术调回，讨伐叛王。文天祥等取得胜利，都与这一形势有关。而当元朝调整兵力，主力南进时，文天祥这一支临时编成的、训练不精、缺乏实战经验的军队，就抵挡不住了。

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八月间，元朝元帅李恒率精骑增援江西元军。围赣州的张汴、赵时赏部突然遇敌，仓促接战，无法挡住元骑兵的冲击，败退雩都。元兵乘胜攻击文天祥的兴国大营。文天祥领兵北撤，想与攻打吉州的邹沔部会合。行军途中，邹沔部也被元军击败，文天祥领兵败退庐陵，被元兵追及。老将巩信领数十名兵士阻击方石山口，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等壮烈牺牲。文天祥退至空坑，又被元兵追及，将领和兵士死伤无数，妻子被俘。十一月，文天祥率残部移到循州（今广东龙川），屯兵南岭山中。各地抗元力量相继失败。

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文天祥出南岭，进兵海丰。三月，遣弟文璧率军收复惠州。宋广州都统凌震、王道夫也收复广州（张镇孙复广州后，不久又被元军攻占）。四月十六日，宋端宗赵昀病死在广州湾的硃洲岛。在此之前，陈宜中逃往占城（今越南境内），从此一去不返。陆秀夫、张世杰与群臣拥立八岁的卫王（广王改封）赵昺做皇帝，改元祥兴。五月，文天祥与朝廷取得了联系。六月，朝廷迁到厓山。厓山位于广东新会县80多里外的海中。这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成为宋朝政府最后一个落脚点。八月，朝廷加封文天祥少保、信国公。文天祥请求入朝，优诏

不许。文天祥因此对陆秀夫很不满，写信给他，批评他们不恤军士，只用空头官爵搪塞。陆秀夫看了只是叹息，不能作答。

十一月间，文天祥率部进驻潮州潮阳县，邹瀛、刘子俊等旧部也前来会师，一时兵势稍振。文天祥图谋凭借潮阳山海之险，进行招兵屯粮，作为中兴的根据地。然而，元朝已任命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元帅，率领元军水陆步骑并进：水路由浙江的秀州、明州泛海进攻厓山宋朝廷；陆路由福建的漳州、泉州进攻潮阳文天祥部。

文天祥得报，一面火速奏报厓山朝廷，一面撤离，向海丰转移，准备进南岭山中固守。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文天祥率军行至海丰北面的五坡岭，突然遭到元军的袭击，文天祥被俘，部属或战死或被俘，全军覆没。

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六日，张弘范率水军从潮阳出发，大举进攻厓山。十三日，元军舰队抵达厓山。张弘范派遣李元帅到关押文天祥的船上，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愤然拒绝，并在招降书上留下了千古传诵的《过零丁洋》诗，最后两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①以此作为回答。

在厓山的宋军决心与元军战斗到底，张世杰、陆秀夫、赵昺和全体人员都登上海船，1000多条战船联结成水砦，自正月中旬起激战20多天，元军无法取胜。元军封锁海口，截断宋军淡水来源，宋军被困，饮海水解渴，纷纷呕吐，战斗力下降。张世杰率领宋军将士仍坚持战斗，多次打退元军的进攻。元军用火攻，也被宋军击退。二月初六日，张弘范率军向厓山宋营发动总攻，宋兵遭到南北夹击，仍拼死拒战。但众寡不敌，渐渐难支。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令家人跳海，然后负小皇帝赵昺投海，宋朝官兵跳海殉国不计其数，“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②张世杰乘天

① 《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传》。

② 《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纪》。

黑砍断系船的绳索，拥着杨太后突围出去。他招集残部，想再图恢复，不意突遇台风，在螺岛海船倾覆溺死。身囚在元军船上的文天祥，见此情景，提笔写下了《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其中有：“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厓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等诗句，^①记述了厓山之战的情形。南宋厓山之战失败，最后灭亡。

从1234年开始的宋蒙战争，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较量，最终以南宋灭亡而结束。从整个战争的全过程来看，南宋仅在战争初期有过规模较大的主动进攻之外，以后基本上是处于被动防御。凭借江、淮等地形条件和水师的优势，是南宋实施防御的两件法宝。在蒙军攻城技术落后和水师缺乏的情况下，南宋利用善于守城和水战的特长，故能在一段时间里遏止蒙军进攻势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的局面改变之后，^②一支强大蒙军水师的出现，南宋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在与蒙军决战中，南宋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种种弊病充分显露出来。南宋腐朽的政治不但制约军事力量有效发挥，而把仅有的防御能力也丧失殆尽。襄阳之战标志着南宋消极的单纯防御指导思想的失败。临安失陷，是南宋苟安江南的结束。以后，南宋流亡官员和宋军残部所重建的新朝，力量极弱，已无回天之力，厓山之败是其必然的结局。

① 《文文山全集》卷十四《指南后录》。

②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刘整传》。

第十四章 军事学术与军事思想

南宋、金时代是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社会处在大统一的前夜，军事较量日趋紧张激烈，因此军事问题成为令人关注的热点。通过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寻找富国强兵之路，为时人孜孜以求的愿望。一时间，不但军事家、政治家谈兵，连文学家、哲学家也纷纷著书立说，发表军事见解。于是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在南宋、金时期又掀起一个繁荣发展的新高潮。

第一节 军事学术的繁荣

一、南宋兵学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兵家辈出，兵家著述甚丰。尔后，兵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对沉寂的状态。自北宋中期以后，中国的兵学开始渐有起色；到南宋时代，兵学的发展又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仅兵制著作就有 20 多部；有关兵学的论文、奏疏、札记等数量甚多，难以准确统计。南宋兵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兵制研究的成就、城市攻防理论的发展和作战理论的进步等方面。

（一）兵制研究的成就

南宋军事学术的成就以兵制研究最为卓著，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超过前代。南宋兵制研究的昌盛，有着一定的政治和历史原因。

从 1125 年末到 1127 年初，所发生的宋金战争，仅短短一年多，称雄一个半多世纪、素有国富兵强之誉的北宋王朝，竟然被

其貌视为“化外夷狄”的金兵打得一败涂地，最终落得兵溃国亡、二帝遭擒的下场。南宋建立后，仍无法摆脱金朝军事势力的威胁，以致宋高宗曾向金表示“愿去尊号”，“比于藩臣”。^① 增强军事力量，以有效地抵御金朝势力的南下，并进而收复中原，“合天下而为一体，合夷夏而为一统”^② 的呼声，在南宋朝野时有出现。岳飞军收复襄阳及三次北伐，张浚发动的北上伐金战争，宋孝宗、韩侂胄策划的“开禧北伐”等几次主动的军事行动，却都以夭折、失败或功亏一篑而告终。北宋兵将众多而何以亡国？南宋又为何不能恢复中原，不能重振军事强国的雄风？这是南宋的武将和文人士大夫所深感痛心疾首，并经常讨论以求解答的问题。探寻的结果，他们往往把国家军力的盛衰归结于兵制的得失上面。于是，兵制问题就成为当时的中心议题之一，以致连理学家朱熹、心学家陆象山也都发表过有关兵制的论述。在讨论宋代兵制利弊得失之时，往往追本溯源，从前代兵制中寻求理论依据，随之使研究历代兵制蔚然成风。这就是南宋时兵制研究昌盛的主要历史原因。

南宋王朝从建国之日起，在指导方针上就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妥协求和、消极防御，一种是主张积极备战、收复中原。并由此而形成了抗战派与妥协派持续不断的斗争。在激烈的论争当中，现行兵制问题往往成为争执的焦点。对于有碍增强军事力量和反攻中原的现行兵制，抗战派常常要求改革，如李纲、宗泽、岳飞、华岳、文天祥等人都曾上书皇帝，提出过改革兵制的建议。妥协派也常常借谈兵制向抗战派发难。宋光宗时，妥协派留正执政，大谈宋朝防范大将专权的“祖宗旧法”，攻击抗战派将领握权过重，趁机剥夺他们的兵权。南宋的政治派别斗争，又常与当时思想上理学与反理学等学派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在参与论争中，往往借兵制问题阐述论点。以上是南宋兵制研究盛行的政治背景。

① 《要录》卷二十三，第484页。

②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一《再上皇帝书》。

南宋兵制研究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型类书中出现独立的兵制门类。南宋以前的类书，对兵制缺乏重视，大多不收兵制资料，也无兵制门，极少列有兵类之书，内容也多疏阔。南宋时，编纂类书，已经十分重视兵制的地位。当时，编纂的大型类书中影响较大的有章如愚的《山堂考索》和王应麟的《玉海》，两书均对兵制予以相当重视。

章如愚，字俊卿，南宋婺州（今属浙江）人。他所编纂的《山堂考索》（一名《群书考索》），分前、后、续、别等集。全书除前集之外，其余3集都专列有兵制门。如后集共分为7门，兵制占有1门，续集分作15门，兵制也占有1门；别集分成11门，兵制又占有1门。全书所列门类甚多，而能在3集中都占有1门者，仅诸史、文章、律历、财用和兵制。足见把兵制置于很重要的地位。

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南宋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他编撰的《玉海》一书，共200卷，分为21门，平均每门不足10卷，而兵制独立为1门，共有16卷，篇幅在各门中居于第4位。可见此书兵制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值得重点一提的是，《玉海》兵制对兵制研究的内涵已有相当明确的看法。它说：“历代兵制沿革，或出于民，则考其成丁归农之限，耕战部伍之法，调发教阅之节，屯戍替易之期；或出于兵，则考其兵民之分自何时兴。其部伍调发廩给之制，历代之兵内外轻重之势，用兵道里之远近，历时之久速，形势之利害，粮食之难易，将权之专杂，军律之得失，皆当详考。”^①《玉海》兵制所划定的研究范围，包括兵役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军队部署、军事训练、军队调动、后勤管理、军权和军律等方面的内容，这对于后来军制学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有关军事史料价值来看，《玉海》兵制也颇为重要。它收录上古至宋代的大量珍贵资料，有些为该书所仅存。如所引《邲侯家传》有关李泌和唐德宗讨论府兵制度的史料，为前代史书

^① 《玉海》卷一百三十六。

所失载。^①

二是兵制史专著的大量出现。南宋以前，未见有专门的兵制史著作。建炎末，南宋开始官修《祖宗兵制》，“谨列自建国以来兵制沿革，与夫祖宗御戎备边，又诸军兴废所因，详著于篇者，凡二百卷”。^②以后，史官进呈宋高宗，被赐名《枢庭备检》，藏于枢密院。此书后来失传。南宋个人所撰的兵制史著作很多，如陈傅良的《历代兵制》、钱文子的《补汉兵志》、王珩的《西汉兵制》、易祓的《汉南北军制》、唐仲友的《鲁军制》等，其中以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和钱文子的《补汉兵志》最有影响。

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通史类兵制研究专著，全书8卷，内容“上溯周乡遂之法及春秋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详”。^③（具体内容详见后文专题）

钱文子的《补汉兵志》是一部断代兵制史。钱文子，字文季，南宋乐清（今属浙江）人，曾官至宗正少卿。此书名为兵志，实则专述兵制。因此，钱氏门人陈元粹在《补汉兵志序》中称该书是“补兵制”。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钱氏书时作《补汉兵制》，看来并非笔误，而有所本。《补汉兵志》主要是从《汉书》本纪、列传及诸志中“载及兵制者，裒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④书中推崇寓兵于农，主张居重驭轻，“所论切中宋制之弊”。《四库全书总目》说：作者著书的目的是“为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⑤颇有道理。

三是涉及兵制的著述增多。南宋时期，除专门的兵制史著作之外，与军事相关的一些著作中兵制也占有重要位置。如陈亮的《酌古论》、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和《九议》等，亦以较多笔墨讨论兵制问题。李道传的《江东十考》所考证的问题，大多也属于兵制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非军事著述亦颇重视兵制。如吕

① 《玉海》卷一百三十八。

② 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

③④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第710页。

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专设有兵制门类；叶适的读书笔记《习学记言》亦多处讨论兵制，并提出“由募还农”等改革兵制的主张。

（二）城市攻防理论的发展

城市攻防战出现之后，城市攻防理论随之产生。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战国的《墨子》一书，是较早涉及攻守城问题的著作。书中关于城防设施、器械、兵力部署以及守城方式等方面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战国以后，城市攻防理论的发展较为缓慢。到南宋时代，城市攻防理论有了重大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专门论述城市攻防的著作面世和有关军事、政治的著作中大量出现攻守城方面的论述。

南宋时代的城市攻防理论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城市的作用加大有关。南宋时代，城市的发展较快，其政治、经济、军事的作用日趋重要，一座城市的争夺往往关系到整个战局的胜负。因此，当时不仅南宋重视攻守城战法，而长于野战的金军、蒙军也开始着意于攻守城作战。在城市攻防战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城市攻防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二是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用于攻守城作战。宋以前的冷兵器时代，攻城利器不外乎弓弩、云梯等，建立较为牢固的防御体系并不困难。然而，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火器大量应用于攻守城作战，使攻守城战斗中出现许多新的作战方法。于是通过理论上的总结，完善和推广作战中的经验，在当时就显得十分迫切。

在城市的发展和武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城市攻防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但有关城市攻防的论述明显增多，而且出现专门论述城市攻防的专著。其中以陈规的《守城录》、赵万年的《襄阳守城录》、赵与峕的《辛巳泣薪录》等影响较大。

陈规的《守城录》不仅总结了前代城池防御的基本经验和理论，更重要的是阐述了火器应用于战争以后出现的新的城市防御作战原则，城防设施变革和守城战具改进的情况，开创了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城市防御理论之先河，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城防理

论（有关该书具体内容见后文专题）。

赵万年，字方叔，南宋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人。他所撰写的《襄阳守城录》，是继《守城录》之后的又一部关于城市攻守方面的著作。书中不但记录了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襄阳守军抗击金兵围攻90多天的战况，而且此书后“附战具诸法颇详”^①。《襄阳守城录》最突出的是强调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火器等战具进行防御，并实施防守和出击相结合的战法。如书中所记述的防御经验，或夜半突袭“用霹雳炮打击，城外虏人惊惶失措，人马崩溃”；或在城上“擂鼓发喊，并打霹雳炮击城外，虏骑惊骇”；都是极为重要的城市防御作战之策。

赵与袞的《辛巳泣蕲录》，是记述嘉定十四年（1221年），南宋蕲州守军与攻城金军作战的纪实性著作。当时，赵与袞出任蕲州司理，协助守将赵诚守城。书中涉及到城防设施、攻守城战具、作战方法等多方面。如在武器方面，仅火器该书记蕲州所存有弩火箭7000支，火药箭1万支，蒺藜火炮共3000只，皮大炮2万只等。但是，仍无法与金军用于攻城的铁火炮相比。它说：铁火炮“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爆炸时“其声大如霹雳”，“震动城壁”；打在城上，守军中炮即死，甚至“头目而霹碎”。此书记述了火器大量应用于攻守城作战之后的战法。

以上三书均出自主持或参与守城人之手，因此书中所总结的经验有很强的实用性。《守城录》面世后，曾广为流传，在整个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一直被奉为“诸将守法”。其他两部著作也颇受后人所重视。

（三）作战理论的进步

南宋时代，由于战争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变化，使作战的理论也随之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作战的著述，如《采石战胜录》、《淮南从军记》、《顺昌战胜录》、《江东十鉴》、《御侮录》、《百战奇法》、《酌古论》等，其中在作战理论方面有所建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二，第472页。

树者，当推《百战奇法》、《酌古论》两书。

《百战奇法》是一部专门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的军事理论著作，以往曾被更名为《百战奇略》，托名明人刘基所撰。最近经军事史学者考证为宋人著作，在南宋已广为流传。^①此书在前人作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古代战争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见，对后人影响很大（详见后文专题介绍）。

《酌古论》，南宋陈亮著。陈亮（1143～1194年），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本书通过对19位历史人物用兵作战经验教训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观点。

一是应变的原则。陈亮认为，由于战争过程是在不断变化，因此要有“应变之道”^②。所谓应变之道，即军事行动要随战局而调整。《酌古论》中多处论及“随机处置”，“随机据守”，“因其势而利导”等，都体现了应变原则。

二是重视“义战”。陈亮认为，“去诡诈而示之以大义，置术略而临之以正兵”，^③以正义之师攻击虽然勇敢而且狡猾的非正义之师，战争的结局必然属于正义之师。

三是战略与战术。陈亮多次提到术的概念，并认为作战指导中有两种术：一种“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世之所谓术也”。另一种“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后，次第收之，而无一不酬其意”。用现代军事学观点分析，陈亮所说的前一种术是战术，后一种术是战略。陈亮认为，两种术以前一种术，“犹有所穷”，作用有限。后一种术，“无一不酬其意”。掌握后一种术，而后才能谈前一种术。这样，在“事变日异”的战争中，方能“沛然应之，而天下可以指挥而定”。^④这对于战略指导与战术应用之间的从属关系，分析较

① 参见张文才《百战奇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② 《陈亮集》卷八《酌古论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 《陈亮集》卷七《酌古论三》。

④ 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五《酌古论一》。

为透彻。

二、南宋著名军事著作

南宋的军事著作宏丰，在前文已有所论及。此处着重对部分军事名著加以介绍。

（一）《历代兵制》

《历代兵制》，共八卷，南宋陈傅良编纂。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宋孝宗乾道时进士，宋宁宗朝曾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宝谟阁待制。^①本书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体裁的兵制专著。

《历代兵制》内容包括自周秦到宋代的兵制，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七卷按照朝代次序分为周、春秋、两汉、王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第八卷专论宋朝兵制。前七卷作者采用辑录史料、注释和按语等形式，对周秦至五代的兵制利弊得失进行了总结。作者在论述前代兵制时，常与宋朝兵制相比较。如阐述周代兵制时说：“周有南国之师，晋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泽之甲，皆全军更役”。^②第八卷的体例与前七卷有所不同，没有注释、按语等，仅作单纯的论述，“言之尤详”^③。从全书体例和内容安排来分析，作者经世致用的意图明显，目的是为南宋军事方面提供借鉴。《四库全书总目》说：“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④

《历代兵制》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最突出的是养兵和用兵问题。作者认为，北宋初期，“兵少至精”；中期用兵西北，“兵增至

① 参见《宋史》卷四百三十四《陈傅良传》。

② 《历代兵制》卷一，道光瓶花书屋校刊本。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0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

六十万”；到宋仁宗皇祐年间，“兵已一百四十一万”。而且，增兵的趋势仍在发展。“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之制未有烦于今日者也”。^①由此带来一系列养兵问题。国家财政开支增大，人民负担加重，军队战斗力下降等，都与冗兵有很大关系。作者赞赏寓兵于农、兵农不分的制度，“居无事则耕于野”，“有事则命将以出”。^②认为这样能解决养兵问题。

关于用兵问题。作者认为，“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③，内外失衡是引起战乱的原因。内外均衡的关键因素是领兵将领，“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④。主张朝廷对兵权严加控制，使“兵无专主，将无重权”^⑤。战时任命将帅带兵出征，战后将帅归于朝。将帅不握有重兵，祸乱就难以产生。

作者通过对历代兵制的比较，推崇唐初的府兵制和北宋初期的军制。他称颂唐初的府兵制是“兵制之善莫出于此”^⑥。盛赞宋太祖“躬定军制，纪律详尽”^⑦。兵力部署得当，“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无内外之患”。更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军事训练有素，“日课其艺，而怠惰无矣”。武器装备优良，“器械精劲，盈牝充积，前世所不逮”。作者还对北宋初年的后勤供给、军官任命、功过赏罚等方面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陈傅良并没有亲身参加过战争，缺少实战经验。虽然《历代兵制》中不乏真知灼见，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制度资料。但是，《历代兵制》不免也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例如，他说“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忽视发展变化；片面推崇府兵制，不适当地把府兵制的破坏，归结为“惜乎后人不能遵也”^⑧。作者对宋初兵制的赞誉，和对南宋兵制的评述，有矫枉过正之嫌。

①③ 《历代兵制》卷八。

②⑥⑧ 《历代兵制》卷六。

④⑤ 《历代兵制》卷二。

⑦ 以下引文见《历代兵制》卷八。

（二）《守城录》

《守城录》，共四卷，南宋陈规、汤琚著。陈规（1072～1141年），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靖康末，陈规任安陆令，后由知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升任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对这一地区的防御做出了贡献。^①绍兴九年（1139年），陈规迁知顺昌府，第二年与刘锜一起又阻挡住金军主力南下，取得顺昌之战的胜利。《守城录》一书，是总结守御德安、顺昌两城的经验以及陈规守城事迹。全书分为三部分：《〈靖康朝野僉言〉后序》、《守城机要》和《建炎德安守御录》。前两部分为陈规所撰，后一部分作者汤琚。汤琚，字君宝，南宋浏阳（今属湖南）人，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②他在任德安府学教授时，辑录陈规守御德安城的事迹，编为《建炎德安守御录》。宋孝宗乾道八年（1177年），曾诏刻《德安守城录》颁行各地，作为“诸守将法”。^③其他两部各自为帙。约在宋宁宗以后，三部合编为《守城录》一书，遂以合编形式流传于世。

《守城录》主要是阐述炮具大量应用于攻城之后，城市防御的理论。此书是南宋时期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书中反映的主要军事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变革城防体制。书中反复强调对旧有的防御体制必须变革。陈规说：“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因为“敌人攻械之备，亦前所未有”，^④所以守御也必然要随之改变。陈规提出许多具体的措施，涉及到有关城防的各个方面。例如，城门旧制，城门外筑瓮城，瓮城上一律修敌楼，以此“遮隔箭凿”很适用，“若遇敌人大炮则不可用”。因此，“城门不可依旧制”，^⑤除去瓮城，在城门前五丈的地方修筑一道护门墙，使敌人从外面看

①③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陈规传》。

② 《宋史》卷四百一十一《汤琚传》。

④ 以上引文见《守城录》卷一《陈规靖康朝野僉言后序》，守山阁丛书本。

⑤ 以上引文见《守城录》卷二《陈规守城机要》。

不见城门开关，不能轻易逼近城门，“万一敌人奔冲，则城上以炮石向下临之”。^① 城墙也需要改革，“将城角缩向里”，便于立炮。“若攻东城，即便近北立炮；若攻南城，则须近西立炮”。改吊桥为实桥，“门前施机械”，目的是“出兵快便之利”，以反击敌军。

2、城守与攻击结合。陈规反对一味死守，主张守城要“守中有攻”，以攻促守。通过积极的防守反击，“常使彼劳我逸”，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造成攻城敌军“昼夜备战，无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顺昌之战中，陈规与刘锜正是采用这一方法击败金军主力的。

3、善守在人。陈规认为，城池能否守住，主要在于守城的将士，“势之强弱在人”。城池不被攻破，“此必守城人中有善守御之策者”。城池被攻占，“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守之不善的原因是守城人“自甘心伏”，缺乏守城的意志。陈规强调，在守城中要尽量避免伤亡。提出“善守者有生无死”，保护自己才能消灭敌人的观点。陈规在他设计城防工事中，首先考虑到守城人的安危。例如，以往金军用炮攻城，“炮座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陈规主张把女头墙稍加高厚，并用大木造高一丈、长一丈、阔一丈上下，外直里斜，外密里稀洞子，外密处以大麻绳横编如荆竹笆相似，以备炮石众多攻坏女头墙。这样女头墙经过改造，又有洞子掩护，“炮石亦何能害人已”。^②

4、配制先进的守城器械。陈规认为，“攻守利器皆莫如炮。主张建立以炮为主要战具，采用大、小炮（均为抛石机）结合，“用炮摧毁攻具”。在敌人用炮攻城时，“用大炮与之相对施放”，兼用远炮（即小炮）射击敌军指挥官。“摧毁攻具，须用重百斤以上或五十斤大炮。若欲放远，须用小炮，黄泥为团，每个重五斤，轻重一般，则打物有准，圆则可以放远”。^③ 陈规在大量采用石炮守

① 以下引文见《守城录》卷一、卷二。

② 《守城录》卷一。

③ 《守城录》卷二。

城的同时，还生产和研制火炮、火枪，并用以守城。陈规所研制的长竹竿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以先进的器械增强城市防御能力。

（三）《翠微先生北征录》

《翠微先生北征录》，共十二卷，南宋华岳著。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属安徽）人。宋宁宗时，为武学生。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反对北伐，言辞激烈，请斩主持军政的韩侂胄、苏师旦等人，因而获罪下狱。在韩侂胄死后获释，继续入国学。后登嘉定武科第一，为殿前司官属。因谋去丞相史弥远，再次获罪下狱，被处死。^① 华岳著有《翠微南征录》和《翠微先生北征录》两书。《南征录》十一卷，除一篇上皇帝书外，其余内容均为诗作。《北征录》是专门论述南宋军事的兵书，内容几乎涉及到南宋军事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研究宋代兵制极有价值。现将该书主要论点归纳如下：

1、招兵原则。华岳认为，招募军兵“不可一概论”，用一个固定的标准。应当采取“有一技则生一材，有一材则济一用，用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②

2、攻城夺地的原则和方法。华岳认为，“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得地首要在于得人心，其次才是战术问题。对进攻淮北地区的金军，应采取以逸待劳，使敌人“夜不得以偃卧”，“居不得以饮食”，“日夜惊惶而进退无策”。并总结出“守城之秘法三十六”则和“攻城之秘法四十二”则。^③

3、“边防要务”。华岳认为，南宋边防的重心在于“修山水寨”。这一措施，“于官无费于民有备，而守边之政举矣”。^④ 并对寨的建置、将领的任命和武器的配备等，都作了论述。

4、“屯守之地，当以要冲”。华岳强调地理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①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华岳传》。

②③ 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一《平戎十策》，贵池先哲遗书本。

④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四《治安药石》。

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冲要，天下有天下之冲要。不知重守其所谓要害之冲，而一切泛然。”^①

5、“恩威不明，三军之大患”。华岳认为，南宋朝廷对军队多有厚此薄彼、赏罚不明之处。例如，“重效用、马校，而轻于吐浑、威雄”。“厚于万弩手，而薄于忠义民兵”。要求对这一现象，“急为之变更”。^②

6、和议不忘备战。华岳反对“以为和可恃而废兵”，指出“和已成而废兵，则他日之祸盖有甚于和之先者”。^③

7、“破敌长技”。华岳认为，金军长于骑兵作战，而当前通行用车和弩对付金军骑兵的办法成效不大。他设计出一套“陷骑”、“御骑”的战术和器械，“凡二十四法”，多有新创。^④

8、注重情报的作用。华岳把军事情报工作划分为采探、候望、聚探、关递、密辨等名目。华岳认为，“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采探即“召募间谍”，深入敌境，掌握“敌国之虚实，所谓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⑤ 候望、聚探、关递、密辨等都是采用不同的方式，以掌握敌军的情况。

9、将帅带兵方略。华岳总结出将帅带兵的要点：搜伏、反泄、暗认、潜易、易将、易兵、急据、分渡、自认、就顺（顺山、顺水、顺风）等。

10、兵器和铠甲制造。华岳用两卷的篇幅叙述器甲的制造，他对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弩手甲制、弓制、弩制、弓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叉枪制等，从材料选取，到制作方法和用途，都一一作了详细的叙述。

①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四。

②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一。

③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三。

④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五。

⑤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九。

11、“足兵便民之策”。华岳强调要妥善处理兵民关系。认为“养兵所以卫民，岂可为兵而殃民哉”。“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解决足兵和便民之间的关系，应采取“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①

此外，华岳对于与军事相关的马政、财政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四）《百战奇法》

《百战奇法》，^②作者不详，约成书于北宋末、南宋初。本书是专门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的军事理论著作。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版本为明刻本，全书共10卷，分为前后两集，每集5卷，每卷10战，合为百战，故名为《百战奇法》。书中涵括的军事思想内容甚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人的作用。《百战奇法》用顺、逆和直、曲等以区别战争的性质，并以此说明战争存在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在《生战》篇中说：“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击愚，皆无疑也”。要求人们对正义性的战争有坚定不疑的信念。书中多处强调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并专门列有《人战》篇，以突出战争中人的重要性。在《生战》篇中说：“凡与敌战，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阵，法令已行，奇兵已设，要当割弃性命而战，则胜。”说明具备作战条件之后，部队能否发挥不怕流血牺牲的奋勇杀敌精神，是获胜的关键。

2、辩证地对待战争。在《好战》篇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黷武穷兵，祸不旋踵”。在《忘战》篇中又强调：“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天下无事，不可废武”，“必须内修文德，外严武备”。告诫人们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种以辩证的观点看待战争，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①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十一。

② 有关《百战奇法》一书参阅张文才《百战奇法浅说》及谢国良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3、治军以“教战”和“为将之道”为本。《百战奇法·气战》篇指出：“将之所以战者，兵也。”要求把士兵作为进行战争的主体力量，因而十分强调搞好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在《教战》篇中说：“凡欲兴师，必先教战”。对待士兵不单纯是军事教育，还必须要进行思想教育。《气战》篇中说：“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盛者，鼓也”。即部队作战依靠军心士气，而军心士气的由来离不开平时的思想鼓动工作。于是本书《怒战》篇强调：“激励士卒，使忿怒而后战”。《危战》篇说：“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不可怀生则胜”，都是强调要做好临战时的思想工作。书中在强调对士兵进行教育的同时，又指出将帅的表率作用是治军的关键。提出“为将之道”，必须具备“信”、“诚”和“甘苦共众”的思想品格，才能带好部队。只有将士一心，全军上下才能舍生忘死地去杀敌。

4、“以计为首”、“要在应变”的思想。《百战奇法》把战争的谋划，即“计”，看成是用兵之要。专列有《计战》篇，加以论述。它说：“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道。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断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主张战前对敌情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而后再行出兵攻战。在《知战》、《形战》、《变战》等篇中，亦以不同的侧面强调，分析和判明敌情的重要性，并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而灵活用兵。《变战》篇说：“凡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古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乃利。”强调因变制敌，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在《百战奇法》全书几乎都贯穿着这一应变的原则。

5、主张多方惑敌、误敌。在《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基础上，《百战奇法》提出，强则示以弱，弱则示以强；远渡示以近济，近攻示以远击，敌众则“设虚形以分其势”，敌贪则“以利诱之”；或“惊前掩后”，或“声东而击西”等惑敌、诱敌、误敌、制敌的作战原则。

《百战奇法》还对攻守、主客、进退、先后、虚实、分合、胜败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总之,《百战奇法》包含军事思想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总结和继承了宋以前的军事思想的精华,而且还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对速战和持久战的看法。《百战奇法》认为,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胜券在握之时,对来犯之敌,应采用速战速决的进攻战;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无获胜的把握之时,则要采取持久的防御战。这较之孙子单纯的“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①的速胜论主张,无论在实践上,还是认识上,都前进了一步。再如,孙子主张:“归师勿遏”、“穷寇勿追”。^②《百战奇法》则认为,对于“虽退走非败”之敌,“宜整兵缓追”;而对确属溃败之敌,则应“纵兵追击”,务求歼灭。这种区别不同情况,所采取不同的作战原则,较孙子的主张,更符合客观实际和战争指导的规律。

(五)《美芹十论》与《九议》

《美芹十论》与《九议》,均为南宋辛弃疾著。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虽以词人著称于世,但“颇谙晓兵事”^③。辛弃疾在青年时期曾起义抗金,后率部归南宋。《美芹十论》是辛弃疾写给南宋朝廷的一篇奏疏。此疏呈奏时间,据后世学者考证,当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④“美芹”一名,借用《列子·杨朱》中的美芹典故,自谦所献菲薄。

《美芹十论》论述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十个方面的问题。通过十论,分析宋、金政治军事形势,要求南宋政府备战抗金。文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1、正确认识形势。辛弃疾认为,形与势是两个问题,如果分

① 《孙子兵法·作战篇》。

② 《孙子兵法·军争篇》。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十《论兵》。

④ 邓广铭:《美芹十论作年考》,《辛稼轩诗文抄存》,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5~27页。

辨不清合而一，在战争中就不会取胜。他说：“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①形包括土地、财赋、军队，系指军事力量外在的表现形式。势则是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但是，“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金朝已处于“形与势异”的状态，不能被其貌似强大之势所吓倒。

2、“藏战于守”、“寓胜于战”。辛弃疾主张在和平时期也要常备不懈，“未战而常为必战之待”。如果进行战争就要有必胜的信心，“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

3、“聚兵为屯，以守为战”。辛弃疾针对金军南下的必经路线，建议宋廷集中十万兵力，以两淮为基地，分屯于山阳、濠梁、襄阳三处，在扬州或和州设置督府总领军事。敌人如果攻山阳，则坚壁不战；诱使敌军攻盱眙、高邮；濠梁分半数兵力与督府兵进击，断绝敌军粮道，截断敌军归路；襄阳之师出唐、邓，骚扰敌军后方。攻濠梁、襄阳也采取同一战术应敌。辛弃疾以两淮为基地，聚兵为屯，以守为战的御敌对策，是针砭南宋弃淮守江战略指导思想的。

4、重视“致勇”。辛弃疾把“致勇”作为战争的重要条件，并认为“此正鼓舞天下之至术也”。“致勇”，即激励和培养将士的勇敢精神。将士“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有所不敢避”。一旦军队达到“致勇”，就会“骄者化而为锐，惰者化而为力”。在战争中发挥出“守之而无不固”、“攻之而无不克”的作用。

5、任命将帅的原则。辛弃疾认为，朝廷对将帅要“信之专，期之成”。如果“任之不专，则不可以有成”。不能以一次胜负来决定将帅的去留。提出要对将帅“久任”，认为即使将帅水平再高，也必须通过持久的信用才能有所成就。“谋之虽审，亦必持久而后可就”。

《九议》，全称《上虞雍公九议》，写作时间当在乾道六七年间，是继《美芹十论》之后辛弃疾的又一篇重要军事论著。辛弃疾称

^① 以下引文均见《辛稼轩诗文抄存》第1~25页。

《九议》“所陈皆恢复大计”。^①《九议》中的某些论点和《美芹十论》相同。

“宜审先后”的原则。辛弃疾认为，指挥作战掌握出兵的先后至关重要。他说：“然而知所先后则胜，否则败。”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经过审慎的考虑，而后决定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

集中兵力的原则。辛弃疾主张集中兵力作战。他说：“凡强大之所以见败于小弱者，强大者分而小弱者专也。知分之与专，则吾之所与战者寡；所与战者寡，则吾之所以胜者必也”。辛弃疾反对处处设防，认为“四路备兵，势分备寡”。主张重点防御。

“合志并力，协济事功”。辛弃疾十分注重军队内部的团结，他认为对待军队，“以和辑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协济事功，则天下幸甚”。军队和辑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军队内部“自相为斗”，就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私战不解，则公战废”。

总之，南宋军事学术与前代相比有较大的发展。这从《通典》和《文献通考》两部典章制度名著中的有关“兵”的记述，也可以反映出南宋时期军事学术的发展情况。杜祐所撰的《通典》成书于唐中期，其中有关“兵”的部分，与其他门类相比，体例不一，杂乱无序，不记兵制而只论兵事，明显带有因资料欠缺和研究不足而勉强拼凑的痕迹。《通典·兵典》的缺陷，不仅是杜祐个人水平的原因，而是受当时兵制研究水平制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成书于元初期，其中《兵门》，内容从上古以迄南宋末，记述了历代兵制的内容、沿革以及发展变化的原因等，是真正反映历代兵制演变过程的《兵典》。从《文献通考·兵门》反映出的史实和论据来看，显然是大量吸收了南宋的军事学术的成果。可以说，如果没有南宋军事学术的繁荣和发展，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兵门》难有如此大的进步。

^① 以下引文均见《九议》，《辛稼轩诗文抄存》第30～40页。

三、金朝兵学的逐步建立

金朝的兵学是在同辽、宋、蒙作战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与繁荣的南宋兵学相比，金朝的兵学显得要稚嫩多了。这主要是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南宋社会文化事业是在北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基相当雄厚。南宋不但有兴盛的刻版印书业，而且有浓厚学术研究的气氛。这是立国较晚，而且建国之后才始从奴隶制迈进封建社会门坎的金朝所无法相比的。文化的落后，自然会影响到军事学术的发展。

金朝的兵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金朝文字出现较晚，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始有文字，因此早期谈不上兵学。在金、辽和金、宋战争中，金朝女真统治者才开始较广泛接触中原文化，并优礼儒士，注重搜集包括兵书在内的辽、宋图籍。^①特别是在灭亡北宋占领汴京后，北宋府藏书籍尽归于金，其中不乏宋朝多年收集的兵书。这无疑是对金朝兵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金朝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朝的兵学开始走上翻刻、注疏、译写的阶段。

金朝为兵书的广为流传，重新翻刻了不少的汉文兵书。例如，《孙子兵法》、《吴子》以及宋人施子美所著的《武经七书讲义》，就曾在金境内刻印过。据《金史》载：金熙宗皇统时设武举，许多汉籍兵书成为武举的必考科目。^②在翻刻兵书的同时，金代注释的兵书也随之开展起来。例如，目前所知的借道家面目而谈兵的《阴符经》，金朝就有刘处玄、侯善渊、唐淳的3个注本。翻刻、注

^① 《大金集礼》卷三《皇统五年增上太祖尊谥》载：“收图书，立制度”。

^② 《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武举，尝设于皇统时，其制则见于泰和式，有上中下三等。……又问孙、吴书十条；能说五者为上等。……孙、吴书十条通四，为中等。……孙、吴书十条通三，为下等。”

疏之外，金朝还大量翻译中原汉籍兵书。如《女真字太公书》（即《六韬》，或称《太公六韬》）、《女真字伍子胥书》（汉籍不详）、《女真字孙臆书》（疑为《孙子兵法》）、《女真字黄氏书》（即《黄石公三略》）等。^①女真文翻译的汉文军事典籍的大量出现，促进了金代兵学的发展。

金朝中期以后，金朝兵学开始进入撰写兵书的阶段。由于战乱等原因，金代遗留下的这方面的资料不多。目前所知金人撰的军事著作有3部：一是金章宗承安年间国子斋长张守愚所撰的《平边议》，一是金末马珣撰的《北新子》，另一部作者不详书名为《炀王江上录》。前两书均已失传，内容难以尽知。需要说明的是，《平边议》在《金史艺文志》被改作《平辽议》，看来有误。据《金史·章宗纪》载：承安元年（1196年）正月，“国子学斋长张守愚上《平边议》三篇，特授本学教授，仍以其议付史馆”。^②“平边”指平定北边部族。金章宗明昌间，金受到鞑靼等北方部族的侵扰。金廷对此大伤脑筋。直至明昌六年（1195年），即张守愚上《平边议》的前一年，金朝对北方部族作战才取得较大的胜利。史称：“右丞相襄率驸马都尉仆散揆等进军大盐冻，分兵取诸营”。^③张守愚撰写此书，正是对金朝与北方部族作战经验的总结。关于《北新子》，其内容仅能从元好问的《中州集》略知一二。“奉圣马珣公敢大言，著书十万言，号《北新子》。大略以谈兵为主，且曰：古人兵法非不尽，但未有《北新子》五十里火雨耳”。^④目前所能见到的《炀王江上录》，严格来说，是实录类著作。“所载汉臣劝金主都燕山，营汴梁，开海口，进兵采石，退至瓜州，为其下所害诸事，皆首尾毕具。”^⑤从这3部有关军事的著作已知情况来看，

① 倪灿、黄虞稷、钱大昕等撰《辽金元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5～48页。

②③ 《金史》卷十《章宗纪二》。

④ 元好问：《中州集》下册，第449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二，第472页。

金朝兵学的水平是较为落后的。

金朝后期，文人士大夫的著作中讨论军事问题的也明显增多。如刘祁《归潜志》中有多处论述金朝兵制等问题。

金朝的兵学，以兵书的搜集、翻刻、注释、译写到著述，反映出金朝兵学逐步建立和发展的轨迹。

第二节 军事思想的发展

一、南宋著名将帅的军事思想概况

南宋建立后，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军事将领，其中以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玠、孟珙、王坚、余玠、李庭芝等人最为著名。他们大部分没有留下专门的军事论著，但是从其散见于史书篇牍中的论述和军事实践，依然可见军事思想的概貌。现择选南宋名将有代表性的思想略作介绍。

（一）岳飞的治军和灵活用兵思想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名将。他的主要军事思想是主张从严治军和灵活用兵。

岳飞从严治军包括严格训练、严肃纪律、赏罚严明等方面。岳飞训练军队十分严格，平时常按实战和临战进行训练。如骑兵训练爬坡跳壕时，“皆披重铠，精熟安习”^①。甚至在止兵休舍时，也“辄课其艺”，并提出“视无事时如有事时”，常练不懈。岳飞通过严肃纪律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为此制定了许多律条。如规定“有践民稼伤农功，市场售直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对违犯军纪的部下士卒也绝不姑息迁就，“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之”。在作战中贯彻“有功者重赏，无功者峻罚”的原则。岳飞从严治军，训练出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死不

^① 以下引文见《金佖续编》卷二十三。

拆屋，饿死不打虏”的严明纪律，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岳飞不但严于治军，而且更善于谋略和灵活用兵。史称岳飞“自结发从军，大约经百战，未尝败北”。^①这无疑是与岳飞善于谋略，灵活用兵的思想分不开的。岳飞要求将士除了有勇敢战斗的精神，更重要是发挥谋略的作用。早年岳飞为张所部将时就说过：“勇冠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②强调作战要谋略在先。以后，成为独挡一面的大将时，对谋略的认识更加深刻，他说：“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无谋”^③。这就明确指出了谋略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岳飞也很注重灵活用兵，不赞同宋朝实行“将从中御”，将帅作战按照事先准备的阵图行事的做法，认为阵图乃定局，而战场千变万化，“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他说：“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若平原旷野，猝与敌遇，何暇整阵？”因此，他提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④这种根据作战情况灵活运用战法的思想，对于岳家军多次战胜金军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岳飞的指挥下，岳家军“皆可以一当百”，所向无敌，就连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⑤。

岳飞的军事思想不仅在当时的作战实践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对后世也颇有影响。

（二）韩世忠的以少击众思想

韩世忠（1089～1151年），字良臣，陕西绥德（一说延安）人，与岳飞齐名的抗金名将。他的以少击众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韩世忠以果敢著称，早年从军“挽强驰射，勇冠三军”^⑥。建炎时，金完颜宗弼率10万大军渡江南下攻宋，所向披靡。韩世忠

① 《金佗粹编》卷九。

②④⑤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

③ 《金佗续编》卷二十三。

⑥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

率领水军 8000 人，阻击金军归路，迫使金军进入黄天荡，前后与金军相持 40 多天，沉重打击了金军。绍兴四年（1134 年），在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大破金军。以后率所部 3 万人屯驻淮东，设宣抚司于临淮河的楚州，与金军隔淮河对峙。在淮东招集流散，通商惠工，发展生产，并联络金境义军，“约以缓急为应”^①，使淮东前线成为抵御金军南下的牢固防线。

韩世忠多次率领少数兵力与强敌作战，曾数次上书表示“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②。韩世忠的言行表明，他是主张和强调以少击众的，但可惜的是他未留下兵书，因而他的这一思想的具体内容难以言表。

（三）刘锜的注重政治鼓动思想

刘锜（1096～1162 年），字信叔，秦州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南宋抗金名将。刘锜指挥作战注重战前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通过政治鼓动，以激起高昂的士气，同仇敌忾战胜敌人。例如，在他“当同心力，以死报国家”^③的宣传鼓动之下，据守顺昌的宋军以寡敌众，以弱胜强，挫败 10 余万金军，阻止了金军的南进。

（四）吴玠的“兵以利动”和“务远略，不求小近利”的用兵思想

吴玠（1093～1139 年），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抗金名将。南宋前期，在川陕率军抗击金军，屡次挫败金兵入川的企图，对南宋西北地区的巩固功勋卓著。他的“兵以利动”和“务远略，不求小近利”的思想，^④在作战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兵以利动”，即作战首先要掌握有利的条件，尤其重视利用地理条件。他曾在金、宋富平之战时，向主帅张浚提出：“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的正确意见，^⑤这都是“兵以利动”思想的具体阐述。

①②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

③ 《要录》卷一百三十五，第 2171 页。

④⑤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

吴玠“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思想，是强调作战要把握全局，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

（五）吴玠的“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思想

吴玠（1102～1167年），字唐卿，德顺军陇干人，南宋名将吴玠之弟。他不但亲身参与和指挥数十次大战，而且著有《兵法》二篇。他的军事思想多有创新，尤以“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思想产生的影响最大。^①

吴玠的“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思想，即把金军长于骑兵野战优势与宋军步兵阵地战的优势结合起来，创造出克敌制胜的战术。他提出：“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他创制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史称吴玠“守蜀二十年，隐然为方面之重，威名亚于玠”。

（六）孟珙的“藩篱三层”的纵深防御思想

孟珙（1195～1246年），字璞玉，枣阳（今属湖北）人，抗蒙名将。他早年参加抗金，金亡后率军与蒙军作战，多次击败蒙军的进攻。以后，他长期在京湖、四川等地主持军务，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其中尤以“藩篱三层”的纵深防御思想影响为最大。^②

孟珙所谓“藩篱三层”，即创制副司及移关外都统一军于夔州，负责防守涪州以下江面，为第一层；备鼎、澧为第二层；备辰、沅、靖、桂为第三层。根据“藩篱三层”的纵深防御思想，孟珙把长江上流的防务和涪州以南至荆湖南路的防务连接在一起，使南宋长江中、上游的防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藩篱三层”的作用在作

① 以下引文均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

② 《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孟珙传》。

战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七）余玠的主张建立山城防御体系思想

余玠（? ~1253年），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人，抗蒙名将。宋理宗时，蒙古用兵四川，宋廷为加强四川防御，派他主持四川军事。余玠表示“当手挈全蜀还本朝”。^①他在四川进行大规模的城防建设，先后修筑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大获（今四川苍溪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云顶（今四川金堂）、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四川万县西）等10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②余玠部署军队驻扎大获城，以控扼由陕入川之路；屯兵在青居、钓鱼、云顶等城，以保障嘉陵江、长江水道；形成以点控面、水陆配合的坚固的防御体系。淳祐三、四年间，余玠与蒙军大小36战，有效地抗击了蒙军的进攻。以后，余玠发兵收复兴元，击退攻成都、嘉定的蒙军，巩固了南宋西北防线。

（八）李庭芝“训农治兵”思想

李庭芝（1219~1276年），字祥甫，随州（今湖北随县）人，抗元名将。他的军事思想突出的特点是重视兵民的作用，实行军民结合的原则。

李庭芝提出：“训农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教之”。通过民兵和正规军一起训练，“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兵至则悉出而战”。^③李庭芝主管两淮制置司事，据守扬州，数次挫败元朝重兵进攻；尤其在南宋灭亡后，仍继续坚守扬州数月之久，这与他发挥民众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金朝的军事思想概况

金朝在同辽、宋、蒙作战中涌现出一批有才干的将帅，其中

①② 《宋史》卷四百一十六《余玠传》。

③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李庭芝传》。

以完颜阿骨打、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完颜昌、完颜宗弼、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徒单合喜、完颜襄、完颜陈和尚等战绩卓越。他们的军事领导艺术不亚于南宋名将。然而，金朝军事著述却大大逊色于南宋。至今未见专门的兵书传世，目前仅见的有关军事的著述《炀王江上录》，不过是记述海陵王攻宋的事迹。因此，只有从有关诏令、奏疏、劄子、议、论等中，勾勒金朝军事思想概貌。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是一位精通军事的皇帝，他在长期征战中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对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金太祖治军思想的核心是“合心尽力”。^①这是在女真起兵反辽前，金太祖命将士传檄宣誓时提出来的。以后成为金朝治军的重要原则。《金史·兵志》说：金军“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②“志一”和“力齐”，即“合心尽力”，强调军队上下要团结合作，奋勇作战。直到金章宗时，仍要求军队“奋敌忾之勇，协心毕力，建立功勋”^③。

金太祖的作战指导思想突出的是集中兵力攻击中坚和胜不失备。在对辽作战中，金太祖说：“彼众我寡，兵不可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败其中军，可以得志”。^④金朝初期的将帅率军作战大都采用集中兵力攻击中坚做法，并在实战中取得很好的效果。完颜宗望在大鱼泊以千名女真骑兵击败辽天祚帝 2.5 万辽军，就是采用此法。^⑤金太祖多次告诫手下将帅，警惕在胜利之后松懈。他说：“不可恃战胜而失备御”，^⑥“不可恃一战之胜，辄有驰慢”^⑦。胜不失备这一指导思想，对金军在对辽作战中不断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①④⑦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②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③ 《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

⑤ 《金史》卷七十四《宗望传》。

⑥ 《金史》卷七十一《斡鲁古勃堇传》。

金太祖晚年提出：“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见可而进，无淹师期，事有从权，毋须申禀”^①是其作战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里面包含治军原则、战略战术、后勤工作、军风军纪、对敌政策等诸多方面内容。

金太宗和金熙宗统治时期，对宋作战的主要将帅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完颜宗弼、娄室、完颜昌、银术可等，几乎都参加过金太祖灭辽战争。这批将帅在对宋战争中，使金朝军事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金太祖时，经常采用分兵左、右翼先后出击的战术。^②此时发展为兵分左、中、右同时进击，“摧其两翼，元帅当中击之”^③。这一时期，在战略进攻方面，也常采用东、西、中三路出兵。另外，完颜宗翰提出“一失机会，后难图矣”^④的把握战机的原则；完颜昌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手段相结合的原则；娄室的“迭出迭入”^⑤战术；完颜宗望的“风行电举，兵无留难”^⑥的战斗作风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金朝军事思想。

金世宗时，金、宋双方军事上处于相持阶段。这一时期，金朝有代表性的将领是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徒单合喜等。他们的军事思想基本上是沿袭前代，少有创新。

从金章宗起一直到金末，由于金朝国力衰落和蒙古的兴起，金朝在军事上不断遭到失败。这与“人不知兵，将帅非才”^⑦有很大关系。金朝将领“或门阀膏粱之子，或宗故假托之流”^⑧，有才能的将领仅完颜襄、完颜陈和尚一二人而已。金朝传统的军事思想没有很好地发扬。例如，集中兵力作战的原则，在金朝后期与蒙古军作战中未能实行。卫绍王大安初，右丞相徒单镒曾说：“自用

①② 《金史》卷二《太祖纪》。

③ 《金史》卷七十二《毅英传》。

④ 《金史》卷七十四《宗翰传》。

⑤ 《金史》卷七十二《娄室传》。

⑥ 《金史》卷七十四《宗望传》。

⑦ 《金史》卷十六《刘炳传》。

⑧ 《金史》卷一百九《陈规传》。

兵以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①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金签河东北路安察事王扩也上书反对现行的“分军守隘，兵散而不成军”的做法，要求“聚之隘内，军合则势重”。^② 金军分散御敌，从而被蒙古军各个击破。

由于金军将帅无能，使金朝文臣一改“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的戒律，纷纷在军事方面发表意见，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军事思想带有鲜明的针对性，其中以陈规《条陈八事疏》、刘炳《条便宜十事疏》、王扩《陈河东守御策》、许古《请择将相招协从止搜括求直言疏》等最有代表性。

陈规提出“选将帅以明军法”、“拔卒为将”的治军原则。他说：“夫将者国之司命，天下所赖以安危者也。举万众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间以决生死，其任顾不重欤？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具殒，城守则阖城被屠，岂皆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哉，特以庸将不知用兵之道而已。”他认为“军官数多”，并不是好现象，“多则难择，少则易精”。主张选拔优秀人才充任将帅，“则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待敌矣”。陈规还提出“练士卒以振兵威”。认为“兵贵精不贵多”，以往“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为敌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独战而遂溃，此所以取败也”。建议挑选“武艺出众者别作一军，量增口粮，时加训练”。^③

刘炳提出要重视精神鼓励。他说：“人情可以气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则万夫齐备”。建议选择诸王英明者，“总监天下之兵，北驻重镇，移檄远近，戒以军政。则四方皆将自备，前死不避”。此外，还提出“结人心以固基本”、“修军政以习守战”、“去冗食以助军费”等主张。^④

① 《金史》卷九十九《徒单镒传》。

② 《金史》卷一百四《王扩传》。

③ 《金史》卷一百九《陈规传》。

④ 《金史》卷一百六《刘炳传》。

许古提出“将者贵谋而贱战”的原则。他认为具有谋略的将领能使士兵“由之而不知，三军奔走号令以取胜，然后中心诚服而乐为之用”。他说：“城守不坚，临战辄北，皆以将之不才故也。”将领与士兵上下离心，“兵轻其将，将畏其兵”，是不可能“出死力以御敌”。^①

总之，金朝著名将帅没有兵书传世，从史书记述中亦可约见其军事思想概况。

^① 《金史》卷一百九《许古传》。

后 记

本书承蒙中国军事科学院之邀，于1988年开始编写，历经8年，几易书稿，终于完成。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王曾瑜、吴如嵩、冯东礼和毛元佑四位先生给予很多的帮助。书稿完成后，承蒙周良霄、陈智超二位先生认真审阅，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并校正诸多讹误。王育成、平国梁、胡瑾、张秀玲同志在图片和图书资料等方面给予过援助。本书始终受到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同志们的关心帮助。这里我谨向曾关心和帮助过本书编著和出版的师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出现疏漏错讹，望专家和读者赐教。

韩志远